

西夏文献研究丛书

黑城出土 汉文遗书叙录

[俄]孟列夫 著

王克孝 译



宁夏人民出版社

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疏序

太原府太崇福寺沙門

澄觀奉

詔述

大哉眞界萬法資始包空有而絕相入
言象而無迹妙有得之而不有眞空得
之而不空生滅得之而眞常緣起得之
而交映我佛得之妙踐眞覺廓淨塵習

歷四十九海讀聲不絕大般若數十部至終七之
證義法師設藥師琉璃光七佛供養惠照禪師
西方無量壽廣大中國西天禪師提點等梵結滅
惡趣廻矧六道法事襲此功德伏願
帝統延昌邁山呼之景筭

西夏文献研究丛书

黑城出土 汉文遗书叙录



目 录

汉文版序言	(1)
导言	(1)
一 佛教作品	(3)
二 儒家和道家的作品	(15)
三 医书、历书、占卜书	(16)
四 历史著作	(18)
五 字书	(19)
六 文学作品	(19)
七 木版画和印章	(20)
八 文书	(21)
九 关于书籍和印刷史的资料	(25)
十 黑城出土汉文遗书中发现的历史资料	(38)
十一 书籍业技术方面的资料	(54)
十二 结论	(64)
十三 图表	(82)
黑城汉文遗书叙录	(87)
佛教经典作品	(87)
经部	(87)
《长、中、杂、增壹阿含经》(1—5号)	(87)
《佛说业报差别经》(6号)	(89)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7号)	(90)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8—62号)	(91)

《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 (63号)	(105)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64—66号)	(106)
《妙法莲华经》 (67—76号)	(107)
《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第二十五》	
(《观世音经》) (77—96号)	(111)
《大方广佛华严经》实叉难陀译 (97—103号)	
.....	(116)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四十,《入不思议解脱	
境界普贤行愿品》般若译 (104—127号)	(119)
《佛说阿弥陀经》 (128—132号)	(130)
《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 (133—143号)	
.....	(131)
《佛说转女身经》 (144—146号)	(135)
《金光明最胜王经》 (147号)	(138)
《大乘圣无量寿决定光明王如来陀罗尼经》	
(148—152号)	(138)
《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	
经》卷第十 (153号)	(140)
《佛母大孔雀明王经》 (154号)	(140)
《圣六字增寿大明陀罗尼经》 (155号)	(141)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	
罗尼(经)》 (第156号)	(141)
《佛说普遍光明焰鬘清净炽盛思惟如意宝印	
心无能胜总持大明王大随求陀罗尼经》(157—158号)	
.....	(142)
《圣妙吉祥真实名经》 (159号)	(143)
《佛名经》 (160—164号)	(143)

论部.....	(145)
《般若灯论释》(165号)	(145)
《瑜伽师地论》(166号)	(146)
《释摩诃衍论》(167—170号)	(146)
未考定出的作品(171—174号)	(148)
未收入经典中的佛教著作.....	(150)
《夹颂心经》(175—176号)	(150)
新译经文.....	(152)
《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胜相 顶尊总持功能依经录》(177—178号)	(152)
《佛说圣大乘三归依经》(179—181号).....	(154)
《佛说圣佛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182号)	(156)
《圣大乘胜意菩萨经》(183号)	(157)
《佛说金轮佛顶大威德炽盛光如来陀罗尼经》 (184—186号)	(158)
《六字大明王功德略》(187号)	(160)
密宗经文(偈、陀罗尼)	(161)
《黑色天母求修次第仪》(188号)	(161)
《无动如来陀罗尼》(189号)	(161)
《大随求陀罗尼》、《一切如来心陀罗尼》(190号)	(162)
陀罗尼(191—192号)	(163)
陀罗尼文集(193号)	(164)
带说明的陀罗尼文集(194—197号)	(166)
偈和陀罗尼文集(198—199号)	(168)
未考定出的密宗经文(200—204号6)	(170)

汉文佛教原著.....	(173)
注释 (205—211号)	(173)
疑经 (212—224号)	(180)
佛教活动家的作品 (225—231号)	(186)
祈祷文、仪轨 (232—257号)	(194)
儒家和道家的作品	(209)
《论语》 (258、259号)	(209)
《吕观文进庄子义》 (260号)	(209)
《南华真经》 (261号)	(211)
《太上洞玄灵宝天尊说救苦经》 (262号).....	(212)
《礼记》 (263号)	(213)
历史著作和文学作品.....	(214)
历史著作 (264—266号)	(214)
文学作品 (267—276号)	(216)
文集 (277、278号)	(221)
字书 (279—283号)	(224)
木版画、装饰图案、彩色画、素描、印章	
(284—296号6)	(229)
医书、历书、占卜书.....	(234)
医书 (297—304号)	(234)
历书 (305—309号)	(238)
占卜书 (310—314号)	(240)
纸币 (315号)	(242)
文书 (316—375号)	(245)
附录.....	(308)
参考书目 (Л. И. 丘古耶夫斯基编制)	(308)
译者后记.....	(315)

汉文版序言

1909年，当П·К·柯兹洛夫在死城哈拉浩特“著名的塔”中发现了大批——迄今世界上数量最多的——西夏文图书时，谁会想到，这些收集品成了几代学人悉心研究的对象。其结果就是解读湮没无闻的西夏语文；撰写西夏国历史、西夏文化和考古方面的书籍；公布久已失传的文献作品并用之于学术研究中；研究西夏文字、语音和语法、西夏书籍史和物质文化史……在所有这些方面，保存和研究柯兹洛夫探险队资料的俄国学者们对这一世界性学科作出了极有分量的、几乎是最大的贡献。因此，А·И·伊凤阁、Н·А·聂历山、А·А·龙国夫、Е·И·克恰诺夫、М·В·索夫罗诺夫、В·С·科洛科洛夫(国直生)、К·Б·柯萍(克平)、А·П·捷连提耶夫——卡坦斯基的名字，现在就理所当然地为各国西夏学者们所知晓。

在“著名的塔”中除发现西夏文资料外，还有一些其他语文的书籍和写本：少量的是藏文（目前只有А·С·马尔提诺夫编制出目录清册），大量的是汉文。伯希和1911年逗留彼得堡期间，这些汉文书籍和写本曾引起他的关注。他还公布了某些汉文文书的第一个简明目录。后来，К·К·弗鲁格在其论文中收录了黑城出土的个别的汉文原文。

伯希和公布的文书虽然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K·K·弗鲁格的目录当时未被引起重视），但原文被完整公布过的只有一件《刘知远诸宫调》（先后两次：1937年和1957年）。当我本人开始整理黑城出土的汉文书籍和写本时，我明显意识到，这些收集品的价值比原先想象的要高得多。我从六十年代末期开始详细叙录在黑城发现的所有汉文原件，结果就产生了这本书。1984年此书出版后，在全世界学术刊物上引起热烈反响。

1989——1990年，我生平第一次来到中国，受到了中国学者的热情接待。我出乎意料地得知中国的学者们都知道这本书。更令我惊讶的是，现在中国有不少人能读俄文写的东西。我获知中国同行中有一些热心人，他们把翻译最感兴趣的有关中国的俄国著作和介绍俄国汉学家的研究成果看作是自己的职责。王克孝同志就是这些热心者之一。他不但是本书的译者，而且也是Л·И·丘古耶夫斯基1983年发表的《敦煌所出汉文文书》一书的译者。我们俩人深切感谢他为翻译这两本书而付出的劳动和友好努力。我们希望，不仅我们而且中国同行们都会评价这两部译著的优点，希望我们的书对中国同行有所裨益。

中国学者们直接接触研究中国和中央亚细亚历史与文化的欧洲科学后（这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发现许多欧洲的学术著作很值得重视，因为其中含有许多以前没有研究过的资料，同时对这些资料的研究所提出的其他看法常常不为中国学术界所知。于是从外文（法、日、英、俄文）翻译出一系列学术著作。可以完全有把握地说，中国的科学由此才博得好评。要知道，在任何情况下中国学者比世界所有其他国家的汉学家们占有的事实都多，如果外国学者对已知的事实补充新内容或者提出新的解释，这不会损害中国科学的威望，而只会有助于相互间交流的加强。加之现在中国科学对全世界汉学的真

诚坦率，中国现在确实成了公认的世界汉学中心。中国科学对世界科学成果吸收的越多，中国科学的威望就越高。

中国汉学威望的增强还由于许多平行的学术中心和团体、机构的建立，它们密切联系，研究许多共同的和专门的问题。例如，除了设在敦煌本地的到1994年已建立50年的敦煌研究院外，目前在全国各地还有许多敦煌学研究中心：北京、兰州、西安、石家庄、扬州、上海、广州、成都、杭州等，我可能由于信息不灵而疏漏了一些别的重要中心。同时也谈谈对西夏国所出资料的研究，这些资料的主要研究中心当然是设在银川。但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民族研究所、北京图书馆、以及兰州、西安和其他中心的专家们对西夏学作出的贡献并非不出色。不能不指出一些学术出版社如宁夏人民出版社、北京文物出版社等在这些研究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只说一点就够了，几乎所有研究西夏国问题的俄国东方学家的重要著作都已被翻译，并附上相应的序言和注释而出版。在这些译本中，第一位俄国西夏学家H·A·聂历山事业的最杰出的继承人E·И·克恰诺夫的著作占有光荣的地位是理所当然的。

当我撰写和发表《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时，我当然不可能想到，这本书会在中国引起如此的兴趣。但是，我却愉快地得知，这本书准备译成中文出版。在中国学术性刊物上发表我为公布敦煌和西夏资料而写成的导言成了这件事的预兆。我给《叙录》写的研究性导言已由王克孝同志译出并在《敦煌研究》杂志上连续登载。现在，此书将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我希望，它的出版有助于俄中之间学术联系的增强和发展，有助于整个国际科学的发展。

再次向王克孝同志，以及史金波、徐庄、李范文、白滨、汤晓芳和其他所有关心本书并促使译成中文和在中国出版的同

志们，表达我的感谢之情。

孟列夫

写于1993年1月23日，中国春节正月初一

导 言

柯兹洛夫1909年在哈拉浩特（黑城——译者注）“著名的塔”中发现的包括古代书面文献在内的收集品，早已举世闻名①，因为其中的西夏文文献已成了释读失传的西夏语言和文字的依据，并促进了西夏学的发展②。聂历山的著作被称为本世纪40年代前这门学科的顶峰③。现在，苏联和外国的一些学者正在这一领域进行卓有成效的研究。本藏品中的一些文献的综合目录业已公布④。

柯兹洛夫藏卷中除了西夏文文献外，还有大量的很重要的汉文文献（本文的目的就是给它们写出科学性的导言）和少量的藏文文献。藏文文献已由马尔提诺夫和列奥诺夫整理就绪（前者登记制册，后者编制目录，尚未公布）。蒙库耶夫对其中的蒙古文文献进行了研究。

黑城汉文文献早就引起了专家们的注意。伊凤阁在著作中首次使用了这批资料，引起了国外反响⑤。1910年访问过彼得堡的著名法国学者伯希和整理了这些资料，并于1914年公布了23件汉文文书的目录⑥。伯希和确实挑选出了许多极为重要的文书。其中13世纪初的刊本《刘知远诸宫调》的公布，使中国和其他国家得到了有重大学术价值的文献⑦。

阿列克谢耶夫、聂历山、弗鲁格曾在不同时期参加过从西夏珍藏品中挑选汉文文书的工作，但是进行得很慢，大概是谁

也没有专门长期整理，只是清理西夏文书籍时顺便做这项工作的。只有弗鲁格把黑城的许多汉文资料收入自己的著作中⑧，可以认为他已着手叙录这些文献了⑨。弗鲁格1942年死于被包围的列宁格勒，这项工作为之中辍。

从1957年开始，本文作者重新对藏卷分类和编写叙录，写出了反映这项工作各阶段情况的几篇论文⑩。克恰诺夫和捷连提耶夫——卡坦斯基在分类整理西夏文藏卷时也挑选出许多尚未被人所知的汉文资料。

从1968年起，孟列夫在完成准备工作之后，开始对黑城的汉文材料编写全面的叙录，也就是现在的这本书。孟列夫最初得到捷连提耶夫——卡坦斯基和乌里曼的帮助。前者编写了约20件的叙录，后者编写了约40件，后来他们俩都脱离了这项工作。叙录的最后整理和参考部分的编写是由丘古耶夫斯基完成的⑪。

由于全面整理和分门归类，藏卷的珍贵之处就明显了。如果以前伊凤阁、伯希和、弗鲁格和我们公布的近五十种作品，因其内容极有价值，而且又是罕见的原文和刊本而很有名，那么现在就变得更清楚了，那只是我们拥有的、以前没提到过的、具有很高文献价值的大量资料中的一小部分。

在分类整理过程中，发现黑城汉文文献分散在手稿部的几个特藏中。本书首先叙录了117件西夏文特藏中的藏卷，这些材料有的写在西夏文刊本和写本背面，有的是粘贴在西夏文书籍封面上的小纸页，有的是修补用的残片。另外一批是收入新特藏的藏卷（14至20世纪的写本和罕见的木刻本），大部分曾收入弗鲁格《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藏汉文古佛经写本简明目录》中，大概是弗鲁格归入新特藏中的，有40件。还有些藏卷（15个藏录号）偶然地（由于外表相似）收入敦煌特藏中。大部分

写本和刊本仍然留在柯兹洛夫的藏卷木盒里，现在以TK的藏录号登记在特种藏品册中（316件）。黑城藏卷中的汉文文献共计488件，现在公布的就是这一部分的叙录。除编过叙录的以外，还有大量的迄今未统计过的零星写本残片，这是西夏国建立很早以前抄写的（有的据外部特征定为6世纪中期）。从外表和内容上看，它们和敦煌特藏中的写本毫无区别^⑫。本书没有对这些残片进行叙录，因为准确地鉴别需要大量的时间，而这会长期延误对主要部分的叙录。

本叙录表明这批藏卷的学术意义大大超过了前面提到的已公布过的那部分范围有限的资料，这不只是从文献内容和西夏印刷史来说的（这些问题是伊凤阁、伯希和、弗鲁格所注意的主要问题）。藏卷的内容（比以前想象的要丰富得多）当然具有重要的意义。藏卷在印刷史上增补了新资料。藏卷还反映出了一系列其他的问题，如关于西夏国的历史、西夏国教佛教的历史^⑬、古文字、远东和中亚的书籍发展史、国际间文化关系、相邻各国的历史等。本文只能粗略地对古文献的最本质方面进行考察，作最一般的探索。在这里不可能对各式各样的材料都作出反映，请专家们注意我们觉察到的问题。

藏卷内容：

一 佛教作品

如果克恰诺夫关于“佛教是西夏的国教”这一论断是对的^⑭，那么，黑城藏卷的绝大多数会是佛教文献。事实也是如此。如果不算本来就不能称其为书籍的那些文献，那么，剩下的331件中有283件就属于佛教的作品。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中国佛教史上著名经典的刊本和较罕见的抄本，更确切地说，是收入三藏（经、律、论）的部分。经就是传教的著作（富有情节

性)，讲释迦牟尼佛的传说。有许多经在黑城的汉文卷子里发现。我们知道最流行的抄本占敦煌遗书的多数，即使份数很少（很多只有1件）的抄本中，也还有大量的其他经^⑮。但在柯兹洛夫藏卷的汉文佛经中则是另一种情况。绝大多数是经，但范围很窄，多是一般佛教徒集体和分散祈祷时常诵读的经文，可以说是有教育意义的经文。况且我们看到的是刻本，许多都是同一版本的印本，各件之间的差别原则上很小。如果一部作品的不同抄本总有各自的特点，那么同一版本的印本则难以互相区别。

柯兹洛夫收集品的汉文佛经分成几类，我们逐类分析。

（一）最流行的经

这类是一些不分地域或流派的佛教徒普遍诵读的不大的经卷。这类经的特点，或是佛教教理简明扼要通俗易懂，或是有故事情节。这类文献共有5种，经文经常重复。

1.《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是关于通往最高智慧（波罗蜜）之路的简短故事。属于经藏中的般若波罗蜜部，篇幅比其他经小得多（《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除外，我们将在后面谈到），只有一卷，叙述合情理，不罗嗦、不冗长，比较易懂，这就使它比其他佛经流行得广。这种经藏品中有54件，分属9个不同的版本。其中11世纪下半期，12世纪上半期、下半期、最后30年代和12世纪末的版本各1件。还有4件13世纪初的版本和3件13世纪上半期（前25年？）的版本^⑯。有两个版本的题记注明出版时间1167年（6件）和1189年（35件）。版本经文有一个共同特点：正文分成32个有标题的段落，前面是傅大士作的有祈祷文和陀罗尼咒语的前言，诵读主要经文前要念这些祈祷文和陀罗尼咒语。这种结构的经文从吐蕃占领敦煌（771—848年）开始的敦煌藏品中间或能看到^⑰，黑城遗书中完全没有通

常不分段的版本，把它当作中亚的版本大概是正确的，因为一般说来，中国晚期版本的经文，通常也不分段、列标题，没有傅大士的前言，而中亚的译本（例如回鹘文译本^⑱）则分段列标题。

2.《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这是《大方广佛华严经》^⑲最后一品的一段。这最后一品佛经，习惯上加另外一个标题《华严经》，有单独的汉文译本^⑳。但是这个译本的40卷本的汉文藏品中，只有最后的部分，是独立出版的。藏卷中这部著作共有24件，7个版本：即1161年版（2个单印本）、1189年版（13个单印本）、1196年版（5个单印本）以及1085年版、12世纪上半期版和两个12世纪中期的版本（各有1个单印本）。

流行的原因大概是这一品里，普贤菩萨讲述了“十种广大行愿”：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和忏除业障等等。这些都和祈祷文的通俗形式发愿文很相似（关于《发愿文》见后面祈祷文部分）。在解释“行愿”的最后部分——（对佛的）总愿望时谈到了极乐世界的净土，那里是以阿弥陀为首的最受人敬重的佛和菩萨（阿弥陀佛、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观世音菩萨、弥勒佛）的世界。净土宗对这段经文很重视，认为是佛教教理中的一个基本理论。普贤的伙伴善财童子也成了中国佛教肖像中最常见的形象。正如我们在下面见到的那样，《妙法莲华经·普门品第二十五》也提供了类似情况。

3.《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第二十五》，即《妙法莲华经》^㉑中的《普门品》，和上述的一样，早已（从7世纪的敦煌写本开始）作为独立的佛经而抄写，常用标题是《观世音经》。在敦煌遗书中，几乎没有发现8—10世纪的《妙法莲华经》的各种完整的抄本，但有许多《观世音经》抄本，其数量

不亚于《阿弥陀经》。《观世音经》在黑城遗书中只占第3位（敦煌遗书中未发现《普贤品》），有18件，其中9件是11世纪上半期到12世纪中期的不同版本，8件1189年版本和1件在开本和样式上都受1189年版本影响的12世纪末的版本。这样，《观世音经》共有11个不同的版本（《阿弥陀经》有9个，《普贤品》有7个，单一件数的比较多）。这证明《观世音经》也很流行。经中说在求救时只要念出观世音菩萨的名字就能消除各种各样的灾难。观世音可以有从佛到妇女的各种不同形象^{②②}，究竟出现何种形象则要看她以怎样的面貌作为指路人。

《观世音经》向广大佛教徒通俗地解释佛教概念。按这部经的说法，祷告时只要向观世音祈求，教徒就能及时得救，无需提那些因果报应、来世投生等繁琐的惩戒性誓语。这种简便而大众化的方法，为《观世音经》从《妙法莲华经》中分出来而成为独立的经，以及把观世音变成人民大众最敬重的中国儒、道、佛混合性神祇创造了条件。

4. 《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②③}，藏品中有11件，1件是11世纪末的写本，其余10件是1189年同一版本的单行本。弥勒作为广大民众敬重的菩萨和观世音一样，其地位要比其他菩萨（普贤、文殊师利等）高得多^{②④}。在黑城遗书中，我们发现了它广泛流行的根据，虽然只有一种版本，但题记中说印数为十万卷^{②⑤}。可见对这部经的需求量很大。经中说，弥勒上生兜率天之后，为了普渡众生就返回了尘世，人们盼望他，从而使此经广泛流传。在中国的实用艺术中，直到现在弥勒像还大量出现在瓷器、石刻和木刻等工艺品上，是快乐的胖人形象（称为大肚子弥勒、布袋和尚）。

5. 《阿弥陀经》^{②⑥}虽然份数比较少（5件），但包含了12世纪初到13世纪初的5个不同版本的单行本，足以说明这部经

的重要。此经篇幅不长，叙述了西天及阿弥陀佛，在那里达到理想境界的许多神似乎都等着到达“彼岸”，即涅槃。对净土的描绘在敦煌壁画中比重很大（几乎每个洞窟中都有相关的壁画）。在中国，对净土和阿弥陀佛的崇拜直到今天都很流行^{②7}。这大概同下述情况有关，即中国所流行的佛教一方面重视日常景仰敬重祖宗的规矩，一方面劝告信徒们为祖宗在净土祈求冥福。这种祈祷被佛教看作是孝敬父母的一种礼仪。

6.《三十五佛名经》，有3件，是3个不同的版本（11世纪末、12世纪下半期以及可能是1189年的）。是从大部头集子《大宝积经》中摘录出的一部经^{②8}。这种摘录不是偶然的，中国佛教文献中有许多统称为《佛名经》的著作。这些经里开列了世界各国大量的佛名，包括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佛名^{②9}。诵读这些经被认为是召唤佛，一定会得到他们的帮助。后来佛教祈祷仪式必须念出的佛名减少了^{③0}，挑选出最受敬重的佛和菩萨的名字（八个佛、四个菩萨、阿弥陀佛、弥勒、观世音和其他佛，等等）。我们已经知道有宣传多念某个佛名而少念其他佛名的著作，例如《观世音经》就直说，只要念一遍观世音菩萨的名字，就等于念了“恒河沙那样多的六十二亿菩萨”名^{③1}。只能从摘录的《三十五佛名经》中看到这种情形，因为这类大部头经在柯兹洛夫藏品中几乎没有，这里所分析的经包括这3个不同的版本。

两件大型的《佛名经》写本残卷中，有一部显然是较早的（可能是11世纪初的），另一部（12世纪末的）不很具有珍藏品特点。

7.还有3件《转女身经》^{③2}，都是1195年的同一版本，但未必能把这部经列入最流行的经中。此经大概有一次是罗太后施印的。这位太后我们将在后面谈。她在西夏国的政治和文化生

活中起过显著的作用。她的丈夫仁宗皇帝（1139—1193年）死后，她参与了立王位的活动，废过3个皇帝（原文如此——译者注）。大概她企望发挥自己更积极的作用，但因是女性，这种努力受到了阻碍，她的这种企望可以从上述刊本中看得出来。

8.最后，珍藏品中还有3件（11世纪末刊本、1210年刊本和12世纪上半期写本）《般若波罗蜜多心经》^③。这部短小的经（标准的写本中只有20行）非常流行，大概它从7世纪初开始被翻译直到很晚时期都很流行。可以认为，其原因在于此经认为克服苦难的一切手段都是不必要的（因为苦难及其世界本身是一种“空”的幻境），宣传念陀罗尼咒语，认为这是达到目的的捷径。不能不看到，这部经同以后兴起的密宗风俗密切结合起来，把陀罗尼咒语当作达到各种目标的绝对有效的手段。柯兹洛夫藏卷中，密宗经文编为专门的一大类。

（二）其他经文

如果除去密宗著作，柯兹洛夫藏卷汉文部分的其他经文就为数很少了。我们统计有31件，居首位的是《妙法莲华经》，有15件。8件是1146年的刊本，其中有7件是完整的7卷本（此刊本中称卷）。1件是残缺不全的卷2的复本。其余6件是各个不同时期的写本残卷，最早1件是7世纪下半期的，3件是8世纪下半期和8世纪末的，1件11世纪末的，2件14世纪中期的。因而可以说这部经也很流行，但远不如《妙法莲华经》第二十五品。

占第二位的是《大方广佛华严经》，般若翻译的最后一卷有许多复本。这部经的其他部分只有实叉难陀的译本（敦煌遗书中这个译本少见，大多数是较早的佛驮跋陀罗的译本）。他译的单品本有7件，其中1件11世纪上半期单独刻印的第五品和5件单独刻印的第十六品，第十六品刊本中1件是1091年版。

3件是12世纪中期的版本（有一个版本是2件）。十分明显，这些单品本（篇幅都很小，内容很简单）和上述那类刊本所追求的目的——即采用广大教徒易接受的简便方式宣扬佛教教理，同时对仪式和祈祷给予基本的指导。其余5件是由中国输入的1132年（？）刻印的《阿含经》残本^{③4}和12世纪末同时刻印的两部著作《佛为首迦长者说业差别经》^{③5}和《无常经》^{③6}。这些经的刊本只有1件，其他是为数不多的残本，还不能大体确定它们的性质。

（三）密宗佛教著作

密宗佛教在远东各国大概从10世纪初广泛流行。在本文里把它作为佛教的一个流派来论述是很复杂的。我们只是大体上对有关著作进行一般地鉴别，而不准备深入探讨那些复杂的和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未能满意地解释清楚的象征意义，不理解这些象征意义，在密教著作中除了一连串的祈祷文、咒语和仪轨外就什么也看不出来。这样，我们的叙述必然是简单和片面的。

密宗著作数量很大^{③7}，可分成以下几类：密宗经文、密宗著作汇编、仪轨、陀罗尼咒语、祈祷文。它们之间的界限常被打乱。譬如，陀罗尼最常见的是有关经和汇编的摘录，仪轨和汇编只是在用于某种节日和集体祈祷时而有所不同，但仪轨的材料更广泛；汇编可以看作是汇集在一起的经文，每一篇又可当成单个的经文和仪轨等等。既然陀罗尼和祈祷文是各种密宗经文的基础，那么，从这些最简单的条文说起就比较合适。

1. 陀罗尼。称为咒语，在祈祷时使用，以求得诸神、佛、菩萨的保佑，或者避免暴力和恶魔的侵袭。这是梵文咒语的译音，在日常生活中已完全丧失字面意义。陀罗尼经常见于非密宗的佛教作品中，只有在佛教的支派密宗中才具有独立的意

义。

在后者意义上，陀罗尼往往作为独立的带咒语性的经文单独摘录出来。毫无疑问，在真正的梵文著作里，许多陀罗尼是没有的（这个问题暂不研究）。最大的可能是，许多陀罗尼是根据译音编成的当地作品。不论如何，通常很难从典范性的佛经和密宗的汇编里找出这种或那种具体单个的陀罗尼。单个的陀罗尼首次在吐蕃占领敦煌时期（8至9世纪）汉族风俗习惯里发现，20世纪就消失了。考察的藏卷中有4件单个的陀罗尼经文和6件汇编，其年代从12世纪上半期到14世纪中期，半数是本刻本。但在各种刊本的附录、祈祷文汇编和仪轨中都发现了大量的陀罗尼。许多陀罗尼也有西夏文的音译^③。

2. 祈祷文。祈祷文和陀罗尼咒语的不同之处是它的意思完全能被理解，大部分写成诗歌，按其形式可分成几类。有一种称为偈，是梵文唱词的译文或是模仿梵文诗的汉文译文。偈不押韵，基于汉文诗的写作规则在其结构上才保持了每首各行都有相等的音节。另一类是赞，也写成押韵或不押韵的诗歌形式。此外，还有祈祷文的其他变体，其中最流行的为发愿文，很少为诗歌形式，最常见的是骈体散文。

从内容来看，有一部分祈祷文是对各种佛、菩萨和其他神的赞颂，在赞颂之前也常常增添些请求保佑的词句，在赞颂词中往往见到某个佛或菩萨对人们保佑的描述。赞颂词有时用的是偈。另一部分祈祷文是请求从佛和菩萨那儿得到这样或那样的救助。

单篇的祈祷文不多见（只有3件，全是不晚于11世纪中期的写本）。常见的是祈祷文集子（有6本），时间从11世纪末到14世纪中期，只有1件为木刻本，其余是写本。此外，有两本把偈和咒语合在一起的写本集子（都是13世纪初的，一本定

为1211年)。不能把黑城发现的祈祷文以及陀罗尼同收入汉文《大藏经》的类似经文混为一谈(少数例外)。两者大概都是当地的作品,是适应该地区祈祷者的需求而创作的。

3. 近似于祈祷文和咒语集子的作品可暂称为仪轨,其特点是记叙了祈祷仪式的一定程序或对某些神灵的崇拜,并且描述了举行仪式的动作、神的形象以及祈祷的话和咒语。藏卷中共有19件仪轨,全是11世纪末到14世纪中期的写本,其中《要门》4件,简述了仪式的主要程序;《禅定》3件,专门记叙神沉思时的各种姿态和祷告语。发现有仪、次第仪、仪轨、次第录、法、正文诸名称。可能还有这些标题下组合成的各种异文,但因未作专门研究,也就未能察觉出差别。一般地说,同仪轨有关系的神名也作仪轨的名称。最常见的密宗神名有黑色天母(大黑、大黑母)、金刚亥母^{③⑨},其余的名称(文殊师利、释迦牟尼等等)不多见。有一些仪轨同纪念性仪式(放弃长寿、召唤甘露等)有关,而同具体的神无关。没有一部仪轨被收入《大藏经》中,它们大概都是本地的作品。祈祷文特别是仪轨还在西夏文文献中发现,常见专讲金刚亥母和大轩白母的仪轨^{④①}。

4. 密宗经编在汉文《大藏经》经部的特别部(称为秘部,正如我们已说过的那样,在标准版的《大日本校订大藏经》中,这一部有4帙,经文未分各种仪轨、祈祷文、祈祷文集和单个的陀罗尼)。如果说到密宗经本身,它的结构体系是统一的。经文开头通常是引言。在引言里听众问佛怎样才能免遭这种或那种(具体的)灾难,或者怎样才能得到某种好处。这时佛就喻示诵读有关的陀罗尼(援引经文),并传授念陀罗尼和使其发生感应的程序。除了专讲一个陀罗尼的经外,还有引用一系列陀罗尼和介绍其念法的汇集^{④②}。在黑城遗书汉文部分14

世纪初的版本中有这种（不广泛的）汇集（《大藏经》未收入）。至于《大藏经》已有的6种密宗经文，都是12世纪中期到14世纪中期的版本。收入《大藏经》的共有11件，有两件是1210年同一个版本的印本④②，还有1189年和1200年的版本。其中两部也有西夏文译本④③。由于这些经的标题繁杂和不好翻译，我们在这里就不引用了，读者们可以在本书编号177--187中看到对它们的叙录。

有许多密宗经（6种，11件）《大藏经》未收入，在黑城遗书发现以前不为学术界所知。这些新译文是兰山宗完成的，同时用西夏文和汉文译出。全部译本大概都属于1167年到1185年较晚时期的。6个汉文标题中5个有西夏文标题④④。只有1个（《六字大明王功德略》，1185年版本）没有相似的标题。还有4件密宗经残片无法同我们知道的标题对上号。

（四）论就是译成汉文的佛教理论和注释者的作品，藏卷中为数很少，只有7件，其中3件是12世纪中期以前的木刻本残片，显然不是当地的，其余4件是小册子的4卷《释摩诃衍论》④⑤（第2、3、5、8卷）的14世纪中期的部分写本。根据所有情况来看，论在西夏国并不普及④⑥。从上述数字可明显看出，吸引西夏佛教徒的是宗教仪式、祈祷、咒语和只有很少的主要在论中阐述的理论。

（五）注释在原本的汉文（不是翻译的）佛教文献中，某些作品的注释（一般像汉文书籍那样）很重要④⑦。但在我们的藏卷中，这类注释的范围非常有限，只有7件，其中有：《金刚般若波罗蜜经》（1016年版本）、《阿弥陀经》（11世纪下半期版本）、《般若波罗蜜经》（12世纪末版本）。此外，还有对禁戒性的著

作——律的注释（12世纪后30年版本），两本《释摩诃衍论》（14世纪中期写本）的注释和1件不十分清楚的注释残卷。这些注释至今不为人所知，也未收入任何一种大藏经中。我们再补充一点，注释律的是我们已提到过的兰山宗的一位活动家。

（六）中国佛教活动家的作品

除了注释之外，藏卷中还有中国佛教活动家的其他原著，共8件。其中只有宗密（780—841年）的两部作品是原先就知道的：一部是12世纪初的版本，内容为他同大臣裴休（死于860年）的对话^{④8}，另一部是1152年版本，是对杜顺（557—670年）作品的注释^{④9}，有两卷。其他作者的作品有：长芦（约死于1133年）12世纪20年代的版本，通理（12世纪）的两件作品（1件为12世纪前30年刊本，另1件是13世纪初的写本），澄观（737—838年）同唐顺宗在805年的对话，是12世纪前25年的版本，附有宗密的注释；还有慈觉或是宗致（其生平资料尚未发现）的作品，是以前不知道的1104年版本。必须指出，这些活动家的绝大多数作品，无论是以前就知道的，还是首次发现的，都是祈祷文和经文，祈祷文基本是诗歌，经文或是口头说教，或是形式上简易通俗的说明和解释。

（七）疑经

疑经是中国佛教文献的重要部分^{⑤0}，通常指不是从梵文（或巴利文）翻译过来的佛教作品，而是在中国写的符合中国情况的著作，这是一个佛教术语。这类著作被认为至少在形式上是佛说过的佛教经典的真本。

多数疑经由于没有被正统的佛教徒作为经典著作而失传了，但在敦煌遗书中发现的却不少^{⑤1}。黑城遗书的汉文藏卷表明，疑经中的某些（很小的）经当时流行得相当广泛。如果不

算3件确实无法鉴别的疑经残卷(全是12世纪的写本),在叙录的藏卷中可以找出5种(10件)。

1.《佛说父母恩重经》,有12世纪初期、下半期、末期和14世纪上半期等4个版本。这部经在敦煌遗书中也有⑤②,专门讲孝顺的子女应怎样善待父母的问题。但黑城文本同敦煌文本却有很大的差别,可以认为是同一名称的不同著作。藏卷的西夏文里也有5件⑤③。

2.《高王观世音经》,藏卷中有11世纪末、12世纪下半期和末期的3个版本。此经在敦煌遗书的疑经中也发现了⑤④,这是一篇祈祷文,把观世音排在其他菩萨的首位,它同密宗经文有联系是毫无疑义的。

3.此外在藏卷中还有3部疑经,各有1件。其中一部是《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为12世纪前25年的版本,在敦煌遗书中见到过⑤⑤。虽然这部著作并不包含陀罗尼经文和祈祷文,但从其说明来看,同《观世音经》(《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第二十五》)和密宗经相近。剩下的两部是疑经类型的密宗经,其中一部(1083年版本)专讲父母亲借助咒语得救的情况;另一部(12世纪下半期版本)是向自在王即观世音提出请求的陀罗尼经⑤⑥。

(八) 特殊情况

挑选出的藏卷中有两件1073年同一版本的无人知道的佛教作品,包含我们前面已谈到过的《般若波罗蜜经》,夹杂着对难解经文通俗解释的8句诗,冠以《夹颂心经》的标题。这类用诗歌解释经文的作品早已为人所知,是敦煌遗书中的一种文体,有个类似的标题叫《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⑤⑦。我们的发现增补了一篇结构类似的经文。现在可以说,这类经文是从佛教文献中分化出来的一种独特的体裁,在某种特征上近似于变

文。

总的来说，藏卷汉文部分的佛教文献主要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经文，这类经文都同崇拜佛教神祇观世音、弥勒、普贤、阿弥陀有关，而这些神又同净土宗教理有关，除了经典作品以外，需要把大量的疑经归入这类作品中；第二类是密宗著作，绝大部分内容是祈祷文、咒语和仪轨。其他的经文少见，甚至在多寡不一的大量刊本和写本中连1件也未发现。可以断定这是偶然的，而不是整个藏卷所具有的特征。根据以上的叙述我们的结论是，西夏国居于统治地位的是兼有净土宗（或者以这派的主尊阿弥陀佛称阿弥陀派）教义和密宗特点的佛教教派^⑤。这种结合对藏传佛教来说，要比汉族的佛教牢固得多。因而可以断言，西夏国居民同西藏在风俗习惯上有过很大的联系，同时也不能否认同宋朝的联系，他们曾从宋朝输入了很多佛教经典。

二 儒家和道家的作品

这两种作品为数很少，《论语》写本的残片两件，一件是12世纪末的，另一件是14世纪中期的；一件有注释的《礼记》残片，是13世纪初的版本。由此情况看来，中国全国性的儒教在西夏的影响大概不大，不过这并不妨碍把儒家的某些经典翻译成西夏文^⑥。

道家作品也很少，有3件。其中两件《庄子》的版本，需要说一下。一本标题为《南华真经》（扉页上署名“南华真人”）是12世纪末或13世纪初原文的普通重刻本；另一个版本非常重要和有意思，有吕惠卿（约卒于公元1106年）、著名的改革家王安石在11世纪写的这部作品的注释，这件题为《吕观文进庄子义》的注释本已佚失了，但在20世纪发现了两种版

本，我们藏卷中的是年代定为11世纪末的原刻本，中国私人收藏的1件是1172年的重刻本^{⑤9}。不同寻常的是还有一部吕惠卿的注释，汉文本也佚失了，西夏文本却保存了下来^{⑥0}。第三部作品《太上洞玄灵宝天尊说救苦经》也很重要，书中使用了中国式的小圆标点，这是使用印刷符号的一个早期证据。至于作品本身早已为人所知，已被列入道教经典中（本书编号第371号），从内容和装帧来看，同佛教的《佛名经》很相似。

所有这些作品都是中国宋朝的版本，总起来说如同儒家的作品一样，它们对藏卷没有代表性。可以认为，道家的哲学和宗教方面的书籍在西夏国没有得以广泛传播。

三 医书、历书、占卜书

在中国，自然科学领域专门知识的发展同道教有密切关系。因寻求长寿药物而发展起来的医学，与占星术、占巫等占卜术同时发展起来的天文学和历法就是这样的，它们都同道教有直接的相互关系。在任何情况下，历书始终（到20世纪以前）是各种占卜术的参考材料，历书既有它本身的特征，又具有指导通灵术“科学”的特征。因此，我们在这里把它们看成一类时，仅仅把医学知识区分出来。

（一）医书

藏卷中医学作品共有10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孙思邈（586—682年）著的药典《孙真人千金方》，它是13世纪初的版本，出自女真人的金国。这部药典记述了大量的药物，解释了疗效。其余的药物汇编和单个药方也是这种类型。此外还有两个写本（12世纪上半期和14世纪中期的）也具有药典的性质，但书名佚失了。还有一部不大的《神仙方论》（包含在有其他内容的14世纪初的写本汇集中），这使我们注意到14世纪和较

晚的中国医学，已经意识到它同寻求长寿有关。

单味药的处方有两件。一件是13世纪初木刻的长小页，另一件是在14世纪中期写本的字行中抄记的药方。

还有4个写本（全是13世纪初的），也是药方，但增添了似乎能帮助取得疗效的佛教祈祷语。这可以说是道教医学的佛教偏方。

可以认为，我们看到的是实用医学方面的作品，它主要研究中草药的配方，但并不轻视当时认为能帮助药物发生疗效的祈祷和咒语。理论性的医学作品（关于普通生理学，破坏有机体功能方面的）在这部分藏卷中没有发现（敦煌遗书中有这种作品，数量不多）^{⑥1}。

（二）历书

历书保存下来的不多（8件），全是零星用于修补破旧写本和木刻本的残片。藏品中宋朝印的历书最多，关于从宋朝得到历书的情况在史料中有很多报道^{⑥2}。1127年女真占领中国北部后，宋朝印刷的历书就再也得不到了，因此印刷的历书都是12世纪前30年的木刻本残片。我们所了解的那些碎片并不使人惊讶，因为历书过了若干年之后，就失去它本身的实际意义。

其余3件历书残片是写本（两件13世纪的，一件14世纪中期的），按准确的意义讲它们不能称作历书，有的分散记在其他写本中，有的（13世纪初的一件写本）大概为熟练地记住年代顺序而把60年一循环的历法编成口诀。但不应该认为西夏人没有历法也行，他们有过从女真人的金朝得到历书的情况，不过是我们不了解而已。此外，西夏人也编撰过自己的西夏文历书，藏卷的西夏文部分里就有^{⑥3}。

根据印刷的历书残片，可以推想出宋代历书的形式和内容。历书是卷子，大概有一天接一天的全年所需的资料、月份

和用干支表示的日期，表示周相的五行元素符号，同当天对比的星座，对当天应回避什么的说明，对许多自然现象的评论，吉凶征兆的说明。这种历书不仅包含了真正有用的资料，很大程度上包含了占卜术所必需的记录，直到14世纪前都具有宋朝的特点，而且其份量不论是实用的还是通灵术的，在此之前都在日益加多。我们有机会看到了同类型的最新的新加坡汉文历书，篇幅相当大。保存下来的这类历书最早的是敦煌遗书中的残卷，而直接继它之后的则是黑城遗书中的历书。

（三）占卜书

正如我们指出的那样，占卜书（5件）同含有大量通灵术内容的医书和历书直接连在一起，其中最有意思的是13世纪初的一件残卷《六壬课秘诀》，这类标题的书《宋史》书目中提到过^④，现在佚失了，藏卷中见到的可能就是原刻本，或者是在女真人的金朝刻印而接近原刻本的重刻本，六壬类的占卜书是占卜书的主要类型，后来直到本世纪以前中国都非常流行^⑤，我们这里说的是原著之一种。第二篇以《易经》的卦爻辞为根据的内容丰富的占卜书，抄在12世纪中期的写本背面。其余3件都是写本（两件13世纪初的，一件14世纪中期的），它们或是一些残片，或是附在别种写本里的不长的文字。

四 历史著作

藏卷中有3件，是三个不同版本的残片，即宋代12世纪30年代绍兴版的《新唐书》，金朝13世纪初的《汉书》注释本和元代14世纪上半期刻印的关于金朝历史的一部不清楚的著作。我们还不能得出结论，历史著作这样少应解释成是西夏人对历史不感兴趣呢，还是西夏人收藏的主要是佛教著作。藏卷的西夏文部分仅仅记录下两个绝不是第一流的中国历史著作的西夏文

译本⁶⁶。

五 字书

藏卷中特殊的和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字书，数量也不多（6件）。其中有一些很重要的宋代辞书，如12世纪初杭州刻印的字书《广韵》，13世纪中期刻印的字书类型的《礼部韵略》的残卷，12世纪下半期刻印的字书类型的《一切经音义》的残卷。此外，还有语言学方面的教科书，一件是12世纪下半期的写本，另一件是14世纪中期的木刻本残卷。如果把这些资料 and 现在人们已知的西夏人的辞典对比一下⁶⁷，那么，从中原运去的一些字书对西夏人的影响是很明显的。西夏人大概在编写自己的教科书时采用了中国的经验，著名的辞典《掌中珠》⁶⁸，12世纪下半期用汉文写的汉语和西夏语对照字典（《字杂》）⁶⁹，都用两种文字编成。在西夏文藏卷中还有语音表⁷⁰。其中所作的许多读书标记证明采用了汉语词汇。

六 文学作品

我们在本文中所说的文学作品是指优美的文学著作，如诗歌、韵文、叙事文和叙事诗等，这类作品藏卷中有12件，韵文3件，即12世纪30年代的木刻本残卷和12世纪末的写本；还有一部不大的著作，是描写梁朝梁武帝（502—549年）信佛的稗史，系14世纪中期的写本；诗歌的种类要丰富得多，除有名的中国童蒙教科书《千字文》（14世纪初写本）以外，在14世纪上半期的写本中（6件）还有许多诗歌，如格律诗和诗行不等、结构复杂、具有宋代特点的曲子词。大概所有的诗歌都是独一无二的，但只有全面查阅全宋诗之后，我们这样说才能有充分的把握。

最后，还发现两个著名的版本（都是13世纪初的），应该专门谈。

第一部作品早在本世纪20年代就已闻名，有大量著作都在专门研究它^⑦，现在它已为中国文学史界所公认，因而这里再大谈特谈它的意义就显得多余了，这就是著名的独一无二的13世纪初的刊本《刘知远诸宫调》，现保存在北京图书馆，已影印出版过两次（1938和1958年）。第二部作品是《新雕文酒清话》，至今未进行过报道，从未记载过，宋代的书目中没有著录过。这本书是许多笑话性质的简短故事集。此刊本刻印于13世纪的金代，但根据书名“新雕”二字来判断，这是更早的、可能是宋代刊本的重刻本。

虽然藏卷中优秀文艺作品很少，但是每一部几乎都是稀世之珍，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增补了我们对中国文学史的知识^⑧。

七 木版画和印章

黑城遗书中的木版画主要是各种不同版本佛经的卷首画，应该看成是该书的一部分。有4件木版画的刊本未保存下来。汉文藏卷里这类作品共有34件（不算重复的）。本文作者曾在《黑城出土的汉文书籍的木版画》一文中详细记述。有一些木版画并不涉及该书的内容。这是一些和经文同时散发的小佛像，其来源已清楚了，是公元847年在敦煌刻印的，这种单印张在敦煌遗书中很多^⑨。在黑城发现的数量也很可观（10张）。这证明它们的发行量大，传播范围更广，流传出敦煌以外。版画类的还有两件，一件是描述密教各神肖像的条文（12世纪末的写本），一件为轮廓被刺穿的佛像画，是制造佛像时（大概是描下来）使用的模本，画在我们已说过的11世纪的《妙法莲华经》写本的背面。此外，有一件14世纪中期手描的带有金刚

像的彩色木版画和一张同一时期的带花的装饰图案。最后，收集品中有5张纸，盖了许多佛像的肖形印，大概是做护身符用的。这些资料对西夏和邻国宋、金的版画史具有的重要价值，是人们公认的^{⑦4}。在黑城也发现了架上制作的（非实用性）木版画，现保存在爱尔米达什博物馆^{⑦5}。

八 文 书

黑城遗书的汉文部分有大批官方经济和军事文书。按时间和来源可将它们分成三部分：

（一）中国陕西北部军管区文书

这批文书全出自女真人占领该地时的陕西省北部边境军管区鄜延路的官署。总共31件（多数是单页，但很多页可连接起来成为一个文件的某部分），是公元1118—1131年间的。许多文书的背面印有西夏文字典《文海》和《文海类编》的条文。关于这些文书与字典的条文之间有何种关系，捷连提耶夫——卡坦斯基曾提出过各种设想^{⑦6}。我们只指出一点，字典是用文书背面印的，而不是相反。因为文书的四边都连字裁去，而字典条文的四边却留有空白。文书光洁的背面大概用作印字典的纸张了，说明西夏的纸张很缺。这批档案如何出现在西夏，只能作种种猜测，最大的可能是在遭到西夏军队袭击时被抢走的。当时女真人在边境地区平定了中国北部对其抵抗的最后一块基地。根据文书上的最晚日期来看，女真人的最后一次胜利不早于1131年。

档案出自“第七将”的官署，某些文书中提到这个“第七将”的名字叫冯武。

文书记录了本区和一些邻区的许多军事和行政设施，邻区多半是同边境军管区相邻的环庆路（甘肃省东北部）。档案中

总共保存62件注有日期的文书：1118年1件，1123年1件，1125年22件，1126年17件，1127年10件，1128年8件，1129年2件，1131年1件。其他的文书由于四边被裁，所记的日期阙佚。

文书被分成行政及归属于行政的司法、军事三大类型。这种原始的分类提供了很有趣的资料。纯行政性文书（提职报告、履历表、呈文等等）有18件，关于捕捉、羁押、释放某人的来往公文属于半行政半司法类的文书有6件。多数情况可以证明，这些举动同被列入司法类的重大诉讼案有关，有关清查财产的命令（2件）同这些案件也有关系。

第二类文书的内容包括审讯记录、监禁某人的生活费报销单、说明书、民事判决书、监禁案卷和刑事判决书（13件，其中审讯记录16页，其他文书各为2—3页）。这些文书都讲从官仓盗窃粮食的同一案件，这个案件牵扯到各种手续，拖延了几乎两年（1125—1126年）。在这个案件中有许多在职官员和私人被牵连进去。有的人很有名气，他们的名字出现在当朝的史书上。

第三类是军事性的文书，共31件。其中的23件同1123—1129年有关（其他文书的确切年代佚失，但根据人名来看，它们应当同上述年代有关）。这些文书报告了同女真人（白直人、金贼）和西夏人（西贼）的边界冲突，1125年以后的文书则报告了关于抵抗女真人的入侵和军队的情况，军队的状况在1126年以后被描述得极为凄惨。

还有10件1125—1131年的文书，保存下来的只是注有日期和签名的结尾部分。根据这些材料来看，它们同三大类的文书有连带关系。

这些文书大大填补了迄今已知的历史资料，并使其更为详尽，此外还有可能查明当时文牒处理的详细程序和形式。标准

文书（通报、呈报、命令等等）有标题、注明报告类型、报告人姓名。报告的主要条文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论述情势，第二部分是结论、建议、请求、采取的措施，或者是呈请对某种行动予以批准。文书结尾注明日期和签名，并且常常要加盖很像中亚戳记的专用私章^{⑦⑦}。如果文书末尾签字的上方留有空白，就用红笔或黑笔把批语写在该处。一般来说，文书上都不写呈报日期。文书被仔细地登记下来，记上收发日期，由收发员签名盖章，并加盖官印，官印的字形通常都模仿九叠文字体。为了能判明文件是真的，就在左右两边盖上专用的戳记，一半盖在文件边上，另一半盖在存根上。这样一来，要偷换文件就不可能。官印和戳记（后来有时写字代替戳记）很难认读，应当进行专门研究。

（二）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的文书

这个时期的文书很少，总共7个编号。其中4个多半是文书碎片，登记了1172年发放的木板和其它材料。另外两个记录了12世纪末发放的粮食和物品。还有一件是关于1223年某次战斗中伤亡和俘虏情况的呈报。这些文书都是偶然保存下来的，因为许多文书都裁成了小片，那大概是为了修补书籍的缘故^{⑦⑧}。

（三）13世纪末至14世纪初的文书

这一批文书同元朝末期的统治有关，共44件。17件保留了确切的年月，其中的13件（最早是1304年的，最晚是1364年的）反映了在1367年被明朝推翻前的一些事件。有5件文书同为时不长的被称为北元（1368—1378年）的国家有关，北元首都在内蒙的哈拉浩特（黑城），这些文书的年代都是1371年。这批文书种类不同，像第一类文书不是综合性的，但作为蒙古人统治中国末期的历史文献资料颇为重要，这样的史料在历史著作中是少见的。这些文书的内容包括军队的布置、军事通

报、呈文，各类供给单据、各种诉讼审理文书，粮食、牲畜、布匹和珍贵物品的单据等等。目前只公布过一件^⑦，其学术价值前面已经说过。

（四）其他文书

藏卷中还有两件文书比上述文书的时间更早。一件公元989年的，是派遣智坚和尚去印度的证件^⑧。另一件12世纪20—30年代的，是一个不知名的人去西凉府的证件。

（五）纸币

元朝在元通（1333—1334年）和至元（1335—1340年）年间发行的纸币^⑨，是一种特殊的文书资料。我们的搜集品中，纸币有3张元通年间的，票面价值为一贯；26张至元年间的，票面价值2贯。据此可以清楚地介绍一下14世纪中国纸币的发行形式。纸币用一种专用的粗板纸印刷，加印上从著名著作《千字文》中选录的篆字。为证明其真实性，纸币正面印有两个九叠文体的红色官印，背面也同样印有红官印和一种特殊的黑色戳记，上面标明纸币的票面价值。此外，有一些像在文书上盖的那种相应的登记戳记（见前述）。纸币本身还印有关于惩罚伪造的警告性条文。大概这样就可确保纸币和硬币的价值相等了。

总体来说，藏卷内容丰富，以致可以想像出西夏国居民，特别是使用汉语的那些居民们的精神需求是很高的。阿弥陀密宗派在这方面起了主要作用，儒家著作传播得少，道家著作主要是占卜术和医学传播得比较多，中国的文艺作品大概主要是故事情节引起了当地居民的兴趣，为一系列后来常见的题材奠定了基础的道家的经典著作《庄子》也传到了这里。我们要感谢的是，当地居民对文艺作品的兴趣使得中国本土失传的中国民间文学的某些重要的原本得以保存下来。有许多文书很特

别。根据这些文书来看，西夏人通常不会保存它们（甚至图书馆中也不保存），因而这些文书出现在藏卷中被解释成是由于各种偶然情况混杂进来的：用作封皮和修补书籍的材料；用光洁的背面印刷文字。后来当人们来不及销毁它们时，就被扔进“著名的塔”的窟窿中，直到被柯兹洛夫从垃圾层中发现。

九 关于书籍和印刷史的资料

（一）注有日期的宋朝版本

藏卷中共有28个注有准确日期的版本，是确定其它版本大致日期的依据。还有些版本的年代某种程度上也能大体断定（误差10年，甚至1年）。应当首先挑选出不是西夏而是相邻的宋朝刻印的书籍，31个版本中有8个。这些版本按时间排列如下：

1. 原藏录号TK—149（本书编号205），《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钞》，1019年5月16日丹州（今陕西省境内）刻印，卷子装，纸页粘合处镌有11个施主的姓名，各纸上的姓名均不相同。其中白水县的两个施主叫王式通和党行者；伏龙村的两人是曹永（？）及妻曹氏；蒲城县的一位施主是尚祚，另外两个名字因纸损坏，无法认读；还有蒲石村的叫杨言；悟缘、王仁福和车度三人的居地未指明。上述各地都在今陕西省中部，当时属于丹州。此刊本大概是由各家或团体出资刻印的，上述每个人都捐助了纸钱。题记中还指明监印此经的地方长官姓梁，是签字（后详述），他是监印人。这个刻本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版印本^②。向贫穷的定制者征收印刷资金的办法也很有趣。

2. 原藏录号Φ—337（本书编号220），1083年6月18日至7月17日（农历6月），密宗经版本（很可能是疑经）《竺兰陀心文经》。从题记可看出，此经是卫州（今河北省境内）仁化寺净

土院的两位和尚贤惠和贤熙监督和校订的。捐印人是杨康国的儿子璞、珩、瑰、琚、琯、琇,女儿四娘、五娘。刻印此经是为了超度金华县(今浙江省境内)君、他们的故母石氏。题记叙述了找到这部经的一个轶闻,注明印500卷。此经也是卷子装。

3.原藏录号TK—185(本书编号98),1091年,《大方广佛华严经》的《梵行品》单印本(折本装)。题记指出大原人王简在辛未年间刻印,是为了纪念祖宗。大原毫无疑问就是太原,位于山西省中部。

4.原藏录号TK—6(本书编号260),《吕观文进庄子义》,作者是著名的改革家王安石、吕惠卿(约卒于公元1106年)。刻印日期是根据间接资料断定的。作者在1094—1097年间使用“观文殿学士”的称号,后失宠被流放,死于流放地^③。在中国还发现了这部作品的另一个重刻本,是1172年(在金国印的)版本。但金国版本未注明上述称号^④。可见TK—6版本的刻印时间应在作者获得“观文殿学士”称号的时候,即1094—1097年之间,可能是金国刻本的祖本。

5.原藏录号TK—132(本书编号225),《镇阳洪济禅院慈觉和尚劝化文并偈颂》,是迄今无人知道的慈觉和尚的作品集。此版本的题记未保存下来,崔振孙在成德(今河北省内——原文如此,译者注)写的前言所注日期是1104年9月28日。蝴蝶装。编此文集的是作者的弟子普惠。

6.原藏录号TK—133(本书编号226),《真州长芦了和尚劫外录》。文集的编者了和尚的弟子德初和义初。大概在真州(今河北省境内)刻印的。撰写前言的是吴敏(12世纪10至20年代宋朝的大臣,1127年后随朝廷迁至南方)。根据文中所叙述劫情况和作者名字判断,很可能是1127年的木刻本,可以认为在今河北省印的这件和前述那件是同一个人的藏书。与此相关

的还有佛教活动家通理的作品集。

7.原藏录号TK—7（本书编号280），1011年编的辞书《广韵》，版本类型同有名的12世纪30年代的杭州刻本一样，尽管书中既无书题，又无题记，也应该看作是这个时期的杭州刻本^{⑥5}。书上印的刻工姓是李、秦、郎，这些姓在其他杭州刻本上则不见，李姓和郎姓在其他书籍的白口上也未发现。蝴蝶装。

8.根据文献资料记载，杭州印的《大藏经》是1132年刻本^{⑥6}。这使我们把8件残片有可能看成此类刻本。这8件的原藏录号为TK—265，272—279（本书编号1—5、7、165、288），用光洁的黄纸印成卷子，每卷都有卷首画。

除了上述的宋代版本，即在中国本土刻印的刊本以外，还有一些仅注大致年代的刊本。这样的刊本（不算历书）有54件。这里我们只详列根据某种特征较准确地断定出年代的刊本。这种刊本也可以作为断定其他刊本年代的依据。

9.河北刻印的佛教活动家作品集中的通理的作品，原藏录号TK—134（本书编号229），残卷，弥补了原藏录号A26（本书编号230）手抄本的部分内容。根据蝴蝶装、纸质和其他资料，定为12世纪前30年代（20年代）的宋代河北刊本。手抄本中有编者恒润写的后序。

10.原藏录号TK—167（本书编号81），《观世音经》（《妙法莲华经》第二十五品）。卷首画上题有“杭州宴家重开大字观音经印”。既然刻印中断过，想必同女真人1127年占领中国北部有关。此书可能是1127年后不久就刻印的（可能是30年代初）。蝴蝶装。

11.宋朝的许多历书残卷也大约是这个时期（1127年以前）的^{⑥7}（原藏录号TK—269、TK—297、TΦ—5229、TΦ—5285、TΦ—4569；本书编号305—309）。保存下来的是许多比较小的

残片，是供裱糊或做封面用的，大概历书都是印成卷子装的。因为没有发现折叠痕迹。

12.原藏录号TK—290、TK—291（本书编号265、267），各种刊本（历史、文学）的残卷，外表特征同12世纪30年代的绍兴刻本相似^⑧。蝴蝶装。象上述残片一样，绍兴刻本的碎片是粘在某些书的封面上而保存下来的。

13.还有17件刊本注有大概的日期，可分为3组：

1)11世纪上半期的3件，全是佛教内容的卷子。

2)11世纪下半期的4件，1件卷子装，1件折本装，2件蝴蝶装，全是佛教内容。

3)12世纪前30年代的10件，折本装7件，蝴蝶装3件，1件道家作品，其余是佛教内容，其中1件是佛经词汇的残卷。

这样看来，宋朝的书籍是从11世纪初到12世纪30年代运入西夏国的，此后的藏卷中再未发现宋朝输入的汉文刊本。历史文献资料中有西夏人自1029年开始从宋朝得到书籍的证据^⑨，当西夏人完全臣服于女真人的金国时，很快就从金国得到书籍^⑩。这一点，藏卷的内容与文献记载完全符合。历史文献的记载也证实运去的主要是佛教书籍。我们列出的34件中有5件历书，2件字书（其中1件是佛教专用的），1件《庄子》和1件晚期道家作品，其余25件全是佛教著作，主要是经藏，间或有佛教活动的作品集、注释，还有少数几部论藏或疑经。比较结果表明，西夏本国的汉文刊本（最早的年代是1073年）长时间内寥寥无几。只是到12世纪30年代以后，当大批书籍不能从宋朝源源运来时，西夏的汉文印书业才高度繁荣起来，后来由于蒙古人占领才衰落下去。

（二）注有日期的西夏版本

西夏人开始印刷汉文书籍，是在宋朝书籍运进来几十年之

后。当运入的书籍不能满足居民的阅读需要时，就出现了当地刻印的汉文书籍。现在我们也按列举宋朝版本的方式，列出这些注有日期的22件西夏版本。

1.原藏录号TK—158、159（本书编号175、176）。两件都注有1073年9月5日刻印，是同一个版本。这部《夹颂心经》大概是西夏国编纂的，可以看成最早西夏版本。从题记得知刻印的原因是陆文政纪念其死去的父母。折本装。

2.原藏录号TK—88（本书编号104），1085年8月23日—9月22日，《大方广佛华严经》中的《普贤行愿品》。卷子装。大延寿寺僧人守琼为向教徒散发而刻印的。该寺地址未查明，推测和下面的是同一地点。

3.原藏录号TK—164、165（本书编号177、178）。题记中说仁宗皇帝（1139—1193年）为纪念他父亲崇宗皇帝（1087—1138年）而刻印的，印数为1.5万卷。蝴蝶装。有3幅卷首画。后序发愿文是仁宗写的。此刊本是两部密宗著作，由鲜卑宝源奉敕译成汉文，天竺僧人嚩也阿难捺（Jayenanda）传发。这个版本是西夏国奉敕由仁宗亲自主持翻译佛经的开始。题记的日期阙佚，有仁宗尊号全称的片断。这个尊号是公元1141年金国的皇帝加封的①。根据此版本和其他版本来看，封号的全称是“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以前根据历史文献只知道封号的简称“制义去邪”，而藏卷的所有版本，包括西夏文版本，所用封号都是全称。1141年崇宗死后已滿三年，他是在大德五年六月四日即1138年7月12日去世的，因而，此刊本可能是大庆二年六月四日即1141年7月6日的版本。题记中记述的仪式（召集和尚诵经超度亡灵）也证实了这个日期。有个机构名称很有趣，叫“蕃（大概指西夏和西藏——孟列夫注）汉三学院”。这个机构无疑是国立的，大概

在公元1161年建立“翰林学士院”^②之前，是国家办的行使研究院职能的学校。

4.原藏录号TK—1、3、4、9、10、11、15、（本书编号67），1146年6月10日—7月11日，完整的七卷本《妙法莲华经》版本；还有一个第二卷的残卷（原藏录号TK—2，本书编号68）。折本装，黄纸，有封面，每卷都附有木版画。仁宗皇帝施印，他的完整尊号出现在描述皇帝全家礼佛的第一幅木版画上。此版本是因西夏从女真人那里得到了赠送的边界领土而刻印的^③。但题记中未讲这个问题。题记和各卷的后记中有刻工王善惠、王善圆、贺善海和郭苟（一作狗）埋。刻印地点为“上殿宗室御史台正直本”。

5.原藏录号TK—241、242（本书编号231），1152年9月15日，近乎完整的《注华严法界观门》，是佛教华严宗初祖杜顺（即杜法顺，557—670年）的作品。题记中指出，此作品刻印于帝里，为在圣节日散施给信徒们，写经的和尚叫法随，刻工是邠州开元寺僧人刘德真，他大概是陕西省被女真人占领后从西安来到西夏国的。此刊本用准备粘连成卷子的单页形式保存下来的，可能要叠成折本的。这个木刻本的纸柔软色黄，想必是由中原运去的。

6.原藏录号TK—72、73（本书编号108、109），1161年，两件（第二件残）《大方广佛华严经》刊本（40卷本）。折本装，粗灰纸印刷，末尾题记注有“京市周家寺僧雕字王善惠”。这位刻工的名字在早于此版本15年的1146年版本中出现过，是刻印那本经的第一个人。此版本刻印技术之精，表明王善惠是我们所知印刷工匠中最有技术的。位于西夏首都（即兴庆）的周家寺无疑是皇室监护下的印书中心。

7.原藏录号TK—124、125、126、127、115、143（本书编号11

—16), 6件都是1167年的刊本(在5月21日至6月18日之间), 用色调不一的灰粗纸印制的《金刚经》。折本装, 题记指出是由秦晋国王施印的④④, 可能是为纪念国王的母亲曹太后去世三周年而印, 从后面版本的题记中可看出, 这位太后死于公元1164年6月1日。

8. 原藏录号TK—128 (本书编号182), 1167年5月29日, 《佛说圣佛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译本。以前无人知晓。用细灰纸印成, 折本装。此经的译者是“觉行国师沙门德慧”, 译本的编者仁宗皇帝(尊号全称), 翻译或刻印地点是兰山。题记说刻印此经是为纪念死去的太后, 特令德慧等僧人举办法会诵念此经和《金刚般若经》。此经印刷2万卷, 施主是“奉天显道……皇帝”, 即仁宗。仁宗的母亲是曹太后, 卒年历史文献未记载。如果注意到纪念死者的大典通常在死后三周年进行, 那就很容易算出曹太后死于1164年6月1日(中国农历5月9日)。上面提到的《金刚经》可证明, 前述秦晋国王施印的版本就是在这时期刻印的。

9. 原藏录号TK—129 (本书编号184), 1184年9月7日。此经的梵文名称不知道, 汉文名称《佛说金轮佛顶大威德炽盛光如来陀罗尼经》。此译名仅仅是从柯兹洛夫藏卷中一个未注明日期的刊本上得知的。根据外表特征, 此刊本可能与上述的兰山寺有关系。用褐灰色粗纸印的折本, 题记有17位施主的名字。这些人可能是一个佛教团体的成员, 因为第一人袁宗鉴称尚座。刻印目的是表示尊敬皇室, 可能同曹太后去世20周年有关。

10. 原藏录号TK—121、122、311 (本书编号179—181), 1184年10月20日。3件都是同一版本的《佛说大乘三归依经》, 一件完整, 折本装④⑤。从题记看出, 都是由兰山僧人德慧翻译

的，此处他用了新法号“智昭国师”，仁宗皇帝主持了翻译，也是此版本的施主，刊本的卷首和题记中都有他的全称。刻印目的是为纪念去世的父母（即崇宗皇帝及其皇后曹氏），并提到了两位死者的情况。印了5.1万卷。和上述版本一样，是为纪念太后去世20周年。

11.原藏录号TK—145（本书编号183），《圣大乘胜意菩萨经》。同上面版本的日期和书型相同，译者和编者同上，题记也相似，也是为纪念曹太后去世20周年而印制的。

12.原藏录号TK—136（本书编号187），1185年9月10日，卷子装，和上面的刊本一样，大概是准备叠成折本的。此刊本名《六字大明王功德略》，施主为比丘智通，刻印目的题记未提及。

13.以下是一大批皇室成员在1189年为庆贺仁宗皇帝登位50周年而印的刊本。这批版本的共同特点是：页面为11×23.5厘米和11×26厘米的折本。前面有优美的卷首画，占6至8个页面，最后是说明刻印目的的题记。全用色调不一的结实灰纸印刷。不过也有个别的刊本使用涂有淡黄颜色的纸张，纸质高级。我们愿把它看成是皇帝的用品。总共能挑出3部属于这种类型的著作（题记中有资料），还有3件无题记，但根据版型来看，同那些有准确年代的版本没有区别。

1)时间定为1189年9月26日的《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毫无疑问是国家级的刻本。这种刻本有10件（本书编号134—143），其中两件完整（原藏录号TK—58,81，本书编号134、135），用淡黄色纸印刷。这大概是皇帝私人的用品。内容丰富的题记指出，施主就是仁宗皇帝。用汉、西夏、藏文总共发行了10万卷。对某些版本进行比较的结果证明，印数绝不是杜撰的。原来各种印本是由4个不同的雕版印刷的，这就是

说，雕版至少换过4次，可见印数确实很大。题记还指出，同时刻印了《金刚经》、《普贤行愿经》和《观音经》，每部各印5千卷。我们确实发现了这3部经的一大批刊本。

2)1189年4月2日罗太后施行的《金刚经》，藏卷中有35件，是用两套不同的雕版印刷的，其中两件完整（原藏录号TK—14、16，本书编号18、19），一件是淡黄色纸印刷的（原藏录号TK—18，本书编号21）。

3)《普贤行愿品》，刻印日期和施主同上。共13件（本书编号110—122），其中两件完整（原藏录号TK—61、65，本书编号110、117），3件用黄纸印刷（原藏录号TK—63、65、69，本书编号121、117、112）。这些单印本是用两套雕版印的。

4)《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观世音经》）有8件（本书编号85—92）。有题记的全本连一件也没有保存下来，但从书型看，这是1189年皇室施印的《观音经》，此经在《弥勒上生经》的题记中说到过。

5)外表特征相似的这类版本还有《三十五佛名经》（原藏录号TK—304，本书编号162）、《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原藏录号TK—123，本书编号156）两个版本和其他几件。但无直接资料作证，我们就不一一列出了。

14.原藏录号TK—8、12、13（本书编号144—146），1195年10月24日刻印本。《转女身经》，折本装，由罗太后在仁宗皇帝去世2周年时施印了3万卷。仁宗死于他执政第五十五年的九月二十日，即公元1193年10月15日。1195年的九月二十日公历应为10月24日，1196年的九月二十日公历则为10月8日（仁宗卒日和周年日的误差是由于换算成公历造成的）。

15.原藏录号TK—98、99、100、146、258（本书编号123—127），1196年10月8日《普贤行愿品》的5个单印本，是罗太后于仁宗去世3周年施印的折装本。题记中说将散施汉文、西夏文、藏文的《普贤行愿品》、《转女身经》、《仁王经》9.3万卷，还有大量的施舍品（仅数珠就有16088串！）。我们不清楚后两部经究竟印了没有。现藏唯一的《仁王经》（原藏录号TK—141，本书编号63）大约属于12世纪前期的，《转女身经》只有1195年的版本。

16.原藏录号TK—135（本书编号155），1200年8月26日刻印本，卷子装（大概后来要叠成折本），《圣六字增寿大明陀罗尼经》。题记指出，此经是哀子仇彦忠等为资荐去世的父母而施印的。

17.1210年9月22日刻印本，原藏录号TK—21、22、23、24、25（本书编号66、149—152）。5件合在一起的《佛说大乘圣无量寿决定光明王如来陀罗尼经》和《佛说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折本，其中1件（原藏录号TK—21，本书编号149）完整，题记说李智宝受普化寺张盖委托施印此经。还有刻工智圆和书手索智深的名字。此三人无疑是同一个寺院的僧人，普化寺大概也是刻印地点。

18.1218年。原藏录号A8（本书编号239）。重要之处在于这是唯一的（文书除外）记有日期的写本。

（三）女真金国的版本

北宋衰落和1127年建立南宋之后，宋朝领土在长江以南，再从那里运书很困难，而且很快就一点也运不来了。我们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能确定年代的晚期宋刊本是1132年以前的。西夏的印书业基本上是在皇室监护下，它的发展补充了西夏国对图书的需求。这些书籍全是佛教文献，其范围非常狭窄。非

佛教内容的版本主要是由女真金国占领的宋朝北部运去的。遗憾的是，许多书籍根据外表特征可以断定是金朝的版本（约有15件），但都未注确切的日期。可以把这些书籍分成两类：

1. 12世纪中期的，具有宋朝版本一切特点的书籍。其中有一部（原藏录号TK—142，本书编号106）《普贤行愿品》附有未注明日期的题记，指出刻印地点和出版者“储协赞于千秋”，施主是安亮和宝戒，施印此经是为纪念去世的父母，印数108卷。千秋在今河南省浍池县，南宋时属金国，但是工匠们大概至金人占领前一直在该地。比较木版画后查明，另外的两个版本——一是《普贤行愿品》（原藏录号TK—243，本书编号107），二是宝叉难陀译的同经第十六品（原藏录号TK—246，本书编号99），也是出自这家书坊，因为这3个版本中毗卢遮那佛像的风格和结构几乎完全一样，不同点仅在于个别的细节（帽子的有无，装饰图案的不同等等）。这3个版本是12世纪中期的，是金国刻印图书的最早实证。重要的是它们和南宋12世纪30年代的杭州版本很相近。这两种版本后来经常成为西夏刻印书籍的样本。我们没有发现12世纪下半叶西夏国印刷业进一步发展时期的大批金刊本和宋刊本，但出现了成批的西夏刊本。

2. 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的书籍有自己的特点，没有或少有西夏版本的特点。这些书全是蝴蝶装，软白纸印刷。任何一部都未保存下有日期的题记，因此只能大致断定刻印年代，这一类书籍有《刘知远诸宫调》（无藏录号，本书编号274）、《南华真经》即《庄子》（原藏录号TK—97，本书编号262）和《文酒清话》（原藏录号TK—228，本书编号276），都是中国题材的文学作品（其中包括《庄子》，对其在中国文学史初期所产生的伟大作用未必会有疑义）的范本。只有《汉书》残卷

证明，历史著作的版本间或从金国传入西夏。像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医学作品和道家的占卜书在西夏人中曾广泛地流传，其中三种：《宋真人千金方》（原藏录号TK—166，本书编号302）、药方（原藏录号TK—173，本书编号302）和《六壬课秘课诀》（原藏录号TK—172，本书编号313）都是由金国传入西夏的。

（四）元代的书籍

我们有元朝时期的大批西夏古文献资料（蒙古的征服从公元1234年开始，到公元1378年蒙古帝国在中国领土上的最后残余北元政权不存在时为止），这是一些文书和密宗经文的写本。至于印刷的书籍，只有一本《圣妙吉祥真实名经》（原藏录号TK—184，本书编号159），可以有把握地认为是14世纪上半期的^{②②}。根据外表特征看，同此版本相似的还有一部《佛说父母恩重经》（原藏录号TK—139，本书编号215），也是同一时期的版本。

西夏国汉文印书业发展概况可根据所引用的资料描述出来，其历史可分为三个时期：

1. 1127年女真人占领中国北部和西夏人由承认（实际上不是经常能作到的）宋朝主权转为承认金国主权以前，这一时期绝大多数版本来自宋朝，只有某些版本证明西夏本土印刷业已产生。西夏刻印的书籍都以宋版本为范本。差别首先可从书的内容上看出，西夏版本仅仅是数量有限的佛教经典著作，或是与之有关的中国佛教著作；宋版本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中国本土的文学作品、辞典以及中国佛教注释著作等古文献。此外，西夏书籍几乎全是卷子装或折本装，而宋代书籍占首位的则是蝴蝶装，其他两种装帧的书也常发现。

2. 从女真人占领中国北部到13世纪初期，这是西夏印刷业

的繁荣时期，主要的当事人是仁宗皇帝，也有其他皇室成员，其中最积极的活动家可算是罗太后。这一阶段的初期（30年代），许多书籍由南宋（杭州、绍兴）和女真政权之下的中国北方运去。这两种版本都继承了北宋印书业的传统。后来的可以据以判断从宋或金输入书籍的资料，在藏卷中未发现。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同南宋的联系中断了，而金国的印刷业还未充分发展起来。因此西夏人为满足居民对书籍的需要，不得不加紧发展本国的印刷业。其特点是：第一，刻印最急需的佛经（最流行的经）；第二，折本装是主要的装帧样式（有几件未叠成折子）。后期，金国的书籍又重新出现，基本是非佛教内容的，主要是蝴蝶装。大概这时金国的印刷业已巩固并发展了，开始向西夏供应书籍，其范围越出了西夏传统佛教的内容。同时西夏国家开展了翻译活动，把汉文中没有的经典译成汉文，首先翻译密宗经典（密宗的许多汉文译本都是从西夏文翻译补充过去的）。翻译活动集中在兰山寺，仍由仁宗主持；还有两个有名的刻书中心周家寺和普化寺。这3个寺院都在西夏首都兴庆，或在其附近。但是由于蒙古人的征服而中断，蒙古人把金、宋和西夏都消灭了。

3. 同蒙古的战争和蒙古元朝时期（13世纪初至14世纪70年代）。我们需要预先声明，在13世纪初至14世纪初有一段很大的停顿。原因大概是把图书放入埋葬其主人的地方——“著名的塔”中，直到把塔填满才停止。较晚的古写本文献如何落入塔墓中，只能作种种猜测。最有可能的是，后来把图书从上部的窟窿（可能是通风口）扔进塔墓中，可能是为了不使书籍和文书（主要是这一时期的大量写本）落入14世纪60至70年代进攻的中国军队手中（应排除在垃圾堆中找到的那部分，但由于上面提到的那些例外情况要分出那部分是不可能的）。引人注目

的是几乎没有印刷的书籍，只有一些版本的个别碎页，这当然不能作为元朝没有印刷业的证据（元朝确有印刷业）。但元朝的版本能出现在遥远的边区，出现在当时实际上已是城市的黑城，而且是荒废了的塔墓里，这只是偶然的。藏卷中有许多是仪轨内容的密宗写本小册子。因此可以断定，大概是本地的写本补充了印刷书籍的不足。随着北元的衰落，黑城的印书传统（在14世纪只能勉强地称它为西夏传统）最后中断了。

十、黑城出土汉文遗书中发现的历史资料

我们叙录的这部分柯兹洛夫搜集品中，可以找到许多资料来补充我们已知的西夏国史，并使人们更加明白有关问题，这主要因为有E·И克恰诺夫翔实可信的著作《西夏国史纲》。在进一步叙述时，我们从这本书中摘录了一些我们必需的已知的材料，但没有每次都专门注明，只有当这本书中的事实没有被完全采用时，我们才作了注释。相反，黑城汉文遗书中的全部资料都被注明编号，以便读者能按叙录对其进行查验。这些资料绝大部分取自版本题记，个别的取自木版画榜题。两者作为文献资料大概不会被引起争议，因而对其可靠性不会有所怀疑。这些资料反映出的首先是印书机构，其次是同印书有关的人，以及所印书籍的传播情况和途径。

（一）机构

根据藏卷汉文版本的题记和许多简接资料，可以确定出一系列从事翻译、印刷和传播书籍的机构（主要是印刷所），可以知道其名称和地点。在说明西夏国本土的这些资料以前，我们先研究一下相邻的宋和金国的版本。我们在金刻本题记中发现了考察这些版本的依据，这类题记仅保存在女真人占领中国北方初期刻印的书籍中。我们知道的这一时期的版本和中国原

先的版本基本上无区别，完全可以断言，这些印刷所一直存在到1127年，并很快在女真人政权下恢复了活动。

在北宋，首都汴梁（今开封）有高度发达的政府印书业——所有研究者对此看法一致^⑨。政府或皇室出版的书籍经皇帝审查后刻有皇帝的赞语。这类书是经国家教育机构研究后被推荐的。在我们的藏品中，可举出一本书，即吕惠卿注的《庄子》，他在1084年把此书呈送皇帝审阅，1094—1097年间由皇室印书局出版。出版日期被定为此时是由于作者这期间得“观文殿学士”称号。此版本系大型蝴蝶装，用白细纸印刷。

除京城的印刷业外，宋朝还有地方行政管理的印书局。我们藏卷中最早的版本《金刚般若经钞》（1019年），是两个相邻地区丹州和军州的行政长官梁胤主持在陕西省丹州的印书局刻印的^⑩（原藏录号TK—149，本书编号205）。

此外，书籍还在佛教寺院里刻印，我们有几个版本都可以证明。1083年版本（原藏录号Φ—337，本书编号220）中的资料最详细，是密宗疑经。从题记可看出，是卫州（河南省）仁化寺“净土院”刻本，编辑和校对是该寺僧团成员贤惠和贤熙。还有3个版本无疑也是寺院刻印的，都是著名佛教活动家的作品集。第一部作品据序言指明是1104年（原藏录号TK—132，本书编号225）印于成德（河北省）；第二部是12世纪20年代的（原藏录号TK—134，本书编号229），印于真州（河北省）；第三部作品据序言所列情况，其人其事都同1127年有关（原藏录号TK—133，本书编号226），虽然未明确指出刻印地点，但据外型看，可认为是河北省的版本。我们通过间接方式还得知，邠州（陕西省）开元寺有寺院印刷所，该寺有位移民刻工，1162年在西夏都城刻过佛教注释者作品的雕版。如果寺院里无印刷所，大概就不需要强制他留下。

最后，我们藏卷资料中记录下来的第四种图书刻印机构是私人书坊。其最早的版本为1091年（原藏录号TK—185，本书编号98）。刻印地点题记中称大原（太原），是山西省的行政中心。由于此刊本又薄又小，施印者无任何称号，因而未必能把其姓名同某大书坊联系起来。其他私刻本属较晚时期，是12世纪20—30年代的，从中可区分出一些杭州刻本。这时的杭州以其印刷业著称，特别是印书业规模宏大，此后于1127年成了南宋的都城。

杭州的印书业在许多研究著作中都有详细的记述，杭州刻本的范本被广泛选登在许多已公布的图录中^⑨。然而，我们的藏卷对我们已知的问题作了补充，使我们知道了宴家书铺的名称（原藏录号TK—167，本书编号81）和以前未一起出现的、人们不知道的同一书坊的刻工们的姓：李、秦、郎（原藏录号TK—79，本书编号209）、此外，珍藏品中还有中国宋代另一大刻书中心绍兴的两个范本（原藏录号TK—290，TK—291，本书编号265，267）^⑩，但在为数极少的残片中，我们只能记录有这种范本而已，此外对我们已知的问题就作不出任何补充。指出这点很重要，无论杭州版本还是绍兴版本，都具有12世纪30年代这两个中心的书籍所固有的特征。

大体来说毫无疑问，中国出的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的书籍，以及女真人占领初期的版本，在西夏印刷业的开始阶段都起了重要作用。甚至金国也未能完全阻止这些书籍从中国南方运进来，而1127年后在北方保存下来的印书机构继续出版木版书，其中许多书也流入西夏国。宋代的印刷业在11世纪下半期至12世纪初极为繁荣昌盛。甚至在柯兹洛夫搜集品的有限材料里，我们也发现了各种内容（道教、佛教、历史、古典文学、字书）和型式（卷子装、折本装、蝴蝶装）的版本。这是因为

全国存在着各种体系的印刷网（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私人、和寺院的）。不容置疑，12世纪30年代以前，中国的版本对相邻民族发生过重大影响（对西夏一直如此），但在30年代后一切都变了，本国印的书籍在西夏占据首位。

西夏国在其印刷业昌盛时期刻印的汉文书籍数量极大。书里提到了某些印刷所的名称。其中有一个座落在大延寿寺内（见1085年的版本，原藏录号TK—88，本书编号104），该寺地址题记中只字未提，但应该认为它在京城地区。因为据印刷质量来看，它并不亚于京城印书局的版本^⑩。此版本的刻印目的（向人们散发）和皇室主持下所刻书籍的题记中通常的记载是一致的。我们不清楚此版本的施主守琼是何人，但他一定同皇室有某种关系。我们认为，大延寿寺可能同1055年建于兴庆西面和受皇室关怀的承天寺有密切关系^⑪。不管怎么说，承天和大延寿两者可相提并论，因为“大”就是天的意思。

第二本书的刻印地点，即1141年版本（原藏录号TK—164、TK—165，本书编号177、178）的题记中提到的“三学院”也在京城里。这很明显，因为第一，施主是仁宗皇帝；第二，根据事实可知，此书是为他父亲崇宗去世三周年而印；最后，据该机构的名称看，也许明显属于起科学院作用的政府系统。

1146年版的7卷本（原藏录号TK—11，本书编号67）题记说，该书是上殿宗室御史台出版，此刊本发行人还是仁宗，而且从其他特征看，也不得不承认是在京城刻印的。在京城“帝里”还印了1152年版本（见第二卷中的题记，原藏录号TK—242，本书编号231），既然仁宗诞辰是刻印此经的原因，就不能排除为同一御史台出版，因为御史台同计算何时过生日、举行婚礼和其他重大礼仪是否吉利有直接关系。

1161年版本（原藏录号TK—72，本书编号108）题记中，

刻印地点称京师周家寺。有两点值得特别提出：第一，该书的刻工王善慧15年前曾为上殿宗室御史台印的刊本刻过一部分版；第二是寺院自身的名称。不错，在历史著作中没有提到周家同皇室有关系，但在西夏文书籍的一个题记中，和1167年同时用汉文刻印的一个版本的题记中刻有“周皇后御译”^⑬。就是说周家同皇室的女系有密切关系，可能寺院本身就处于皇后的庇护之下，可以说成是她及其亲属的“家庙”。

不论是西夏文版本，还是汉文版本，题记中常提到兰山寺（见1167年—1184年的版本），不清楚它是否为印书地点，但却是一处活跃的译书场所。许多题记都指出，把一系列佛经翻成汉文和西夏文的译者就是该寺的沙门德慧。他至少把四部作品译成为汉文（原藏录号TK—128、129、121、145，本书编号182、184、179、183）。仁宗皇帝是该寺施主，在题记中他还自称是所有汉文和西夏文译本的“译定”。兰山寺在西夏印书业中所起的作用无可怀疑，但该寺所在地至今未查明。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试图引用某些历史资料：《西夏记》1047年条目下写道：“秋七月筑离宫于贺兰山”^⑭。京郊的这座离宫一直存在到金朝，大概18世纪还在，《甘肃通志》中有很生动的记载：

“贺兰山，距州（即宁夏城，西夏时称兴庆——孟列夫注）西六十里……（山）上有废寺并元昊（西夏皇帝，1031—1048年在位——孟列夫注）离宫遗址百多间”^⑮。

该书又写道：

“元昊离宫，其遗址在贺兰山东。又振武门（大概是整个宫殿围墙上的门——孟列夫注）内有元昊避暑之离宫，洪武（约1368年——孟列夫注）初遗址尚存，后遂改修为清宁观”^⑯。

我们认为，贺兰山（阿拉善）和兰山寺（“贺”音被省去）发音相近不是偶然的巧合。18世纪时这座山上还存有大量的佛寺遗址。对我们来说，重要的问题应查明是否存在过那种与西夏刻印书籍的活动有密切关系的寺院。我们在《西夏纪》中找到了这类记载：

“冬十月修承天寺——没藏氏（元昊妻——孟列夫注）好佛，因中国赐《大藏经》，役兵民数万，相兴庆府西偏起大寺，贮经其中，赐额“承天”。延回鹘僧登座演经，没藏氏与谅祚（她儿子，1049—1067年在位——孟列夫注）时临听焉”⑩。

这是不是德慧译经的那个寺院，我们没有充分把握，但它符合所必需的条件：如果它不在郊区的离宫里，那就在其附近，寺院里保存有佛经典籍，受到皇室的赏赐和庇护⑪。

最后，在1210年版本（原藏录号TK—21，本书编号149）题记中，印书地点称普化寺。虽然关于此寺的其他资料一点也没有，但我们倾向于这也是京城（或京郊）的寺院，因为题记中署有“圣普化寺连批张盖谨施”，在普化寺前冠有“圣”字。

这样，我们就从柯兹洛夫汉文收集品的题记中知道了西夏国六个不同印刷所的名称，并在一定程度上也知道了它们的位置。同我们知道的中国宋代印书机构作一比较，就能得出饶有趣味的结论。无论如何，从藏卷资料来看，西夏国的印书业几乎完全由皇室控制，当时就像中国一样，它既是私营，又是国营。在西夏，印书的寺院全在京城地区，它们就像依赖国家机构一样依赖皇帝及其身边的人。这就造成一种事实：西夏国用汉文刻印的书籍除了符合本国思想意识的，如佛教特别是在西夏得到传播的佛教支派阿弥陀派和密宗派的书籍以外，完全没有别的著作。

（二）同刻印书籍有关的人

关于宋代刻印书籍的情况我们只有一些零星不全的资料，已在有关的叙录中引用了。倒是西夏的刊本资料比较完整，应作专门的阐述。既然我们查明了西夏的印书业具有国营性质，那就理所当然地先要从作为书籍主要施印者的皇帝及其身边的人们说起。

1. 仁宗皇帝（仁孝）

原名仁孝，生于1124年，其父为乾顺皇帝（1087—1138年在位），母曹太后（卒于1164年）。仁孝于1139年继王位，时年15岁（按中国算法是16虚岁），他的原名在翔实可信的藏卷中一处也未提到。他生前有女真人于1141年赐的尊号，我们已援引过，死后（1194年）庙号称仁宗，同样也只提到他父亲的庙号是崇宗，据史书记载，仁宗还是西夏国许多教育机构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于1143年在宫中设立小学，在全国各州县设立学校，1148年设“内学”，1161年设“翰林学士院”^⑭。1143年前的情况我们还能补充一点，1141年宫中已有了可能是起科学院作用的“三学院”（其建立年代不详）。仁宗在组织和发展西夏印书业中的作用难以重新评价。几乎藏卷中出现的所有印书业中心（“三学院”、御史台、兰山，可能还有周家寺）都同他的名字联在一起。而且他在兰山积极参加了把佛经译成汉文和西夏文的活动（甚至散施和校勘译本）。他在位的55年中（到1193年）曾多次散施大量刊本。

还需补充，在仁宗所施印刊本中的版画里，我们有可能看到他的画像。无容置疑，有一幅版画上就画着他（见1146年版本卷一的版画，原藏录号TK—1，本书编号67）。皇帝被画成率领全家（共22人）跪在佛前的施主。我们认为，这些人中还有可能被辨认出另外一些人。他们的名字和职位在历史资料中已为人所知。更有趣的是，有两个版本版画上画着同一人的

像，这无疑出自同一画师之手（原藏录号TK—247，TK—140，本书编号290、161）^⑩。在第一个版本的版画里，施主中有一人戴皇室成员的帽子，而在第二个版本的版画里，那人却戴着王冠。两个版本都未注明日期，但在12世纪中期，西夏只有一人具备从皇室成员到皇帝的资格，这人正是仁宗。最后，在1189年版本（虽然题记佚失，但版型同注有该年日期的版本相同）的一幅版画中（原藏录号TK—179，本书编号53），站着的王子面前坐着一位戴皇冠者，其容貌同上述的肖像相似，但长着上髭和胡须，这大概也是仁宗^⑪。

2. 罗太后

这位妇女本是汉人，在一次西夏人偷袭宋朝领土时被掳，住在皇宫数年。1165年仁宗元配王皇后去世，1167年罗氏被立为皇后^⑫。后来，1193年仁宗去世，她的儿子纯佑称帝（1194—1206年在位），但在1206年被他表兄弟安全（1206—1211年在位）推翻而死去。罗太后可能参与了推翻其子的活动^⑬，或者很快顺从了这一事实。她在这年两次（正月和七月）派外交使团前往对西夏实施主权的金国都城，向金国解释政变原因，要求得到对新统治者王位的承认^⑭。最后在九月，金政权送来承认安全为夏国王的国书^⑮。此后，罗太后的名字就从史书上消失。

我们从西夏国汉文书籍的题记中知道了罗氏1189年第一次参与印书活动的情况，当时为庆祝她丈夫登位50周年刻印了一系列佛经，如果说主要的版本（《弥勒上生兜率天经》）由仁宗主持，那么另外两个版本（《金刚经》和《普贤行愿品》）则由她施印。我们从题记发现，以她名义（这时已成为太后）刻经还有过两次：第一次是在仁宗去世两周年刻《转女身经》（1195年），第二次是在仁宗去世三周年刻《普贤品》（1196

年)。可以认为，这些版本中出现《转女身经》不是偶然的，丈夫死后，罗太后立自己的儿子（纯佑，时年17岁）为皇帝，她大概企望在国内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因此就选刻此经，经中叙述妇女如何神奇地变成了男子。

在罗太后施印的版本所附的许多版画上，我们多次发现一些跪着的妇女像彼此相像。在1189年的版本中（原藏录号TK—61，本书编号122），一位妇女跪在佛前供桌左侧，独自处于其他一组妇女的前面。在1195年的版画上（原藏录号TK—8，本书编号146），左下角有两妇女像，一位梳着太后的华丽发式，第二位的发式则比较朴素。两位妇女同上幅版画上的很像。这可能就是罗氏和其女儿（有关其女儿的史料不见）。最后，在1210年版本的版画上（原藏录号TK—21，本书编号149），佛像供桌前作祈祷的妇女也像上述两版画中的形像。如果想起有关罗太后的历史资料在1206年猝然中断，这最后一幅像就非常有趣。可以断定，在她儿子被推翻、新统治者在她参与下得到王位后，她被停止过问国家事务。她后来的命运不清楚，但某些资料（我在有关木版画的文章中详述过的资料）使人推测，她可能出家为尼，被放逐到黑城，而且死后葬在那里“著名的塔”中。这就能解释清楚，为什么木版画上有她的像，但版本题记中则对她只字不提。如果这种推测可信，就应该认为“著名的塔”中的书籍是她的私人藏品。其中皇帝的私人用书（黄纸印制）以及珍藏品中有宋、金刊本都可证明。而宋、金版本显然是西夏都城皇室印书局刻印一系列书籍时的范本^{①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感谢这位妇女使黑城的书籍一直保存至今。

3. 皇族的其他成员

题记中提到的或木版画上出现的皇族成员中，应首先指出

我们知道的1167年一个版本上的施主“秦晋国王”（原藏录号TK—124，本书编号11）。虽然他的情况我们知道得不多，但毫不怀疑此刊本版画上画的是他及其全家的“肖像”。这是一位年青人，留有短髭和胡须，戴皇室子弟头饰，跪在男施主们的第一排。他对面第一排的妇女可能就是他母亲，其余三位是他妻子。他后面的四个男子大概是其兄弟，头饰比较朴素。

如同我们前面所说，在原藏录号TK—140、TK—247（本书编号161、290）的版画上，我们看到的是另一家庭的画像，其中一人可能是仁宗，其他人（大臣、高级将领以及佛教僧侣）不能不是身居国家要职的皇室成员。

在另一些版画上的施主中间，还可发现有其他皇族成员。其中我们发现有两位王子，一个叫威光太子，出现在1161年的版本（原藏录号TK—72，本书编号108）的版画上，是位约10岁的男孩，着华贵服装。既然当时的皇后是王氏，罗氏还未被册立，这就证实威光太子是王皇后之子，此版本是她施印的（版画上的男孩年幼）。威光太子的命运如何，我们不知道。

第二位王子叫祁陀太子，出现在1189年版本的两幅版画上（原藏录号TK—179、TK—14，本书编号53、18）。他的形像出现在仁宗纪念日刻印的一些版本中，其中之一有题记（原藏录号TK—14），施主为罗太后。十分明显，祁陀是罗太后之子。但这位王子的命运也不清楚（仁宗之后继位的太子是罗氏之子，本名纯佑）。我们还不能说，祁陀和纯佑是同一人。但考虑到画上的祁陀可能有12岁，而5年以后纯佑登上王位时正好17岁，那就不能排除祁陀就是纯佑的可能性。因为在中国有个尽人皆知的习俗，在不同场合和不同年龄，可以变换和另起名字，而西夏人仿效过中国的这种称名习俗。如果这样，那我们拥有的还是一位西夏统治者的“肖像”。但我们实在没有

把握说他俩是同一人。祁陀也可能是另一人。佛经里把佛身边的一位称作Jeta，在他受到佛赏识之前是祇园的主人。他名字的汉文译音叫祇陀，而祁陀完全可能是祇陀在语音和字形上的异称。但即便在此情况下，也不能排除那幅肖像同现实的王位继承人纯佑的肖像相似，就像不能排除同一类版画中的舍卫国王同纯佑父亲仁宗皇帝的画像相似一样。

皇族成员的名单就到此为止，我们有他们在我们感兴趣的印书业方面活动情况的资料。

4. 其他施主

关于其他施主的资料更加缺乏。其中某些人——1073年版本（原藏录号TK—158，本书编号175）的施主陆文政和1085年版本（原藏录号TK—88，本书编号104）的施主守琼，我们只知道这些书由他们施印。根据前面叙述过的理由，就像1201年版本（原藏录号TK—21，本书编号149）中提到的普化寺一样，大延寿寺（守琼属于该寺）应当处于皇室的庇护之下。

1184年版本（原藏录号TK—129，本书编号184）的施主同皇室关系比较明显。该书是为曹太后去世20周年而印，而且同仁宗自己施印的两个版本（原藏录号TK—121、145，本书编号179、183）有密切关系。大概后两个版本题记中指出的5万1千卷印数在这次可以完成。施主们的组成很有意思。题记中注有姓名的17人显然属于同一寺院团体（不一定全由僧人组成，也有世俗信徒）。领衔者称“尚座”袁宗鉴，这些人称“善友众”，这是证明。17位施主中有6人姓杜：杜俊义、杜俊德，杜用，杜信忠，杜彦宗，杜宗庆，由此可断定，这寺院同杜家关系很密切^{①7}，其他姓（有9个）一定是杜家的亲属，中国的社团通常都有这种情况。还有一件事实也证明上述人属同一寺院团体，17人中有11人按取名被分成四组，“俊”字

组：杜俊义、杜俊德、李俊才；“用”字组：杜用、陈用，张用；“忠”字组：杜信忠、杜彦忠、袁德忠；“宗”字组：杜庆宗、袁宗鉴。在中国，一个家庭的孩子们取名时都讲究有一字相同。这种习俗在寺院团体（特别是在僧人中间）和不同姓的同辈人中也很流行。如果这样，那这个团体里的人就有四辈，而且这四辈人里都有杜姓也不偶然。最后一个细节是，此版本同另两个版本都是同一年刻印，而且后两种的经文是德慧在仁宗主持下于兰山寺完成的译文。由此可认为，此版本同兰山寺也有关系。从上述情况可肯定，此版本是皇室印书局出版，并由皇帝身边的人施印。

最后一件注有日期的版本（原藏录号TK—21，本书编号149）是普化寺的李智宝在1210年施印。应该认为他同刻工和写手都属同一寺院团体，因为这三个人（李智宝、智圆、索智深）名字中有一个相同的“智”字。有一个细节要特别指出，此版本版画中左边的施主是一对夫妻，毫无疑问他们一定是李智宝（戴官帽）和他妻子（梳复杂发式），而罗太后像的出现说明这对夫妻不知怎么同皇太后有了关系。如果罗氏这时如我们认为的那样失宠了，那我们就不应当惊讶，因为她的名字在版本中一点也未提到。如果在列出的人里能补上1185年版本（原藏录号TK—136，本书编号187）中的比丘智通和1200年版本（原藏录号TK—135，本书编号155）中的仇彦忠，那么我们所知道的施主名单就处理完了。遗憾的是关于这两人我们什么也说不上。

5. 印书业的工匠

除了施主之外，题记中还有许多制造这些施舍品的人名。我们已谈到过德慧，他在皇室庇护下的兰山寺做工。可以说，他和仁宗是刻印书籍的组织者。

与此同时，我们还知道印书行业许多工匠的名字。众所周知，书上的文字是用专门的雕版（木刻版）按页印刷。制版时先在纸上写好字，然后反印在木版上（木版上预先涂一种特殊的混合液），将没印字的地方刻掉，版面上就凸现出准确的反刻着的文字。这之后就可以作印版用^⑧。由此可见，一个印刷所里应该有写手、刻工和制版匠。制版匠的资料我们藏卷中一点也没有，但却有关于前两种拥有专门技术的手工业工人的许多记载。

藏卷题记中写手的名字不多。有1152年版本（原藏录号TK—242，本书编号231）中的法随和前面提到的1210年版本（原藏录号TK—21，本书编号149）中的索智深。除了他们写过具有宋刻本特点的字——宋体字以外，其他细节我们什么也不知道。

刻工的情况不同，他们经常被提到，可能是因为这项职业较复杂和更受人重视的原因。此外，像木版画那样复杂的作品，也一定是他们刻的。在我们的叙录中，刻了1146年版本的御史台印书局一批刻工的名字占着首要位置。各卷上总共有4人的姓名，然后在卷七题记中又一同出现，他们是王善惠、王善圆、贺善海、郭苟埋。前三名有一个相同的“善”字，照上述解释，他们应属同一寺院团体，而王善惠和王善圆无疑是兄弟，这又提示我们，刻字技术可能（像其他手艺常有的情况一样）是祖传的。王善惠的名字还出现过一次，他是1161年版本（原藏录号TK—73，本书编号109）的刻工，并指出是周家寺的。如果此寺院1146年就已存在，那其他三位工匠就应同其有关系。

1152年版本（原藏录号TK—242，本书编号231）题记不仅说出刻工刘德真的姓名，而且还记载了他的一些活动，我们从而可断定，他是邠州（在陕西省中部，靠近甘肃）开元寺的

和尚，12世纪30年代女真人占据陕西后，他迁居西夏国，在京城“帝里”刻印了该版。所有这一切证明，西夏的国家印书局乐意使用来自中国的工匠。还有一位1210年版本（原藏录号TK—21，本书编号149）的刻工智圆，我们除了知道他是普化寺的以外，其他情况则一概不知。

西夏国汉文版本题记中提到的同印书业有关者的名单到此为止。无容置疑，名单可能广些，而要补充和详细加以说明，则依据收入柯兹洛夫藏卷的西夏文版本。但我们现在还做不到，因为这些资料还显示得不充分，而显示出的部分又不完整^⑨。不过现在已能证明，从事印书的人，或者几乎全是皇族成员，或者是同皇族有某种关系。这又一次证明我们的论点：西夏的书籍出版业是国营企业，操纵在皇帝及其皇室手里，集中在京城和周围地区。在宋国和金国，正如我们见到的那样，施印者常常是私人，虽然从全国来看，最重要的版本是在京城的国家印书局刻印。

（三）刻印目的和印数

宋朝（包括刚占领中国北方的金朝）和西夏的书籍出版业在刻印目的和印刷数量上也有显著差别。宋版书中有3个版本指出过印书目的：第一个是1083年版本（原藏录号Φ—337，本书编号220），是孝子孝女按父亲嘱托为纪念亡母石氏而印；第二个是名叫王简者要祭奠祖宗（1091年版本，原藏录号TK—185，本书编号98）；第三个是12世纪30—40年代版本，是安亮和宝戒为纪念去世的父母而印。正如我们所说，这些版本全是为家庭私事而刻印。当然，也有为公事而印的版本，1094—1097年刻印的吕惠卿注《庄子》就是（原藏录号TK—6，本书编号260）。但藏卷中明确指出刻印目的的只有私刻本。书籍的印数也很少，1083年版本印数500卷；12世纪30—40年代

版本印数108卷。

当我们带着同样问题研究西夏刻印的书籍题记时，则完全出现另一种情况。只有几个版本，即1073年版本（原藏录号TK—158，本书编号175）、1185年版本（原藏录号TK—136，本书编号187）、1120年版本（原藏录号TK—135，本书编号155），可能还有1085年（原藏录号TK—88，本书编号104）和1210年（原藏录号TK—21，本书编号149）版本，大概可以算为私事而刻印，其中1073年本和1120年本是为纪念去世的父母，1185年本刻印目的不详。1085年本是为了“散施”，但题记颂词部分提到安宁幸福，这应是指国家而言。至于1210年本我们已说过，它可能是为纪念失宠的罗太后而刻印。既然后两个版本可以初步推测是为国家公事，那就有把握断言，它们不可能是私事，这5个版本的印数全未指明。

其他注有日期（或据间接资料推算出日期）的版本，无疑都是为国家公事而刻印。一般来说，这些版本的题记内容非常广泛，有的祝愿国家、皇帝和人民安宁幸福，有的祈求上天和佛保佑皇帝全家和去世的祖先等等。题记最后通常也指出具体的刻印目的。如1141年版本（原藏录号TK—164，本书编号177）是为纪念崇宗皇帝去世3周年；1152年版本（原藏录号TK—242，本书编号231）是为庆祝仁宗皇帝诞辰；1167年的两个版本（原藏录号TK—124、128，本书编号11、182）是纪念曹太后去世3周年；1184年的两个版本（原藏录号TK—121、145，本书编号179、183）是纪念曹太后去世20周年；1189年的所有版本都是庆贺仁宗皇帝在位50周年；1195年（原藏录号TK—8，本书编号144）和1196年版本（原藏录号TK—98，本书编号123）分别为纪念仁宗皇帝去世2周年和3周年。1146年版本的刻印目的不详，但如对照日期就能看出，可能同一个重大活动

——庆贺金国赠送六个城市有关。

总之，西夏国家的所有汉文书籍几乎都是在喜庆或悲痛的日子里出版的。毫无疑问，无论是国王的诞辰（特别是一些纪念日），还是皇族重要成员的丧日，都被算成这种日子。在题记中还指出，刻印这些书籍是为散施和让老百姓在上述纪念日公开诵读。

○说到这里，西夏书籍的印数非常典型。上述版本的印数最少者为15000卷（1141年版本），依次上推为20000卷（1167年版本）、30000卷（1195年版本）、51000卷（1184年版本）、93000卷（1196年版本）、100000卷（1189年的国家版本）。顺便说明，这些印数就在本世纪也非常庞大，表明西夏居民对书籍的爱好；也表明知识渊博的仁宗在教育人民方面所作的努力^②，这种努力终于取得不小成绩。

总起来说，对涉及西夏汉文印刷史的全部资料所作的基本分析，以及把它与相邻国家宋、金（主要是宋）有关书籍的同类资料作一比较，就使我们得出为藏卷全部材料所证实了的结论，即西夏的印书业是皇家鼓励下的国有企业；刻印书籍是为供应各种全国性活动需用；这些书籍是由国家印书局或受皇家庇护的寺院刻印。既有刻印精良的善本，又有指明散发给百姓的大量单印本，特别是仁宗皇帝在位期间，在国内教育方面实行了一系列措施，使西夏印书业出现繁荣昌盛的局面。另一方面，皇帝的庇护又造成汉文所印作品的种类非常贫乏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所印书籍已不是普通的原先作为西夏国思想学说的佛教著作，而是从佛教作品中挑出的经文范围很狭窄的阿弥陀派和密宗派的版本。佛教的这两个支派在西夏占统治地位，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最流行。至于宋和金的印书业，则完全不是国有性质，印书的渠道要广泛得多。因而就印出了大批各种各样

的书籍，印出了佛教经文或其他意识形态的经文不占明显优势的各种版本的汉文著作，例如宋朝的全国性意识形态就是儒学。

柯兹洛夫在黑城“著名的塔”里发现的藏书，是属于一位皇室成员的，它的构成也同样证明这点。问题不仅在于藏书中京城印的版本占优势。多数藏卷的纸是未经染色的灰纸和白纸。只有个别藏卷是黄纸，这应被看成是皇帝或皇后的私人用书。同一种刊本的大量存在只能这样解释：这是一位施主的藏书，给百姓散发后还剩相当多；绝大多数刊本都是罗太后在1189年、1195年和1196年施印的同一种版本，这就使人不能不认为，珍藏这些书籍的主人正是罗太后。而史料中也未指出过另外的人。同印书业有关系的其他皇族成员（仁宗、王太后、威光和祁陀）当时都已不在人世，而藏卷中时间最晚的刊本或写本（1200年、1210年、1218年）正是这些人去世后刻印或抄写的。我们在这里未说14世纪的刊本和写本，它们不可能同上述这些人有关系。1210年刊本版画上有罗太后的“像”，也证实了我们的考证。当时她的名字已从历史著作中消失了。

最后，12世纪的藏卷中含有大量不能称之为著作的写本（祈祷书、仪轨、祈祷文和咒语汇编等等），我们认为，这说明藏卷主人在晚年已成为尼姑，因为这类经文是和尚、尼姑的用品，而不是居家佛教徒的日常用物。

在“著名的塔”中除了图书之外，还发现埋在里面的一具人的骷髅，据人类学家鉴定，是位女性^②（骷髅下落目前不明）。这就是说，如果我们的考证正确，那么罗太后就在西夏国边远地区的黑城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并被埋葬在那里。

十一、书籍业技术方面的资料

黑城发现的汉文印刷术方面的资料，无论按时间顺序（敦

煌发现的年代最晚的书籍和黑城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书籍都属于11世纪初期)、还是按地理位置(敦煌在甘肃省最西边,西夏都城兴庆位于甘肃省中部偏北——原文如此,译者)、或是按同其他文化中心的联系(中国北方中部各省在唐、宋时期是很重要的地区,它们同黑城存在着联系)来说,都是敦煌发现的那些资料的历史发展线索的直接延续。尽管在时间和地理位置上这样接近,但敦煌和黑城就资料的总体来说,在中国书籍史上应属于完全不同的时期,我们依次称之为敦煌时期和黑城时期。

（一）书籍传播方式

在整个敦煌时期,图书生产的主要方式一直靠手抄。甚至在发明了雕版印刷术之后^②,一直到藏经洞被封闭为止(约1035年),敦煌保存下来的几乎只有写本,而木刻本仅仅是少数。在黑城则是另一种情况,这里(如果不算按完全合理的原因,迄今还常用手抄写的文书)宋、金和当地生产的木刻本占绝对优势。这些木版书与三个国家的写本相比,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不过,前提条件是当地确实能够刻印木版书。在那以后,当西夏北边出现蒙古人时,也就是13世纪初期,珍藏品中的刊本几乎消失了,而写本却大量出现。原因大约不仅在于这时印书业在西夏人的生活中已处于很次要的位置,而且在于图书的主人(据所有间接资料来看是罗太后)已无力刻印和购买新的刊本。当她是国内的显赫人物时,她施印了大批有思想内容的书(按西夏人的观点),指定散发给老百姓。但当她被停止权力时,正如我们认为的那样,她成了尼姑,她为自己个人购置的日常用书只有一种(祷祈文、仪轨,间或有药方)——当然,在那种情况下,抄本既便宜又方便。我们估计这一事实是由当地(也可能是个人)的原因造成的,因为无论是宋还是金的印书业都没有在蒙古人占领之前就停下来(金亡于1234年,宋亡于1279

年)。

(二) 书籍的样式

敦煌时期和黑城时期，书籍的样式彼此也大不相同，然而，它们是一个链条上直接联在一起的环节。在敦煌时期，书籍的样式大多数是卷子。早期的木刻本如果不算经常附有祈祷文的小佛像画和印在一张纸上的简要经文，也都是卷子。卷子在这次阅读时都要展开，阅后再重新卷起，中国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用纸和丝织品做卷子，充分满足了读者的需要，并存在了许多世纪。只是在敦煌时期的后期，大约从吐蕃占领敦煌时期（8—9世纪初）开始才出现折本、小册子和梵夹本^②。折本是卷子的自然发展。为了阅读方便和查找文句省事，卷子被叠成折子形式，这样可以不展开全卷就能翻到要看的那面。敦煌的小册子是由双折着的一些小纸页组成，有4页，全抄着经文。小纸页粘连折叠或缝成书。几乎所有小册子都是袖珍的祈祷书。梵夹本是印度贝叶书的仿造样式。

在黑城时期，卷子发现的比较少，共有40件（主要是11世纪和12世纪初的），其中有一些（不少于10件）如果根据同一版的其他件和同一时期的重刻本判断，是由于某种原因无意地忘记叠成折本（所有这种“忘记叠成折本的卷子”属于西夏印刷术的繁荣时期）。主要的和占优势的样式是折本装，藏卷中这种装订样式共176件。但当时也经常有另一种样式的蝴蝶装，它可以被看成是折本装的进一步发展。如果把印着和写着字的纸面相对而折，外边散开，把里边粘住，就成了蝴蝶装^③。这种书藏卷中共有48件，但西夏本国的版本中几乎没有发现蝴蝶装。宋刻本中我们发现11件蝴蝶装，金朝的有7件，元朝的有6件残本。其余的出现在西夏国的24件蝴蝶装书，只有4件是西夏印刷术繁荣时期的木刻本，其他全属于藏卷后期（13世

纪初期以后)的写本书。

宋、金书籍中最常见的是蝴蝶装。西夏书籍中只间或有这种装订样式(用数字表示:宋朝书籍中有10件折本,金朝有3件,并且是女真人刚占领中国北方时的,其余163件折本全是西夏的)。这大概不全因为西夏人在这方面思想守旧,问题在于,宋代中国和金朝的印刷业初期,佛经都装订成折本书样式。在西夏,正如我们认为的那样,刻印的仅仅是佛教书籍。所以这时的折本装可被看成是佛教印刷书籍的传统样式^{②9}。对写本书来说,最合适的是其他装订样式,其中有蝴蝶装。蝴蝶页的装订形式经常变化,藏卷后一时期的写本中有它变成新样式前的一些变化形式。有一本书的正文不是字面向里,而是字面外露(“正文朝外的蝴蝶装”),有一本是“双蝴蝶装”,把两个蝴蝶页展开,一个放入另一个里面,其中里页的正文朝里,外页的正文朝外。但最流行的(在原来的蝴蝶装之后)样式是小册子(藏卷中有25件,全是写本),黑城时期的小册子是由蝴蝶装发展而来的一种新装订形式:几个双页一个套在另一个里面,但页面不相接,而是交叉着,上页的字面向里,下页的字面就朝外。翻书时两面有字,下两面就无字,交替出现。如果蝴蝶装通常将中缝粘起来,那么小册子则用粗线缝起来,如果书很厚,就分装成几小叠联起来。

小册子形式在中国书籍史上没有出路(只是在20世纪,中国人像日本人、朝鲜人和其他远东各国人一样,接受了欧洲把小册子装订成书的方法,但已是另种样式了),蝴蝶装却很有发展前途。不过在明朝时已采用一直保存到现在的样式。中国较晚期的书中,蝴蝶页的字面不是向里对折,而是向外对折,沿书脑缝订起来。

对装订形式的分析表明,就是在中国,也多方面探寻着书

籍最合适形式。我们藏卷所属的那段时期，可称之为实验时期，当时传统的卷子装在逐渐变化，越来越接近中国木版书后来的那种完美形式。

（三）封皮

卷子装书籍有其固有的特殊封皮，在卷首（按中国习惯从右端）粘有一张坚硬厚实的纸，当卷子被卷起来时，它用作包裹卷子以防损坏，在这个“封皮”外边贴入一个细木棒，系上一根带子。由于正文向里，在“封皮”外面就写上作品名称和卷号。敦煌卷子的“封皮”和黑城保存下来的卷子“封皮”（有3件）就是这种样式。敦煌的小册子无封皮，但其首页和尾页不写字。既然这些小册子中全是最常用的祈祷经文（《金刚经》、《观音经》、某些简短的疑经、祈祷文等），那它们就一定被经常使用——事实正是如此，这些书未写字的外页上沾满了油污汗渍。

当然，书的样式改变时，书籍的封皮也发生了变化。我们的珍藏品中共有40个封皮（包括上述3个卷子装“封皮”），其中折本装封皮23个，蝴蝶装封皮9个，小册子封皮5个^{②6}。

我们认为折本装封皮似乎有几个演变阶段。第一阶段是包皮封皮阶段，折本用一张连粘两层的厚纸包起来。正面贴上作品名称标签，这大概是起源于卷子包皮的折本封皮的一种特殊形式^{②7}。最流行的是另一种形式：折子首尾两页分别贴上二至六七层厚的硬纸板作封皮，上封皮再紧贴一层厚纸或多半是蓝色的编织品^{②8}，左上角贴有书名标签（长方形白纸）。珍藏品中总共有14件贴标签的封皮。下封皮有两种不同样式：或是用二三层纸随便贴在折子最后一面，或者像上封皮那样，是紧贴着纸或编织品的几层硬纸板。

另一种是蝴蝶装书籍（以及小册子）封皮。像折本书籍一

样，粘有蓝色的纸或编织物，也有书名标签。不同之处在于封皮也是蝴蝶页式，书页粘在书皮背脊上。因而其外形和现在的书籍完全一样。但古典时期（元朝以后）中国书籍的封皮是订在书前后的两页单个的厚纸^{②9}。所以应该认为，蝴蝶装封皮只是一种试验形式，没有给后来的中国书籍业提供直接的继承者，正如大家非常熟悉的那样，传统的封皮发端于折本装封皮。

（四）书页的装帧

卷子页和折本页的装帧大体上分不开，正如我们说过的那样，虽然卷子装和折本装书籍本身表明，它们是中国书籍连续不断的不同发展阶段。把折本的页（折面）展开就是卷子的页（叶）。一页就是一版，正文在版框里，从上、下、右三边留出页边（右边预备粘前面一页，我们的珍藏品中未见到这种式样）。无论卷子还是抄本的页码都按页计算，而且不同版本中页码的位置也各不一样：有一种在右页边或右边栏上（卷页粘连时就看不见了）；第二种在每页正文前几行之间（这时页码字小）；第三种在段尾空白处。有的版本段尾有小花纹图案、卐字形符号、4个小菱形图案等，这些图案对佛教徒具有吸引力。页码数字上面，经常加上不超过三个字的缩略书名。

蝴蝶装书籍按另一种样式装帧，它也按页印刷，但书页样式不同，是两面（折本的书页叠成4—8面）。书页上的正文在同一个版框里，四周围以栏线，左右两边多是双线，通常外线比里线粗。书页正中是书口，将一版分为两半（两面），书口上印有黑线者称“黑口”，不印黑线者称“白口”。白口（或黑口）上印书名（经常缩略）、卷第和页码。书名下往往有鱼尾。每行正文之间用界行隔开。宋代杭州和其他大刻书中心的版本，页码下的白口上还镌有刻工的姓^{③0}。在书页装帧方面

我们没有发现能区别宋刻本和西夏、金刻本的明显特征，但在许多细节问题上（字体特征、纸色、纸型和纸的光洁度）我们有充分把握区分开它们^③。不过，西夏的蝴蝶装汉文书籍本身特点很少，这就要首先把它同宋、金的范本作一比较。

宋刻本的纸大多表面光滑，西夏刻本的纸一般涩滞，而金刻本的纸表面有软绒毛^④；宋刻本纸的帘纹每厘米6—9道，每厘米7道的很少。而对12世纪西夏纸来说，每厘米7道帘纹则最典型，西夏刻本帘纹上的横纹很难看到，因为已同表面上的软绒毛粘在一起（1152年和1200年的刻本），这就有把握证实是外来的金朝纸。

宋纸和西夏纸的厚度也有区别，据此可辨别其来源，虽然这种界限不很准确。宋纸很少厚于0.10毫米（多半在0.06—0.11毫米之间），相反，西夏纸很少薄于0.10毫米（多半在0.11—0.17毫米之间），不错，个别情况下西夏纸比上述要薄，但我们认为那是外来的。

不能用纸的开本作为判断是宋刻本还是西夏刻本的某种标准，即便是大致标准。

特别要谈谈文书用纸。珍藏品中这种纸明显分成两种类型。一是宋朝郃延路1118—1131年的文书用纸，质地光滑，厚0.07—0.12毫米，每厘米5道帘纹。西夏无这种型号纸，现存所有西夏时期的文书（最早1172年，最晚1371年）都使用一种表面有软绒毛的纸，厚度0.05—0.12毫米（多数不超过0.10毫米），每厘米7道帘纹（个别为8道）。这种纸容易识别，对着光看有许多孔隙，似小洞，光线全能透过。饶有趣味的是，两个世纪期间这种纸无变化（更确切地说，察看到的单个纸样的差异是个别的，不是成批的）。既然用这种纸记录短期的重要文书（登记配发物款，军队作战部署等），显然事先就不准备长期加以

保存。应该认为，这是一种廉价纸。后期的写本（我们认为那是已做尼姑的罗太后为其个人日常祈祷而购置）也全用这种纸。正如其他间接材料所证明那样，这也许并不偶然，说明这位太后已极度缺乏资金。

另一种是钞票纸，很粗糙，暗灰色，色调不一，同其它纸有显著区别，无疑这是准备专门印纸币的，厚0.18—0.25毫米，每厘米4—5道帘纹。虽然这种纸对区分版本不起作用，但有必要引起重视，因为它在中国造纸史上占重要地位。

必须注意字形和字体特征，据此可鉴定某刊本是何国何时所刻（写本情况较复杂，本文不涉及，需作专门研究）。从黑城发现的汉文刻本中，我们主要区分出3种印刷字。第一种是用坚硬的、很可能是专门削尖的小木笔书写后刻制的字体。我们在叙录中称其为“写刻体”。其特点是起落顿笔，转折笔画不圆。敦煌发现的早期木刻本中就有这种字体。几乎所有11世纪的印刷书籍，不论宋刻本还是西夏刻本，都使用这种字体。

第二种是宋体字，实际上同后一时期木刻本的字体无多大区别。称其为宋体字是因它最早出现于宋代，当时专门为刻书而发明。用尖端有纵缝的尖木笔书写，使粗细均匀，折笔平稳（早期字体折笔不平稳），其特点是横画顿笔有棱角。这种字体无论在宋代和金朝早期还是12世纪的西夏刻本中都占优势。

最后，第三种我们称“小宋体字”，似乎和宋体字完全一样。可能为节约纸张，多排些正文，它比宋体字通常要小3至四倍。竖画不用粗笔，横画棱角减小，常常难以辨认。这是金朝晚期刻本和13世纪初西夏某些刻本的特点。

（五）书籍的总装帧

除上述资料外，“著名的塔”中发现的汉文书籍还有其他一些特点，这大体表现在书籍总的组成和装帧上^③。

了解一本书要从封皮开始，关于封皮的各种类型我们已说过。虽然，远不是所有的书（包括完整的）都“装有”封皮，但可以断言，封皮已成为必需，因它不仅能防止书籍损坏，而且能帮读者按封皮上的书签辨认所需之书。读者打开书，首先看到的是木版画（往往带有变相）^{③⑨}，我们曾单独写过一部书，专门论述版画的形式和内容。这里仅指出，几乎在我们知道的所有版本中（包括卷子装、折本装和蝴蝶装）版画都放在正文前面，印成单独一页（或几页）成为卷首画。这些画页并不计算在书籍总页数里，因为它是单独印好，然后再粘上的。也有例外，1210年版本（原藏录号TK—21—24，本书编号149—152）的几幅版画，同正文交替刻在同一版上。还有，一个版本包括两部经文，各有一幅版画，其版画就放在各有关经文首题前面。

接下来是所印作品的正文，它始于首题，终于尾题。首题后面，用小字注明作者、译者、注释者、校订者^{④⑤}。有的正文带有序（在中国给书作序是常有现象）。佛教经文有时带有祈祷仪程的引言（例如整个《金刚经》版本就如此）。

正文结束后可能有某些补充部分，我们称其为后序，内容同序相近，两者都是评述作品的主要方面。另一种补充形式像正文前的部分，带有祈祷性质。在某种情况下，还有一种被称为“传记”的附录。最后一部分和最常见的附录形式是题记。版本中有题记大概是通常惯例，如果许多书中缺题记，我们可以肯定它阙佚了^{④⑥}。题记一般很短，只指出施印者姓名和刻印日期，但有的内容很广泛。如果找一篇非常详细的题记来分析，就可将它分成几部分，开头部分是“发愿文”，通常包含用骈体文祝愿国家、皇族、居民百姓和佛教团体繁荣昌盛、兴旺发达等。因而发愿文含有版本所必需的某种“指导思想”。此后转入“实际”部分（无专门段落和标题），说明该版如何印成、

用什么样的捐助、举行何种仪式、刻印卷数、用何人资金等。题记包含年、月、日（通常准确到某一天）和主要施主的名字（或是称号）。有时也补充监印者、写手、刻工、校订者姓名。西夏都城和近郊所印版本中，正如我们见到的那样，几乎从来不提刻印城市名称，只注明印书机构。宋刻本则相反，印书城市比印刷所名称出现得多。此外，我们知道宋刻本中题记内容要比西夏刻本特别是皇室刻本简单和朴实。宋刻本题记的颂词和西夏相比，多半是施印者对去世的先辈们的祝愿。

最后，黑城出土的书籍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其中的许多书被修补过（我们认为这是“当时的裱糊”）。修补常有两种：第一种可说是预防性修补，其特点是在折叠处按整个书页的高度从里面糊一条窄纸。折本书中，衬纸经常糊在折缝里面，但有的也糊在外面；蝴蝶装中，糊上衬纸也是为了在缝和粘书页时加强其牢固性。第二种修补是把被撕碎或用坏了的书恢复如初。如果书中只有个别书页破损，就用剪好的小纸块仔细地糊在出现的烂孔和其它破损处。如果整个书页全破损，就用整块纸进行裱糊（复制）。

修补时很少用新纸，多半用作废的笔记和文书纸、无用的刊本纸页、过时的和用坏了的写本。封皮硬纸板也用这种纸粘贴。从这些用做修补的纸中可找到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资料。可弥补我们对西夏国的知识。在用全部现代化技术对藏卷进行修复（此项工作现正在进行）之后，硬纸板和裱糊纸上的文字将容易认出。本书中我们仅在个别情况下提到这种裱糊纸，如果它们能被认出，我们在叙录中就予以记述。

与修补书籍相关的是改正错字。这种情况不仅写本中存在（此问题十分清楚，用不着多加解释），而且刊本中也有。因为在抄写原文时，从抄写到录制在木板上，写手可能看错和写

错。这些错误被校对者根据原文改正过来。收集品中有个别几件错字被涂上颜料，在上面进行改正，或者在错处贴一块小纸，然后写上正确的字。根据我们的藏卷很难说清楚更加详细的过程，但中国雕版印刷术后来的实际操作方法人们是清楚的，刻错的字被挖掉，在挖去的窟窿中嵌入一块木料，再刻上改正过来的字，宋和西夏的方法未必会是另种情况。

此外，柯兹洛夫汉文藏卷发现有标点（用墨汁和朱砂颜料点的），是一种圆点。像敦煌遗书中那样，是读者点的。因为同一版本的其它印本中并无这种标点。可见，这些书籍被印时大多数并无圆点（逗号和其它标点符号还未发明）。但在被断定为宋代的个别版本（原藏录号TK—154、167、176，本书编号79、81、128）中，有一种标点（黑色小圆圈）是刻在雕版上印出的。这些版本可能是最早印有标点符号的例证。既然这些版本都属于12世纪前30年代，那么在雕版上刻小圆圈标点应认为从这时开始。

如果对上述部分作一总结，那就需指出，所列单项材料一般还不能准确地判断版本地点和时间。但如加以综合，特别是把其它部分所叙录作品的所有特征都加以综合，就可找出充足可靠的证据，断定那些原文中无日期的刊本和写本年代的上下限（几年或几十年）。我们对全部藏卷都这样作了。

上述所举资料，几乎全列入附录的一览表里，其中所统计的只是题记中有日期或可据其它资料确定出准确日期的书籍（许多刊本和一件写本）。据其它资料确定出准确日期的理由，我们在叙录中予以详述。

十二 结论

对柯兹洛夫汉文藏卷（黑城的）概述和系统整理，使我们

能够对确定藏卷的归属及其意义作出某些重要的结论。

根据我们引证的一系列资料可以认为，在“著名的塔”中发现的藏书是属于后来成为仁宗遗孀的罗太后。当然，所有这些资料都是间接的，我们未能找到有利于这一假设的直接历史证据。没有能证明这位太后最后死于黑城的历史文献和资料。以致认为这是完全不可能被证实的假设。但同时也没有任何间接和更直接的资料能够指出藏书主人是另外某个人。如果没有发现能直接或间接证明这批书籍是属于另一个人的事实，那也就失去了怀疑这种假设的根据。因此，我们提出的假设不管怎样并不同我们现有的知识相矛盾（而现在已知的正史和文献资料大概不可能再补充这些知识），在现阶段提出这一假设并不违背真理。

无论如何，藏卷是属于一位在西夏国官职等级和财富方面处于显赫地位的人物。此人能经常得到远东地区各国（中国宋朝、女真人金国）的刊本，能在皇室印书局印刷书籍，并自己保存这些件数极多的刊本。上述材料可以对宋、西夏和金部分地区的印书业作出系统的比较，因而可搞清楚书籍史上一系列最重要的问题。

通过对比搞清楚的最有重大意义的事实，是西夏印书业具有国家的和中央集权的性质。在其他两国，印刷所不仅都城里有，而且遍布全国各地。因而，上述性质使西夏印书业处于一种特殊地位，也造成了其他一些特点。

引人注目的是西夏所印汉文书籍的千篇一律。果然不出所料，这些书籍都是为西夏国的全国性意识形态——阿密陀密宗派佛教服务的。庞大的印数使这些局限于主要教义的经文能够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得到充分传播，因而使其在居民心目中树立了牢固的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出版者自然是皇室在京城（包括近郊）的机构和寺院。而施主主要是皇帝本人及其皇室成员。同时有充分证据证明，还有另外一些施主同中央政权有某种关系。题记颂词部分几乎一成不变地证明了这点。宋刻本的题记更多地反映个人私事，已知的印数要少得多（金朝书籍的印数我们不知道）。

西夏印书业的国有性质还造成一个特点。在宋刻本中，追念和祝福祖先是刻印目的，同全国性节日无关。当然，这只是本藏卷材料反映出的情况。但宋代大量私刻本的存在本身也证明了这点。正如历史文献和藏卷中个别版本证实的那样，宋代国家印书局所印书籍大多是得到皇帝称赞和批准后刻印的。而黑城出土的西夏汉文书籍，则全是为纪念某个全国性节日。例如，除了接受金国赠送城市以外，都与纪念日（仁宗登位50周年）、皇帝、皇后忌辰（去世2、3、20周年）有关。就这方面来说，西夏印书业具有官方性质。

西夏书籍在探求装帧形式方面也有特点。西夏的刊本似乎给人一种停滞不前的印象，从卷子过渡到折本之后，折本变成固定和传统的样式。12世纪在宋、金占优势的蝴蝶装，大概在西夏很少风行起来。但写本却有各种各样的变化形式，蝴蝶装首先就有从简单的双页到小册子的各种形式。而宋、金书籍中却见不到。

同邻国显著不同的情况使我们特别注意到西夏印书业比起远东各国有其特殊阶段。而佛教思想的占显著地位，有可能证实西夏文化发展走的是不同于宋朝的另一条道路，虽然总的来说，西夏人仿效和吸收了中国人的文化结构和历史经验，

注释:

①发现经过参看:柯兹洛夫《蒙古、安多和死城哈拉浩特》;克恰诺夫《只有文字说明问题》,莫斯科,1965年;鲁勃——列斯尼钦柯、萨弗拉诺夫斯卡娅《死城哈拉浩特》,莫斯科,1968年。

②我们不能列出有关西夏学的全部著作,谨向读者推荐克恰诺夫在《西夏文译的中国古典作品(〈论语〉、〈孟子〉、〈孝经〉)》(影印本)一书中有关这一问题的图书目录、前言、西夏文汉文对照、索引(科洛科洛夫和克恰诺夫合编),载《东方写本文献》,莫斯科,1966年,第136—143页。稍晚的著作见孟列夫:《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的远东和中亚写本藏卷》,载《考古学年鉴》(1970年),莫斯科,1971年,第284页。

③聂历山:《西夏语文学》第1—2卷,莫斯科,1960年。他因这部著作荣获列宁奖金。

④戈尔芭切娃和克恰诺夫合编《西夏文写本和刊本·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藏已考定的写本和刊本目录》,莫斯科,1963年。以下简称《西夏文写本和刊本》。

⑤伊凤阁:《西夏史上的一页》,载《皇家科学院通报》第6集第5卷,1911年第11期,第831—836页(法文注释见沙畹译,伊凤阁著《西夏史上的一页》,载《通报》第12期,1911年,第441—446页);伊凤阁:《黑城出土文书(一)(14世纪的中国私人书信)》,载《皇家科学院通报》第6集第7卷,1913年,第14期,第811—816页。

⑥伯希和:《柯兹洛夫探察队在黑城所得汉文文书》,载《亚细亚杂志》,1914年5—6月号,第1—20页。

⑦关于《刘知远诸宫调》的参考文献见：威林格鲁瓦《〈刘知远诸宫调〉版本》，载《东方档案》，1960年，第28期，第282—329页。我们要特别指出，这个文献在中国有两种影印本（1937年版和1958年版），这个文献的木刻本现保存在北京图书馆。

⑧弗鲁格：《关于西夏刻印的汉文经文》，载《东方书目》，第2—4辑，1934年，第158—163页；《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藏汉文写本非佛教部分概述》，载《东方书目》第7辑，1934年，第87—92页；《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藏汉文古佛教写本简明目录》（下称《简明目录》），载《东方书目》第8—9辑，1936年，第96—115页；《10至13世纪中国印刷术简史》，载《苏联东方学》第1期，1940年，第78—94页。据我们所知，这些著作发表后在学术界没有引起反应。在他去世后出版的《10至13世纪中国宋代书籍印刷史》（莫斯科——列宁格勒，1959年）中，有许多关于黑城汉文文书的资料。

⑨见《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东方学家档案》第73宗，第1目，第30（甲）号。此外，在手稿部里保存着已开始编目的新特藏的写本，其中包括黑城出土的许多写本。

⑩孟列夫：《论诸宫调体裁和〈刘知远诸宫调〉》，载《苏联和东方各国的历史和语言学问题》，莫斯科，1961年，第78—82页；《黑城发现的早期出版物》（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柯兹洛夫藏卷汉文部分），载《亚洲民族研究所简报》第7册〔勒里希纪念集〕，1961年，第143—149页。法文注释见戴密微译《黑城发现的早期出版物》（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柯兹洛夫藏卷汉文部分），载《通报》第51卷，第4—5期，

1964年，第450—452页。

⑪在孟列夫的下列论文中可以看出同现在整理的资料相近的地方：〈1〉《中国古书面文献研究》，载《苏联科学院通报》，1967年第5期，第59—67页；〈2〉《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的远东和中亚写本藏卷》，对藏卷的概述也是为被称作宋代书目提要的部分作准备的（在印刷中）。

⑫我在给葛玛丽的信中谈到这类残卷和其来源的看法，她在《吐鲁番收藏的印本书》（载《柏林德国科学院》〔语言、文学和艺术类〕，柏林，1967年，第1期，第36页）的附录中登载了此信。我们注意到，中亚各地发现的类似写本，在俄国学者的藏品中（例如部分归入敦煌特藏的马洛夫藏卷和鄂登堡1906—1909年第一次考察的收藏品）和德国学者勒柯克的藏品中都有。关于这个问题参看《亚洲民族研究所敦煌特藏汉文写本叙录》第1辑以及葛玛丽的上述著作。

⑬对这个问题最全面和最有系统的叙述（还不是详尽的），见克恰诺夫：《西夏国史纲》，莫斯科，1968年，第283—297页。

⑭同上书，第283页。

⑮姜亮夫：《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上海，1956年。书中说，敦煌抄本的95%是佛教作品（第70页）。

⑯这里和以下指没有注明年代的刊本和写本。我们是根据其外表特征粗略推断的。

⑰全文见《大正新修大藏经》（以下简称《大正藏》），东京版，1924年—1928年，第85卷，第1页及其后。

⑱未校订的古回鹘文的傅大士前言见G·Hazai和P·Zieme：《回鹘文〈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刊本残篇》，载《Acta orientalia Hungarica》，第21卷，1968年，复制件I，第1—

14页；校订过的文本见G·Hazai和P·Zieme:《〈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回鹘文译本残卷》(另有T·Inokuchi写的补遗)，载《柏林吐鲁番文书》I,《古东方历史和文化文献》第3号,1970年,第1—75页,插图1—11。鸠摩罗什译的经文见《大正藏》第8卷,第235号。

⑲汉文有两个完整的译本：佛驮跋陀罗(359—429年)的60卷本(《大正藏》第9卷第278号)和实叉难陀(652—710年)的80卷本(《大正藏》第10卷第279号)。前一个译本在敦煌遗书中是主要的，在黑城遗书中则未发现；后一个译本有刊本，下面将叙述。

⑳见《大正藏》第10卷,第293号。般若(8世纪末—9世纪初)完成的译本是40卷本。

㉑鸠摩罗什译的经：《大正藏》第9卷第262号；第二十五品见第56—58页。

㉒在以后的中国风俗里，观世音或观音保持了自己的声望，成为中国佛教神庙最受人喜爱的神之一(见沃纳：《中国神话词典》，上海，1932年，第225—227页；威廉：《中国艺术的手法和象征主义的百科全书》，纽约，1960年，第339—242页)。稍后，观音成了救苦救难的女菩萨、送子娘娘等。黑城遗书中观音是男像。

㉓见《大正藏》第14卷第452号。此经的梵文名称已失，有沮渠京声(4世纪)的译本。此经西夏文译本是由伊凤阁公布的，还增补了此经的汉文译本。圣彼得堡，1916年。

㉔见㉒沃纳同书第225—227页；威廉同书第239—242页。

㉕伊凤阁：《西夏史上的一页》公布了这个题记。不过，弥勒上生兜率天的题材在敦煌壁画和塑像中也充分表现出来，因而可以证实，它的广泛流行比这更早。但弥勒经的抄本在敦煌

遗书中极少。

②⑥经文见《大正藏》第12卷第366号，鸠摩罗什译本。

②⑦见②②沃纳同书第6—7页；威廉同书第7页。

②⑧《大正藏》第11卷第310号，菩提流志（572—727年）编，月婆首那（6世纪）翻译了24集，摘编为《三十五佛名经》，见《大正藏》第11卷，第515页下—516页上。

②⑨井口泰淳在《敦煌本〈佛名经〉的结构》（载《东方学报》1964年第35号，第397—437页）一文中试图对中国的佛名及其经文排列方式作出最有趣味和最合理的分类。

③⑩如果按井口泰淳的统计，最大的《佛名经》中不重复的佛名达6万个，8至9世纪，佛经中的佛名已下降为1500个（见《亚洲民族研究所敦煌特藏汉文写本叙录》第1辑，第1215、1216号；第2辑，莫斯科，1967年，第2264号）和更小的数字。

③⑪《大正藏》第9卷，第57页。

③⑫《大正藏》第14卷第564号，昙摩蜜多（356—442年）译本。

③⑬《大正藏》第8卷第251号，玄奘（602—664年）译本。

③⑭这四部经在5世纪中叶前有各种汉译本（见《大正藏》第1卷第1号、第26号，第2卷第99号、第125号）。

③⑮《大正藏》第1卷第80号，瞿昙法智6世纪末的译本。

③⑯《大正藏》第17卷第801号，义净（635—713年）译本。

③⑰在标准本《大日本校订大藏经》中，密宗著作有4卷，约600号（《大正藏》第18—21卷，第848—1420号）。我们查明，这类作品远不是都被著录并收入《大日本校订大藏经》中。

③⑱格林斯蒂德在其《西夏研究》（写本缩微胶卷）一书中广泛运用了西夏文的陀罗尼译音。

③⑨这两种名称是弗鲁格断定的，见其著作《简明目录》，第110、161号。

④⑩没有发现完全重复汉文标题的祈祷文和议轨的名称。

《西夏文写本和刊本》指出了同亥母有关的19个标题（第246、254—270、290号）和同白母有关的4个标题（第330—333号），其他的标题由于冗长繁杂和五花八门，我们就不援引了，但需指出《要门》大概就是《要文》。

④⑪《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大正藏》第18卷第848号），这个汇编共7卷，是7世纪末善无畏（636—735年）和一行（683—727年）翻译的。

④⑫作品见《大正藏》第19卷第937号。上述版本中除这部经外，还有《般若波罗蜜经》的经文大概不是偶然的，正如我们已指出的那样，它是近于密宗经的。这类经的其它作品见《大正藏》第19卷第945号；第20卷第1049、1153、1190号。

④⑬《西夏文写本和刊本》，第63号（4件）和77号。

④⑭同④⑬，第75、83、138—139、141—144号。西夏文标题和藏卷中汉文名称不一样。

④⑮《大正藏》第32卷第1663号。作者龙树（2世纪），译者筏提摩多（7世纪）。

④⑯这个结论在下述事实中也可得到证实：藏卷的西夏文部分要比汉文部分丰富得多，而总共也只有9件论（《西夏文写本和刊本》，第353、359、365、392、400号）。

④⑰在同一《大日本校订大藏经》中，不算该版本续编各卷中的许多注释（第56—58卷，第85卷），对主要佛经作品（经、律、论）的注释有12卷多（第33—45卷，约占该书的后一半）。

④⑱见《续藏经》东京，1905年，第110卷。

④⑲《大正藏》第14卷，第1885号。

⑤⑩研究疑经的著作很少。最著名的是张心澂《伪书通考》（上海，1957年版），分出了许多疑经，还有牧田谛亮《中国佛教疑经研究序说——敦煌出土疑经类》（载《东方学报》1964年第35期，第337—395页）。

⑤⑪在敦煌发现的疑经几乎都在《大日本校订大藏经》后续的85卷中刊载了（《大正藏》第85卷，第2864—2910号）。

⑤⑫见《大正藏》第85卷第2887号。其最详尽的内容载《报恩变文》第1集，莫斯科，1972年，第82—84页。

⑤⑬《西夏文写本和刊本》，第150号。

⑤⑭《大正藏》，第85卷第2898号。

⑤⑮同⑤⑭，第2897号。

⑤⑯这3部改变了部分标题（观世音称为自在王）的在两份西夏文藏卷中只有1部（《西夏文写本和刊本》第132号），没有观世音名字的标题较短的著作（6件、同上书第133号）也许是同一部经。

⑤⑰《大正藏》第85卷第2732号。也有回鹘文本，见注⑮。

⑤⑱（原书注码如此——译者）此处和后面的结论是根据叙录的藏卷资料得出的。当然，这些藏卷首先反映了其主人的兴趣和爱好。如果我们发现其他相似的藏品（但可能性很小），那么，我们的结论可能会很大地改变。例如，儒家和道教教派的经典曾在西夏人中间广泛地传播（同一藏卷的西夏文文献提供了某些证据）。克恰诺夫在悉心查阅大量历史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著成《西夏国史纲》。他屡次说到和佛教不同思想的学说在西夏国的发展情况。例如说：“西夏除了佛教外，也流行对祖先灵魂、道教和儒教的崇拜”（第294页）。他说仁孝皇帝（仁宗）“推崇儒学，1146年规定祭祀孔子的制度。命令全国各地修建孔庙，按照祭祀皇帝的礼仪进行祭祀。仁孝开始实施他在西

夏广泛推崇儒学的计划”(第240页)。还说,“在西夏加紧传播儒家教理……其目的是教会行政长官治理国家,使臣民百姓俯首听命”(第275页)。然而,当我们拥有这一类收藏品时,我们只能相信它,虽然我们的结论有许多地方可能是片面的。

⑤⑧《西夏文译的中国古典作品(〈论语〉、〈孟子〉、〈孝经〉)》

⑤⑨书目和黑城版本见本叙录;1172年版本中的一页在北京文物出版社的《中国版刻图录》1961年第256号上刊载过。

⑥⑩《西夏文写本和刊本》第1号;载《西夏文译的中国古典作品》。

⑥⑪藏卷的西夏文医学作品也带有那种特点,见《西夏文写本和刊本》第47—54号。

⑥⑫关于此问题,克恰诺夫的《西夏国史纲》中曾屡次提到。

⑥⑬见《西夏文写本和刊本》第41—44号,根据对它们的记叙判断,西夏文历法的类型和汉文的相同。

⑥⑭《宋史·艺文志·补·附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1957页。

⑥⑮参见《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423页。

⑥⑯《西夏文写本和刊本》,第10、12号,大概西夏人感兴趣的是军事,参见同书第6、9号。

⑥⑰同⑥⑥,第13—24号,该书第14—17号中载有《文海》。

⑥⑱同⑥⑥,第13号。

⑥⑲同⑥⑥,第19, 20, 23号。

⑦⑰同⑥⑥,第22号。

⑦⑱见⑦⑱

⑦②大概西夏国对中国优秀文学作品的兴趣是相当大的，这有下列事实可证：在一些有关中国世俗文学作品的西夏文译本中有已散佚的中国百科全书《类林》（《西夏文写本和刊本》第11号）；又见K·Б·柯萍的著作：〈1〉《西夏文译本所有已失传的汉文类书》，载《东方各民族的古文献和文化史研究问题》，第7卷，1971年，第16—19页；〈2〉《唐宋〈类林〉》，同上，第8卷，1972年，第191—195页。

⑦③翟理斯：《大英博物院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伦敦，1957年，第8088—8092号；卡特：《中国印刷术及其向西方的传播》，纽约，1925年。

⑦④藏卷西夏文部分中的版画（其中一部分已由克恰诺夫《只有文字说明问题》发表，莫斯科，1964年）大大补充了同类汉文资料。捷连提耶夫——卡坦斯基在其未发表的论文中也作了叙录。

⑦⑤图片见鲁多娃：《黑城出土的两件版画》，载《爱尔米达什博物馆通报》第28号，列宁格勒，1967年，第45—49页；那波利贞：《柯兹洛夫发现南宋版画美人图考》，载《支那学》第5卷，1929年，第1号，第75—136页。

⑦⑥见《文海》第一册，第22—27页。

⑦⑦关于这种假定被称为“戳记”的符号，见捷连提耶夫——卡坦斯基：《西夏古文献中一种“不认识的”符号》，载《东方题铭学》，第19期，1969年，第154—158页。

⑦⑧同一时期的某些西夏文文书已公布了，见克恰诺夫：《黑城所出1224年西夏文书》，载《匈牙利东方学报》第24卷第3期，1971年第189—201页。关于修补书籍的方法本文未详述。

⑦⑨伊凤阁：《黑城出土文书（一）（14世纪的中国私人书信）》，载《皇家科学院通报》第6集第7卷，1913年，第1期。

第811—816页。关于同一时期蒙古文文书见蒙库耶夫：《黑城出土的蒙文印刷品》，载《蒙古研究》，第341—357页。

⑧弗鲁格：《简明目录》第160号。

⑨关于发现纸币的最早报道，见伊凤阁、鄂登堡、科特维奇：《柯兹洛夫在黑城的发现品》，载《俄国皇家地理学会通报》，第45卷，第8期，1909年，第463—477页；伊凤阁：《15世纪以前中国纸币的使用》，载《俄国民族志资料》，第2卷，1914年，第159—174页。14世纪到中国游历第一个见到纸币的欧洲人是马可波罗，见《马可波罗游记》第57章。

⑩《中国版刻图录》第3号刊登了975年的版本，下一个版本（第4号）不早于1034—1037年。

⑪其生平事迹见丁传靖：《宋人轶事汇录》，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502—507页。

⑫见《中国版刻图录》第256号的影印件和说明，又见傅增湘：《跋宋本吕惠卿庄子义残卷》，载《北平图书馆馆刊》第5卷，1933年第2期；陈任中：《校辑吕注庄子义序》，同上，第7卷，1934年第6期。

⑬见《中国版刻图录》第3—63号影印件和说明。

⑭弗鲁格：《10—13世纪中国宋代书籍印刷史》，第72—73页，此类书籍的一幅图版见《中国版刻图录》第67号。

⑮克恰诺夫：《西夏国史纲》第47、214、281页。

⑯绍兴刻本的影印图版见《中国版刻图录》第63—80号。

⑰克恰诺夫：《西夏国史纲》第287—289页。关于得到中国历书的问题我们已说过了。

⑱同上，第291页。

⑲戴锡章：《西夏纪》，京华印书局，1924年，第24卷第56页。

⑨②同上，第19页上。

⑨③克恰诺夫：《西夏国史纲》第249—250页。

⑨④秦晋，古代指陕西和山西省南部。西夏的皇室成员曾被封为这些地区的王，比如，1156年以前的晋王是仁宗的叔叔察哥（见克恰诺夫《西夏国史纲》第242页）。这里的秦晋国王大概是继承了察哥封号的某人，其他情况未查明。

⑨⑤完整的这件（原藏录号TK—121）没有叠成折本，但据其他各件来看是折本。

⑨⑥《大正藏》第20卷第1190号，元朝释智译，其生平不详。

⑨⑦K·K·弗鲁格在《10至13世纪中国宋代书籍印刷史》一书中对宋代出版业史作了最详尽的叙述，其中关于政府印书业见第六章。

⑨⑧题记中只印出他的姓“梁”，把名字空下，这是避讳皇帝名字的一种方法（参见陈垣著《史讳举例》，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按当时惯例，空字用手写上，变形成“𠂔”。宋初直到1019年所有避讳的汉字中，只有宋朝第一个皇帝赵匡胤的“胤”同该字相似。伯希和认为是“夙”字（见伯希和《柯兹洛夫探察队在黑城所得汉文文书》第3号）我们认为他错了，应是“胤”字。

⑨⑨K·K·弗鲁格：《10至13世纪中国宋代书籍印刷史》《私人印书业》和《学术著作刻本》两章；《中国版刻图录》第4—63号。

⑩⑩K·K·弗鲁格上书两章和《中国版刻图录》第68—80号谈到这个中心。

⑩⑪我们把座落在兴庆本地或郊区皇帝离宫的印刷所称作“京城印书局”。

⑫戴锡章：《西夏纪》，第12卷第12页上。

⑬E·И·克恰诺夫：《西夏国史纲》第291—292页，史料中未发现另外的周皇后。

⑭同⑫，第11卷第11页上。

⑮《敕修甘肃通志》（据序言确定成书时间为1736年），第6卷第22页上（此处据俄文转译——译者注）

⑯同上，第23卷第14页上。

⑰同⑯

⑱西夏京城附近还有一座贮存《大藏经》的有名寺院，即1047年为纪念諒祚生日而修的高台寺。但该寺院与我们所说条件不符，因它在城东15里（《西夏纪》第11卷第9页上）。

⑲所列资料见《西夏国史纲》第266页。

⑳我们在这里不比较版画的艺术流派，因为我们在《黑城出土汉文刊本中的卷首画》一文中作过论述。

㉑这些和下面谈到的所有“肖像”见插图部分。

㉒E·И·克恰诺夫：《西夏国史纲》第252页说是任皇后，大概搞错了，任氏可能是仁宗过去的皇后。历史文献中几次提到，1137年的一条史料说，大臣任得敬“有女年十七，使其弟德聪饰之以献乾顺纳为妃”（《西夏纪》第23卷第17页下）。我们要提请注意，乾顺（崇宗）是仁宗的父亲。1138年的一条史料说：“秋八月立任氏为皇后，与曹氏并居后位”（同上书第19页下—20页上）。最后一次提到她是在1169年：“夏四月，太后任氏卒……仁宗葬之如礼”（同上书第25卷第25页上）。克恰诺夫书中说被立为皇后的是任氏（第137页），但死于1169年的任太后同她不是一人。

㉓史料中说，安全在“天庆十三年正月二十日（即1206年3月1日——孟列夫注）与纯佑母罗氏废纯佑自立”（同上书第

26卷第11页上)。

①④大概金政权要求证实政变时太后没有被杀。史料中说：“是月遣御史大夫……以纯佑母罗氏表如金求封册”（同上），又说：“秋七月，安全复以纯佑母罗氏表遣使如金奏告”（同上）。

①⑤同上，第11页下。

①⑥在《黑城出土汉文刊本中的卷首画》一书中作过比较。

①⑦我们一点也不知道这家的情况，但认为应该从皇室的同族中或据下面叙述的原因在西夏国大臣中找到他们。但史料中目前尚未发现有这个姓的西夏大臣。

①⑧对木刻技术的详细叙述，见O·II·彼特洛娃《朝鲜文化的古书面文献叙录》中的绪论。第1辑，莫斯科——列宁格勒，1956年，第5—6页。

①⑨某些补充资料可在克恰诺夫《西夏国史纲》的《西夏国家的文化》一章中找到。

①⑩见《西夏国史纲》第266页及其后。

①⑪Ф·沃尔科夫：《黑城塔墓中的人类遗骸》，载《俄国民族志资料》，第2卷，1914年，第179—182页。II·K·柯兹洛夫在《蒙古、安多和死城哈拉浩特》一书中复述过，第555—556页。

①⑫我们提示一下，最早的印刷书籍是836年（原文如此，应为868年——译者注）印的敦煌卷子。读者在任何一部有关中国印刷术史的著作中都可找到这条资料。

①⑬我们不详细介绍书籍装订样式和产生的原因，因为这在许多有关敦煌的书籍和一般的中国书籍史著作中都被详细记叙过。

①⑭藏卷中有3件好像是过渡样式，在叙录中暂称折本——

蝴蝶装（其中两件刊本，一件写本）。这种样式的特点是所印页面后来被叠成折子，但页码不按页计算，而是像蝴蝶装那样，按两面计算。此外，沿折子里端缝上书背。折子外端被裁开，这样就成了真正的蝴蝶装。

⑫一部分佛教刊本后来直到20世纪都始终保持着折本装这种传统的装订样式。这种书籍在苏联亚洲民族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新特藏(14—20世纪)和本文作者的私人珍藏品中都有。同时，如果说到柯兹洛夫藏卷的西夏文部分，那里的大量蝴蝶装书主要是非佛教内容的（字书、中国古典书籍的译本、法律汇编等），这也证明，折本装当时已是佛教书籍的传统样式。

⑬从总数中我们还要除去离开书个别找到的5件封皮，关于它们只能肯定一点：这不是卷子装的“封皮”。

⑭此版本（原藏录号TK—186，本书编号227）无疑是宋刻本。我们据外表特征断定其年代为12世纪前25年。可以认为，它的包皮封皮反映了探索折本装书籍封皮最合适形式的一个阶段。重要之处是这里第一次记录了书名标签——后来（直到现在）这种书签成了中国式书籍封皮必须具有的重要组成部分。较早的卷子上贴书签的方法不再使用了。

⑮在已叙录的收集品中，有一件贴着淡黄色封皮纸的样品，这是本书编号227的那个刊本的包皮封皮。正如A·П·捷连提耶夫——卡坦斯基在未发表的论文中指出的那样，还有其它颜色的封皮。

⑯对于古典时期（一直到现在）的书籍来说，还有一种装帧样式，我们的藏品中没有记载，这就是“套”，同一部作品的几本书放在一个木匣里称套；套多半起源于“帙”，通常十个卷子包成一捆叫帙。在卷子装书籍变成蝴蝶装之后，帙（用软布做成）也就变成了套（粘有织物的硬纸匣）。

⑬⑩藏卷的汉文部分中没有发现白口上鐫有刻工姓氏的西夏刻本，但西夏文刻本中有，证明西夏刻工仿效了宋朝刻工的这种风气，虽然不是各地都这样仿效。

⑬⑪在辨别版本时，我们文章中屡次提到的《中国版刻图录》很有帮助。虽然该书中还没有我们收集品中发现的图版，但印刷术各流派的一般风格根据此图录很容易辨别出来。

⑬⑫我们在本文中并没有涉及纸样分析，因为纸的成分和分析中反映出的其它资料肉眼是看不到的，我们只在这里指明肉眼能看到的迹象。

⑬⑬我们根据西夏版本对此问题作一介绍，因为输入到西夏国的书籍几乎都是残件。但我们所谈情况包括了这一时期各国的汉文书籍。

⑬⑭关于术语“变相”的含义见《维摩诘变文、〈十吉祥〉变文》，莫斯科1963年，第14—29页。

⑬⑮例如在兰山宗译的版本中，除译者外，指出仁宗皇帝(用他的完整尊号)是校对和审核译文的编者。

⑬⑯我们未能在本珍藏品的版本中发现能表达出题记(КОЖИ ОФОН)一词的一般术语名称，所遇到的名称“发愿文”，“后序”或“传记”，大概都不能表达出来，因为据一切迹象来看，它们属于题记的前一部分或是从属于这后一部分的变形。现在中国书籍所特有的后记在藏卷中未被发现。

表 1

宋、金版本资料 (12世纪30年代前)

序号	日期	刻地	印单	书位	出版者 序言作者	写手	刻工	编校 编者	施主	刻印目的	份数	藏卷中 件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1036.4.16	丹州 (陕西)	官方机构	梁胤	—	—	—	王式通, 党行者, 曹永(?), 尚 祚, 杨言, 悟缘, 车度... 等	—	—	—	1
2	1083.6.18 —7.17	卫州 (河南)	仁化寺 净土院	—	—	—	—	贤惠、贤照	杨康国及其六子 一女	纪念亡母石氏	500	1
3	1091	太原 (山西)	—	—	—	—	—	王简	—	纪念祖宗	—	1
4	1094—1907	汴梁	皇室印书局	奉昌	—	—	—	—	—	—	—	1
5	1104.9.28	成德 (河北)	寺院	崔振孙 (序言)	—	—	—	普惠	—	—	—	1
6	12世纪 20年代	河北	寺院	—	—	—	—	恒润	—	—	—	1
7	约1127	真州	寺院	吴敏 (序言)	—	—	—	德初、义初	—	—	—	1
8	1127年后	杭州	宴家	—	—	—	—	—	—	—	—	1
9	12世纪 30年代	杭州	—	—	—	—	—	—	—	—	—	1
10	1132(?)	杭州	—	—	—	—	—	—	—	—	—	1
11	12世纪30 —40年代	千秋 (河南)	—	储协赞	—	—	—	—	安亮、宝戒	纪念亡父母	108	1

表 2

西夏国版本资料

序号	日期	刻印地点	印书单位	出版者 序言作者	写手	刻工	编校者	施主	刻印目的	份数	藏卷中 件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1073.9.5	—	—	—	—	—	—	陆文政	纪念亡父母	—	2
2	1085.8.23 —9.22	都城 (?)	大延寿寺	—	—	—	—	守 琮	散 施	—	1
3	1141.6.6	都城	三学院	仁 宗	—	—	鲜卑宝源	—	纪念崇宗去世 3周年	15000	2
4	1146.6.11 —7.10	都城	上殿宗室 御史台	—	—	王善惠、王善圆、 贺善海、郭苟理	—	仁 宗	庆祝得到城市 (?)	—	2
5	1152.9.15	都城	帝 里	—	法随	邠州开元寺 刘德真	—	—	圣节日	—	1
6	1161	都城	周家寺	—	—	王善慧	—	威光太子	—	—	2
7	1167.5.21 —6.18	—	—	—	—	—	—	秦晋国王	纪念曹太后去世 世3周年	—	6
8	1167.5.29	—	—	德 慧	—	—	—	仁 宗	纪念曹太后去世 世3周年	20000	1
9	1184.9.7	—	—	德 慧	—	—	—	袁宗鉴等17人	纪念曹太后去世 世20周年	—	1
10	1184.10.20	—	—	德 慧	—	—	—	仁 宗	纪念曹太后去世 世20周年	51000	3

表 2 (续)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1	1184.10.20	—	兰山	德慧	—	—	仁宗	仁宗	纪念曹太后 去世20周年	51000	1
12	1185.9.10	—	—	—	—	—	—	比丘智通	—	—	1
13	1189.10.26	—	兰山(?)	—	—	—	—	仁宗	纪念仁宗 登位50周年	100000	10
14	1189.4.2	—	—	—	—	—	—	罗皇后 祁陀太子	纪念仁宗 登位50周年	50000	34
15	1189.4.2	—	—	—	—	—	—	罗皇后	纪念仁宗 登位50周年	50000	13
16	(1189)	—	—	—	—	—	—	祁陀太子	纪念仁宗 登位50周年	—	1
17	1195.10.24	—	—	—	—	—	—	罗太后	纪念仁宗去 世2周年	30000	3
18	1196.10.8	—	—	—	—	—	—	罗太后	纪念仁宗去 世3周年	93000	5
19	1200.8.26	—	—	—	—	—	—	仇彦忠等	纪念亡父母	—	1
20	1210.9.22	—	普化寺	—	索智深	智圆	—	李智宝	—	—	4

表 3

刊本和写本 (不含文书) 技术资料

序号	日期	装帧	纸					张					每行字数	字体
			页 (cm^2)	厚度 (mm)	光洁 度	帘纹 (道/cm)	连接线 (每隔几cm)	栏面 (cm)	每面(页、 纸)行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I 宋代和金代早期书籍														
1	1016	卷子装	52×34.5	0.06—0.07	稍涩	7 (背光时)	—	52×26 —27.5	28	21	写刻体			
2	1083	卷子装	43×26	0.14—0.19	光滑	7	—	43×21.5	18	13—15	宋体字			
3	1091	折本装	49×15	0.07—0.08	光滑	7	—	7×11.5	4	9	写刻体			
4	1094—1097	蝴蝶装	24.5×20	0.05	光滑	9	—	11×17	10	17—20	宋体字			
5	1104	蝴蝶装	30×20	0.08—0.09	涩滞	8	1—4—1 —4	12×16.5	8	15	宋体字			
6	12世纪20年代	蝴蝶装	28.5×20.5	0.10—0.15	涩滞	7	—	11×16.5	7	14	写刻体			
7	约1127	蝴蝶装	31.5×23	0.10—0.14	涩滞	8	—	12×17.5	8	17	宋体字			
8	1127年以后	折本装	42.5—51× 21.5	0.16—0.17	光滑	—	—	8.5×18	4	11	宋体字			
9	12世纪30年代	蝴蝶装	37×27	0.09—0.12	光滑	7—8	—	15.5×23	14	18	宋体字			
10	12世纪30—40年代	折本装	47.5×20	0.11—0.17	涩滞	6	—	9.5×16	6	15	宋体字			

表 3 (续)

I 西夏的写本和刊本

11	1073	折	本	装	48×17.5	0.12—0.13	涩	滞	7	—	—	8×13.4	5	13—15	写刻体
12	1085	卷	子	装	53.5—55.5× 29.5	0.12	光	滑	—	—	—	53.—55.5×24	28	15	宋体字
13	1141	蝴蝶	装	装	17.5×13.5	0.12—0.14	柔	软	6	—	—	7.5×9	9	14—15	写刻体
14	1146	折	本	装	42.5×18.5	0.11—0.13	光	滑	8—9	—	—	8.5×15	8	16	宋体字
15	1152	卷	子	装	44×34	0.07—0.10	柔	软	7	1—5.5—5.5	—	44×24.5	16	10—11	宋体字
16	1161	折	本	装	40×29	0.16—0.18	涩	滞	7	—	—	10×22	5	13—16	宋体字
17	1167	折	本	装	57×20.5 55×22	0.10—0.16	光滑和涩	滞	7	—	—	9.5×15 11×16.5	7	15	宋体字
18	1184	折	本	装	57×21.5(?)	0.08—0.14	涩	滞	7	—	—	9.5×16 7.5×15	6 5	12 15	宋体字
19	1185	卷	子	装	41×18.5	0.09—0.11	柔	软	8—9	—	—	40×12	30	11	宋体字
20	1189	折	本	装	55×29	0.13—0.19	涩	滞	7	—	—	11×23	6	18	宋体字
21	1195	折	本	装	60×21.5	0.14—0.15	柔	软	8	—	—	10×16	6	14	宋体字
22	1196	折	本	装	54×21	0.11—0.17	柔	软	8	—	—	9×16	6	15	宋体字
23	1200	卷	子	装	50×20	0.08—0.11	柔	软	8	4.5	—	45×16	30	11	宋体字
24	1210	折	本	装	42×12.5	0.06—0.08	涩	滞	7	—	—	6×8.5	6	13	宋体字
25	1218	小册子、写本	写本	装	22×11	0.13—0.15	涩	滞	—	—	—	11×11	7	9—10	楷 书

黑城汉文遗书叙录

佛教经典作品

经部

《长、中、杂、增壹阿舍经》（1—5号）

1（原藏录号TK—274）《佛说长阿舍经第四分〔世纪〕经阿须伦品第六》

卷子装木刻本的开首，下端残缺，附有版画。系两件残片，4残行，宋体字，纸色暗黄，厚0.12—0.14毫米，宋版本（12世纪初的，可能是1132年的）。

残片一，8.5×14厘米，版画的右上角，有高1.7厘米的带形装饰图案（沿外粗内细的两条黑边上绘有植物图案），画面上是云彩、山脉和一支箫的上端。

残片二，20.5×24.5厘米，版画及正文开头。

①版画左部分，下端残缺，与残片一有同样的装饰图案，上有榜题：“护法神王”，画一保护神，着全套战衣，右手横握宝剑，头部周围环有光轮，背景是云彩和群山。

②正文开头，首题，其下为小字：“卷第”，首题后面是小字的译者署名：“姚秦闍〔宾〕三藏佛陀耶舍共竺法念译。从：“佛告比丘须弥山北大海水底有罗呵须□”到：“城纵〔广八万由旬〕……”。见《大正藏》第1卷，第129页中栏第

1—第3行。

此木刻本背面糊了两层印着汉文的纸（当时的裱褙），外面一层上有尖笔写的题词：①外题字和书号：“长阿含经卷第二十？；”②“长文恶为？也”；③一行回鹘文。

参考书目：弗鲁格《10至13世纪中国宋代书籍印刷史》，第72—73页；《中国版刻图录》，表67。

2（原藏录号TK—273）《杂阿含经》卷第三十四

木刻本上封皮的左上角， 3.5×16 厘米，上有 3×15.5 厘米的书签，双栏（外线粗），栏内印着外题字，外题字下面有书号，外沿粘一小木签。纸色黄，宋版本（12世纪初的，可能是1132年的）。

参考书目：弗鲁格《10至13世纪中国宋代书籍印刷史》第72—73页。

3（原藏录号TK—278）版画

卷子的右端（卷首），一件残断， 14×25.5 厘米。版画上下两端各有高1厘米的画着金刚象的带形图案，右栏是一道粗线。画面是佛的光轮和华盖的右端，右旁有一老僧和三位菩萨，下面的坐在莲花上；中间的身体四周环有光轮，坐在毯子上，背景是山脉。纸色黄，粘一小木签，由于带子脱落而露出窟窿。背面边上有三道栏线的书签，上有一不知名作品的外题字。此书签上方还粘有一个纸签，上题：“中阿含经卷第……”，是从《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经文在背面）写本上剪下来的。两书签下有图书登录号“登”。1132年（？）的宋版本。

参考书目：弗鲁格《10至13世纪中国宋代书籍印刷史》第72—73页。

4（原藏录号TK—265）版画

残片， 13.5×9 厘米，一纸的右上角。单栏。保存下来的是

云彩、光芒和光轮的边缘。上栏的下方有高0.5厘米的花边。纸色灰褐，背面有手写的该卷外题字：“增壹阿含〔经〕……”并粘着许多小纸片（当时的裱褙）。1132年（？）的宋版本。

参考书目：弗鲁格《10至13世纪中国宋代书籍印刷史》第72—73页。

5（原藏录号TK—275）版画

一卷《长阿含经》刊本版画的左上角，8.5×7.5厘米，天头被撕掉。画面同本书编号1相似。榜题：“〔护法〕神王”。纸色黄，厚0.13—0.14毫米。1132年（？）的宋版本。

版画背面粘有写着汉字的纸（当时的裱褙）。

参考书目：弗鲁格《10至13世纪中国宋代书籍印刷史》第72—73页。

《佛说业报差别经》（6号）

6（原藏录号TK—137）《佛说业报差别经》；《佛说无常经》

木刻本，经折装，折面8.5×19.5厘米，双栏，栏面8.5×15厘米。纸色灰，每厘米7道帘纹，厚0.10—0.18毫米，宋体字，面6行，行15字，或两句七言诗，或三句五言诗。此刊本被分成页码不连贯的几部分：

一、第一部经的版画。两折面。版画右部分，佛侧坐于莲花上，面前一小供桌，身后是天龙八部众，左右两侍从；版画左部分，下面是五个跪着的弟子，他们的上方有八个作业的有情众：男人、女人，阿修罗，罗刹，饿鬼，蛇、鸟，马；佛的上方榜题：“释迦佛释法处”；天神的上方榜题：“天龙八部众”；弟子们的上方榜题：“四部弟子众”；有情众的上方榜题：“六道有情众”。

二、第一部经。与《佛为首迦长者业报差别经》相符，共76折面，454行。有首题和尾题，首题后面是小字：“隋洋川郡守瞿昙法智译”。

从：“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到：“迦闻佛所说心大欢喜顶礼而还”。见《大正藏》第1卷，第891页上栏第15行—第895页中栏第21行。

三、第二部经的版画，大小和第一部经的版画一样，结构也相同，只是没有最后一组画和榜题，而代之以有栏杆的木板台。

四、第二部经，有附录和题记。4纸，每纸6折面，第4纸仅存2折面。分为：

1.经文，第1纸第1折面至第3纸第1折面，共13折面，76行；第2纸上有页码：“无二”。有首题和尾题，首题下面是小字：“亦名三启经”，其后有小字：“三藏法师义净奉制译”。

从：“稽首归依无上士，常起弘誓大悲心”到“菩提妙花遍庄严，随所住处常安乐”。见《大日本校订大藏经》第14帙，第7册，第19页上栏第5行—下栏第19行。

2.附录和题记开头。第3纸第2折面至第4纸第2折面，共6折面，36行。附录包括陀罗尼：《大佛顶白伞盖心咒》，附有另一部经的说明；《圣六字大明王心咒》附有《宝王经》即《大乘庄严宝王经》的说明。见《大正藏》第20卷，第1050号。最后一行是题记开头，有皇帝的自称“朕”。此刊本同12世纪最后30年的小型御览本相似。

参考书目：伯希和《柯兹洛夫探察队在黑城所得汉文文书》第17页。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7号）

7 (原藏录号TK—279)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

鉴定不出是经中的哪一段。经文中反复出现“亦不可取”几个字。

木刻本，残片，25×16厘米，卷子的上半截，首尾残缺。一残页，14残行，宋体字，纸色黄，厚0.12—0.14毫米。无书题。1132年(?)，宋版本。

从：“……〔明识界乃〕……”到：“……好亦不可……”

参考书目：弗鲁格《10至13世纪中国宋代书籍印刷史》第72—73页。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鸠摩罗什译(8—62号)

8 (原藏录号TK—181)

木刻本，残片，13×22厘米。卷子的一部分，首尾和下端残缺，右端卷首有小字的经名简称，5残行，纸色浅褐，厚0.09—0.10毫米，帘纹模糊，每厘米10道，有竖纹，单栏，宋体字，有小字双行注释，无书题，(11世纪下半期的)宋版本。

从：“是世尊如〔来〕……”到：“尊佛告须菩提尔所国〔土〕……”。见《大正藏》第13卷，第751页中栏第21——第25行。

背面粘有一条薄纸(当时的裱褙)。

9 (原藏录号TK—182)

木刻本，经折装。第4纸(最后3折面)、第5至第7纸(均6折面)。下端损坏，面5行，每行原有14字，纸色黄，单栏，写刻体，无书题(12世纪上半期的)。

从：“故如来常说，等比……”到：“一，希有，何以故，此人无我相，〔无〕……”。见《大正藏》第8卷，第749页中栏第10行——第750页中栏第7行。

10(原藏录号TK—178)

木刻本,经折装,各纸右端有页码。折面 9×19.5 厘米,栏面 9×18 厘米,单栏。面5行,行13字,宋体字,无书题(12世纪下半期的)。此刊本存有以下部分:

一、1折面,缺下半截。

从:“有持戒修福者,于此〔章〕……”到:念生□〔信〕者,须〔菩〕……”。见《大正藏》第8卷,第749页上栏第28行——中栏第3行。

二、第5纸(最后1折面)、第6纸(7折面)、第7纸(第1至第2折面)。

从:“……〔行〕者,以须菩提,”到:“即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须菩提,”。见《大正藏》第8卷,第749页下栏第14行——第750页上栏第23行。

三、第9纸(7折面)、第10纸(第1折面)。

从:“得成就,不可量不可称,无有边不”到:“也世尊,如我解佛所说义,佛于然”。见《大正藏》第8卷,第750页下栏第16行——第751页上栏第8行。

刊本背面折缝处粘有汉文刊本、西夏文写本和刊本的纸块(当时的裱褙)。

11 (原藏录号TK—124)

1167年版本,木刻本,经折装。此版本有版画,保存下来的不全,正文完好。破损严重。共12纸,另有一纸版画。各纸均叠成 9.5×20.5 厘米的折面,不算版画共66折面。面7行,行15字,或两句五言诗,共457行。文面 9.5×15 厘米,画面 9.5×14.5 厘米。页码在每纸右端。宋体字。正文单栏,版画双栏。此刊本背面折缝处糊有汉文刊本和写本的小纸块。第5纸第6折面第1行被撕去,是补抄上的(当时的修补)。

此经的附录，计有：〔《金刚经启请》〕，《净口业真言》，《安土地真言》、《普供养真言》、《奉请八金刚》、《奉请四菩萨》、《云何梵》、《发愿文》。

有首题和尾题，首题后面是小字的译者署名：“姚秦天竺三藏鸠摩罗什译”。此经的补充部分，计有：《般若无尽藏真言》、《金刚心陀罗尼》、《补阙真言》、《普回向真言》。

最后是标题为《发愿文》的刊本题记。题记中说，此经指明了解脱烦恼和到达“彼岸”的途径。捐款雕印此经为的是消灾除病。接着祝愿家庭和国家兴旺，百姓安宁幸福，“悉除有漏之固”，“并证无为之果”。最后两行是刻印日期和施主署名：“天盛十九年五月 日/太师上公总领军国重事秦晋国王谨愿”。刻印日期合公历1167年5月21日——6月19日。封号为“秦晋国王”的人未查明。左页边宽3.5厘米，上有椭圆形黑墨铃记，九叠文字体，印文辨认不出。铃记大1.5×2厘米。

12 (原藏录号TK—143)

秦晋国王1167年5月21日——6月19日版本前面的第2面版画。

13 (原藏录号TK—127)

木刻本，经折装，秦晋国王1167年5月21日—6月19日版本，正文前面的附录，第1纸第2折面，标题是：《安土地真言》、《普供养真言》、《奉请八金刚》。

14 (原藏录号TK—115)

木刻本，经折装，秦晋国王1167年5月21日—6月19日版本。

15 (原藏录号TK—126)

木刻本，经折装，秦晋国王1167年5月21日—6月19日版本，经文，同《大正藏》第8卷第750页上栏第6—22行。

16 (原藏录号TK—125)

本刻本，经折装，秦晋国王1167年5月21日—6月19日版本，残本。

17 (原藏录号TK—180)

12世纪后30年版本，木刻本，经折装，每纸5折面，面幅 8.5×20.5 厘米，栏面 8.5×16.5 厘米，单栏，面5行，行14字或两句五言诗，宋体字。(12世纪后30年的)。

第2至第4纸(每纸5折面)，经文前的附录，包括：《金刚经启请》、《净口业真言》、《普供养真言》、《请八金刚》、《请四菩萨》、《云何梵》、《发愿文》，往下是经文开头，有首题，之后是字体较小的译者署名：“〔姚〕秦天竺三藏鸠摩罗什译”。

18 (原藏录号TK—14)

1189年版本，木刻本，经折装，罗皇后版本。全件完整，稍有破散，13纸，另有一纸版画。每纸均叠成 11×29 厘米的折面，版画有4折面，第1至第12纸各5折面，第13纸2折面。共计66折面(含版画)。面6行，行18字，共367行。文面 11×23 厘米。有页码，纸色浅褐，每纸均为双栏，宋体字，蓝布封皮包在用西夏文和汉文写本及刊本的纸粘成的硬纸板上。刊本折缝的背面糊有写着西夏字的小纸块(当时的裱褙)。此刊本分为四部分：

一、版画， 42.5×23 厘米，画面为侧坐于宝座上的佛、诸神、弟子们及前来聚会者，佛的身后榜题：“十大弟子，八金刚，四菩萨”；宝座下方榜题：“比丘众”；佛的身前榜题：“长者，须菩提，天人众，舍卫国王，善男子，祁陀太子，善女人，波罗门众。”

二、第1至第5折面，28行，经的附录，包括：《金刚经启请》，《净口业真言》，《安土地真言》，《虚空藏菩萨普供养真言》，《请八金刚》，《请四菩萨》，《云何梵》，《发愿

文》。相应的附录见《大正藏》第85卷，第1页上栏——中栏。

三、第5至第61折面，经文，337行，有首题和尾题。首题后面有小字：“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尾题下盖有黑色印章，2.2×3.4厘米；楷书印文：“温家寺/道院记”。经文分作三十二分，标题如下：《法会因由分第一》；《善现起请分第二》；《大乘正宗分第三》；《妙行无住分第四》；《如理实见分第五》；《正信希有分第六》；《无得无说分第七》；《依法出生分第八》；《一相无相分第九》；《庄严净土分第十》；《无为福胜分第十一》；《尊重正教分第十二》；《如法受持分第十三》；《离相寂灭分第十四》；《持经功德分第十五》；《能净业障分第十六》；《究竟无我分第十七》；《一体同观分第十八》；《法界通化分第十九》；《离色离相分第二十》；《非说所说分第二十一》；《无法可得分第二十二》；《净心行善分第二十三》；《福智无比分第二十四》；《化无所化分第二十五》；《法身非相分第二十六》；《无断无灭分第二十七》；《不受不贪分第二十八》；《威仪寂静分第二十九》；《一合理相分第三十》；《知见不生分第三十一》；《应化非真分第三十二》。见《大正藏》第8卷，第748页下栏——第752页下栏。各分的标题在上述的经文中无，但在《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中有。见《大正藏》第85卷，第1页上栏——第8页下栏。

四、1纸、2行。题记：“大夏乾佑二十年岁次己酉三月十五日/正宫皇后罗氏谨施”。题记中的日期合公历1189年4月2日。

用另种雕版印刷的相同刊本见本书编号19及其后。此版本以下称“甲种本”，其他版本称“乙种本”。

参考书目：关于版本见伯希和《柯兹洛夫探察队在黑城所得汉文文书》第22号；弗鲁格《10至13世纪中国印刷术简

史》表4；孟列夫《黑城发现的早期出版物（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柯兹洛夫藏卷汉文部分）》，载《亚洲民族研究所简报》第7册，1961年，第145页。关于题记见：伊凤阁《西夏史上的一页》，载《皇家科学院通报》第6集第5卷，1911年，第835页；卡特《中国印刷术及其向西方的传播》，纽约，1925年，第65—66页；沙畹译、伊凤阁著《西夏史上的一页》，载《通报》第12卷，1911年，第444页；戴密微，《黑城发现的早期出版物》，载《通报》第51卷，第4—5期，1964年，第451页。关于印章见：伯希和《柯兹洛夫探察队在黑城所得汉文文书》第22号。

19（原藏录号TK—16）

木刻本，经折装，罗皇后1189年4月2日版本。和本书编号18相同，但此件系用另外的雕版所印（以下称本书编号18为“甲种本”，此件称“乙种本”）。版画和题记（第13纸第2折面）阙佚，所有测量数据与甲种本相同。经文和附录同甲种本完全一致。纸色褐灰，每厘米9道帘纹，厚0.14—0.18毫米，有首题和第一至第三十二分的标题。

甲种本和乙种本的差别是：①甲种本结尾的偈同散文连在一起，不分诗行；乙种本的诗行分开，每两句五言诗占一行；②甲种本367行，乙种本369行；③两种本子的栏线有几处明显不同；④对比两者相应的文字，可以看出轻微的差别；⑤甲种本的尾题在第13纸第1折面，乙种本的在第13纸第2折面。

此刊本折缝破裂，多处粘有汉文和西夏文写本的小纸块（当时的裱褙）。

20（原藏录号TK—17）

木刻本，经折装，罗皇后1189年4月2日版本，甲种本。此件不全，保存下来的有版画、附录和被烂孔断为两块的正文。

第1纸第1折面上有印章“温家寺/道院记”（参见本书编号18）。有首题和尾题，首题后面为小字译者署名。此刊本折缝处粘有汉文和西夏文写本的小纸块（当时的裱褙）。

21（原藏录号TK—18）

木刻本，经折装，罗皇后1189年4月2日版本，甲种本。此件不全，保存下来的有版画（第1至第4折面）、附录和前半部经文（第1纸第1折面至第6纸第6折面）、题记（第13纸第2折面）。

纸色柠檬黄，帘纹模糊，每厘米7道，厚0.16—0.18毫米，折面11×28.5厘米。首尾有蓝布蒙面的封皮，封皮硬纸板用此刊本和其它刊本的纸片粘成。有首题，其后为小字的译者署名。题记后面有莲花形的黑印（1.5×2厘米，上面有个“李”字）和手书的收藏者姓名：“李善？”。

此刊本折缝背面粘有汉文刊本的小纸块（当时的裱褙）。

22（原藏录号TK—45）

木刻本，经折装，罗皇后1189年4月2日版本，乙种本。版画（第3—4折面）、附录和经文开头（第1纸第1折面至第3纸第1折面）。

刊本背面粘有西夏文写本的小纸块（当时的裱褙）。

23（原藏录号TK—43）

木刻本，经折装，罗皇后1189年4月2日版本，甲种本。版画（第4折面）、附录和此经的首题（第1纸第1—5折面）。首题后面有小字的译者署名。

24（原藏录号TK—19）

木刻本，经折装，罗皇后1189年4月2日版本，甲种本。此件不全。保存下来的是附录和被烂孔分成两块 的 经文。有首题，其后为小字的译者署名。

25 (原藏录号TK—44)

木刻本，经折装，罗皇后1189年4月2日版本，乙种本。附录，第1纸第3折面。折缝处粘有汉文写本的小纸块（当时的裱褙）。

26 (原藏录号TK—20)

木刻本，1折面，罗皇后1189年4月2日版本，甲种本。第2纸第1折面，折缝里糊有汉文写本的小纸块（当时的裱褙）。

27 (原藏录号TK—42)

木刻本，经折装，罗皇后1189年4月2日版本，乙种本。附录（第1纸第4—5折面），经文开头（第2纸第1—4折面）。有首题，其后为小字的译者署名。

28 (原藏录号TK—31)

木刻本，经折装，罗皇后1189年4月2日版本，甲种本。经文开头。第2纸第1—5折面。

29 (原藏录号TK—46)

木刻本，经折装，罗皇后1189年4月2日版本，乙种本。经文，第2纸第2折面至第4纸第4折面。刊本折缝背面粘有许多小纸块（当时的裱褙）。

30 (原藏录号TK—32)

木刻本，经折装，罗皇后1189年4月2日版本，甲种本。此件不全，保存下来的是经文部分（第2纸第3折面至第6纸第5折面）。此刊本折缝上多处粘有小纸块（当时的裱褙）。

31 (原藏录号TK—49)

木刻本，经折装，罗皇后1189年4月2日版本，乙种本。保存下来的是两部分经文。刊本折缝背面粘有汉文写本的小纸块（当时的裱褙）。

32 (原藏录号TK—33)

木刻本，经折装，罗皇后1189年4月2日版本，甲种本。此件不全，各纸被从上面和沿外端裁成 9×20 厘米的开本（显然是准备粘成硬纸板作封皮用）。保存了经文的片断。

33 (原藏录号TK—34)

木刻本，经折装，罗皇后1189年4月2日版本，甲种本。经文，保存片断部分。

此刊本折缝背面粘有许多小纸块，有些是西夏文写本和汉文刊本（当时的裱褙）。

34 (原藏录号TK—35)

木刻本，经折装，罗皇后1189年4月2日版本，甲种本。经文部分，第5纸第1—4折面。

此刊本折缝背面粘有西夏文写本的小纸块（当时的裱褙）。

35 (原藏录号TK—89)

木刻本，经装折，罗皇后1189年4月2日版本，乙种本。第5纸第2折面下半截残片，经文。

36 (原藏录号TK—48)

木刻本，经折装。罗皇后1189年4月2日版本，乙种本。经文，第5纸第3折面至第6纸第4折面。此刊本折缝背面粘有刊本《三十五佛名经》的小纸块（当时的裱褙）。

37 (原藏录号TK—47)

木刻本，经折装，罗皇后1189年4月2日版本，乙种本。经文，第5纸第4—5折面。此刊本折缝背面糊着许多小纸块（当时的裱褙）。

38 (原藏录号TK—51)

木刻本，经折装，罗皇后1189年4月2日版本，乙种本。经文，第6纸第1—5折面。

39 (原藏录号TK—50)

木刻本，经折装，罗皇后1189年4月2日版本，乙种本。经文，保存了第6纸第3折面至第7纸第5折面；第8纸第5折面至第9纸第4折面。

40 (原藏录号TK—52)

木刻本，经折装，罗皇后1189年4月2日版本，乙种本。经文，第6纸第5折面至第7纸第1折面。

41 (原藏录号TK—37)

木刻本，经折装，罗皇后1189年4月2日版本，甲种本。6折面，下部被撕去，经文，第6纸第5折面至第7纸第5折面。

42 (原藏录号TK—36)

木刻本，经折装，罗皇后1189年4月2日版本，甲种本。经文部分，第7纸第1—5折面。此刊本折缝背面糊有许多小纸块（当时的裱褙）。

43 (原藏录号TK—54)

木刻本，经折装，罗皇后1189年4月2日版本，乙种本。经文和题记，保存了第7纸第2折面至第9纸第1折面；第9纸第4折面至第12纸第2折面、第12纸第5折面至第13纸第2折面。此刊本背面的折缝处间或糊有小纸块（当时的裱褙）。

44 (原藏录号TK—55)

木刻本，经折装，罗皇后1189年4月2日版本，乙种本。经文，第8纸第2—5折面。此刊本折缝背面糊有许多小纸块（当时的裱褙）。

45 (原藏录号TK—38)

木刻本，经折装，罗皇后1189年4月2日版本，甲种本。经文，第9纸第1折面至第11纸第3折面。此刊本背面折缝处裱有许多小纸块，此外，有的折缝处还用褐线缝着（当时的修补）。

46 (原藏录号TK—308)

残片，13.5×21厘米。罗皇后1189年4月2日版本的第11纸第2—3折面，下部被撕烂，甲种本。

47 (原藏录号TK—53)

木刻本，经折装，罗皇后1189年4月2日版本，乙种本。经文，第10纸第5折面至第11纸第1折面。此刊本折缝背面糊有小纸块（当时的裱褙）。

48 (原藏录号TK—56)

木刻本，1折面，罗皇后1189年4月2日版本，乙种本。经文，第11纸第3折面。

49 (原藏录号TK—39)

木刻本，经折装，罗皇后1189年4月2日版本，甲种本。经文结尾和题记。第12纸第1折面至第13纸第2折面。经文结尾（第13纸第1折面）和题记（第13纸第2折面）之间粘有两页手写的陀罗尼（共9行）：《般若无尽藏真言》；《补阙（？）真言》。

纸色浅黄灰，厚0.15—0.17毫米，折面11×26.5厘米，最后面有封底的余幅，用西夏文刊本和汉文写本的小纸片粘成的硬纸板。此刊本折缝处粘有许多小纸块（当时的裱褙）。

50 (原藏录号TK—57)

木刻本，经折装，罗皇后1189年4月2日版本，乙种本。经文，第12纸第3—4折面。

51 (原藏录号TK—40)

木刻本，经折装，罗皇后1189年4月2日版本，甲种本。下边被撕掉，残存的折面11×24.5厘米，经尾和题记。第13纸第1—2折面，有尾题。

52 (原藏录号TK—41)

刊本的最后一面（第13纸第2折面），罗皇后1189年4月2日本，甲种本。题记正文，题记后面有手写的偈（两行）：“诸法从本来 常自寂灭相/佛子行道已 来世得作佛”。其后有小字的书主人姓名“李善进”。

53 〈原藏录号TK—179〉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12世纪末版本。

木刻本，经折装，第1纸（第1至第4折面）、第2至第18纸（各5折面）、第19纸（1折面）。页码有四种类型，第3纸在小圆圈内标上该纸号数和“金”字，黑底白字；第4—7纸、第16—17纸的页码是数目字，有的从右向左排列（第16纸）；第8、第14、15纸的数目字有墨围；上述三种空行下有各分的标题。其余各纸的页码在粘接处的边栏右面。封皮用几层黑布粘成，各层之间夹有衬纸，有一张衬纸是手写的草书体的汉文文书。上下封皮连在一起。折面11×30厘米，栏面11×24厘米，单栏，面5行，行15字，或两句五言诗。纸色浅黄灰，涩滞，厚0.14×0.18毫米，每厘米6道帘纹，宋体字（12世纪末的）。此刊本分以下几部分：

一、第1纸第1—4折面，42×24.5厘米，上下栏双线，带有高1厘米的装饰图案。一佛侧坐在莲花上，右边10人，榜题：“十大弟子”，佛的右侧和左侧有两护卫和两侍从，莲座下面有一只狗和狮子。另一佛坐于小毯上，他左边的诸像榜题：“须菩提，给孤长者，舍卫国王”，身后是祁陀太子和另外两像，在他们的上方是天人众（四身）。较远处小毯上是比丘众（四身），高处站着一位波罗门，身后是一持礼品的仆人和四个护卫。再远处是善男子和善女人（保存下来了四身）。这一组像的上方两侧，是面向着佛的飞天。

二、第2纸第1—2折面，附录开头，带有标题：《金刚经

启请》、《净口业真言》、《安土地真言》、《奉请八金刚》，往下阙佚两折面，再下为第2纸第5折面、第3纸第1折面，标题是：《发愿文》、《云何梵》。

三、第3纸第1折面至第18纸第4折面，经文，分作三十二分。有首题和尾题，首题下面是小字译者署名：“姚秦三藏鸠摩罗什奉诏译”

从：“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到：“罗等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见《大正藏》第8卷，第748页下栏第16行—第752页下栏第3行，段落的划分不完全相同。

四、第18纸第4折面至第19纸第1折面，三部陀罗尼经文：《般若无尽藏真言》、《随心真言》、《补阙圆满真言》；第一部的语音注释是双行小字。

折缝处里面粘有小纸条（当时的裱褙）。

此版本在外表上同1189年的皇室版本相似。

54 （原藏录号TK—26）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13世纪初版本。

木刻本，经折装，折面 5.5×12.5 厘米。面10行，行17字，文面 5.5×9.5 厘米。纸色浅灰，厚0.09—0.12毫米，单栏，宋体字（13世纪初的）。此书现存两件残片，附录有：《清八金刚》、《请四菩萨》、《云何梵》、《发愿文》。

55 （原藏录号TK—28）

木刻本，经折装，纸色灰白，单栏，有几处是写刻体，无书题（13世纪初的）。此书保存了两件残片，共7折面。

56 （原藏录号TK—104）

木刻本，经折装。折面 7×15.5 厘米，文面 7×10 厘米，6折面（第60—65折面）。面6行，行13字，纸色灰白，每厘米6道帘纹，厚0.09—0.11毫米，写刻体。有第十九至第二十二分的

标题，保存了经文片断（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的）。

57 （原藏录号TK—106）

木刻本，经折装。同类版本。折面7×13厘米，文面7×10厘米。第4纸第22—29折面，共8折面，面6行，行12字，纸色浅灰，略带黄褐，每厘米7道帘纹，厚0.11—0.13毫米。写刻体，有第十至第十三分的标题（13世纪初的）。保存了经文片断。背面粘有写着汉文草体字的纸（当时的裱褙）。

58 （原藏录号TK—112）

木刻本，经折装。同类版本。6折面，折面7×13厘米，文面7×10厘米，面6行，行13字，纸色浅灰，每厘米7道帘纹，厚0.11—0.12毫米，单栏。写刻体，无书题（13世纪初的），有第二十八至第三十一分的标题。经文片断。

59 （原藏录号TK—27）

木刻本，经折装。同类版本。纸色浅灰，栏线粗糙，写刻体，无书题（13世纪初的），有第十九、第二十分的标题，经文片断。此刊本背面折缝处粘有手写的汉文文书的小纸块（当时的裱褙）。

60 （原藏录号TK—101）

木刻本，蝴蝶装。页面6.5×10厘米，文面5×7.5厘米，边栏双线，上下栏单线。页8行，行14—17字，白口上有页码和经名简称“金”，纸色黄，纸质光滑，厚0.14—0.17，字小，宋体，金版本（13世纪上半期的），无书题。此刊本保存了以下的部分：一、第7页上有第八分的标题；二、第17—18页上有第十七分的标题；三、第24页下有第二十八分的标题。

61 （原藏录号TK—29）

木刻本，蝴蝶装。和本书编号60是同类刊本。页面6×9厘米，文面5×7.5厘米，纸色浅黄灰，涩滞，厚0.11—0.13毫米，

无书题。金刊本（13世纪上半期的）。经文首尾残缺，有第九和第十分的标题，第7页下至第9页上。

62 （原藏录号TK—30）

木刻本，蝴蝶装。与本书编号61的印版相同。页面 6×6.5 厘米，文面 5×7.5 厘米，边栏双线，上下栏单线，白口上有页码和经名简称“金”。纸色浅灰，纸质光滑，厚0.11—0.13厘米，每厘米7道帘纹。页8行，行15字，宋体字，无书题。金刊本（13世纪上半期的）。保存了刊本的以下部分：一、第10页上——第11页上有第十二、第十三分的标题；二、第13页上——第14页下有第十五分的标题。三、第19页上——第22页下有第十八至第二十二分的标题。第11页上的背面粘着一层好像纱布的薄布（当时的裱糊）。

《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63号）

63 （原藏录号TK—141）

《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上，〔观如来品第二〕，〔菩萨品第三、二帝品第四〕

木刻本，经折装。经文首尾残缺，保存下来的是第4至第16纸，第4—15纸各5折面，第16纸只有1折面，面6行，行15字，或两句七言诗，或三句五言诗，折面 9.5×17.5 厘米，文面 9.5×14.5 厘米。各纸右页边的粘连处有经名简称“仁王上”或“仁王经上”及页码。纸色灰，纸质光滑，厚0.13—0.15毫米，每厘米7道帘纹。写刻体。有第三、第四品的书题（12世纪上半期的）。

从：“……〔行〕识常乐〔我〕净亦不”到：“义了知一二非二即胜义谛取”。见《大正藏》第8卷，第835页下栏第3行—第839页下栏第1行。

参考书目：孟列夫《黑城发现的早期出版物》第149页。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玄奘译（64—66号）

64 （原藏录号TK—144）

玄奘译的经文，增补了此经所有著名译本中都不见的陀罗尼后面的七言诗。

木刻本，经折装。折面 8.5×18.5 厘米，栏面 8.5×15 厘米，单栏。面5行，行11—12字，或两句七言诗。纸色浅黄灰，涩滞，厚0.10—0.12毫米，每厘米8道帘纹。写刻体。有尾题（11世纪末的）。保存了此刊本的以下部分（纸数和折面是推测出的）：

一、第1纸第2—4折面，经的开头（无首题）。

从：“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到：“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见《大正藏》第8卷，第848页下栏第3—12行。

二、第1纸第6折面，第2纸第1折面，经尾和七言诗开头。

从：“〔故〕□〔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到：“□□罪障并消除 远离众苦归圆寂”。经文见《大正藏》第8卷，第848页下栏第16—19行。

三、第2纸第3折面，诗尾和尾题。

从：“如是一切诸业障 悉皆消灭尽无余”到：“如是四法广无〔边〕 愿今回向亦如是”

此刊本折缝背面糊有纸条（当时的裱褙），纸条上面间或有手写的汉字和西夏字。

本书编号160大概是同一刊本或者同类刊本的开头部分。

65 （原藏录号TK—189）

写本，经折装。开头的两折面，尾部阙佚。折面 8×18 厘米，面4行，行11字。纸色乳白，纸质光滑，结实，厚0.16—0.19毫米。楷体，书写很不熟练。天头高1.5厘米。首题：《佛说般若波罗蜜多心经》（12世纪上半期的）。背面是带有粗糙界格的西夏文佛

教经文。

66 (原藏录号TK—25)

和本书编号149的印版相同,经折装。折面 6×12.5 厘米。纸色浅灰,近于白色。每厘米6道帘纹,每隔8.5和2.3厘米有道竖纹;厚0.08—0.09毫米。一个刊本的两件残片:

(1) 第6纸第1—3折面,经文。

(2) 第6纸第3—9折面,38行。有题记,包括以下部分:祈祷诗式的发愿文(第1—10行);《功德山陀罗尼》(第11—15行);《大集经》引文(第16—24行);题记本身——日期和一位施主的署名:“时皇建元年十一月初五日众/圣普化寺连批张盖副使沙……”(日期合公历1210年11月22日)。此折面的尾部被撕去,第7折面的上方钤有朱印,印文字体和本书编号149上的相同,难以辨认。

《妙法莲华经》(67—76号)

67 (原藏录号TK—1; 3; 4; 9; 10; 11; 15)

木刻本,经折装,七卷本。正文齐全,保存较好。各卷自成一书,装有封皮,封皮上有标明作品名称的书签。每纸5折面。各卷第1纸均为佛像画和表现作品题材的插图,各纸粘接处或前几行之间一般均注有标明卷数和纸数的页码。折面 8.5×18.5 ,文面 8.5×15 。面8行,行16字。或四句四言诗,或三句五言诗。宋体字。每卷都有首题和尾题,使用西夏文和汉文写本与刊本的小纸块,作封皮的硬纸板和裱糊折缝。

(1) 卷第一,《弘传序》、《序品第一》、《方便品第二》。序题后面是作者署名:“终南山释道宣述”;第一品标题后面是译者署名:“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奉诏译”,共17纸。第1纸有栏面 34×15 厘米的版画,版画右部为诸神簇拥着的佛,佛前跪着一

群弟子，在一个独特的低台上是皇室成员，左边和上方的画面描绘佛的故事。版画左端栏框里题有仁宗皇帝的称号（他大概是此刊本的施主或监印人）占两行：“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悖睦懿恭 皇帝”。全卷共计 626 行，保存了手写的卷第一标题的封皮书签。见《大正藏》第 9 卷，第 1 页中栏第 11 行—第 10 页中栏第 21 行。

（2）卷第二，《譬喻品第三》、《信解品第四》的全文，17 纸。末尾有刻工姓名：“王善惠”。经文同《大正藏》第 9 卷，第 10 页中栏第 22 行—第 19 页上栏第 12 行。

（3）卷第三，《药草喻品第五》、《授记品第六》、《化城喻品第七》，全文 16 纸，共计 618 行。经文同《大正藏》第 9 卷，第 19 页上栏第 13 行—第 27 页中栏第 9 行。

（4）卷第四，《五百弟子受记品第八》、《授学无学人记品第九》、《法师品第十》、《见宝塔品第十一》、《提婆达多品第十二》、《持品第十三》。全文保存得极好，20 纸，752 行。蓝布上封皮的书签上有手书的外题字，书尾有刻工姓名：郭苟埋。经文同《大正藏》第 9 卷，第 27 页中栏第 10 行—第 37 页上栏第 2 行。

（5）卷第五，全文共 4 品 19 纸，但缺第 1 纸第 1 折面。696 行，蓝布上下封皮，书尾镌有刻工姓名：贺善海。经文同《大正藏》第 9 卷，第 37 页上栏第 3 行—第 46 页中栏第 14 行。

（6）卷第六，全文，共 6 品 19 纸，676 行。蓝布上封皮，有外题字书签。书尾镌有刻工姓名：王善圉。经文同《大正藏》第 9 卷，第 46 页中栏第 15 行—第 55 页上栏第 9 行。

（7）卷第七，全文，共 5 品 16 纸，622 行。经文同《大正藏》第 9 卷，第 55 页上栏第 10 行—第 62 页中栏第 1 行。尾题后面是小字的题记，14 行，行 20 字。题记中注有日期“大夏国入庆

三年岁丙寅五月……”（1146年6月11日—7月10日，这是整个被登录的七卷刊本的日期）。题记中有关于此经意义的叙述：诵读此经可以解开迷误，免入歧途，使诵读者增加美德，打开知识之门，解脱痛苦。28品共7万字，指明刻工姓名和刻印地点：“雕字人王善惠、王善圆、贺善海、郭狗埋”、“上殿宗室御史台正直本”；指明雕印此经免费发给所有的发愿人。下封皮是几层硬纸板，用有西夏文和汉文的纸做成。

参考书目：孟列夫《黑城发现的早期出版物》第145页。

68 （原藏录号TK—2）〔卷第二，《譬喻品第三》〕、《信解品第四》〕

木刻本，经折装，1146年版本的第二件，卷第二，首尾残缺，第11纸和第12纸（第1折面），共6折面。文内和页边上有用黑墨作的改写，有第四品的标题（1146年6月11日—7月10日的）。

69 （原藏录号TK—157）〔卷第二，《信解品第六》〕

写本，残片，34.5×27厘米，卷子的一部分，两残纸，19行，行17字，楷书；无书题（11世纪末的）。大概是宋写本，天头上有一行藏文草书字。

背面有一幅浅墨色的素描画，画的是坐着的阿弥陀佛，沿轮廓线上有刺穿的小孔；用刺出轮廓的方法描画佛像，就会描得更清楚。有用很淡的墨汁横写着的两句回鹘文，每句一行。

70 （原藏录号B—54）〔卷第三，《药草喻品第五》〕、《授记品第六》〕

写本，卷子的一部分，叠成12×24厘米的折面，共4折面，首尾残缺，两残纸。24行，行17字。或四句四言诗，楷书，细界格，纸色黄，有第六品的首题（8世纪的）。

此部分和本书编号71是同一个写本，但不直接相连。

71 (原藏录号B—55)〔卷第三,《授记品第六》〕、
《化城喻品第七》

写本。此卷子首尾残缺,叠成 12×24 厘米的折面,共58.5折面,14纸。351行,行17字。或四句五言诗,或四句四言诗。楷书,有细界格。纸色黄,厚0.11—0.13毫米,有第七品的首题(8世纪的)。

背面用黑墨画出页边的界格,此写本的破损处糊着汉文和西夏文写本的小方块纸(当时的裱褙)。此部分和本书编号70是同一个写本,但不直接相连。

72 (原藏录号TK—188)〔卷第四,《授学无学人记品第九》〕

写本,残片, 14×25 厘米,卷子的一部分,首尾残缺。8行,行17字;或四句五言诗。纸色柠檬黄,厚0.09—0.11毫米,楷书,无书题(8世纪末的)。

73 (原藏录号A—27)〔卷第四,《法师品第十》〕、
《见宝塔品第十一》

写本,首尾残缺。1纸,蝴蝶装, 17.5×18 厘米。12行,行13—15字,或三句七言诗。用尖木笔写得不好的楷书,有朱点。纸色灰,纸质柔软,厚0.07毫米,每厘米8道帘纹。此写本磨损得厉害,有包括经名在内的各品标题(14世纪30—60年代的)。

参考书目:弗鲁格《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藏汉文古佛教写本简明目录》第157号庚。

74 (原藏录号TK—57)〔卷第四,《提婆达多品第十二》〕

写本,裁成粘封皮硬纸板用的小页,面幅 11×24 厘米,3小页,是不同时期的写本和刊本。

（1）连在一起的两小页，写本。卷子的一部分，首尾残缺，22×24厘米，有两纸的粘接缝，13行，行16—17字，楷书，纸色淡黄，厚0.10—0.11毫米，无书题（8世纪下半期的）。

（2）1189年4月2日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刊本的版画，最左边的一面（参看本书编号122）。版画背面粘有一条纸，上题《妙法莲华经卷第三》，大概是此书的外题字书签。

75 （原藏录号B—56）〔卷第五，《安乐行品第十四》〕、《从地踊出品第十五》、《如来寿量品第十六》、《分别功德品第十七》

写本卷子，首尾残缺，叠成11.5×24厘米的折面，共14纸64折面，第14纸残。375行，行17字，或四句五言诗，或四句四言诗，楷书，界格细，几乎看不出来。纸色深黄，纸质光滑，发脆，厚0.07—0.08毫米，帘纹在反射的光线中能显示出来，每厘米8道。有第十五—第十七品的首题（7世纪下半期的）。

在损坏处糊有汉文写本的小纸块（当时的裱褙）。背面用黑墨画栏线。

76 （原藏录号TK—196），〔卷第七，《普贤菩萨劝发品第二十八》〕

写本，51×18.5厘米，卷子的一部分，首缺。两纸，第1纸残。此写本不到尾。16行（第1、2行残），行17字。纸色灰。左边宽14.5厘米，楷书，有改写处，无书题（14世纪中期的）。

《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第二十五》（《观世音经》）（77—96号）

77 （原藏录号TK—175）

木刻本，卷子的下边部分，无首尾。残片，9残行。纸色黄，厚0.12—0.15毫米，宋体字，单栏，无书题，宋刊本（11世纪上半期的）。

78 （原藏录号TK—156）

木刻本，经折装，首尾残缺。第4纸（最后的3折面）、第5纸（6折面）、第6纸（5折面）、第7—8纸（各6折面）、第9纸（前面的2折面）。栏线上有页码。折面9×20厘米，栏面9×16.5厘米，单栏。面4行，行10字，或两句五言诗。纸色褐，厚0.08—0.09毫米，写刻体，无书题，宋版本（12世纪前25年的）。

79 （原藏录号TK—154）

木刻本，经折装。上名作品第二十五品的单独刊本，折面9×20.5厘米，栏面9×18.5厘米，单栏，面4行，行11字，或两句五言诗。纸色灰褐，涩滞，厚0.12—0.15毫米。楷书，笔画粗，字大2×1.5厘米。间或有语音的小字双行夹注。有印刷的墨色小圆圈标点，其上间或有朱点。无书题。宋刊本，大概是12世纪前30年的。

80 （原藏录号TK—155）

木刻本，经折装，第5纸第2—3折面，第6纸（第3—7折面）至第9纸第1折面，面幅8.5×21厘米。单栏，面4行，行10—12字，或两句五言诗。写刻体，有淡墨标的圆点，无书题（12世纪上半期的）。刊本折缝背面糊着小纸条，上面间或有草书的西夏文（当时的袷裙）。

81 （原藏录号TK—167）

木刻本，经折装，全本，第2至第9纸各6折面，第1和第5纸各5折面，共52折面。面幅8.5×21.5厘米，栏面8.5×18厘米，单栏，各纸的前两行间有小字的页码。面4行，行11字，或两句五言诗。纸色褐，表面涂了石膏，厚0.16—0.17毫米，分成两层，字很

大，宋体字。印出的正文中有标点（汉文句号）。间或有小字双行语音夹注。第1纸第1行和第9纸第20行缺损，从上面糊住并作了补写，最后两行从下面糊住，也对破损处作了补写。有首题，其后的栏内是小字双行的陀罗尼，标题从右至左，名为：

《真言》，经文是：唵哆利咄哆利/咄咄哆利萨婆诃”尾题：《观世音经》（12世纪中期的）。上封皮用许多层纸粘成，其中有汉文刊本和题有“观音寺前社”的版画碎片，外面被涂成深褐色，有手写的《观世音经》题签，下封皮由几层结实的纸粘成，宋刊本。包括以下部分：

一、版画，第1纸第1—3折面，23×21厘米，栏面23×17厘米，上下单栏，左右双栏，右端的图案上有出版者名称：“杭州晏家重开〔大字观音经印〕”。版画中心画一侧坐于莲座中的观世音，两旁描绘的是念出观世音名字时免遭灾难的情景。

二、经文，第1纸第4折面至第9纸第6折面，共208行。

从：“尔时无尽菩萨。即从座起”到：“心〔竟〕观世音经”

见《大正藏》第9卷，第56页下栏第2行—第58页中栏第7行。

此刊本破散，背面裱了一层白中略呈黄色的薄纸，折缝处另外糊着汉文刊本和字迹流利的西夏文写本的纸条（当时的裱褙）。

82 （原藏录号TK—168）

木刻本，经折装，首尾残缺。现存第3纸（第4—5折面）至第10纸（第4折面），字大，宋体字，无书题（12世纪中期的）。折缝背面糊有草书的西夏文写本的小纸块（当时的裱褙）。

83 （原藏录号TK—169）

木刻本，经折装，第4纸第5折面和第5纸第1折面。栏线里

的右边有纸号和大概是指每纸折面数的符号如：“三”。字大，宋体字，无书题，可能是宋版本（12世纪中期的）。

84 （原藏录号TK—170）

木刻本，经折装，残本，页码未保存下来。折面 8×21 厘米，栏面 8×16.5 厘米，单栏。面4行，行10字，或两句五言诗。大字写刻体。有手写的黑墨标记（汉文句号），无书题（12世纪中期的）。

85 （原藏录号TK—90）

木刻本，经折装，1189年的皇室版本。此刊本包括以下部分：

（1）版画，1纸，4折面，栏面 44×23 厘米，右部分是观世音的的侧身像，坐在山岩之中，面前是急流，左边有插着竹枝的高瓶。版画的其余部分为八幅画，画着由于念出观世音名字而摆脱灾难的故事。各画面旁的榜题为：“若恶兽围绕”、“或囚禁枷锁”、“如日空中住”、“虬螭”、“刀兵段段坏”、“云雷鼓掣电”、“火坑变成池”、“还着于本人”

（2）经文，4纸，第1—3纸各5折面，第4纸只有前两折面，此刊本不到尾，现存17折面。页码形式：“音四”。面6行，行18字，或三句五言诗，共存108行。有首题，字形为宋体字。

从：“尔时无尽意菩萨即从座起偏袒右肩合掌向”到：“念彼观音力 疾走无边方 虬蛇及蝮蝎”。见《大正藏》第9卷，第56页下栏第2行—第58页上栏第8行。

纸色灰，涩滞，每厘米8道帘纹，厚0.12—0.14毫米，折面 11×29 厘米，文面 11×23 厘米，有许多烂孔，宋体字，有首题。蓝纸上封皮粘着相同刊本的4折面版画。封皮里面有两行手写的字迹流利的西夏文以及汉字。

这个刊本的各印本由四种不同的雕版印成。此印本的版本

以下称甲种本，其次称乙种本。二者的区别在于，它们的页码不同，正文的排列顺序小有出入，版画的风格不一，字体稍有差异，其他版本（丙种本和丁种本）同甲种本在字形方面的差别不大。根据这个刊本的不同印本判断，经文应由5纸印成，第1—4纸各5折面，第5纸1折面。现有各印本中均无题记，日期是根据这类刊本的其他著作确定出的，参看本书编号19、122、134。

86 （原藏录号TK—91）

木刻本，经折装，1189年版本，甲种本。第一折面是版画。

87 （原藏录号TK—138）

木刻本，经折装，1189年版本，乙种本。第1纸经文完整，第1折面至第5纸第1折面。共21折面，124行。有首题和尾题，尾题是：《佛说观世音经》。此刊本折缝背面糊着有西夏文刊本经文的小纸块（当时的裱褙）。

88 （原藏录号TK—92）

木刻本，经折装，1189年版本。乙种本。与甲种本版画的区别是刀法很巧，情景的布局不同，下端的图案为莲花瓣式，现存的画面（从上自下）有以下榜题：“如日虚空住”；“还着于本人”；“刀寻段段坏”。经文残缺不全，尾题是：“佛说观世音经”。

89 （原藏录号TK—93）

木刻本，经折装，1189年版本，乙种本。经文，第2纸第3折面至第3纸第1折面。

90 （原藏录号TK—94）

木刻本，经折装，1189年版本，丁种本。经文，残。

91 （原藏录号TK—95）

1189年版本版画的第2—4折面，甲种本。有观世音像的第

1 折面阙佚。

92 (原藏录号TK—96)

1189年版本版画的第4折面,甲种本。3幅最后的画面。

93 (原藏录号TK—177)

木刻本,经折装;第3纸最后4折面和第4纸的第1—2折面,页码在右边缘,阴文,宋体字,“供”字均印成“供”,无书题(12世纪末的)。

94 (原藏录号TK—171)

木刻本,经折装。各纸均无页码,宋体字和楷书。首题:“佛说观世音经”,其后是小字:“姚秦三藏沙门鸠摩罗什奉诏译”(12世纪初的)。有两个封皮书签:①题名《观世音经》;②黑线框内题名《佛说观世音经》。残本。

95—96 (原藏录号TK—105、113)

木刻本,经折装,无首尾,字小,宋体字。第1纸第4折面至第3纸,每纸6折面,共15折面。无书题(13世纪初的)。

《大方广佛华严经》(八十卷本),实叉难陀译(97—103号)。

97 (原藏号TK—261)〔卷第九,《华藏世界品第五之二》〕

木刻本,1折面的下半截,9.5×13厘米的残片。9残行,每行原有23字。纸色浅黄,厚0.14—0.15毫米。字小,宋体字。单栏,宋版本(11世纪上半期的)。

背面有手写的文书记事片断。

一、3行:“寔庸敬〔献〕/结织绳拂/子一把伏乞”;

二、1行:“国公平章大人钩座”(大概是赵钧);

三、1行：“笑〔笛(?)〕为妙”

98 (原藏录号TK—185)，〔卷第十七，《梵行品》
〔第十六〕〕

单印本。木刻本，经折装，刊本的下半部分，最后的14折面。第5折面的行间有小字的版号：“行五”。大概总共是6版4纸，每纸7折面。面幅7×15厘米，栏面7×11.5厘米，单栏。面4行，行9字。纸色浅褐，纸度光滑。厚0.07—0.08毫米，每厘米7道帘纹。写刻体。此刊本包括两部分：

(1) 本品的经文，缺首，第1至第12折面，有尾题。

(2) 题记，第12—14折面。10行。题记中说了刻印此品的好处，和“伏愿慈航电激作沉迷旷劫之津梁，宝录芸绵印社稷万年之席福”；最后1行是日期和施主姓名：“辛未大原王简施”，山西的宋刊本。按辛未年应为1091年。

99 (原藏录号TK—246)

第十六品的单印本。木刻本，经折装，全文和部分版画。3纸，每纸7折面(第1纸缺第1折面)。面5行，行10字。页码形式：

“梵行二”。折面9×17.5厘米，栏面9×14.5厘米，单栏，粗线。纸色浅褐，涩滞，厚0.12—0.14毫米，每厘米7道帘纹。宋体字。有首题和尾题。首题后面是小字：“唐于阗国三藏实叉难陀译”，金版本(12世纪中期的)。

一、版画，第1纸第1—2折面(第1折面阙佚)。画一佛正面坐在有花瓣的莲花上，手结印契于胸前。背光是涡旋形光线，围以四圈圆边，外层一圈花纹式带形图案，围了三圈圆边。头光呈波浪形的发射状，围有三圈圆边。背光，头光四周和莲花下面是云团，云团周围至画边为发射状光线。左下角是花朵。在本书编号107中有同一位画师的版画，和此刊本版画的不同处仅在于头饰、头光和榜题。

二、经文，第1纸第3折面至第3纸第7折面。最后一行下面有黑底阴文榜题，是施主的署名：“净信弟子李”。

上封皮的硬纸板被保存下来，糊硬纸板的有《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刊本的书页，也有带西夏文草书字的薄纸，其中一纸上有一方红印的左边，高6厘米，九叠文字体。

此版本背面折缝处糊着西夏文刊本的小纸条（当时的裱褙）。

本书编号100也是这个刊本的一件印本。

100（原藏录号TK—255）

木刻本，经折装，和本书编号99是同一版的金刊本残片（12世纪中期的），但磨损严重。

101（原藏录号TK—256）

木刻本残片，大概是经折装，金（？）刊本（12世纪中期的）。

102（原藏录号A20 B 1Y）

木刻本，大概是上品经的单印本。

同一刊本的3件残片，每行原有17字，大写刻体楷书，有本品的首题（14世纪中期的）。此刊本被剪成裱糊本书编号190的小纸块，因此原来的样式肯定不了。

103（原藏录号B62）

写本，叠成折子而折缝已破裂的卷子装的散页，大概是用来说作封皮硬纸板的，各页背面有一或两个直径8.5厘米的圆形黑印，印文是中亚的婆罗迷文（13行），印鉴中心有高4厘米的塔影。共18页，二十八个印。是四件不同的宋写本残片（12世纪初的）。

有以下部分：

一、《大周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序》，8×18厘米的3小页，文面8×13厘米，双栏，外线粗，细界格。页6行，行11—13

字，小楷。有首题，其下是写得很小的藏书记号：“卷第一平”。首题后面是小字的作者署名：“天册金轮圣神皇帝制”。

二、〔《大方广佛华严经》（八十卷本），卷第十三，菩萨问明品第十〕。8×22厘米的10小页。

三、〔《大方广佛华严经》（四十卷本），卷第四十，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4小页，页面8×21厘米，文面8×14厘米，单栏，页5行，行11—12字，楷书。

四、最后有一小页的下半截，3残行。

从：“……〔回〕向法界诸众生”到：“……成就普贤广大愿”

没发现哪部经中有此经文。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四十，《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般若译（104—127号）

104（原藏录号TK—88）

木刻本，卷子装，高29.5厘米，栏面高24厘米，14纸，纸幅53.5—55.5×29.5厘米，最后一纸59.5×29.5厘米，每纸2⁸行，行15字，或两句七言诗，第6纸上标有“行愿经六”。

尾题后有4行小字题记：“大延寿寺演妙大德沙门守琼/散施此经功德 大安十年八月日流通 /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涂苦 / 普施尽法界 万类诸舍识 / 依经行愿行 广大无有尽 灭障恶业罪 速证佛菩提。”题记中的日期合公元1085年8月23日—9月22日。

纸色黄，纸质光滑，厚0.12毫米，表面显出淡白色石膏斑点，宋体字。

105（原藏录号TK—147）

经文，首尾残缺，附有标准经文中所没有的补充部分。

木刻本，经折装，5折面。折面 8×18.5 厘米，栏面 8×14.5 厘米，单栏。面5行。行两句七言诗，纸色淡黄灰，稍涩，厚 0.10×0.12 毫米，每厘米7—8道帘纹。写刻体，无书题（12世纪上半期的）。

从：“一身复现刹尘身——遍礼刹尘佛”到：“所有众生身口意见或贪谤我法等”。见《大正藏》第10卷，第847页上栏第5—25行，最后4行《大正藏》中无。

106 （原藏录号TK—142）

木刻本，经折装，全件保存完好。经文前有一纸版画，5折面（缺首）。16纸：第1—4、6—8、10—14纸各6折面；第5纸2折面；第9纸5折面；第15纸4折面；第16纸3折面。第2、第5—7、第9—15折面的粘接处有页码。折面 9.5×20 厘米，栏面 9.5×16 厘米。面6行，行15字，或两句七言诗，或三句五言诗。纸色灰，涩滞，厚 $0.11—0.17$ 毫米，帘纹模糊，每厘米6道。宋体字，金版本（12世纪中期的）。此刊本有以下部分：

一、单独一纸的版画。6折面，第1折面阙佚，栏面 47×16.5 厘米，双栏。画中心是正面坐在高莲座上的佛，三圈头光，背光呈发射状，围着一圈有花纹的光带。头戴上部加宽的华冠，头部上方榜题：“教主大毗卢遮那佛”。身体两边有发射状光带，身后是建筑物和两棵树，顶部靠近五个坐于云彩中的佛。高莲座前方有一尊像面佛而坐，有头光和发射状背光，头顶榜题：“眉间胜音菩萨”。他右边是一个跪在小毯上的男孩，榜题：“善财童子”，左边是一个站在小毯上的僧人，榜题：“弟子宝戒”。他们的左右各有五身画像，站在小莲花上（每位脚踩一支莲花），仰面朝佛。右边的是五位妇女，左边的是三女二男。右边有上半句榜题：“请法上道”，左边有下半句榜题：“菩萨天主”。他们均有头光。佛的两侧各有五位坐在莲花上的菩

萨，都有背光和头光。左边（从佛的右手起）榜题：“文殊菩萨”、“功德林菩萨”、“法慧菩萨”、“贤首菩萨”、“座内海慧菩萨”。右面（从佛的左手起）榜题：“普贤菩萨”、“金刚藏菩萨”、“金刚幢菩萨”、“心王菩萨”、“青莲菩萨”，画面右端下角有十身坐在莲花上的菩萨，都有背光和头光，榜题：“常随菩萨众”。他们的上方是十个恶魔和穿皇族服装有头光的人，榜题：“八部四王众”。右端下边有两身坐像，穿皇族服装，还有两身残像（大概应有十身），有头光。榜题：“欲色诸天众”。他们的上方是六个恶魔，还有一身残像（大概也应是十身），有头光。榜题：“杂类诸神众”。所有画像的周围都有两三团表示吉祥的向上冒的香雾。版画底部有高0.5厘米的莲花瓣装饰图案，左上角有版画榜题：“大花严经/九会圣众”。

二、《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疏序》。第1纸第1折面至第2纸第4折面，未收入《大正藏》中的序，标题后有小说的作者署名：“太原府大崇福寺沙门澄观奉诏译”，有朱点。序后有5行小字，每行20字，附记了此经的翻译过程：“此经南天竺国王手自书写梵本进奉大唐皇帝于 / 贞元十二年六月五日奉诏令长安崇福寺内译闍 / 宾三藏般若宣梵文沙门广济译语沙门圆照笔受 / 沙门智柔智通回纥沙门道弘鉴虚润文沙门道章 / 大通校勘证义太原崇福寺沙门澄观共道邃详定”。日期合公元796年7月13日。此经文的附记和收入《大正藏》（第10卷第848页中栏第25行—第849页上栏第8行）中的同类附记不一样。

三、经文。第2纸第5折面至第14纸第1折面，有首题和尾题。尾题：《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首题后有小说的译者署名：闍宾国三藏般若奉诏译。

从：“尔时普贤菩萨摩诃萨称叹如来胜力”

到：“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
见《大正藏》第10卷，第844页中栏第14行—第848页中栏第24行。

四、《四分律七佛略说戒偈》。第14纸第2—6折面，附有用小字解释的八个偈文集。据解释，偈是由下列诸佛说出来的：毗婆尸如来，尸弃如来，毗弃罗如来，拘留孙如来，拘那含牟尼如来，迦叶如来，释迦牟尼如来。此书名未见著录过。有首题和尾题，尾题下有个“竟”字。

从：“忍集第一道 佛说无为最 出家恼他人”到：“皆共成佛道”。

五、《大乘起信论立义分》，第15纸第1—4折面。根据文意此论包括：1.开头的偈和导语部分，见《大正藏》第32卷，第575页中栏第6—18行。2.从“立义分云”开头的此论的第二分，见《大正藏》第32卷，第575页下栏第19行—第576页上栏第1行。3.此论最后的偈，见《大正藏》第32卷，第583页中栏第15—16行。首题和尾题，尾题后是小字的作者署名：“马鸣菩萨造”，和译者署名：“梁天竺三藏真谛译”。尾题下面有个“竟”字。

六、题记（无标题），第16纸第1—3折面。用小字刻印，每行17—19字，写刻体，内容为：安亮等人伏愿报答王后的恩惠和已故父母的美德，以及期望弥陀佛对他们去世的母亲永远慈悲，特嘱托施印《普贤行愿品经》一百零八卷并像七十二幅。此外，延请僧众诵读四大部经，梁武帝文和忏悔文；延请祝寿僧诵读《法华经》、《大般若（经）》，还延请诠义法师设药师琉璃光七佛供养；惠照法师、西天禅师提点等行诸一师法事。往下祝愿国王全家幸福，王权昌盛，标明出版者和出版地点：“储协赞于千秋（今河南省浍池）”。

107 (原藏录号TK-243)

木刻本，经折装，折面 9.5×22.5 厘米，栏面 9.5×17.5 厘米，单栏，宋体字。有首题和尾题，尾题是《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首题后面有小字的译者署名：“大唐闍宾国三藏般若奉诏译”，金刊本（12世纪中期的）。此刊本现存版画和经文残片。

108 (原藏录号TK-72)

1161年版本，木刻本，经折装，全件，首尾有几处被弄破。共21纸，每纸4折面，第11纸和第21纸各3折面，另有1纸5折面版画。各纸沿栏线的粘接处有页码。折面 10×29 厘米，栏面 10×22 厘米，单栏，纸色灰，涩滞，厚 $0.16 - 0.18$ 毫米，每厘米7道帘纹，宋体字。此刊本包括版画、经文、后记和题记。

一、单独一纸的版画，5折面， 50×29 厘米，栏面 50×22 厘米，双栏。画中心是正面坐着的佛，上方榜题：“教主大毗卢遮那佛”。座前一像面向着佛，榜题：“善财童子”。左边站着穿皇族服装的少年，榜题：“威光太子”。佛上方左右有两组小佛，每组五身。边上是飞翔着的凤凰，乐器和天神。佛座两侧是菩萨的侧面像，菩萨身后两边各九身天神、梵王、天王和保护菩萨。

二、经文。第1纸（第1折面）至第20纸（第2折面第2行）。面5行，行13—16字，或两句七言诗。有首题和尾题，尾题：《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首题后有字小的译者署名：“闍宾国三藏般若奉诏译”。末尾一行经文后面有字小双行的刻工署名：“京市周家寺/僧雕字王善慧”。

三、《华严感通灵应传记》。后记，第20纸（第2折面第2行）至第21纸，包括正文和注释。正文报导了此经所带来的裨益，注释为字小双行，每行24字，有首题。

四、一张小纸条上的题记残片，1行：“大夏〔天盛〕□
（辛）已十三〔年〕……”，即1161年。

版画的第1折面与封皮相粘，封皮上有印着经名《□（大）
方广佛普贤行愿经》的黄色书签，围以4道绳纹形栏线。

此刊本背面粘着西夏文刊本和写本的纸页（当时的裱
褙）。

参考书目：弗鲁格《10至13世纪中国宋代书籍印刷史》第
75页；孟列夫《黑城发现的早期出版物》第144—145页；伯希
和《柯兹洛夫探察队在黑城所得汉文文书》第15号。

109 （原藏录号TK—73）

木刻本，经折装。1161年刊本的两个单页，面幅10×26.5厘
米，栏面10×22.5厘米。纸色黄，厚0.14—0.20毫米，无书题。

110 （原藏录号TK—61）

1189年的木刻本，经折装，全件保存极为完好。13纸，每
纸叠成5折面，第13纸3折面，各纸第1行前面增补了标明纸数
的页码，此刊本分以下部分：

一、经文第1纸前面是一纸3折面的版画。栏面41.5×23厘
米。画中一佛像，身边两菩萨，周围是诸神和弟子们。右边粘着
1189年4月2日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刊本版画的第1折面。

二、此著作的全文。第1纸第1折面至第12纸第2折面。折
面11×27.5厘米，栏面11×23.5厘米。面6行，行18字，或两句
七言诗。每纸30行。纸色淡黄灰，涩滞，厚0.19—0.20毫米，
每厘米7道帘纹。宋体字。有首题和尾题，首题右面是小字的
译者署名：“鬲宾国三藏般若奉诏译”，尾题后面是小字的编者署
名：“大（原文如此——译者注）原崇福寺沙门澄观校勘详定
译”。此著作的全文同收入《大正藏》（第10卷第844页中栏第14
行—第848页中栏第23行）中的经文相符。

三、标题为《华严感通灵应传记》的后记。第12纸第3折面至第13纸第2折面，正文夹有小字双行注释。

四、题记。第13纸第3折面，两行：“大夏乾祐二年岁次乙酉三月十五日/正宫 皇后罗氏谨施”。日期合公历1189年4月2日。

此书的各印本中有两套在栏幅、字行、版面的排列以及页码形式上各不相同的版本，分为甲种本和乙种本。

参考书目：孟列夫《黑城发现的早期出版物》第144—145页；弗鲁格《10至13世纪中国宋代书籍印刷史》第75页；伯希和《柯兹洛夫探察队在黑城所得汉文文书》第15—16页。

111 (原藏录号TK—160)

木刻本，1189年4月2日版本，甲种本，第9纸（第2—5折面）的残片，纸色褐灰。

112 (原藏录号TK—69)

木刻本，经折装，1189年4月2日版本，乙种本。折面11×27.5厘米，栏面11×23厘米。纸色黄，厚0.18—0.20毫米，每厘米8道帘纹。无书题，保存了经文片断、后记的末尾和题记。

113 (原藏录号TK—66)

木刻本，经折装，1189年4月2日版本，甲种本，一折面（第5纸第3折面）。

114 (原藏录号TK—67)

1189年4月2日版本的木刻本残片，甲种本（第5纸第2面）。

115 (原藏录号TK—68)

木刻本，经折装，1189年4月2日版本，甲种本。此刊本现存：

一、经文残片和尾题，其后为小字的编者署名：“太原崇

福寺沙门澄观校勘详定译。”

二、后记《华严感通灵应传记》前两折面。上封皮损坏严重，外面是蓝纸，粘在用被裁断的汉文刊本的书页糊成的硬纸板上。封皮里面粘着本书编号18的刊本版画的第1折面。

116 (原藏录号TK—64)

木刻本，经折装，1189年4月2日刊本。甲种本残片。

117 (原藏录号TK—65)

木刻本，经折装，1189年4月2日版本，甲种本。保存尚好。版画、后记结尾和题记阙佚。

118 (原藏录号TK—161)

木刻本，经折装，1189年4月2日版本，甲种本。尾部稍有损坏。经首、后记末尾和题记阙佚。

119 (原藏录号TK—71)

木刻本，经折装，1189年4月2日版本，甲种本。无书题，经文残，有后记末尾。背面糊着此书别种印本(封皮余幅)的纸块。

120 (原藏录号TK—62)

木刻本，经折装，1189年4月2日版本，甲种本。有首题，其下为小字的译者署名。经文残。有后记的正文，但无首尾。

121 (原藏录号TK—63)

木刻本，经折装，1189年4月2日版本，甲种本。全文保存较好，有后记和题记，经文中首题和尾题。首题下是译者署名，尾题后是编者署名。上封皮硬纸板由汉文和西夏文刊本的纸块粘成，下封皮糊着一张蓝纸。

122 (原藏录号TK—162)

木刻本，经折装，1189年4月2日版本，乙种本。现存：

一、版画。把不同印本的版画的单个折面粘在一起，包括：①本书编号133的版画的最后1折面；②同一个版画的西夏

文本的最后6折面；③同一个版画的汉文本的最后两折面；④此刊本版画的第1—2折面；⑤同一个版画的第2—3折面，这些版画的下端损坏严重。

二、第1纸第1折面至第5纸第5折面，经文，不到尾。页边间或标有朱点，有尾题，其下是小字的译者署名。此刊本背面糊着西夏文写本和汉文刊本的纸条（当时的裱褙）。

122a （原藏录号TK—320）

木刻本，经折装，1189年4月2日版本，甲种本。残片。

123 （原藏录号TK—98）

木刻本，经折装，1196年版本残件。各纸叠成9×21厘米的折面，1纸6折面；第1、2、6纸各5折面。面6行，行15字，或两句七言诗，文面9×16厘米。右边栏外或每段末的空白处有标明纸数的页码，有些页码前增补了“行愿”二字。纸色白，稍发黄，每厘米8道帘纹，厚0.11—0.17毫米。各纸的栏线一样，宋体字。此刊本保存了以下部分：

一、版画。第1至第6折面，双栏，栏面55×15.5厘米。有许多榜题。左上角有版画名：《行愿经变相》。前两折面是向左侧坐着的佛，榜题：“教主毗卢遮那佛”；左右各坐一菩萨，榜题：“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身后是天神（有八身），榜题：“天龙八部众”。佛座下方的右边有六身跪者像，榜题：“声闻众”、“梵王众”；佛座前站一男孩，榜题：“善财童子”；佛座左边有三身男像，榜题：“帝释众”；还有十身跪着的弟子像，榜题大概是：“弟子众”。版画第二部分（6折面）是此经的十个情节，榜题：“一礼敬诸佛”，“二称赞如来”，“三广修供养”，“四忏悔业障”，“六请转法轮”，“七请佛住世”，“五随喜功德”（补题：“随喜及涅槃/分布舍利善根”），“八常随佛学”（补题：“刺血

为墨/书写经典，示种种神通/处种种众生”）；“〔九恒顺众生〕”；“十普皆回向”（补题：“极重苦果/我皆代受”）。版画前有封皮，封皮硬纸板用木刻本的纸块粘成，外糊一张蓝纸。

（2）经文。第1纸第1折面至第8纸第1折面，有首题，其后在顶栏的两条竖线间有一行小字的译者署名：“罽宾国三藏般若奉诏译。”

从：“尔时普贤菩萨摩訶萨称叹如来胜功”到：“以诸最胜妙华鬘、妓乐涂香及伞盖”见《大正藏》第10卷，第844页中栏第14行—第847页上栏第10行。

（3）经文。第8纸第4折面至第10纸第3折面。从：“唯愿久住刹尘劫，利乐一切诸众生”到：“三世诸佛所称叹，如是最胜诸大愿”见《大正藏》第10卷，第847页上栏第23行—第848页上栏第7行。

（4）题记（末尾阙佚）。第12纸第1折面至第14纸第1折面，到题记结尾还有几折面不详。包括以下部分：第12纸第1—2折面，7行，《净涂一切业障如来陀罗尼咒》；第12纸第2—5折面，21行，未注出经名的引文，解释诵读这部陀罗尼会得到怎样的好处；第12纸第5折面至第14纸第1折面，现存52行题记正文，末尾阙佚。题记中说，刻印的此经称作《大方广花（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它帮助人们像毗卢一样登上脱离尘世的道路，像普贤一样找到主要的道路，摆脱苦孽，免除恶根。因此，皇太后罗氏在仁宗皇帝（1139—1193年）逝世三周年之际，为了他及早升天，为了“梦图”、“宝历”（祖先？）、军政官吏，皇室人员（玉叶金枝），兆民万姓幸福，祝愿他们得到尧时的荣誉，舜时的安乐，特命：各寺庙焚香三千三百五十遍；

设斋会十八次；起读大藏经三百二十八部，其中主要的经二百四十七套，其他经八十一部，各种小经五百五十四万八千一百七十八卷；度僧西番、番汉三千员；散斋僧三万五百九十员；放神幡一百七十一口；散施八塔成道像净除业障功德共七万七千二百七十六帧；番、汉《转女身经》，《仁王经》、《行愿经》共九万五千部；数珠一万六千八十八串；消演番、汉大乘经六十一部，大乘忏悔一千一百四十九遍；皇太后宫下应有私人尽皆舍放并作官人；散囚五十二次，设贫六十五次；放生羊七万七百七十九只；大赦一次（以下阙佚）。既然仁宗皇帝死于乾祐二十四年九月二十日（1193年10月16日），而此刊本印于他三周年忌辰，那就应该是天庆三年九月二十日（1196年10月8日）。

从此件和其他各件来看，整个刊本应由以下各部分组成：版画，第1—6折面；经文，第3—5纸、第7—10纸各6折面，第12、6和11纸各5折面，共64折面，385行；题记，第12—14纸，不少于8折面和43行。

有三种不同版的印本：甲种本（本件的印版）、乙种本和丙种本。三种版本在字体、段末小花饰、段末纸数的排列、正文的排版以及栏线边页码的标注方面均有不同。

参考书目：孟列夫《黑城发现的早期出版物》第145—146页；弗鲁格《10至13世纪中国宋代书籍印刷史》第75页。

124 （原藏录号TK—99）

木刻本，经折装，罗太后1196年10月8日版本，甲种本。经文首尾残缺，第3纸（第4折面残）至第10纸（第5折面）。

125 （原藏录号TK—100）

木刻本，经折装，罗太后1196年10月8日版本，乙种本。经文残，尾题：《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第9至12折面是题记。

从：“贞玉叶金枝并仙桂而郁翠兆民贺尧”到：“大乘忏悔一千一百四十九遍”。

126 (原藏录号TK—146)

木刻本，经折装。罗太后1196年10月8日版本，丙种本。经文残。无书题。

第13纸第3—4折面是题记的后面的部分。开列了施舍品。此刊本的印纸是一些不知名刊本的封皮，被裁成 19×9 厘米长条，大概是要适合于此书的开本。纸色浅黄灰，涩滞，厚 $0.12 - 0.15$ 毫米，每厘米7道帘纹。

127 (原藏录号TK—258)

1196年10月8日版本的第12纸第3折面，题记的第3折面。

从：“终不堕恶趣若为利益亡过者清净受”到：“尸上或坟冢上其彼亡者由宿业故设”

《佛说阿弥陀经》(128—132号)

128 (原藏录号TK—176)

木刻本，经折装的1折面，上端残缺， 11×23.5 厘米的残片。靠近经首的文字，面6行，行10字。文面高12厘米，单栏。经文上方是画着建筑物的版画（大概整个经文上方都有）绘制精巧，上端残缺。纸色褐灰，纸质光滑，厚 $0.10 - 0.11$ 毫米，宋体字。印文中有标点（汉文句号），无书题，宋版本（12世纪前30年的）。

129 (原藏录号TK—110)

木刻本，经折装，折面 7.5×18 厘米，栏面 7.5×15.5 厘米，单栏，面7行，行16字。纸色灰，稍涩，厚 $0.11 - 0.14$ 毫米，每厘米7道帘纹，宋体字（12世纪中期的）。从：“若四日若五日〔若〕□□□□〔日〕一心不乱”到：“而去”，残本，共12折面。尾

题后面有陀罗尼标题《无量寿佛说往生净土咒》和该陀罗尼的第1行，经文载《大正藏》第12卷，第348页中栏第1—2行。

此刊本折缝背面糊着纸条和纱布之类的布条，有的还用粗黄线缝缀起来（当时的修补）。

130 （原藏录号TK—109）

木刻本，经折装，折面 8.5×20.5 厘米，栏面 8.5×18 厘米，单栏，面6行，行15字。纸色灰，涩滞，厚0.11—0.14毫米，每厘米7道帘纹，宋体字，无书题（12世纪末的），残本。

131 （原藏录号TK—108）

木刻本，经折装，开头7折面的上半截，宋体字，有首题（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的）。

第2—7折面的背面，有手写的文章的结尾，议论的是长寿、财富和功名等问题。笔迹粗、潦草。

从：“上有神弓三张〔圣〕前九只（？）……”到：财禄官注……”

132 （原藏录号TK—111）

木刻本，经折装，折面 9×20.5 厘米，栏面 9×17 厘米，双栏，面6行，行15字。纸色灰，涩滞，厚0.14—0.19毫米，帘纹模糊，每厘米7道，宋体字，无书题（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的）。经文断片，背面有手写的汉文忏悔文。此刊本折缝背面糊着纸条，纸条上有时写着西夏文（当时的裱褙）。

《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133—143号）

133 （原藏录号TK—267）

经文内容的简述，以及祈祷皇帝、官吏和百姓安宁幸福的结尾。

写本，册页装，由4纸（8页）和最后一叠的3页（第3页

残)缝订而成,页边稍微磨损。页面 14×9 厘米,页5行,行10—12字。纸色浅褐,纸质柔软,厚0.09—0.11毫米,每厘米7道帘纹。楷书,笔迹粗,潦草,标有黑色小圆圈,无书题(11世纪末的)。正文后面有一行较清楚的字:“小石花心动”

从:“夜义捷达等。皆集至我佛”到:“上。愿众生。尽登彼岸”

134. (原藏录号TK—58)

1189年版本,木刻本,经折装,全件保存得较好。由以下部分组成:

一、版画。8折面,两纸,栏面 87.5×23.5 厘米,双栏,线条精致,描绘出很多细节,分为三部分。

1.第1—2折面,二十五位神(右边十一,左边十四)簇拥着坐佛,佛左前方跪着一弟子。右上角榜题:“释迦么祢佛于给孤独园/内与弥勒菩萨授记处,”弟子的上方榜题:“波离发问”。

2.第3—7折面,画一低台,佛端坐于中央,座前两舞女。两侧各四菩萨,往下是中国式回廊,上有忏悔者,每边五位。从佛座向四方飘散着表示吉祥的烟带,佛座下方的中央有一跪着的天王首领,他的两旁各一乐队,每队九身画像,其次各一组弟子,每组五身,还有两组天神,每组九身。低台前面的云彩中各有两身天神。低台下方有四侍从,中间两身,两角上两身。佛的上方榜题:“牢度大神额宝珠/中化四十九重宫/殿供养弥勒之处”;各组弟子的上方榜题:“声闻众”;每组天神上方榜题:“八部众”;右边一组天神的上方还榜题:“五百亿天子/奉施宝冠”;左边一组天神的身旁还榜题:“花德大神”、“花音大神”、“喜乐大神”、“正音大神”、“宝幢大神”;右边战神的上方榜题:“南方增长天王”、“东方持国天王”;左边的榜题:“西方广目天王”、“北方多闻天王”。

第3.第8折面，六幅德行图，榜题：“花香供养”、“深入正受”、“修诸功德”、“读诵经典”、“威仪不缺”、“扫塔涂地”。

(2) 经文。7纸，每纸叠成5折面。页码形式：“上一”；面6行，行18字。经文223行。有首题和尾题，首题后面是小字的译者署名：“宋居士沮渠京声译”，尾题后附录了两部陀罗尼：《慈氏真言》、《生内院真言》（第224—230行）。宋体字。

从：“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到：“大欢喜作礼而退”。见《大正藏》第14卷，第418页中栏第2行——第420页下栏第23行。

(3) 题记。2纸，一纸5折面，另一纸2折面。共36行，行18字（最后一折面无文字）。题记中有以下几部分：

1. 第1—10行，说明如何借助此经才能到达兜率内宫，应该如何援引经文并且诵读《弥勒尊佛心咒》和《弥勒尊佛名号三归依》。

2. 第11—36行，《施经发愿文》。题记本身谈了借助此经可获得怎样的裨益。为此，朕（即仁宗）谨于乾佑己酉二十年九月十五日（1189年10月26日）恭请宗律国师、净戒国师、大乘玄密国师、禅法师僧众等，就大度民寺作求生兜率内宫弥勒广大法会，烧结坛作广大供养，奉广大施食，并念佛诵咒，读西番、番、汉藏经及大乘经典，说法作大乘忏悔，散施番、汉《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一十万卷，汉《金刚经》、《普贤行愿经》、《观音经》等各五万卷，暨饭僧、救生、济贫、设因诸般法事凡七昼夜。所成功德，伏愿一祖（太祖，982—1003年）、四宗（太宋1004—1031年；景宗1032—1048年；毅宗1049—1067年；惠宗1069—1086年）证内宫之宝位；崇考（崇

宗，1087—1138年）、皇妣（曹氏，约1107—1164年）登兜率之莲台。最后两行低两个字，题为：“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悖陆懿恭皇帝谨施”。

纸色柠檬黄，版画纸加了石膏，涩滞，每厘米7道帘纹，厚0.13—0.16毫米。折面11×29.5厘米，文面11×23厘米。现存四种不同版的印本，此件的版本下称“甲种本”，其他版本下称“乙种本”、“丙种本”、“丁种本”。各种版本之间在字形上稍有差别，乙种本在正文排列和页码标注方面还有一些不同，参看本书编号138。

参考书目：孟列夫《黑城发现的早期出版物》；伊凤阁《西夏史上的一页》；沙畹译，伊凤阁著《西夏史上的一页》；弗鲁格《10至13世纪中国宋代书籍印刷史》第75页。

135 （原藏录号TK—81）

木刻本，经折装，仁宗皇帝1189年10月26日版本，丁种本。全件包括版画（两纸8折面）、带附录的经文（第1—7纸，各5折面）、题记（两纸，第1纸5折面，第2纸1折面）。各部分都和甲种本相同。版画第2纸右页边有雕刻师（？）的姓名“张知一”。

纸色柠檬黄，每厘米7道帘纹，厚0.12—0.15毫米，折面11×29.5厘米。有首题和尾题，首题之后是小字的译者署名。此刊本的下沿损坏严重，烂孔损及经文。书首是蓝纸封皮。

136 （原藏录号TK—83）

木刻本，经折装，仁宗皇帝1189年10月26日版本。丁种本。

137 （原藏录号TK—59）

木刻本，经折装，仁宗皇帝1189年版本，甲种本，版画残，经文和题记全，正文后面有附录。

138 (原藏录号TK—60)

木刻本，经折装，仁宗皇帝1189年10月26日版本，丙种本。与其他版本在字形上稍有差别，在经文和页码的编排上也有出入，页码形式：“上生经七”。经文全，有附录，第1纸第1折面至第7纸第5折面。题记，第1纸第1折面至第2纸第1折面。

139 (原藏录号TK—86)

木刻本，经折装，仁宗皇帝1189年10月26日版本，乙种本。经文断片，第1纸第4—5折面，无书题。

140 (原藏录号TK—84)

木刻本，经折装，仁宗皇帝1189年10月26日版本，丁种本。经文，第3纸1—5折面，无书题。

141 (原藏录号TK—82)

木刻本，经折装，仁宗皇帝1189年10月26日版本，丁种本。经文和附录、题记（第1纸第1折面至第2纸第1折面），经文残，题记的最后1折面缺下边的部分，有尾题。

142 (原藏录号TK—87)

木刻本，经折装，仁宗皇帝1189年10月26日版本，乙种本。经文，第5纸第2折面的下半截，面11×14.5厘米，无书题。

143 (原藏录号TK—85)

木刻本，经折装。仁宗皇帝1189年10月26日版本。丁种本。经文，第5纸第3折面。缺上边和右边，9×24.5厘米。无书题。

《佛说转女身经》（144—146号）

144 (原藏录号TK—12)

木刻本，包括此经的正文，经音注释（18行）和题记（80

行），其中说到了妇女转身成男子的可能性，援引了针对这种情况的咒语（陀罗尼）和祈祷文，以及解释这一问题的其他作品的引文。题记的结尾说，皇太后罗氏为纪念去世的仁宗皇帝（1139—1193年）特施印此经三万卷及其版画。此刊本被指定在百姓中间传播。末尾（最后两行）为施印日期：“天庆乙卯二年九月二十日 / 皇太后罗氏发愿谨施”（1195年10月24日）。

木刻本，经折装，经文每纸6折面，各纸右页边上有经名“转女身经”，常加上“张”或“么”字的纸号。面6行，正文行14字或三句五言诗，题记行15字。纸色浅黄灰，厚0.14—0.15厘米，每厘米8道帘纹。折面10×21.5厘米，文面10×16厘米，宋体字，有尾题。此刊本现存两部分：

（1）第1—13纸。第1纸缺前3折面，第9、5纸各5折面，共73折面。438行，经文：

从：“言世尊是净日所怀之女诸根具足”到：“为风寒冷热等分众病之所坏散恒”。见《大正藏》第14卷，第915页中栏第16行—第919页下栏第5行。

（2）第16—22纸。第21纸3折面，第22纸5折面，共38折面，218行（经120行，语音注释18行，题记78行，日期2行）。经文：

从：“我于此不转女身成男子者终不起”到：“皆大欢喜作礼奉行”。见《大正藏》第14卷，第920页中栏第9行—第921页下栏第3行。

根据现存的书编号145、146刊本来看，整个经有以下部分组成：版画、经文（105折面，630行）、语音注释（3折面，18行）、题记（14折面，80行）。

参考书目：关于刊本见伯希和《柯兹洛夫探察队在黑城所得汉文文书》第13—14号；弗鲁格《10至13世纪中国宋代书籍

印刷史》第75页；孟列夫《黑城发现的早期出版物》，第145—146页。

145. (原藏录号TK—13)

和本书编号144为同版的印本，共26折面，156行（第153—156行残，经78行，语音注释18行，题记60行），有尾题，题记到：“珠衣挫声闻直……”

146. (原藏录号TK—8)

和本书编号144是同版刊本，但显然是用另一种重新使用的雕版印出的。页码是缩略形式：“女身 五”或“女身经二么”。第1—20纸，第10纸5折面（不像其他各纸是6折面）。共119折面，714行（经630行，语音注释18行，题记66行），题记的最后差3折面14行（第21纸）。纸色淡黄，厚0.09—0.13。

（第10纸厚0.17）毫米，每厘米8道帘纹。有首题和尾题，首题后面是译者署名：“宋闍宾三藏昙摩蜜多译”。经文前有版画，栏面 58.5×16 厘米，双栏，纸幅 59×21.5 厘米，叠成6折面。版画分两部分，前两折面画的是正在说法的佛，由诸神、菩萨和弟子们簇拥着，榜题：“教主释迦牟尼佛”、“天龙八部众”、“诸菩萨众”、“诸大声闻众”、“阿泥卢豆”、“净日夫人”、“四部弟子众”。第二部分（第3—6折面）画的是经中的情节，榜题：“佛在耆闍崛山说经处”；“诸居士妇施佛璎珞/化成宝台佛会之处”；“诸居士妇转女/成男出家之处”；“诸居士救请出家处”；“菩萨在母胎/中向佛听法；无垢光女劝母发/心以宝盖奉母处”；“无垢光女/请问法要”；“阿泥卢豆/问佛之处”；“从母石胁/忽然化生”；“天帝施衣/不受之处/他方佛与无垢/光女衣服璎珞”；“东南方净住世/界无垢称王佛”；“得闻此经/信解欢喜”；“供养父母师长处”；“怀子在身生/□〔受〕大苦痛”；“女人

为他所使捣/药春米若熬若磨”；“厌离女身供养佛菩萨处”。左下角有整个版画的名称：“佛说转女/身经变相”。题记到“仁宗之厚德仰凭法力以荐资遂于”为止。经文见《大正藏》第14卷，第915页中栏第1行—第921页下栏第3行。

《金光明最胜王经》（147号）

147 （原藏录号TΦ—6808）《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一，《序品第一》、《如来寿量品第二》

同一个写本卷子的六件残片，原纸一叠为四，被裁成23.5×25厘米的4小页，背面写有西夏文。正面13—15行，行17字，或四句五言诗。界格细，天头高2.5厘米，地脚高3厘米。楷书。纸色黄，光滑，厚0.11—0.13毫米，每厘米4道帘纹，每隔6厘米有道横纹（10—11世纪的）。经文同《大正藏》中的一样。

《大乘圣无量寿决定光明王如来陀罗尼经》（148—152号）

148 （原藏录号TK—76）《佛说大乘圣无量寿决定光明王如来陀罗尼经》

木刻本，经折装，此印本保存完好。折面9×20.5厘米，文面9×15厘米。面7行，行14字，或两句七言诗。单栏。纸色浅黄灰，结实，涩滞，厚0.12—0.17毫米，每厘米7道帘纹。此刊本由两部分组成（11世纪中期的）。

（1）版画。1纸，两折面，栏面17×14.5厘米。一佛侧坐，画像粗糙，左右两僧人，佛前跪着一弟子。

（2）经文。5纸，每纸5折面，共25折面，172行。写刻体。有首题，其后小字为：“西天印度摩伽陀国那烂陀寺传教大师三藏赐紫沙门臣法天奉 诏译”，尾题：“佛说大乘圣无量寿王经”。

从：“如是我闻一时世尊在舍卫国祇树”到：“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见《大正藏》第19卷，第85页上栏第5行—第86页下栏第11行。

末尾有一圆形红印，直径8.5厘米。13行印度婆罗迷文，中间有高4厘米的塔影。

149 （原藏录号TK—21）

木刻本，经折装，5纸共210行，双栏，纸色浅黄灰，宋体字，此刊本分为三部分：

（1）经文前有版画。佛座上有一种不认识的符号：“𑖀、𑖁、𑖂”。经首，有首题，其后小字为：“西天中印度摩伽陀国那烂陀寺传教大师三藏/赐紫沙门臣法天奉 诏译𑖃”。

经尾。尾题：“佛说大乘圣无量寿王经”

（2）《佛说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经文前有版画，有首题。

（3）题记。包括下列部分：祈祷诗式的发愿文（第1—10行）；《功德山陀罗尼》（第11—15行）；《大集经》的引文（第16—24行）；用行书体写的题记本身，其中说了刻印此经所带来的好处和此刊本的施印情况。最后5行是施印日期和施主、刻工、版画雕刻师及书写者的姓名：“时皇建元年十一月初五日众/圣普化寺连批张盖副使沙/门李智宝 谨施 / 西天智 圆刁 / 索智深书”。题记中的日期合公历1210年11月22日。第8折面上有一4.5×2厘米的红印，有3行字体奇特的印文。

参考书目：弗鲁格《10至13世纪中国宋代书籍印刷史》第76页。

150 （原藏录号TK—22）

木刻本，经折装，和本书编号149是同一种雕版的印本，

使用同样的纸。第1纸第5折面（第4行）至第2纸第7折面，开本同上，无书题。

151 （原藏录号TK—23）

和本书编号149是同一种雕版的印本，使用同一种纸。无书题。第2纸第1—7折面，开本同上。

152 （原藏录号TK—24）

和本书编号149是同一种雕版的印本。折缝处粘有一条较结实的纸，此外，又用另一张纸对全纸作了修补（当时的裱褙）。无书题，残片，共6折面。

《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卷第十（153号）

153 （原藏录号A20, B y）《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卷第十

一个写本的三件残片，被裁作裱褙用的小块，经折装。原先的折面 14×20.5 厘米，文面 14×18.5 厘米，单栏，面8行，行18字。楷体，近似行书，有改写处。纸色浅黄灰，纸质柔软，厚 $0.06—0.07$ 毫米，每厘米6道帘纹（14世纪中期的）。折面页边上第16和17行之间有用尖木笔写的两行治病处方（药方）：

“刀步药 薤 杏树皮 大灰 任五月初五·合 / 泻痢药 长尾蛆 温调下”。

此写本的小纸块被用来裱糊本书编号190的刊本。

《佛母大孔雀明王经》（154号）

154 （原藏录号TK—306）〔《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卷下〕

木刻本，经折装， 10×21 厘米的残片。1折面，缺下边。5残

行，宋体字，有小字双行的语音夹注。从外型看，这是12世纪末（1189年？）的版本。经文同《大正藏》第19卷，第436页上栏第13—18行。

《圣六字增寿大明陀罗尼经》（155号）

155 （原藏录号TK—135）《圣六字增寿大明陀罗尼经》

本刻本，卷子装，145×20厘米，3纸，卷端沿页边损坏。纸色白，光滑，每厘米8道帘纹，每隔4.5厘米有道竖纹，厚0.08—0.11毫米。页码在每纸的第一段末。每纸30行，行11字，共70行。文面133×16厘米，左页边宽12厘米，双栏，宋体字，有首题和尾题，首题后有两行小字的译者署名：“西天译经三藏朝散大夫试鸿胪/卿传法大师臣 施护奉 诏译”。

从：“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到：“信受奉行”。见《大日本校订大藏经》第27帙，第8册，第53页上栏——下栏。

尾题后面的最后5行是题记，刻印粗劣，因此给人的印象题记与正文不同，是由另外的版印出的。题记全文为：“右愿印施此经六百余卷资荐/亡灵父母及法界有情同往/净方/岁大夏天庆七年七月十五日/袁子仇彦忠等谨施”。题记中的日期合公历1200年8月26日。此刊本大概应叠成经折装，但由于某种原因而未做。

西夏文译本见З·И·戈尔芭切娃、Е·И·克恰诺夫编：《西夏文写本和刊本》第77号。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圆满无障碍大悲心陀罗尼(经)》
(156号)

156 （原藏录号TK—123）《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障碍大悲心陀罗尼》

木刻本，经折装，《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中的陀罗尼（见《大正藏》第20卷，第1060号），刊本第四纸的两折面（第1—2折面）。大概是某部经（可能是《妙法莲华经》卷第七《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第二十五》）刊本的附录。陀罗尼的开头，有对陀罗尼的小字双行夹注。

从：“〔南无〕喝罗怛那 哆罗夜耶”此是观世音菩萨本
身大须慈悲用心念到：
“此是龙树菩萨本身大须用
心诵勿失菩萨性意十婆卢吉帝室佛罗楞”。见《大日本校订大藏经》第27帙，第10册第32页下栏第13—15行，《大正藏》中无注释。

纸色灰，每厘米7道帘纹，厚0.10—0.14厘米，折面 9.5×25 厘米，文面 9.5×21.5 厘米，面5行，正文行16字，注释行25字，共10行，写刻体，有首题。各折面的内上角全损坏，第4—7行的上两字阙佚（1189年的御览本类型）。

《佛说普遍光明焰鬘清净炽盛思惟如意宝印心无能胜总持大明王大随求陀罗尼经》（157—158号）

157（原藏录号TK—103）〔上名作品的陀罗尼〕

木刻本，经折装，无首尾，折面 7×13 厘米，文面 7×10 厘米，面5行，行12—13字。纸色浅灰，近似灰白，厚0.07—0.09毫米，字型小，宋体字。有小字双行语音夹注。第11纸第5—7折面（13世纪初的）。陀罗尼名称：《一切如来灌顶陀罗尼》；《一切如来结界陀罗尼》；《一切如来心中心陀罗尼》。同《大日本校订大藏经》第25帙，第9册，第75页上栏第12—16行。

158（原藏录号TK—107）

木刻本，经折装，和本书编号157是同一种刊本。折面 7×15.5 。

厘米,栏面 7×10 厘米,面5行,行13字纸。被染成黄色,厚0.09—0.11毫米,字型小,宋体字。正文中标有印刷的小黑圆圈,间或有手标的小红圆圈。有首题,其后是小字的译者署名:“唐开元三朝灌顶国师和尚特进试鸿胪卿开/府仪同三司肃国公食邑三千户实封三百/户增司空谥大辨正大广智大兴善寺三藏/沙门不空奉诏译”(13世纪初的)。

参考书目:弗鲁格《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藏汉文古佛教写本简明目录》第91号。

《圣妙吉祥真实名经》(159号)

159((原藏录号TK—184))《〔圣妙吉祥〕真实名〔经〕》
木刻本,蝴蝶装,页面 22×16.5 厘米,栏面 19×13.5 厘米,单栏。页码在白口上,页码上方有经名简称:《真实名》。面7行,行13—14字,或两句七言诗。纸色白,柔软,厚0.08—0.10毫米,每厘米7道帘纹。字小,没有粗笔,印刷不清晰,无书题,元刊本(14世纪上半期的)。经文同《大日本校订大藏经》第27帙,第13册第53页下栏—58页上栏中所载相同。

西夏文译本见弗鲁格《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藏汉文古佛教写本简明目录》第63号。

《佛名经》(160—164号)

160(原藏录号TK—245)《佛说三十五佛名经》

经文出自《大宝积经》卷第九十《优波离会第二十四》,标题是另加上的。

木刻本,经折装,折面 8.5×18.5 厘米,栏面 8.5×15 厘米,单栏。面5行,行10—12字,或两句七言诗,或两句五言诗。纸色褐灰,涩滞,厚0.10—0.12毫米,每厘米8道帘纹,写刻体,有首题

和尾题。首题后面是双行小字：“出大宝积经〔优〕/波离会第二十四”，其后有小字的译者署名：“大唐三藏菩提流志奉诏□”（11世纪末的）。经文同《大正藏》第11卷中所载相同。本书编号64大概就是此刊本或此类刊本的一部分。刊本折缝背面糊着有手写的西夏文和图画的纸条（当时的裱褙）。

161（原藏录号TK—140）

木刻本，经折装，粘接处有页码，宋体字（12世纪下半期的）。保存最后的1折面版画，榜题：“长者居士”。经文有首题，首题下面是双行小字：“出大宝积经优波/离会第二十四”，首题后面有小字：“大唐三藏菩提流志奉诏译”。佛名在有装饰图案的栏内，栏的下方每一佛名下一朵莲花，佛名之间是香雾，上方是佛像，每身佛象的姿势隔五身一重复。经文见《大正藏》第11卷，第515页下栏第18行—第516页上栏第18行。

参考书目：M·И·沃罗比耶娃——捷霞托夫斯卡娅、И·Т·佐格拉夫、А·С·马尔提诺夫、孟列夫、Б·П·斯米尔诺夫：《亚洲民族研究所敦煌特藏汉文写本叙录》第2辑，第1212号（开头一部分除外）。

162（原藏录号TK—304）

此经的一个不著名刊本的序言，谈到了诵读此经的好处。

木刻本的1折面，11×29厘米，栏面11×25厘米。单栏，经文的一部分，首尾残缺。5行，行13字，宋体字。纸色浅黄灰，涩滞，厚0.10—0.12毫米，每厘米6道帘纹，无书题。根据开本和样式看，像1189年的御览本。

从：“安风雨依时五谷丰熟花果茂盛”到：“念三十五佛而为上首及与佛刹”

163（原藏录号TK—70）〔《佛名经》〕

同收入《大正藏》中的经文不相符的佛名经，有对须弥灯

王佛的称呼语。

写本，3折面，前两折面缺上面的三分之一。折面 10×22 厘米，栏面 9×19.5 厘米。面6行，行14—16字。纸色黄，光滑，厚0.11—0.15毫米，界格和栏线为红色，楷书，间或有黑色标记，无书题（11世纪的）。

从：“……南无净光秘密佛法藏”到：“毒害那摩大明观世音观明观世音”

第3折面的背面有使劲被擦过的6行回鹘文。此写本的折缝糊着纸条、布条并用线缝起来（当时的修补）。

164（原藏录号TK—296）

用作封皮硬纸板的佛教写本和刊本残片，纸色浅褐，光滑。厚0.05—0.06毫米，每厘米7道帘纹（12世纪末的）。在为数不多的小纸块中有两块较大：

一、〔《佛名经》〕， 8×18 厘米的残片，缺下端和首尾，写本，4残行。

从：“〔南无弥〕□〔佛南〕无释迦牟尼□”到：“南无水瓶〔佛南无〕……”

二、〔未考定出的律〕， 8×18 厘米的残片，中间的一块，4残行，有朱点。

从：“……从今以……誓当……”到：“〔难·某甲寺·誓不〕……”

论 部

《般若灯论释》（165号）

165（原藏录号TK—276）《般若灯论释》卷第十四，〔《观圣帝品第二十四》〕

木刻本，卷子的一部分，无首尾，面 41.5×27 厘米。1残纸，卷

首有小字的页码：“般若灯论释十四”。22残行，单栏，宋体字。纸色黄，厚0.11—0.13毫米，宋版本，1132年(?)的。经文和《大正藏》第30卷第126页中栏第7行——下栏第1行相同。

参考书目：弗鲁格《10至13世纪中国宋代书籍印刷史》第72—73页。

《瑜伽师地论》(166号)

166(原藏录号TK—253)《瑜伽师地论》卷第三十二

木刻本的1页，蝴蝶装，下端残缺。现存部分33×20.5厘米。栏线是一条粗边，右端有小字的论名和卷数，下面大概有页码。6残行，字大，宋体字。纸色灰，涩滞，每厘米10道帘纹，每相隔4和1厘米有道横纹。宋版本(11世纪末的)。经文和《大正藏》第30卷第460页下栏第4—13行相同，背面有手写的大字：“大西”，“香附子”(习字)。

《释摩诃衍论》(167—170号)

167(原藏录号TK—77)《释摩诃衍论卷第二》

写本，册页装，不到尾，现存6叠，用本色的粗线缝在一起。第一至第四叠各16页，第五叠28页，第6叠33页，第六叠的尾部阙佚，最后4页严重损坏，共125页(4页残)。纸色淡黄，厚0.07—0.11毫米，每厘米7道帘纹。面幅11×20.5厘米。一面有正文，轮流写在正面和反面。天头和外页边均2厘米，地脚高1厘米。面7行，行16—21字，楷体，有些地方变成行书。有删改处，句后有朱砂标的大小圆圈，有首题，其后为作者和译者署名：“龙树菩萨造姚秦〔三藏筏摩〕多奉诏译“(译者的名字漏一字，应是“筏提摩多”)(14世纪中期的)。经文和《大正藏》第32卷第602页上栏第15行——第613页中栏第22行

相同

和本书编号168、169、170是同一个写本的一部分，和本书编号209、210写本的用纸一样，笔体也相似。

168 (原藏录号A 38 I)

卷第三，写本，册页装，全文。用黄粗线缝在一起的四叠：第一叠9个双页，第二叠9个双页，第三叠10个双页，第四叠11个双页，末尾从里面还粘着写满了习字的1页。面幅13.5×21厘米，栏面13×19.5厘米，单栏。相邻两面的外边未裁开。面8行，行18—20字，或两句五言诗。楷书，有修改处。纸色灰，小型纸，厚0.06—0.07毫米，每厘米7道帘纹，每轮流相隔1和4厘米有道竖纹。硬纸封皮，里层裱着一张薄纸，上写草书的西夏文。有外题、首题和尾题，首题后面是小字的作者和译者署名：“龙树菩萨造姚秦三藏筏提摩多奉诏译”（14世纪中期的）。经文和《大正藏》第32卷第613页下栏第4行——第622页下栏第22行相同。

169 (原藏录号A 38 II)

卷第五。写本，册页装，全文。用浅黄灰粗线缝在一起的两叠，第一叠22双页，第二叠18双页，从后面裁掉了多余的大概是空白的11面，共69面。面8行，行16—19字，或四句五言诗。面幅14×21.5厘米，文面12.5×20厘米。楷书，有很多修改处，错处被挖去个洞，然后糊上一块纸，重新写上正文。纸色淡黄，柔软，厚0.06—0.07厘米，每厘米7道帘纹，每隔1—3、5—3、5—1厘米有道模糊的竖纹。第1面上有外题，右起共4行：“与马鸣菩萨造起信论/龙树菩萨造于十论总标百本经文虽十诃经该一代义包五教/利钝千门等海内于百川/尚面金龙进宝”。第2面未写字。第3—65面是正文，有首题和尾题。首题后面是作者和译者署名：“龙树菩萨造姚秦三藏筏提摩多奉诏译”（14世纪中期

的)。经文和《大正藏》第32卷第632页中栏第4行——第639页下栏第7行相同。

第66—69面的外下角严重损坏，是《大乘百法门论》的全文。有首题和尾题，首题的右边有重复的首题，被画上栏线。其下有小字的小标题：“本事分中略略名数”。后面是小字的作者和译者署名：“天亲菩萨造 唐三藏法师释玄奘译”。尾题后面勾掉了添写上的字：“李腰子文字”（抄写者的姓名）。经文和《大日本校订大藏经》第18帙第10册第12页上栏第6—19行相同。

参考书目：弗鲁格《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藏汉文古佛教写本简明目录》第61号。

170（原藏录号TK—78）

卷第八，写本。册页装。卷首。现存两叠，带着一小截缝纸页的粗线。第一叠19页（第1面大概有外题，已阙佚）。第2叠16页，共35页。整个写本的外边损坏，并且损失了第一行文字，最后的5页缺靠外边的上半截。纸色淡黄，厚0.07—0.11毫米，每厘米7道帘纹。面幅11×20.5厘米。楷书，有修改处，无书题。现仅存应写在首题后面的作者和译者署名（14世纪中期的）。经文和《大正藏》第32卷第652页中栏第21行——第656页中栏第21行相同。

未考定出的作品

未考定出的作品（171—174号）

171（原藏录号TK—307）〔未考定出的经〕

关于向佛献花的故事，木刻本。5×20厘米的残片。纸页中间的一块。3残行，宋体字。纸色黄，涩滞，厚0.16—0.19毫米（12世纪中期的）。

背面糊着小纸块（当时的裱褙）

172 (原藏录号TK—310) [未考定出的经]

关于对“恶贪”，“天中恶贪”概念的解释。

写本，卷子的一部分，24×25厘米，首尾残缺，1残纸。15行，行17字，最后一行残。界格精致，天头和地脚各高3厘米。字体熟练，楷书。纸色暗黄，纸质光滑，厚0.15—0.17毫米，每厘米5道帘纹，无书题（8世纪中期的）。

从：“〔少物施得物更〕多或得十倍或得八倍如是”
到：“□〔如〕不生怖□□是……”

背面有手写的西夏文《佛名经》经文。从背面粘了一页，又粘了从同一个写本上剪下的一页，大小相同，有西夏文。原来的用蓝皮蒙面的硬纸板封皮上有西夏文书签：“𐽀𐽂𐽄𐽆𐽎𐽐𐽈𐽊𐽌”，后来被加贴了一层灰布，硬纸板上加贴了一块纸（当时的修补）。

173 (原藏录号Φ—214) [未考定出的经类著作]

残片，157×23厘米，写本。卷子的一部分，缺首。3纸，80行，行18字。此著作包括祈求多闻天王的陀罗尼。纸色白，纸质纤细，柔软，厚0.07—0.09毫米，每厘米8道帘纹。楷书，有些地方是行书。最后一行为题记：“天庆丙辰三年十二月廿五日写勘了”。日期合公历1197年1月16日（西夏皇帝桓宗的在位年代），无书题。

从：“此咒三遍或七遍天王〔？〕……”到：“非法则证甚深殊胜之功。此亲诵仪已竟”

参考书目：《亚州民族研究所敦煌特藏汉文写本叙录》，第1辑，第903号。

174 (原藏录号TK—251)〔未考定出的论〕

解释“四大”概念和它们两种表现(“内”、“外”)的文字,正文中有《宝积经》的引文。

木刻本,两折面,大概是裁短作封皮硬纸板用的,折面 9.5×20.5 厘米,文面 9.5×16.5 厘米,双栏。面6行,行15字,宋体字,第6—7行在好像装饰图条的栏内印成阴文。天头高3.5厘米。纸色浅黄,涩滞,厚0.12—0.14毫米,每厘米8道帘纹,无书题(12世纪上半期的)。

从:“皆名尘者垧〔净心识故经〕□□〔说〕□□”到:
“等水界二者身内润性泪汗等身外润”

未收入经典中的佛教著作

《夹颂心经》(175—176号)

175 (原藏录号TK—158)《夹颂心经一卷》

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每句经文后面标以“颂曰”,之后再再用八句押韵诗对该句作出通俗解释。此经名未被著录过。

木刻本,经折装。折面 8×17.5 厘米,文面 8×13.5 厘米,单栏。面5行,行13—15字,或两句五言诗。刻印粗糙,写刻体。纸色灰,微淡黄,涩滞,厚0.12—0.13毫米,每厘米7道竖帘纹。各纸的后页边有页码,每纸(最后一纸除外)有6折面。此刊本保存了以下部分:

一、正文。第2纸第1折面至第8纸第1折面,缺首。第2纸第1折面无右上角。前两行的上半截阙佚。第2纸第6折面缺第2—5行的上半截。其余各纸破坏不严重,几乎均未损及经文。共37折面,182行。有尾题。

从:“……〔不〕□□〔行〕□”到:“般若波罗蜜 万

代古今常”

经文同《大正藏》第8卷第848页下栏第2—19行相符。

二、题记。1纸两折面，面5—6行，行12—14字，共11行。题记中说，施者盛闻般若多心经非常灵验，特捐款雕版刻印此经，使我去世的父母离苦得乐，使弥勒的圣容照耀他们，使所有省识者都能从此经中得到益处。最后一行是日期和施主姓名：“天〔赐〕□（礼）盛国庆五年岁次癸丑八月壬申朔 陆文政施（根据年号合公历1075年。但根据干支是1073年9月5日）。”

参考书目：孟列夫著《黑城发现的早期出版物》，载《亚州民族研究所简报》第7期，1961年，第147页；戴密微译：《黑城发现的早期出版物》载《通报》第51卷，第4—5期，1964年，第451页。

176（原藏录号TK—159）

木刻本，经折装，1073年9月5日版本。折面 8×13.5 厘米，文面 8×13.5 厘米。此刊本现存以下部分：

一、简要的序言，包括下列陀罗尼：《净口业真言》；《安土地真言》；《普供养真言》，第1纸第1—2折面。序言前面有首题。

二、正文，第1纸第3折面至第7纸第3折面。正文前有经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和小标题：“达磨大师三十七颂”，“颂曰”。

从：“智慧清净海 理密义幽深”到：“能除一切苦 真实不虚 颂曰”。经文同《大正藏》第8卷第848页下栏第1—16行相符。

此刊本十分破旧，损坏严重。折缝背面多处糊有小纸条（当时的裱褙）。

新译经文

《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胜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录》（177、178号）

177 （原藏录号TK—164）《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胜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录》

木刻本，蝴蝶装。页面 17.5×13.5 厘米，栏面 15.5×9 厘米。单栏，左右双栏。页码在白口上。面9行，行14—15字，或两句七言诗。纸色白，略带淡黄，厚 $0.12—0.14$ 毫米，每厘米6道帘纹。字小，写刻体。第1面和最后1面的背面糊着灰粗纸（封皮的余幅），粘接处的下方有两个大字兰查体梵文：“𑖀𑖡𑖛”。各页的下角严重损坏，多处磨破，从第14页到末尾有页码。各页的两边也被磨坏，最后两面沿边的两行都已损坏。此刊本由以下部分组成：

一、三幅版画。每幅单独一页，栏面 15×9 厘米，双栏。第一幅上是侧面坐着的佛，佛侧各两天神，宝座上有个符号：𑖀𑖡𑖛，左边八尊跪着的梵王。第二幅上是华盖下的八手十二面观自在正面像，其上方有两个跪着的侍从，宝座上有符号：𑖀𑖡𑖛，左面坐两人，身后两仆从，一掌伞，一持礼品。第三幅上也是同样的观自在像，无华盖，宝座上有符号：𑖀𑖡𑖛。左边四个人坐着。最后一幅比前两幅画得精致。

二、上名第一部作品，第1—10页。有首题和尾题，首题前面有梵文标题的译音：“摩诃引葛浪祢葛 捺没 阿□□/阿鞞浪鸡帝说冷 捺冷祢 阿？六？〔蟾〕□（萨/萨号 怛须引得罗合怛三？哩□□（号怛）”。首题后面有很小的译者署名：“诠教法师番汉三学院兼偏袒提点𑖀卧郎沙门鲜卑/宝源

奉 敕译”，和口传此经者的署名：“天竺大般弥怛五明显密国师在家功德司正嚷乃将沙门撈/也阿难捺 传”。名字后面是祈祷或呼语：“敬礼圣大悲心观自在”。白口上有经名简称“大悲”。

从：“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波怛？山圣观自”到：“知受持大悲咒者所获福报不可思议”

三、上名第二部作品，第11—17页。有首题和尾题，首题前面有梵文标题的音译：“乌实祢舍觅撈夜 捺摩〔捺〕罗祢〔阿〕/?六?蟾萨号怛 须引得罗_引合怛三〔?哩号怛〕”首题后面有译者及其口传者的署名（同第一部作品）。名字后面是祈祷或呼语：“敬礼一切如来”。白口上有经名简称“尊胜”。

从：“如是我闻一时世尊有三十三天诸天会”到：“子演说妙法授菩提记”

四、《御制/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并胜相顶尊/总持后序发愿文》。仁宗皇帝（1139—1193）写的后序发愿文第18—21页。白口上标明“后序”。发愿文中说，朕认为神能教育和使众生走上正路，消除罪孽进入净土。由兹遂命刻印此经番、汉一万五千卷，并施全国官员百姓。命令召集法界诵读此经，使朕去世的父亲崇宗皇帝（1087—1138年）早日安息，使他的子孙永保社稷，兴旺昌盛。最后的残片上有仁宗的整个尊号：“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去邪悖睦懿恭皇帝……”。刻印日期阙佚。大概不早于崇宗去世三周年（1141年），不晚于曹皇后去世三周年，在1167年的题记中提到她已去世三周年（参见本书编号182）。崇宗的上述尊号是1141年从金国得到的，这个日期是最可能的刻印日期。

西夏文译本见З. И. 戈尔芭切娃、Е. И. 克恰诺夫编，《西夏文写本和刊本》，莫斯科，第83号1963年。

178 (原藏录号TK—165)

木刻本，蝴蝶装。页面 17.5×13 厘米，栏面 15.5×9 厘米。仁宗皇帝(1139—1193年)为纪念去世的崇宗(1086—1138年)约在1141年刻印的刊本。此刊本现存：第一部经的经文，有尾题；第二部经的全文，《御制 / 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并胜相顶尊 / 总持后序发愿文》，仁宗皇帝的后序发愿文，结尾阙佚。从开头到“枕之安九有获覆盂之固祝〔庆〕□”

《佛说圣大乘三归依经》(179—181号)

179 (原藏录号TK—121)

木刻本，卷子装。此刊本显然原作经折装，但本件未叠成折子(请比较本书编号180)。经文中可能包含疑经，因此，这个经名不见于文献书目中。经文和题记全。

4纸，前3纸纸幅 57×21.5 厘米，文面 57×16 厘米，每纸30行。第4纸 29.5×21.5 厘米，文面12行，共102行，行12字。仅第3纸后空白处有页码，宋体字。纸色褐灰，涩滞，每厘米7道帘纹，厚0.11—0.13毫米。

一、经文。62行，有首题和尾题。首题后两行：1.小字：“兰山智昭国师沙门 德慧 奉诏译。”2.更小的字：“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 皇帝详定”。之后有一行诵读此经前念的祈祷式呼语：“敬礼最上三宝”。尾题后面有个“竟”字。

从：“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到：“奉行”

二、题记。40行，在题记中仁宗皇帝自称朕，他说了佛教教理的优点和自己使众生都皈依佛门的愿望，表达了他对这部经的敬重，颂扬此经能指明觉道，帮助众生远离轮回和超脱生

死之界。仁宗皇帝希望各级僧众都焚香诵读此经，并下令作广大供养，放生赦囚，饭僧济贫。还下令刻印此经番、汉文五万一千余卷和同样多的彩画，散施数珠五万一千余串，使臣吏僧民每日诵持供养。往下祝愿皇基永固，宝运弥昌，崇考（即崇宗，1087—1038年）、皇妣（即曹氏，约1107—1164年）“祈早往于净方，中宫永保于寿龄，圣嗣长增于福履，满朝臣庶共沐慈航”。最后4行是：“白高大夏国乾祐十五年岁/甲辰九月十五日/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 皇帝施”。日期合公历1184年12月20日。

根据同版的另一件刊本判断，此刊本应被叠成经折装，共21折面，面5行（第1—3纸均6折面，第4纸3折面）。

此经有不同的版本：甲种本（此件）和乙种本。两者的差别在页码上，字体也稍有不同。

参考书目：关于译者见弗鲁格《10至13世纪中国宋代书籍印刷史》，第76—77页；关于皇帝尊号见伊凤阁《西夏史上的一页》，载《皇家科学院通报》，1911年第5卷第836页；沙畹译伊凤阁著《西夏史上的一页》，载《通报》第12卷，1911年，第447页；伯希和《柯兹洛夫探察队在黑城所得汉文文书》第1号。

西夏文译本见З·И·戈尔芭切娃，Е·И·克恰诺夫编，《西夏文写本和刊本》第1号。

180 （原藏录号TK—122）

木刻本，经折装，仁宗皇帝1184年10月20日版本，残件。经文和题记开头。第1纸第1折面至第3纸第6折面，乙种本。经文中朱点，有首题和尾题，首题之后的两行标出译者姓名，并指出此经由皇帝施印。

181 （原藏录号TK—311）

木刻本残片，5.5×7厘米，一纸的中间部分，3残行，宋体字，无书题（1184年10月20日的）。

《佛说圣佛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182号）

182 （原藏录号TK—128）《佛说圣佛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木刻本，经折装。全件，包括版画、经文、附录和后序发愿文。此经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不著名译本。未见著录过。

4纸，另有1纸版画，版画折成两面。第1—3纸各5折面，第4纸4折面，除版画外整个刊本共19折面，折面11×22厘米，文面11×16.5厘米，右页边和各段后有页码。面8行，行16字，共126行。单栏。纸色灰，光滑，每厘米7道帘纹，厚0.10—0.14毫米。宋体字。

一、版画。1纸两折面，栏面22×16厘米，双栏。中央莲座上一佛母正面像，着盛装，戴华丽头饰，头部上方榜题：“一切如来般若佛母众会”。周围三十七身妇女像，分三组：下面一组十位短发妇女着素装，最上面的八位妇女的衣服上有装饰品，戴高高的圆锥形帽子，中间的十九位妇女着素装，梳塔形发式。所有画像都有顶光，手结印契。

二、经文。第1纸第1折面至第2纸第1折面，共6折面，43行。有首题和尾题，首题前面有两行梵文名称的汉文译音：“梵云啊冷拽 末遏鞞帝 不罗嘿钵罗/弥怛 纥哩捺也 须得罗”。往下在“此云”两字后是首题，首题后面是小字的译者署名：

“兰山觉行国师沙门德慧奉 敕译”，还用更小的字标出审定者的尊号：“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 详定”。此后是祈祷式呼语：“敬礼般若佛母”和经文。从：“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祇舍崛山与大比丘”到：“奉行”

三、《持诵圣佛母般若多心经要门》。第2纸第2折面至第3纸第5折面，共9折面，55行。有首题和尾题，首题后面是小字的译者署名，和上经中的相同，最后三字是“救传译”，施主尊号和祈祷式呼语也和上经中的相同，尾题后面有个“竟”字。此文中还包含《发愿》和《奉食咒》。

四、后序发愿文《御制后序》。第4纸第1—4折面，28行。其中说，十二部经中此六百卷经（即《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最能帮助得到彻悟和脱离尘世的污垢。因此朕（即仁宗，1139—1193年）命沙门德慧逐字从梵文重译此经，纪念太后皇妣（即曹氏，大概是三周年忌辰），开版印造此经番、汉共两万卷。德慧等僧应作法华会诵读《金刚般若经》、《般若心经》，救生济贫，资往佛土。祝愿“六庙祖宗恒邀极乐，万年社稷永享升平”。最后三行是日期和发愿人尊号：“天盛十九年岁次丁亥五月初九日/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悖睦懿恭皇〔帝谨施〕。”日期合公历1167年5月29日。

参考书目：弗鲁格《10至13世纪中国宋代书籍印刷史》第76—77页；关于皇帝尊号见伊凤阁《西夏史上的一页》，载《皇家科学院通报》，1991年第5卷第836页；沙畹译伊凤阁著《西夏史上的一页》，载《通报》第12卷，1911年，第447页；伯希和《柯兹洛夫探察队在黑城所得汉文文书》第1号。

西夏文译本见З·И·戈尔芭切娃，Е·И·克恰诺夫编，《西夏文写本和刊本》第138—139号。

《圣大乘胜意菩萨经》（183号）

183 (原藏录号TK—145) 《圣大乘胜意〔菩萨经〕》

此经的经文是由兰山寺完成的，译者大概是德慧。经名是根据西夏文的原意拟定的。

木刻本，经折装，刊本的开头上半截和题记的结尾部分，和本书编号179是同一类型的刊本。现存部分的面宽9厘米，高3厘米，天头2.5厘米，面6行。纸色灰，涩滞，厚0.09—0.10毫米，每厘米7道帘纹，宋体字。此刊本保存了以下部分。

一、第1纸第1—5折面，第2纸第1折面（残）上半截，28残行，经首。前三行是梵文经名的音译：“梵云 啊冷拽……/磨磻萨咄 捺……/捺 须得罗”（第4行是汉文经名《圣大乘胜意……》，第5—6行是小字的译者和审定者署名：“兰山智昭国师沙门……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第7行为祈祷式呼语：“敬礼一切诸佛……。”往下是经文。

从：“如是我闻一时〔佛〕……”到：“乃诸人□乃至……”

二、题记结尾，和本书编号179内容相同，是同一个版。第1纸第3—5折面，第2纸第1—2折面。文中有刻印日期：“白高大夏国乾祐……/甲辰九月十五日……”和施主的资料：“奉天显道耀武宣文……”。日期合公历1184年10月20日。此刊本是仁宗皇帝（1139—1193年）为纪念去世的双亲，大概是为纪念他母亲去世二十周年而施印的。

三、还有一件同一个题记的末尾，是第2纸第2—3折面。

西夏文译本见З·И·戈尔芭切娃，Е·И·克恰诺夫编《西夏文写本和刊本》第75号。

《佛说金轮佛顶大威德炽盛光如来陀罗尼经》(184—189号)

184 （原藏录号TK—129）

木刻本，经折装，不著名译本。此经其他译本的经名有：《佛说炽盛光大威德消灭吉祥陀罗尼经》（见《大正藏》第19卷，第963号）、《佛说大威德金轮佛顶炽盛光如来消除一切灾难陀罗尼经》（见《大正藏》第19卷，第964号）。此译本

的经文比上述译本的经文简略。这可能是兰山宗的译本。

15折面（纸数未能查明），折面 7.5×19.5 厘米。开头部分阙佚，根据此经的其他刊本判断，至少差5折面。单栏，文面 7.5×15 厘米，面5行，行15字或两句七言诗。刊本下端毁坏严重，有时损及经文。纸色褐灰，涩滞，每厘米7道帘纹，厚 $0.11-0.14$ 毫米。宋体字，题记是写刻体。此件缺首，包括以下部分：

一、七言诗前言，缺开头和标题。第1—3折面，13行。

从：“光明上照尼咤天 下炽泥犁十八狱”到：“十缠九结永消除 万善千祥悉圆满”

二、经文。第3—8折面，25行，有首题和尾题。

从：“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净居天宫说文〔殊〕”到：“受奉行”

三、附录。第8—13折面，26行。专讲各种星的真言（陀罗尼），指出每个真言应该在每月何日诵读，如：“罗睺星真言 每月八日降下”。这些真言包括：《罗睺星真言》（八日）、《金星真言》（十五日）、《计都星真言》（十八日）、《土星真言》（十九日）、《水星真言》（二十一日）、《木星真言》（二十五日）、《大阴星真言》（二十六日）、《大阳星真言》（二十七日）、《火星真言》（二十九日）。

四、题记。第13—15折面，11行。题记全文：“伏愿/天威振远/圣寿无疆/金枝郁茂重臣千秋蠢动含灵/法界存亡齐成/佛道雕经善友众/尚座袁宗鉴 杜俊义 朱信忠 杜俊德/安平陈用 李俊才 杜信忠 袁德忠/杜彦忠 杜用 牛智惠 张用 訛德胜/杜宗庆 薛忠义 张师道 等/乾佑甲辰十五年八月初一日重开板 印施”。从题记中可以看出，这是重刻本，题记中的日期合公历1184年9月7日。

西夏文译本见З·И·戈尔芭切娃,Е·И克恰诺夫编,《西夏文写本和刊本》第144号。

185. (原藏录号TK—130) 木刻本,经折装。此刊本可能是原版,据此印了第二版(参看本书编号184),可能属于12世纪70—80年代初期的,6折面。现存以下部分:

一、七言诗序言。第1—2折面,8行。开头部分(至少6折面)阙佚。

从:“若有恶星临命者须念炽盛光如来”到:“十缠九结永消除万善千祥悉圆满”

二、经文。第2—6折面,22行。末尾阙佚。有首题。

从:“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净居天宫说”

到:“诸星辰之本师若人空念如来名”

纸色褐灰,折面 8×19.5 厘米,文面 8×15.5 厘米。面5行,行13字,或两句七言诗。写刻体。另一种雕版的刊本,参看本书编号186。

186. (原藏录号TK—131)

木刻本,经折装,和本书编号185一样,是另一种版的印本。第2纸的最后两折面,经文首尾残缺(12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

从:“咒曰”到:“大吉祥事一切众生如遇年灾月”

纸色浅黄灰,宋体字,无书题。

《六字大明王功德略》(187号)

187. (原藏录号TK—136) 《六字大明王功德略》

此作品在有关文献中未登录过。内有《大庄严宝王经》(即《大乘庄严宝王经》,见《大正藏》第20卷,第1050号)

的引文，以佛同除盖障菩萨谈话的形式，说明念末尾引用汉文和兰查体梵文的陀罗尼可得到怎样的好处。

木刻本，卷子装，70×18.5厘米，2纸，共50行，行11字，双栏，文面67.5×12.5厘米。纸色浅黄灰，宋体字，有首题和尾题。首题后面有名为《尊胜心咒》的陀罗尼（1行）和题记（2行）“乾祐乙巳十六年季秋八/月十五日比丘智通施”。题记中的日期合公历1185年9月10日。

密宗经文（偈、陀罗尼）

《黑色天母求修次第仪》（188号）

188（原藏录号Φ—315）《黑色天母求修次第仪》

讲述大黑色天母的传说和解释与其有关的术语和概念的作品。提到大黑色天母的父亲瞿迦捺，母亲遍行母，兄弟俱舍和俱舍集将，丈夫一般杀帝，以及老师吉祥形噜割、斜噜上师、阿浪师。文中有梵文标题的汉文音译：“摩诃割利丁卑萨但捺吃罗麻。”。

残片，45.5×22.5厘米，写本，卷子的开头，左部下端损坏。1残纸，28行（第21—23和27—28行残），行24—28字。纸色淡黄，字体小，流利，楷书，有首题（12世纪末的）。

从：“释此大黑色天母求修大利分四一起发缘由者此天母是西天”。到：“……〔坏〕诸魔〔法师〕……”

参考书目：《苏联科学院亚州民族研究所敦煌特藏汉文写本叙录》第2辑，第2527号。

《无动如来陀罗尼》（189号）

189（原藏录号TK—301）〔《无动如来陀罗尼》〕

陀罗尼经文，解释怎样念此陀罗尼及这样做所带来的好处。

最后是关于于阗国一位尼姑（苾刍尼）的故事开头。

木刻本，经折装，无首尾，20×19厘米的残片，两折页。12行（第1—5行残），行13字。注释和说明是小字双行，宋体字。说明中有陀罗尼的名称（12世纪50—70年代的）。

从：“多嚧^二舍……”到：“（双直行的左边一行）昔于阗国有苾刍尼厌患女身”

残片背面的左端，糊着一条有版画的纸（当时的裱褙）。

《大随求陀罗尼》、《一切如来心陀罗尼》（190号）

190（原藏录号A20A）《大随求〔陀罗尼〕》、《一切如来心陀罗尼》、《唐梵般若心经》

木刻本，蝴蝶页——经折装（蝶页粘接成折子）。白口中自上而下有该作品的简称、页码、各卷的总页码、卷号（中）。由卷号看出，全部作品包括三卷（上、中、下）。折面7×14厘米，栏面7×11.5厘米，双栏，外线粗。面6行，其中梵文每行10字，汉文排在梵文右边，译音对准梵文的音节。宋体字，小字双行语音夹注。纸色灰，光滑，厚0.06—0.08毫米，每厘米7道帘纹（14世纪初的）。现存以下部分：

一、《大随求〔陀罗尼〕》。此作品的第7—38页和全卷的第73—104面，白口上有经名简称《大随求》。此作品在第37页第2面（总104面）上终止，其后用小字注明：“计三百句一千八百九十九字”。接着是下一部作品的首题：《一切如来心陀罗尼》，此作品现存7行梵文和7行汉文音译。汉文的起止是：

从：“驮宁^引萨罗缚^二播^引跋尾戍^引驮宁^引”

到：“贺罗拏^一冒^引地^一冒驮野”

二、《唐梵般若心经》。此作品的第9页第2面至第10

页，全卷的第117页第2面至118页。此卷和整个作品的结尾。有此经的尾题。白口上有经名简称：〔梵若心〕。

从：“〔怛□〕么”_{二合}枳娘_{〔二〕合}怛尾焰_{二合}钵罗_{二合}枳娘_{二合}播引罗弥”到：“罗僧哦帝冒地_引娑缚_{二合}贺_引”

《大正藏》第8卷第852页上栏第14—23行有用汉字标音的正文和语音注释的异文。梵文原文《大正藏》中无。

此刊本从背面进行了加固，许多折缝处糊着纸条（当时的裱褙）。所糊的纸上有汉文刊本和写本的文字，参看本书编号102、153、270、272、373。此外，用以裱糊的一件残片大9×13.5厘米，是粗劣的图画，另件残片大11.5×13.5厘米，是12世纪末的刊本，黄纸，上面印着大字，有红色标记。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经文，5残行。

从：“……何如来昔……”到：“……庄严佛土”见《大正藏》第8卷，第749页下栏第16—20行。

陀罗尼（191—192号）

191（原藏录号TK—294）〔陀罗尼〕

未考定出的陀罗尼经文，标有顺序号。

木刻本（经折装）的一面，用作封皮用，8×17厘米，栏面8×15.5厘米。单栏，4行，行10字，宋体字，小字双行夹注。纸色浅褐，纸质脆，厚0.12—0.13毫米，每厘米8道帘纹，无书题（12世纪上半期的）。

从：“耻_{二合}帝_{四十}么_九坭么坭_五□”到：“普_{二合}？_{五十}没地秣弟_{五十}惹”_六

正面粘了有手写的西夏文的一页纸，背面粘了一块浅蓝色绸缎，上有写过西夏字的痕迹。

192 (原藏录号TK—207)〔陀罗尼〕

未考定出的陀罗尼残片，12.5×19.5厘米，写本。卷子的一部分或册子的一页，无首尾，7行（第1—2、7行残），行18字。纸色浅黄，楷书，顺序号和语音注释为小字双行，有改写处，无书题（14世纪中期的）。

从：“……耶三〔怛〕……”到：“……缚羯磨□^(二)□”

陀罗尼文集 (193号)

193 (原藏录号TK—153, B60)〔陀罗尼文集〕

此作品系陀罗尼汇编，附有祈祷文和祈祷诗，大部分陀罗尼有名称。

写本，经折装，折面10×20厘米。面5—6行，行12—15字，或两句五言诗，或两句七言诗。纸色黄，向行书转化的楷书。有红墨标记：新陀罗尼或祈祷文前面是小圆圈或符号“v”，句子之间是小圆点，陀罗尼的词之间及其结尾后面是用黑墨画的两道竖线。有修改处：漏掉的字添写在行间，错字上面贴一小纸块，再写上正确的字，有用小字作的说明，如：“三说”、“振铃”等等。某些陀罗尼用图解形式表示。此作品无书题，宋写本（12世纪中期的）。背面间或出现裱糊物，有一个上面有西夏文刊本的文字，此写本保存了以下部分：

一、写本的开头。第1纸（9折面）、第2和第3纸（各8折面）。有以下的陀罗尼名称：《莲华藏真言》、《种智真言》、《被礼萨埵真言》、《无畏真言》；《金刚杵真言》，《金刚墙真言》、《金刚明犬真言》、《军咤利大酒净陀罗尼真言》。

从：“○曩谟 = 三满哆 = 设驮喃 = 唵 = ”到：“原离群迷 = 更是珠供养巍巍荡”

二、写本的一部分，无首尾。3纸，第1—2纸各8折面，第3纸7折面，第8折面阙佚。陀罗尼名称残缺，开头有对下列佛的称呼语：阿□尊佛、宝生尊佛、无量寿佛、不空成就佛、毗卢遮那佛、释迦牟尼佛。

从：“南无一心信礼东方世界摩诃曼鬘罗”到：“真言曰 = 曩谟 = 三满哆 = 设驮伽喃”

三、写本的一部分，首尾残缺。3纸，第1、2纸各8折面，第3纸只有开头的1折面。陀罗尼名称：《护魔洒净真言》、《持地无畏真言》、《衢魔曳明玉涂坛真言》、《揩坛真言》、《下线真言》、《五色线真言》。

从：“室战 = 罗利 = 缚罗 = 播罗曳 = 摩诃药叉”到：“□〔也 = 唵〕 = 缚罗怛罗_合曩贺素”

第二和第三部分的先后顺序不清楚。

四、写本的结尾。8纸，第1、2纸各4折面，第3—7纸各8折面，第8纸2折面。有下列陀罗尼名称：《四成事真言》、《小三宝真言》、《三礼真言》、《八叶莲花真言》、《净三业真言》、《遍照真言》、《金刚起敬真言》、《忏悔真言》、《随喜真言》、《劝请真言》、《回向真言》、《观佛眼真言》、《除慰结界真言》、《金刚合掌真言》、《结界真言》、《除染召无满真言》、《知坚固真言》、《三昧耶真言》、《大悲箭真言》、《金刚运真言》、《比法轮真言》、《大欲真言》、《大乐真言》、《召罪真言》、《推罪真言》、《净三业真言》、《菩提心真言》、《发菩提心真言》、《安住明王真言》、《金刚坚固真言》、《斩魔真言》、《金刚渐真言》、《金刚界真言》、《身观真言》、《证真实智真言》、《天魔不怀真言》、《四坛门真言》、《五方真言》、《金刚

《圣众真言》、《四菩萨真言》、《千六贤护真言》、《十大明王真言》。第14折面的开头有个“世”字，可能是写本的总纸数。

从：“○唵 = 萨哩缚怛他哦哆 = 布袒乌波萨驮曩”到：“曩谟 = 宰都谛”

第7—6纸的一部分背面，有4至2折面解释《易经》爻辞和卦辞的占卜文。包括下列部分：

一、爻辞及爻名两行，用黑墨写的。

二、六句五言诗和六句六言诗。4行，每行三句诗。用黑墨写的。

三、讲述道家占卦的宇宙论的三言诗和四言诗，12行。正文用黑墨写，标点和许多改写处使用朱砂。

四、卦辞及卦名，每个卦辞旁用一段小字说明和四句七言诗指出卦名。正文用朱砂抄写，从第7纸第3折面开始，每面被横线分成两半，每半面有一个带解释的卦名。第6纸第8折面只有上半面写了字，往后直到第5纸第6折面只有横分界线。共有下列卦名：乾、坤、屯、蒙、需、讼、师。

带说明的陀罗尼文集（194—197号）

194（原藏录号A3）〔带说明的陀罗尼文集〕

陀罗尼汇编。

写本，蝴蝶装，无首，7个双页，面8×9厘米，文面6.5×6.5厘米。面6行，行8—9字，最后一面两行。小楷。纸色淡黄，涩滞，有熨压痕迹。无书题（13世纪初的）。

从：“迦如来想自心一念相”到：“怛发怛发怛 莎诃怛”

195（原藏录号TK—102）〔带说明的陀罗尼汇编〕

各种陀罗尼汇编，附有各种佛教密宗作品（经名被大大简

化)的说明。这些陀罗尼除汉文译音外,还有对称的兰查体梵文佛经经文。

木刻本,经折装,袖珍本,每块雕版均有序码。一版印两纸,第1纸3折面,第2纸6折面。折面 6×10 厘米,栏面 6×7.5 厘米,双栏,面6行,行10字。纸色白,涩滞,厚0.10—0.13毫米,竖帘纹,每厘米7道。字小,宋体字。有念诵陀罗尼的说明,小字双行,无书题(12世纪初的)。此刊本现存两部分:

(1) 版三和版四的印张,共15折面,包括正文和对两个陀罗尼的说明:①一个缺首的陀罗尼(标题阙佚),带《无量寿如来念诵仪》的说明,《无量寿佛化身大忿迅俱摩罗金刚念诵瑜伽仪轨法》(见《大正藏》第21卷,第1223号)中无此文;②《大佛顶白伞盖心咒》,附《万行首楞严经》即《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卷第七的说明(见《大正藏》第19卷,第945号,第136页下栏第16行—第137页中栏第12行)。

从:“遏引弥你啊密唵_合怛遏遏捺”到:“□□□□根清
净未得戒”

(2) 版7和版8的印张,共12折面,包括正文和对两个陀罗尼的说明:①一个不知名的陀罗尼,现仅存用梵文兰查体写的最后一行,是《佛顶放无垢光一切如来心陀罗尼经》即《佛顶放无垢光明普门观察一切如来心陀罗尼经》的说明(见《大正藏》第19卷,第1025号,第723页上栏第5行——第725页下栏第9行),很简略;②《观自在菩萨六字大明心咒》,附《庄严宝王经》即《大乘庄严宝王经》卷第三至第四的说明(见《大正藏》第20卷,第1050号;《大日本校订大藏经》第7帙,第25页下栏19行——27页下栏第15行),很简略。

从：“𠬞𠬞”到：“以天金宝造作如微尘数”

196（原登录号TK—163）〔附说明的陀罗尼文集〕

陀罗尼文集，说明念诵这些陀罗尼时应该加持何种动作，这样可给念诵者带来怎样的好处。先后顺序是：《七枝加行颂》、《阿弥陀佛根本咒》、《佛名号》、《奉食咒》。

木刻本，经折装。现存第6纸最后两折面和第7纸第1—4折面，宋体字，无书题（12世纪中期的）。

从：“或想金色一面二臂右手作施印左手”到：“观喜求所愿事允许既已其彼佛等变”

197（原藏录号TK—271）〔《密咒圆因往生集》中的陀罗尼和摘录〕

间或有附加的经文，先后次序不一定同原来的经文相符。同陀罗尼经文并列的有该陀罗尼的竖行婆罗迷体梵文。

木刻本，经折装，“袖珍”本。折面6×10厘米，栏面6×8厘米，双栏，外线粗。面6行，行10—11字。纸色灰，宋体字，字小（13世纪初的）。陀罗尼经文有《大宝楼阁随心咒》、《尊胜心咒》、《阿弥陀佛一字咒》、《智炬如来心咒地狱咒》、《文殊菩萨五字咒》、《毗卢遮那佛大灌顶光咒》、《七俱□佛母心大准提咒》、〔《阿弥陀佛根本咒》〕经文、〔《观自在菩萨六字大明心咒》〕的附加经文的末尾、《金刚萨埵百字咒》、《十二因缘咒》带附加经文，经文后有双行小字：“已上十五道咒之功能在密咒圆因往生集内须者检之”。

最后4折面是题记的开头，加了标题：《密咒圆因往生集录》。题记解释了陀罗尼的功能，此后是对祖先和施主们的祝福。

偈和陀罗尼文集（198—199号）

198. (原藏录号TK—75)〔偈和陀罗尼文集〕

袖诊祈祷书，以对文殊的称呼语“愿证文殊”起头，往下是对文殊形象的描述和祈祷文：《六字咒》、《开智咒》、《变空咒》、一个无名的陀罗尼、《敬礼三宝》、《成道吉祥偈》、《七定供养》。

写本，册页装，用白粗线把6叠缝在一起，页面 7.5×10.5 厘米，经文用各种笔体写成，最后两页上各画了一个黑底的大阴文，作为印记，印面 3.5×6 厘米，有改写和涂改（13世纪初期的）。

第五叠最后两页是历书中的文句：四句一组的干支符号，用很小的字进行了解释。

从：“甲子乙丑海中金 丙寅丁卯炉中火”到：“丙辰丁巳土戊午己未火”

199. (原藏录号Φ—311)〔祈祷时读的偈和陀罗尼的文集〕

写本卷子， 922×19.5 厘米，缺首，22纸，长短不一。491行，每行两句七言诗，或两个陀罗尼词。诗押韵，楷书，有的字小，不很熟练。许多标题有小字双行解释。有五十三个偈和陀罗尼的标题：《标授三禁并增长拥护偈》、《增长定偈》、《究竟定偈》、《诵咒偈》、《增长中围偈》、《召请智佛偈》、《迎请众圣偈》、《三种供养偈》、《心赞三宝偈》、《不空牟尼供养偈》、《勾召亡魂偈》、《施财安位偈》、《奉曼拏罗偈》、《奉十种供养偈》、《不空牟尼供养偈》、《通念五夫偈》、《振铃偈》、《礼赞上师偈》、《澄神赞相传上师偈》、《奉捺辣偈》、《十种供养偈》、《五夫偈》、《振铃偈》、《礼赞观音菩萨偈》、《念观音根本赞偈》、《赞咒功德偈》、《诵咒成验偈》、《奉曼捺罗偈》、《十种供养偈》、

《不空牟尼供养偈》、《通念五夫偈》、《振铃偈》、《礼赞马项圣者等偈》、《坐定赞圣众偈》、《奉曼罗偈》、《十种供养偈》、《不空牟尼供养偈》、《忏悔供》、《随喜偈》、《请转法轮偈》、《请佛住世偈》、《回向偈》、《振铃偈》、《五供养偈》、《不空牟尼供养偈》、《普济三涂偈》、《沐塔亡过偈》、《赞六波罗蜜偈》、《哀请标受偈》、《奉过伽偈》、《哀纳偈》、《请忍偈》、《奉□偈》。标题重复者经文也重复。最后4行是抄写者和审核者的附记：“皇建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门资宗蜜沙门 本明/依□刹门标授中集 毕/皇建二年六月十五日重依次行对勘定毕/永为真本”。附记中指明了日期：公元1211年1月1日（抄毕日期），和公元1211年7月26日（勘定日期），及抄写和尚的名字：“本明”。

从：“遏你 你末帝”到：“永为真本”

参考书目：《亚州民族研究所敦煌特藏汉文写本叙录》，第2辑，第2784号。

未考定出的密宗经文（200—204号6）

200 （原藏录号TΦ—4270）〔未考定出的密宗经〕

经文，其中交相出现部分押韵的七言诗、陀罗尼和散文式的解释。有下列几篇的标题《大随求梵语题目》、《大随求陀罗尼第二会》、《〔大随〕求法印》、《随求妙章句》。最后一篇是佛教各概念之间关系的示意图。

写本，经折装，首尾残缺。由8纸组成，其长短不一，从1折面半到5折面，共28折面半。折面12×26.5厘米，栏面12×22.5厘米。纸色淡黄，光滑，表面有烫压痕迹。楷书，有小字双行语音夹注，改正过来的字写在一小块纸上，贴在错字上面，有的将错字预先挖掉。从第7折面开始界格（画在页边上方的）

是红色，宋写本（11世纪下半期的）。

从：“〔应当赞诵此真言〕……”到：“尾瑟努^{二合鼻}曩莫塞^{三合}讫
帝→娑缚贺”

此写本的背面整个用西夏文写本进行了裱糊，有些折缝处加糊了西夏文写本的纸条（当时的裱糊）。

201 （原藏录号TK—191）〔未考定出的密宗经〕

叙述念下列陀罗尼的动作和仪式：《遣魔咒》、《本佛心咒》、《变空咒》、《阿弥陀佛心咒》。

写本。卷子的一部分，首尾残缺。1纸，38.5×24厘米，损坏严重，20行，行24字。纸色淡黄，小楷，文中有修改处，有对陀罗尼经文的小字双行夹注，无书题（14世纪初期的）。

从：“……麝沉檀〔及〕钵怛罗^{其〔松〕是〔少〕}}”到：“执数珠念南无阿弥陀佛或念阿弥陀佛心咒亦得正念诵时”

202 （原藏录号TK—270）〔未考定出的密宗著作〕

经文，包括陀罗尼：《持陀罗尼密咒》、《护身真言》、《六字大明真言》、《七俱□佛母心大准提陀罗尼真言》和对它的解释；提到的陀罗尼有：《一字大轮咒》、《准提真言》。汉文咒语旁边有相应的竖写的婆罗迷体梵文。

木刻本，经折装，开头部分。两残纸，8折面（第1和第8折面残）。折面9×20.5，栏面9×15.5，单栏，面6行，行13字，宋体字。首题（1行）被撕掉，现只存用小字印的有关编者的题衔：“五台山金河寺沙门 道殷集”。纸色浅灰，宋刊本（12世纪初的）。

从：“凡欲诵持陀罗尼密咒者先须金”到：“十四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

有被简缩得很短的和稍被修改过的《显密圆通成佛心要

集》卷上的经文，（起止见《太正藏》第46卷，第994页上栏第14行—第995页上栏第22行）。这可能是收入上述汇编中的著作之一。

203（原藏录号TK—266）〔密宗著作〕

叙述各种陀罗尼的诵持程序，提到了《百字咒》。

写本的两个双页，被装订成蝴蝶装，外边和下边损坏严重。面幅14.5×21.5厘米，文面11×17厘米，面7行，行14—15字，纸色褐，楷书，无书题（14世纪上半期的）。

从：“风轮形似弓样二角坚□旗于上想一〔赤〕”到：“唵哑莎诃……”

有一页的背面糊了许多写着汉字的小纸块（当时的裱褙）。

204（原藏录号TK—238）《……修观行仪轨》一卷

来考定出的密宗著作，可能是《修习般若波罗密菩萨观行念诵仪轨》。

残片，10×11厘米，1纸的左下角，经文结尾。两行，第1行是小字双行注释的末尾，第2行是尾题结尾。纸色深褐，楷书。尾题后面有“汜”字和戳记，一行西夏文（14世纪初的）。

从：“（注释的第一直行）……〔结才昭〕除前有□中”到：“……修观行仪轨一卷竟”

204a（原藏录号Дх—3185）〔未考定出的密宗经〕

经文结尾，专讲到达佛界的目的，在那里佛为普渡众生而说法。

写本，蝴蝶页的右面，未写满。面17.5×20厘米，文面13.5×8厘米，界格用尖木笔画出。8行，行13—15字。纸色灰中略带绯红，潦草的楷书，经文用小木笔写出，无书题（13世纪初的）。

从：“不可得思量此等经文如来别有甚”到：“有智者应可细详”

204δ (原藏录号Дх—591)〔密宗经文〕

附有解释的曼荼罗。

写本，面幅42×99厘米的竖长条，由两张纸粘成，上面的42×58.5，下面的缺底边。纸色灰，此写本毁坏严重。楷书，笔画熟练、清楚，小字双行注释，无书题（8世纪初的）。经文被分成两块：

(1) 直径为39厘米的圆形曼荼罗，由指出各门名称的文字组成。此外四面还有文字（从上面顺时针方向）：“众生心法”、“相大义”、“用大义”、“体大义”。曼荼罗上方是对它的解释，文面13×37.5厘米，28行，第14—19行全，每行11字。

从：“……〔者〕总”到：“捡彼文”

从左右两面沿经文和曼荼罗各有四句七言诗。

(1) 对曼荼罗各门名称的解释，经文排在下面的纸上，纸面49.5×37.5厘米，31行。

从：“……者唯不二大乘深妙独尊属于果海故论云性德圆满海”到：“为释子坐右之铭焉”

参考书目：《亚洲民族研究所敦煌特藏汉文写本叙录》，第1辑，第1328号。

汉文佛教原著

注 释

注释(205—211号)

(原藏录号TK—149)《金刚般若经钞》第五

对《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综合注释，是最后的第五卷。此书名未被著录过。

木刻本，卷子装，缺首，2019×34.5厘米。现存第4—43纸，前几纸从边沿被撕断。纸幅52×34.5厘米。此刊本的雕版由两位刻工雕成。单栏，每纸28行，行21字，最后一纸30.5×34.5厘米，上有12行，其中5行题记。共1104行。粘接缝的右边标有书名简称和卷数：“抄第五”，或“钞第五”、“抄五”、“钞五”等以及纸数。各纸左端有施主的名字：“白水 县王〔式通〕□〔施及二片〕”（第4—5纸），“比丘悟缘并王仁福”（第6纸），“比丘悟缘一片”（第7纸），“白水党行者一片”（第8纸），“〔伏龙村曹永〕□施一片”（第14纸），“蒲石村杨言施一片”（第21纸），“〔蒲城邓（？）〕……〔施一片〕”（第26纸），“车度女弟子等”（第31纸），“〔俗〕弟子□……”（第32纸），“〔蒲城 贤〕……〔施一片〕”（第33纸），“蒲城县前行尚祚施一片”（第35纸），“〔伏龙村女弟子曹氏一片〕”（第36纸）。其余各纸上的名字或因在粘接时被裁掉一部分而认不出来，或者就没有。纸色浅黄灰，稍涩，厚0.06—0.07毫米，帘纹几乎显现不出来，每厘米7道。写刻体。有朱砂标记：“疏”字（注释）前面是小圆圈。间或有小字双行夹注。第4纸开头有一方形红印，2×3厘米，楷书印文：“？宗/记耳”双栏，有尾题。注释文：

从：“众生或又解云菩提涅槃而为两头八圣道支名之为”到：“获福田法界生灵普沾益”

注释与经文相符，见《大正藏》第8卷，第750页下栏第18行—第752页下栏第2行。

题记是5行小字：“雕印功德广大如虚空究竟如法界/皇庭宴肃率土丰登勾当者实相通神助缘/者弥卢积福飞行水陆带角

披毛俱沐良因齐/登觉岸时大中祥符九年四月八日雕毕/朝散大夫行尚书驾部员外郎知丹州军州兼管内劝农事轻车都尉借紫梁(?)施一卷”。题记中的日期合公元1016年5月16日。施主的名字伯希和认为是梁夙,但第二个字是手写的,也许是施主的戳记,很可能是“胤”字。根据施主居住区地名来看,这是宋刊本,印于当时的丹州,现在的陕西省中部。

参考书目:伯希和《柯兹洛夫探察队在黑城所得汉文文书》,第3号;卡特《中国印刷术及其向西方的传播》第65页、第222页;弗鲁格《10至13世纪中国宋代书籍印刷史》,第48—49页;孟列夫《黑城发现的早期出版物》,第148页;戴密微译《黑城发现的早期出版物》,载《通报》第51卷,第4—5期,1964年,第450—451页。

206 (原藏录号TK—116) [《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注》]

《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不出名译本。根据《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玄奘译)编成的作品,并按密宗经的形式(有经的冗长异文)增补了结尾。经文附有大量的注释。

木刻本,蝴蝶——经折装,每纸4面,每两面一对,按蝴蝶装样式印刷,有白口,但页码在第二对的白口上,各纸粘成折子。共8纸(整个刊本有32折面,但第一纸前两折面和第八纸后两折面阙佚,现存28折面),每面9.5×20厘米,栏面9×19厘米,单栏。外边损坏严重,几乎到处破烂,常常影响到第2行。面5行,行10—11字,小字双行注释为16字。纸色浅黄色,涩滞。厚0.10—0.12毫米,每厘米7道帘纹,宋体字,注释中的字竖笔稍长,无书题,金刊本(12世纪末的)。分三部分。

一、序言,只剩下对标题的解释。从开头到第2纸第2折面(第2行)。

从：“□□〔岂在繁论摩诃〕□□□”到：“所分别也”

二、经文。第2纸第2折面（第3行）至第7纸第4折面。

从：“观自在菩萨^{此破凡夫历劫背}_{心唯观诸法被法}”到：“必无老谬〔疾〕”

陀罗尼前的部分同《大正藏》第8卷第848页下栏相符。

三、后序发愿文。第8纸第1—2折面，末尾阙佚。讲述诵读此经带来的好处。

207 （原藏录号TK—148）《观无量寿佛经甘露疏科文》

示意性注释，说明《观无量寿佛经》的注释、程序和相互间的关系。这种相互关系用联接线、数字和其他说明性文字表示出来。此作品未被著录过。

木刻本，卷子装，16纸，未粘接在一起，第1纸缺首，差前5行，第6—13行缺上半截。纸幅60×31厘米，栏面60×23厘米，第16纸的纸幅26.5×31厘米，单栏。从第3纸起页码在每纸开头的行间，带经名简称《甘露疏科》。每纸27行，每行四段解释。纸色淡黄，纸质光滑，厚0.07—0.09厘米，每厘米7道帘纹。宋体字，有尾题，尾题上面有7×7厘米的红印，大字楷书印文“翠野/楼记”。宋刊本（11世纪下半期的）。印记大概是私人的收藏品。

从：“……〔初〕显行相二后引证二”到：“四回愿微
四众喜奉行后释成以 后正释经文二”

参考书目：孟列夫《黑城发现的早期出版物》，第144页；戴密微译《黑城发现的早期出版物》第451页。

208 （原藏录号TK—150）《四分律行事集要显用记 卷第四》

四分律的注释指南，大概是保存在《十三僧残法篇》（卷第二至第五）中的一部分。未被著录过。

写本，册页装，卷第四的完整抄本。用白粗线缝在一起的7叠，每叠16页，或8个双页，最后一叠10页（4个双页和2个单页）。每页有一面正文，文面交错向里或朝外。面幅13×21厘米，栏面11×17厘米，单栏。面8行，行18—21字。小字双行注释。文中有修改，写在页边和被纠正的那个字的背面。纸色淡黄，纸质光滑，加了石膏（许多纸页上显出石膏斑点），厚0.05—0.08毫米，每厘米6道帘纹。第22页以前有用很淡的墨汁画的界格，几乎看不出来。楷书，笔体熟练。有首题和尾题。首题后面是此注释的编者署名：“兰山通圆国师 沙门智冥集”；主持者的尊号：“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评定”，这是仁宗皇帝（1139—1193年）生前的尊号。收入此卷的各注释篇名：《篇聚名报篇第十三》、《随戒释相篇第十四》比丘二百五十戒中尽四重戒及十三僧残戒。尾题前添写了陀罗尼：“娑^{平声}呼^之木析罗^{合口呼之}肠^{此云}”（12世纪最后30年的）。

从：“中卷自行四篇篇聚名报第十三分四初立名意二”到：“之语不犯”

正文纸页前面是用厚实的鲜黄色纸做的上封皮，上面有贴过首题标签的痕迹，封皮背面糊了一张写得很规矩的习字纸。

参考书目：伯希和《柯兹洛夫探察队在黑城所得汉文文书》，第1号；关于皇帝的尊号见伊凤阁《西夏史上的一页》，载《皇家科学院通报》，第6集，第5卷，1911年第836页；沙畹译、伊凤阁著《西夏史上的一页》，载《通报》第12期，1911年，第447页。

209（原藏录号TK—79）《龙论卷第一》下半

对《释摩诃衍论》的一本不出名注释，卷第一的下半部分。

写本，页册装，把纸页缝成叠，各叠再用未漂染过的粗线缝成的册子。共5叠，第一叠有第1—4页，第8—25页，共22页（第5—7页和第26—28页阙佚）；第二、三、四叠各20页；第五叠存第5—17页（第18—20页阙佚）。每页一面有文字，几页写在这面，下几页就写在另一面。第二至第五叠第1页的空白面上有顺序号（从二到五）。纸色淡黄，页面 13.5×20.5 厘米，面7行。此写本有三种笔体：第一种是写得好的楷书，有些地方转为行书；第二种笔体是忽大忽小，写得不好的楷书；第三种笔体是写得好的向行书转化的楷书大字，正文内有改写和涂改，间或有双行注释。第1页上有首题，首题下面是作者（？）的姓名“李大道”，并两次盖了他的戳记（西夏字（道）的简化字），第3面的正文前有卷数和小标题：“第一半下以解八因至立义分卷”。第1—3页上有字体很大的习字和对联：第1面上是：“白日莫闲过 / 青春不再来”；第2页的正面是：“我写湖山下稻梁 / ？？？？楼心动”；反面是：“功高在志 / 业广由勤”（第3面上也有这句话），上面写着：“儒门及第赋之名”（14世纪中期的）。正文分为三部分断片。与《大正藏》第32卷第598页上栏第9—13行、第22行—第600页中栏第25行中有关文字相符。

此写本的笔体同本书编号167、169、170相似，纸张一样，本书编号210是此写本的一部分。

210 （原藏录号TK—80）〔《龙论第二》上半〕

对《释摩诃衍论》的注释，卷第二的上半部分。

写本，册页装。纸页被缝成5叠，各叠再用未漂染过的粗线缝在一起。每叠均20页，面8行，每页写一面正文。纸色淡黄，页面

13×20厘米。两种笔体：一种与本书编号209中的第二种笔体相似，另一种笔体稍向左倾斜，写得比较好。有改写和涂改，间或有小字双行注释。第一叠第2页上有首题片断：“……正解第二论”。第1页上是某些词句的片断，字很大：“……道/来”，有截记和草字（12世纪中期的）。文字与《大正藏》第32卷第602页上栏第1行—第66页中栏第11行相符。和本书编号209是同一个写本，纸张和笔体同本书编号167、168、169、170相似。

211（原藏录号TK—220）〔佛教注释文〕

阐述对“涅槃”这一概念的各种观点的注释文。

残片，13.5×19厘米，无首尾，写本，9残行，纸色灰，楷书，无书题（14世纪中期的）。

从：“……唯是身业 言声 □经 挨……”到：“……富贵……”

背面是习字，重复写着“无”字。

此写本粘了一件同样纸的残片，11×19厘米，画有界格，第1行字残，最后一行有装饰图案。

211a（原藏录号Пх—2823）〔佛教名词解释〕

以问答形式解释名词“三宝三种”、“四谛二种”、“众生九物”、“四大三种”。

用尖木笔写的写本，册页装，不到尾。缝在一起的两叠，第一叠5个双页，第二叠7个双页。面幅4×5.5厘米。正文写在每页的一面上，第1和第5页无正文。面3行，行4—6字。全部正文共22面，66行。第2、4、8、10、11、15、19、24、28、32、36、37、41、45面上有2.8×4厘米的印章，全部成了浅褐色的斑点。纸色淡黄灰，楷书（12世纪末的）。

从：“问三宝有”到：“何名空色二大”

疑 经

疑经 (212—224)

212 (原藏录号TK—152)〔《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

疑经，在敦煌遗书中也发现过。

木刻本，蝴蝶装，1页，34×25厘米（两面），栏面30×23.5厘米，上下栏一道粗线，边栏双线。白口上有经名简称《八阳》和页数“九”。面8行，行20字，宋体字，无书题。宋版本（12世纪前25年的）。经文同《大正藏》第85卷，第1424页中栏第3—25行。

参考书目：关于此作品见牧田谛亮《中国佛教疑经研究序说——敦煌出土疑经类》，载《东方学报》1964年第35号，第338页，第383—387页；《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359、413页。

213 (原藏录号TK—119)《佛说报父母恩重经》

疑经，和敦煌遗书中的《佛说父母恩重经》经文不一致（见《大正藏》第85卷，第2887号）。

木刻本，经折装，不到尾。5纸，面5行，行17字，或三句五言诗，写刻体，有首题（12世纪初的）。此刊本由两部分组成。

一、版画。第1纸第1—3折面，中央是正面坐着的佛像，佛前站着两僧人，跪着两僧人。两侧是行孝图。右边八幅，一图无榜题，其余各图的榜题是：“□〔父母绕〕须弥山处”、“为父母割肉之处”、“为父母剜眼睛之处”、“为父母割心肝之处”、“为父母打骨处”、“为父母受刀轮之处”、“为父母吞铁丸之处”。左边七幅，上面的一图无榜题，画犯

罪者们的痛苦状况，其余各图的榜题是：“为父母受持条戒”、“为父母供养三宝”、“为父母布施修福”、“为父母书写经典”、“为父母读诵经典”、“为父母忏悔罪(?)”。版画刀笔粗糙，特别是两侧的行孝图。

二、经文。不到尾，第1纸第4折面至第5纸第4折面。

从：“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到：“身躯誓不违于如来圣教宁以斩碎其身百”

参考目书：伯希和《柯兹洛夫探察队在黑城所得汉文文书》第9号；孟列夫《黑城发现的早期出版物》，载《亚洲民族研究所通报》，第7卷，1961年，第148页；关于此作品牧田谛亮在《中国佛教疑经研究序说——敦煌出土疑经类》一文中多次提到。

214 (原藏录号TK—120) 《佛说父母恩重经》

疑经，和本书编号213相似，但有大量的异文和缩略语。

木刻本，经折装，宋体字（12世纪下半期的）。

题记中说，此经以回答难陀提问的形式进行叙述，并说有一个名叫“呱呱”的青年人和其他人，由于他们的先父七十岁任中书相公时去世，将恭请禅师提点，副判承旨，座主山林戒德及僧众七千余人作各种法事，举行10场法会，诵读西番、汉藏经各一次、番藏经五次，并举办诵读《法华》、《仁王》、《孔雀》、《观音》、《金刚》、《行愿经》、《乾陀般若》各经的法会，设道场三昼夜，作大法会，向佛献金三次，竖起神幡，放生羊一千只，邀请工匠（往下题记中断）。

背面被撕破处糊着许多写有西夏字的小纸块（当时的裱褙）。

215 (原藏录号TK—139)

疑经，和本书编号214的措辞相同，有少量的异文。

木刻本，蝴蝶装，页码在白口上，白口上方有经名简称《恩》。

216 （原藏录号TK—240）

木刻本的一面残片，经折装，3残行，宋体字（12世纪末的）。与其他版本的不同处是诗的前面有“颂曰”。

217 （原藏录号TK—183）《高王观世音经》

木刻本，经折装。第1纸最后1折面，第2纸第1—7折面，下端损坏严重。面4行，每行原来13—15字，写刻体，有首题，首题前面有“〔高王观世音经序〕”的最后一行。经文见《大正藏》第85卷，第1425页中栏第5行一下栏第1行。

218 （原藏录号TK—117）

疑经，有序言和版画。

木刻本，经折装，折面 8.5×19 厘米，文面 8.5×13.5 厘米，双栏。14折面（版画2折面，正文两纸，第1纸7折面，第2纸5折面）。纸色褐灰，面6行，行12字，或两句五言诗，宋体字。（12世纪下半期的）。此刊本包括以下部分：

一、版画。画中观世音坐在岩石上，背景是山，观世音面前站着一男一女，着西夏装，男的双手抱一香炉，空中有飞天，右边是一跪着的死刑犯和一着西夏装的刽子手，刽子手的剑被折为三段。

二、《高王观世音经序》。第1纸第1—5折面第4行。经的序言，讲述了一个被判处死刑的犯人敬德的故事，说有位僧人给他托了一个梦，要他诵读此经一千遍，于是刽子手手中的剑就断裂为三段。奉高欢国王（即高王）之命刊印的此经的效应，在其他死刑犯的身上也被验证了。

三、经文。第1纸第5折面第5行到完，有首题和尾题。与《大正藏》第85卷第1425页中栏第5行一下栏第11行相同。

参考书目：伯希和《柯兹洛夫探察队在黑城所得汉文文书》，第17号；孟列夫《黑城发现的早期出版物》，第148页；关于此作品见牧田谛亮《中国佛教疑经研究序说——敦煌出土疑经类》。

219 （原藏录号TK—118）

木刻本，经折装。折面 10×28.5 厘米，文面 10×22 厘米，单栏，面5行，行16—17字，或四句五言诗。两纸，每纸5折面半，共11折面。纸色淡黄，宋体字（12世纪末的）。此刊本包括序言和经文。有首题和尾题。同《大正藏》第85卷第1425页中栏第5行—下栏第11行相同。

背面是写本，在裱了的纸页上写有草书的西夏文（当时的裱褙，可能是13世纪的）。

220 （原藏录号Φ—337）《佛说竺兰陀心文经》

按密宗经的格式制作的疑经，包括起首部分（谈解救陷入罪恶深渊的亲属的必要性）、陀罗尼和结尾（谈解救的方法）。

木刻本卷子， 123×26 厘米，3纸。纸幅 43×26 厘米，单栏，纸色淡黄，纸质光滑，厚0.14—0.19毫米，宋代（今河南省的）刊本。包括两部分：

一、经文。40行，行15字。字大，宋体字。有首题和尾题（无“佛说”二字）。

从：“尔时佛说无上之法无上之因无上之”到：“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勿妄宣传”

二、题记，19行，行17—19字，字小，宋体字，使用了台头。题记中说，元丰二年（1079年）太常少卿薛公仲的儿子死了，陕西都运学士皮公公弼的女儿为解脱他的痛苦，于元丰三年（1080年）去寻找这部未收入经典中的经，并在关中找到了这部经，从此整个三秦地区都在诵读此经。卫州仁化寺净土院

僧人、讲解唯识论和因明论的贤惠与讲解《华严经传法界》的贤熙校订了此经。现在，这部经由“承议郎杨康国大明府乡贡进士”的儿子“璞、琬、瑰、琚、琯、琇”和女儿“四娘，五娘”刻印了五百卷，来纪念和超度他们去世的母亲“金华县君石氏”。刻印日期是：“元丰六年三月日施”（1083年6月18—7月17日）。

221（原藏录号TK—174）〔《佛顶心自在王陀罗尼经》〕

疑经，以释迦牟尼佛和观世音菩萨谈话的形式说出了下列陀罗尼的良好效应，这些陀罗尼是：《无量自在王智印大陀罗尼》、《姥陀罗尼》、《薄伽梵莲花手自在心王印》、《佛顶心自在王陀罗尼经印》。也提到了阿咤钺拘罗神。结尾是一则寓言，说有位官员被委派到怀州县，而行李却留在泗洲的普光寺。经文中又称此经为《佛顶心陀罗尼经》。

木刻本，经折装，首尾残缺。页码在右页边，黑底阴文。面5行，行14字，宋体字，无书题，经文中提到了书名（12世纪下半期的）。

从：“此威神悉能离苦解脱”到：“象钱一百贯文用作上官其时寺主”

相似的名称有：《佛顶心观世音菩萨陀罗尼经》，见《敦煌遗书总目索引》第409页；牧田谛亮《中国佛教疑经研究序说——敦煌出土疑经类》，载《东方学报》，第35号，1964年，第365页。

222（原藏录号TK—309）〔未考定出的疑经〕

经的最后一部分，提到的名字有：“魔王”、“弥勒阿夷哆”、“阿难”。

木刻本，蝴蝶装，1面（右半页），6行，行14—15字，或三句五言诗，宋体字，无书题。（12世纪上半期的）宋版本。

从：“彼为必度岸 如鸟破网出 得禅自在游”到：“者阿难及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223 （原藏录号TK—257）〔未考定出的疑经〕

经文，里面叙述了在香花园的一次聚会，这次聚会上谈的是延年益寿问题，并列举了十七种神，保存下来的神名有：

“结黄缕”、“毗遮诃”、“波婆那”、“金头陀”、“摩河波”、“……〔头〕陀”。

木刻本，现存两件残片，每片2折面，面5行，宋体字（12世纪中期的）。被剪成同样尺寸的残片，是从某个封皮的硬纸板上取下来的。

一、刊本开头的下面部分，8残行。书名阙佚，现存经尾，附有译者署名：“〈鸠摩〉〔罗〕什诏译”。从：“……佛住香花园”到：“……〔百〕二十岁快得”。

二、刊本的下面部分，10残行。从：“〔聋〕者能听盲者见”到：“…〔头〕陀”。

224 （原藏录号TK—303）〔未考定出的疑经〕

疑经的开头部分，出现的角色是名叫“吉般……”的大力鬼王。裁开做封皮硬纸板夹层的写本残片，楷书，小字双行夹注。界格精细（12世纪末的），现存三件残片。

一、一纸中间的残片，经文接近开头部分，6残行。

从：“（注释的右行）……标三类者〔也〕……”到：“……〔或〕居岩穴其形可畏通变极即〔从〕……”
〔多〕不属人天住居趣

二、上端的残片，两残行，

从：“分别念数无不了知^{初譬}”到：“涅槃云人觉知有贼^{口〔能〕为二起功口〔渐〕次增}”

三、上端的残片，6残行。

从：净“将前四行……”到：“〔苦也〕〔见〕……”
门皆是〔诸〕口

此外，封皮中还有一小页，10×9厘米，经修复上有大字“十字歌”（可能是与封皮有关的写本的外题）。

佛教活动家的作品

佛教活动家的作品（225—231）

225 （原藏录号TK—132）《镇阳洪济禅院慈觉和尚劝化文并偈颂》

镇阳洪济禅院慈觉（就是宗致）和尚的作品集，包括教言、忏悔文和诗集，由他的门人编出。此书名和地名在著录中未找到。

木刻本，蝴蝶装，文面24×16.5厘米，边栏双线，面8行，行15字，宋体字，白口上有书名简称《化文》和页码。此刊本分成以下几部分：

一、《慈觉禅师劝化集序》。页1上至页1下，此刊本的序言，说明这本文集是作者的一位门人所编。有首题，其后是小字的序，作者署名：“朝请大夫通判成德军府事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崔振孙撰”（成德军—其管区属现在的河北省）。最后是写序日期：“崇宁三年九月初八日序”，日期合公历1104年9月28日。根据年号和管区名称判断是宋版本。

二、文集目录。页1下至页2上，8行，共列出16篇标题。

三、文集正文。页2上至页3下，页4上至页45上，不到尾。有首题，其后为小字的文集编者的署名：“门人普惠编”。尾题：“慈觉禅师劝化文竟”。文集中有下列著作：

《莲池胜会录文》、《念佛忏悔文》、《念佛发愿文》、《发菩提心要略法^{依华严悲}门^{华二经集}》（目录中是《发菩提心文》）、《劝念阿弥陀佛防退方便并颂二首》（目录中是《念佛防退方

便)》、《净土颂》、《戒酒肉文》、《坐禅仪》、《自警文》、《在家菩萨修行仪》(目录中是《在家修行仪》)、《事亲佛事》、《豪门佛事》、《军门佛事》、《?中佛事^{普劝诸行百户修真实慈悲}》、

《公门佛事并颂》、《人生未悟歌》，辅国大师撰、《未悟歌》^{郎师撰}(目录中是《人生未悟歌二道》，即二首，指最后两部著作)。第一部著作中包括一则梦幻故事，讲述有个叫宗颐的人(他就是长芦禅师，参看本书编号226)在元佑四年(即1089年)冬做的梦。可见，文集的作者这年还在人世。间或有小字双行夹注，尾题后面残留一行题记的残片：“□□□佛悯[尘]……”。

参考书目：关于作者见明河《补续高僧传》卷十八，《大日本续藏经》，第134部，第2卷，第147页上栏至中栏；关于宗颐也见上书第147页上栏。

226 (原藏录号TK—133)《真州长芦了和尚劫外录》

真州(在今河北省)长芦寺一个名叫了禅师的和尚的作品集，由他的弟子们编成。作者也像真歇清了禅师一样，很有名，在1122—1128年任青原宗十三祖，约死于1133年。此书名未见著录过。

本刻本，蝴蝶装，面7行，行17字，宋体字，白口上有书名简称《劫外》和页码。现存页1至页38上(书尾，很可能是有题记的最后一面页38下被遗失)。此刊本分为以下部分：

一、《真州长芦了禅师劫外录序》。页1上至页1下。此文集的序言，末尾有序言作者的署名：“中桥居士吴敏序”。吴敏是宋徽宗(1101—1125年)和宋钦宗(1126—1127年)时期的有名官员，他使用“中桥居士”这一笔名是在12世纪20年

代。女真人占领北方（1127年）后他仍然忠于宋朝。既然此刊本是在北方刻印的，其出版年代就不会晚于1127年。序言颂扬了本书作者的美德，指出是作者的师祖芙蓉（即道楷，十一祖，死于1117年）和师父丹霞（即子淳，十二祖，约死于1121年）给作者传授了教理，作者在钵孟峰学习，在一苇江传教（两地在何处，不详）。与温伯雪子和净名居士齐名。

二、文集的正文。页2上至页38上，不到尾。有首题，其后是小字的编者署名：“侍者德初义初编”。包括以下部分：谈话记录（无标题）、《法要》、《机缘》，其中提到了作者在香山庵（即香山寺，今湖南省）和深州（今河北省）的住处与以下一些人物的会见，他们是：丹霞、保宁、法云（1025或1028—1091年）、云盖，长芦祖照。诗歌作品，《偈颂》，最后一首加了标题《宣和癸卯宴堂自赞》，标题中的日期合公元1123年，诗中提到作者这年进行佛事活动已满三十六年，也就是说，作者的佛事活动开始于1087年。

根据序言和最后一首诗提供的资料，此刊本大概刻印于1123年到1127年之间。既然书名中提到了女真人入侵的事，那么此刊本的刻印年代就应该是1127年。宋版本。

参考书目：关于作者见《补续高僧传》卷二十八（《大日本续藏经》，第134部，第2卷，第147页上栏）。关于序言作者见《宋史》第352卷，第2928页；《宋人轶事汇录》卷十四第700—701页。关于所提到的其他人物见《补续高僧传》卷八、卷九（《大日本续藏经》，第134部，第1卷，第79页中栏——第80页上栏，第147页上栏）；念常，《佛祖历代通载》，第28卷（《大日本校订大藏经》，第35帙，第11册，第14页下栏——第15页上栏）；《五家正宗赞》（《大日本续藏经》，第134部，表5，第469页中栏）。

227 (原藏录号TK—186) 《圭峰兰若沙门宗密注顺宗皇帝所问心要法门华严疏主清凉国师澄观答》

《大正藏》中未收入的作品和注释。包括澄观(737—838年)答唐顺宗(805年)和宗密(780—841年)的注释。

木刻本,经折装,全件。纸色白,涩滞,厚0.09—0.11毫米,宋体字。(12世纪前25的)宋版本。包括两部分:

一、版画。3折面,一纸,栏面28×20.5厘米,单栏。画中小桌上放着香炉,右边坐一僧人,站一侍者。左边坐着皇帝,站一官员。版画刻印精细。

二、著作和注释的正文。第1—4纸均4折面,第5纸2折面。页码在各纸右栏上。第1行是版画题词:“清凉答顺宗”。折面10.5×28厘米,栏面10.5×21厘米,单栏。此刊本的版画被分成两部分,下面是正文和小字双行注释,上面是注释结构示意,正文面5行,行10字。有首题和尾题。尾题:“注心要法门”。正文结尾有加了标题《心要法门颂》的五言诗。尾题下面是黑底阴文的施主题名:“善友施”,尾题上方盖有书主人的长方形淡紫褐色印章,4×5厘米,双栏,内为双行楷体:“李丑儿宅经记”。

封皮表面为黄纸,里面糊了一张有汉文文书(草体)的纸。封皮上有印下的书签:《注清凉心要》,黑底阴文,双栏。

228 (原藏录号TK—254) [《中华传心地禅门师资承袭图》]

是一部关于裴休相国(死于860年)问,宗密禅师(780—841年)答的著作。

木刻本,蝴蝶装。现存个别的几面,17×28厘米,栏面16×22.5厘米,上下栏单线,边栏双线。面7行,行18字。注释为小字双行,行18字。宋体字。纸色淡黄灰。无书题。白口上有书名

简称《承袭》和页码（12世纪初的）。纸页被裁开用作封皮的硬纸板，一面被裁成三条。宋刊本。经文见《大日本续藏经》第110卷，第435页下栏第18行—26行；第437页上栏—下栏第3行。

此外还有四件3×9厘米的碎片，其中的一件上有注释的片断：“〔亦知〕……”。

229（原藏录号TK—134）《通理大师立志铭性海解脱三制律》

通理大师的作品，其人其书在有关文献中均未被查到。

木刻本，蝴蝶装，纸色浅黄灰，页面28.5×20.5厘米，文面22.5×16.5厘米，双栏。面7行，行14字。有朱点，白口上有书名简称《立》和页码。12世纪前30年（到1127年止的）宋版本。保存了以下部分：

一、页1上，书首。从外面加贴了一张蓝纸封皮，封皮上有4.5×11.5厘米的书签，上印书名。书页上有首题：《立志铭心诫》，然后是作者署名：“通理大师制”。根据书名判断，此文集应包括两篇著作：首题中指出的那篇和《性海解脱三制律》，后一篇未保存下来。现存的部分（一个名叫“立志”者的墓志铭）赞颂了死者的美德。

从：“夫上士者不以世名是贵，但可道德”到：“之乡易往，入轮回乃苦恼之路难行”

二、页4下至页8上，上名著作的继续，不到尾。

从：“曾有吝，无为而济，不作而施，有力能”到：“性未狂歇，力不自由，以此悲心，但垂拨”

里边上有缝缀时被针扎破的小孔。

参考书目：伯希和《柯兹洛夫探察队在黑城所得汉文文书》，第20号。

230 (原藏录号A 26)《立志铭心诫》、《无上圆宗性海解脱三制律》

作品集，作者署名“通理”，附有后记。

写本，册页装，无首尾。用粗灰线缝成的两叠，第一叠有13个双页，前两页佚失，剩下24页；第二叠8个双页，16页；此外还有第三叠的一页（两面），没有直接和正文连在一起。面幅11×17.5厘米，栏面8×12.5厘米，栏线和界格均用尖木笔画出。面6行，行13字。笔画清楚，楷体，间或有修改处。纸色淡黄，此文集的总标题阙佚（13世纪初的）。现存以下部分：

一、40面，连在一起的两叠，前后佚失。现存下列著作：

1.第1—10面，《立志铭心诫》，首缺，有尾题。

从：“藏位不自居能不自我贤必为友”到：“识而可惊哉克志当行誓无违矣”

2.第11—21面，《无上圆宗性海解脱三制律》全文，有首题和尾题，首题后为作者署名：“通理大师作”。

从：“闻夫灵心是佛幻影元真见闻之性”到：“始终如一者也”

3.第31—38面，《恒润启近善定处获捧》，用作后记，是作者的名叫恒润的弟子寄给一位叫善定的人的呈文全文，宣扬了此作品的优点。有首题，结尾是：“法〔第〕沙门〔恒〕润上”。

从：“三解脱律及立志诫心铭文辞精”到：“垂荣览”

4.第38—40面，没有指出词牌的词，颂扬了对神仙生活的向往。第39至40面损坏严重，4节，第四节不到尾。

从：“色色苦因毒害怨亲溺贤德善”到：“……呵常忌十〔支（？）〕蜜防深六”

二、两面、损坏严重，根据笔体判断，他们是册子的一部分，在写本的上述部分的前面。这两面文字可能在前面，和写

本的上述部分不直接连在一起。

从：“于东……九天之位不下”到：“名而高者乃尘中之世士不可”

保存下来的所有各处，和本书编号 229 中的文字一致，大概这是原文和它的手抄本。

231（原藏录号 TK—241，TK—242）《注华严法界观门》

华严宗初祖杜顺或杜法顺（557—670年）的作品，附有序言、注和科。

用单页的纸印的木刻本，大概原准备粘连成卷子。纸幅 44×34 厘米，文面 44×24.5 厘米，单栏，每纸 16 行，行 10—11 字，注为小字双行，行 13—15 字。正文被分成两个栏面：下面的是正文和注，高 16 厘米；上面的是科，高 8.5 厘米。纸色淡黄，纸质柔软，厚 0.07—0.10 毫米，每厘米 7 道帘纹。每轮流相隔 1—5、5—5、5—1 厘米有道竖纹。宋体字，有手标的朱点和小红圈（其中有的是字词的音调符号）。

一、（本书编号 TK—241）上名作品，卷上，《真空第一》，第 2—28 纸，包括两部分：序言（第 2—12 纸第 15 行）和正文（第 12 纸第 16 行至第 28 纸）。第一纸上是序言标题：《〈注〉华严法界观门序》，小字的序言作者署名：“……州刺史裴休撰”。纸首沿栏线有小字：“……〔住拾传〕法赐紫遵式治□”（可能是一位施主的名字）。此作品有首题《注〔法界〕观门》和尾题。首题后是小字的注释者署名：“□（圭）峰兰若沙门宗密注”。正文开头有作者的名字：“京终南山释杜顺集”，注释中指出了他的异名，以及继承者的名字：二祖俨尊（即智俨，602—668 年）和三祖康藏国师（即法藏，643—712 年）。

从：“……〔自心〕如此之〔灵〕”到：“是故行由解成行起解绝”

见《大日本校订大藏经》，第32帙，第2册，第22页下栏第19行——第25页下栏第16行，序注和科在《大藏经》中无，段落的划分也不相符。

二、（本书编号TK—242）。同上书，卷下，“〔理事无碍观第二〕，周偏含容观第三”，首缺，第13—30纸，包括正文、最后的偈和题记。有尾题，在偈后面，尾题上方有手画的红色小标记号。

1.正文，第13—28纸（第8行）。

从：“（注释的第一直行）为无我理离”到：“障无阂深思之令现在前”。见《大日本校订大藏经》第32帙，第3册，第27页上栏第18行—第29页下栏第11行。《大藏经》中没有科，段落的划分也不相符。

2.“注略，法界，观门”。第28纸（第9行）——第30纸（第3行）。押韵的七言偈，每行一句诗。每句诗又以押韵的四句七言诗加以注释。有首题，其后是小字的作者署名：“杭乌山沙门智藏注”

从：“若人欲识真理空”到：“（注释的第二直行）。山河石壁不相妨。即是智通无窒阂”。

此作品有关文献中未被登录过，作者生活在741—819年。

3.题记。在第30纸上，字小，宋体字。24行，行22字。题记中说到了毗卢、文殊和他们显像的征兆。注释者定慧祖师（即宗密，780—841年）把注释分为注和科。相国裴公（即裴休，死于860年）作了序等等。题记的作者宣称，他是在帝里募工镂版印施此经的，接着指出若持若诵、或见或闻此作品的好处。最后3行是：“皇朝天盛四年岁次壬申八月望日汧道沙

门释法随劝缘及记/邠州开元寺僧西安州归义刘德真雕板印文
谨就/圣节日散施”。题记中的日期合公历1152年9月15日。

祈祷文、仪轨

祈祷文、仪轨 (232—257)

232 (原藏录号TK—218)

佛教祈祷文, 包括向各种神提出的祈求。

写本, 57.5×29厘米, 卷子的一部分, 无首尾。两纸, 均残。
24行。楷书, 字体大小不一, 写得不很好。无书题。纸张和字
体与后一时期 (10世纪末至11世纪初) 的敦煌写本相似。

从: “……〔谨请〕南方火〔头〕金刚为〔结〕……”

到: “阎罗天子〔焰〕……”

233 (原藏录号TK—250) 〔祈祷文〕

写本, 首尾残缺, 6折页, 折面8.5×17厘米, 两面都有正文。
面7行, 行13—16字, 或两句五言诗。小楷, 写得很不好, 无
书题 (11世纪上半期的)。有些折页局部沿折缝破裂, 被用粗线
缝缀起来 (当时的修补)。

1. 写本正面。祈祷文, 首尾残缺, 被分成两部分, 第二部
分的标题是《黄昏礼佛文》 (第2面第3行), 第一部分结尾一句
是“回向发? 了也”, 其中前四字可能是尾题, 共42行。

从: “光名 南无日光明佛 南无无遍宝” 到: “恒闻解脱
音弘誓平等度众生毕意”

2. 写本背面。祈祷文, 分成未加标题的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
(第1—2面) 是起首, 第二部分是对诸佛的称呼公式: “敬礼
……佛” (第3—4面), 第三部分是对从天神到有罪者的各种
人物的祈祷公式: “为……敬礼常 (或“上”) 主三宝”。共42行。

从: “于无遍界无遍无量作佛事供” 到: “为三途八难受

苦众生缘界礼苦敬礼上^三宝”

234 (原藏录号TK—262)〔密宗仪轨〕

同祭祀“大黑母”有关的经文汇编。写本,册页装,15面,用褐线缝在一起,外边损坏严重。面9行,行17—19字,或两句七言诗,或三句五言诗。字小,有许多改写处。有带小字双行夹注的陀罗尼,无总标题(11世纪最后30年的)。包括下列部分:

一、第1—8面,68行,包括下列名称的陀罗尼:《百字咒》、《命咒》、《空行母咒》、《拥护母咒》、《柔善母咒》、《勾标母咒》、《勇猛母咒》、《杀害母咒》,以及《赞叹偈》。有尾题。

从:“夫修习□欲放施食则于自面前置割八”到:“诵赞叹已”

二、第9—10面,曼荼罗画。标出了各部分的范围和应当染的颜色。四个门下各画着一盏灯,每个角落各一把剑,左边有曼荼罗名称:“胜妙宫”,整个画上都有说明性文字。

三、第11—12面。“大黑根本命咒”(尾题)。陀罗尼经文,11行。

从:“唵麻曷葛辣 臊捺訖哩^三怛发唵”到:“大黑根本命咒 竟”

四、13—14面,《大黑赞》。18行,第16—17行间添有小字,“警愿偈”。

从:“吽自性中而出生 具鸱鸟名大尊者”到:“十方食肉为侍从 百万摩诃亦围绕”

五、第15面,未加标题的五言偈,7行。

从:“拥护于正法 中围及佛殿 拥护禅定□”到:“复

归本官位 后请愿降临”

第10面背面有四个大的西夏字和一个西藏字。

235 (原藏录号TK—300) 祈祷文

经文，其中连续列举了对佛、九菩萨、诸佛和菩萨主持的五会的参加者，以及对三佛的祈祷语。往生极乐国的祝辞。

木刻本，卷子装，祈祷文的末尾，两纸，25行，提纲性的文字，都套用了同样的格式，宋体字。

从：“……品莲”到：“南无如来所居净□舍命已生其中”

236 (原藏录号Φ—249 + Φ—327) 《金刚亥母修习仪》

密宗佛教著作，有关文献中未登录过。叙录念诵各种心观“瓶佛”、“智亥母”的陀罗尼的规矩。提到了下列经名：《六甲咒》、《甘露金刚咒》、《百字咒》、《十二因缘咒》。

写本，全卷，92.5×13.5厘米，两纸，100行，行15—17字。纸色淡黄，厚0.07—0.15毫米，每厘米7道帘纹。天头宽1.5厘米，地脚宽1厘米，左页边长2厘米。小字楷书（11世纪末的）。有首题和尾题，首题后面是起首的祈祷语：“敬礼金刚空行母”，尾题后面有个“竟”字。

从：“夫修禅定者早晨起时沐浴清净于意”到：“末罗蒙弹指奉送归本位 竟”

背面有两个词：①“顶”；②“非寒”。

标题以“金刚王亥母”起头的写本，参看《西夏文写本和刊本》，第254—263号。

237 (原藏录号A4) 《护国三宝偈》

由祈祷性的不押韵的九言诗组成的作品。

写本，蝴蝶页粘成的折子。全文，8个双页和第9页的第一面，版心上有页码，第1页的前面有封皮的余幅，面幅6

×8.5厘米。面5行，每行一句诗。小楷，有首题和尾题（12世纪后30年的）。

从：“此世界中及与他世界”到：“如此真谛汝愿得安乐”

从背面沿外页边用纸条把各小页粘成折子（当时的裱褙），此外，背面还写了一篇文章，解释“妄见”、“见性”、“真见”、“安心门”等概念，每个解释都用七言韵诗（颂）。最后一行可能是尾题，面5—6行，行10—16字，或一句七言诗，或两句七言诗。小楷字，不很工整。文末添写了“如患梦”三字，行书。

从：“夫见性者复有二种一者真”到：“一切万行解行照心图一本”。

参考书目：弗鲁格《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藏汉文古佛教写本和刊本简明目录》第100号。

238（原藏录号B64）《金刚乘八种不共根犯堕》

记在一张卷子上的仪轨文。

写本，卷子装，首缺，188.5×22.5厘米，5纸（第1纸残）。共94行（第1—3行残），行19—21字，潦草的楷书，间或有标记（页边上有4个小圆圈）。有改写和涂改，纸色淡黄（12世纪末的）。

一、作品的结尾，专讲吃喝方面的戒规。11行（第1—3行残），末尾写着：“上来集轮法事 已竟”，第3—6字可能是此作品的名称。

二、上名作品，全文。开头先提到了作者：“吉祥形噜割说”。文中谈到了清除八种罪孽的仪式，83行。有首题和尾题，首题是：《金刚乘八不共犯堕》，尾题后有更小的字：“子”。

从：“吉祥形噜割说一切众生为执着世间贪欲”到：“提

矣”。

239 (原藏录号A8) 《赞佛称赞慈尊》

祈祷内容的文集。

写本,册页装,用白粗线缝在一起的8叠,每叠两个双页,被装订成双蝴蝶页,还有一叠是7个双页。共46面,面幅11×11厘米,面7行,行9—10字。纸色褐灰,小楷,不工整,此写本用尖木笔抄写,有许多改写和涂改。界格较粗糙(到第42行止)。用结实硬纸做的黄封皮,封皮上有白标签,栏内写外题字。此文集包括下列著作:

一、第1—15面,未加标题的经文,对“弥勒菩萨摩訶萨”的祈祷文,还包括对卢舍那佛和释迦牟尼佛的祈祷语和《弥勒真言》,103行。

从:“□边无根善根所引生故志”到:“唵萨罗缚 僧伽野南无窣都帝”

二、第15—22面,《寅朝礼》,对许多神的祈祷语,51行。

从:“敬礼毗卢遮那佛”到:“礼一切贤圣僧”

三、第23—31面,《五方礼一本》,对五方佛的祈祷文,此篇和下篇经文用另种笔体写出,61行。

从:“南无依法净土无相无为〔清〕”到:“白众等各礼刹那偈”

四、第31—35面,《三归依》,对“三宝”的祈祷,29行。从本文起各段尾被标了两排圆点。

从:“归依佛补住慈氏如来”到:“福”

五、第35—39面,《尊王乐》,26行。

从:“志心信礼释迦牟尼佛为”到:“萨……”

六、第39—42面,《四菩萨》,18行。

从:“文殊菩萨出现清凉”到:“世生净土法王家……”

七、第42—46面，《大献乐启请并真言》，包括《护安经》的引文，33行。

从：“护安经云佛说大献乐施”到：“同生居作弟子亦曾出”

许多页面的背面有字迹潦草模糊的记事，计有：

第2—3面，“宿赞”?? 12行。标题后是（作者?）署名：“南天竺国摩尼灰山大圣滨头卢尊者”，最后一行是日期：“光定八年”????（合公元1218年）

第3—6面，“门启佛”，有关亡姊的祈祷文，14行，最后4字用红笔写出。

从：“见故姊休信礼常”到：“乾三四月卦”

第8面，两行，被用红颜料重重地涂抹掉。

第14—15行，7行七言诗。

从：“稽首归依天官主”到：“愿灭三降诸烦恼”

第32—33面，祈祷文，6行。

从：“愿得智慧??了”到：“愿面慈尊亲供养”

第44面，“云何梵”，3行未写完的经文。

240（原藏录号A11）〔仪轨〕

叙述了用偈和陀罗尼起誓的仪礼。

写本，册页装，用浅黄色粗线缝成。面幅10×11.5厘米，文面8.5×9.5厘米。面6行，行10字，或一句七言诗，或一句九言诗。纸色淡黄，纸质柔软，有熨帖痕迹。楷书，有时页边上出现小字注释，间或有标记（每个诗节的开头标上黑圆点）。栏线和界格用尖木笔画出（13世纪初的），保存了以下部分：

一、两面。正文首尾残缺，提到了“奉洗足水”。

从：“虽于自性净清智”到：“奉洗足水”

二、上叠的最后一面，完整的两叠（一叠11个双页，另一

叠12个双页)、下一叠的五面。包括下列各篇:《七种供养》、《四住礼》、《二十供养》、《希有偈》、《赞叹偈》、《八天母》、《八天母供养》、《梵音天母》(最后三篇是提纲)、《?恩偈》、《七宝供养》、《六勇识偈》、《付五戒偈》、《赞六波罗密》(开头部分)。提到的仪礼有:“奉洗足水”、“奉香,奉花,奉灯,奉涂,奉食,动铃,巧饰八天母”。

从:“刺耶莎河 七种供养”到:“降于慈水除执恼”

三、下一叠的两面,最后一部分的结尾和《六度偈》的开头。

从:“西番六波蜜√罗”到:“如是布施我赞礼”

四、同一叠的9面,〔《六度偈》〕的末尾、《哀纳偈》、《五轮灌顶偈》的开头。

从:“安乐宫中救度者”到:“敬礼大觉正觉得成就”

241 (原藏录号A12)〔祈祷文集子〕

汇编,包括三篇经文:1.《释迦赞》(有尾题);2.陀罗尼;3.《小西方赞》。

写本,蝴蝶装,首缺。8个双页,面幅7.5×14厘米,下端损坏严重。面3行,行10—11字。楷书,此写本用尖木笔抄写,每节终了有一直排小圆圈。纸色浅黄灰,无总标题(13世纪初的)。尾题后面附记:“愿将以此最功德”。

从:“种种杂类诸雀白鸪孔雀□”到:“噫一会永赞西方”

参考书目:弗鲁格《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藏汉文古佛教写本和刊本简明目录》,第156号。

242 (原藏录号A14)《亥母集轮供养次第录》

仪轨,文献中未被著录过,经文中提到了《百字咒》。

写本,蝴蝶装,全文。8个双页,正文结束于第7页第一面,下剩为空页。面幅12×14厘米,面8行,行11—14字。纸

色淡黄灰，潦草的楷书。小字双行夹注。有首题和尾题（《金刚亥母集轮次第录》）（13世纪初的）。

从：“敬礼一切上师”到：“舍我曼任意东西矣”<sup>须悉帝割割”
阿巴轱</sup>

为了连接牢固，此写本沿书背外面糊了一条纸。

243（原藏录号A15）梦幻身要门

证“佛果”的仪轨文。

写本，蝴蝶装，全文。5个双页，面幅11×14厘米。面7行，行13—14字。纸色淡黄灰。此写本用尖木笔抄录，小楷。有首题和尾题，尾题是：《梦幻要门》，其后是汉文和婆罗迷文的五字陀罗尼（13世纪初的）。

从：“夫行上以梦为门要证佛果者须”到：“舍睡也此为明证”

第一面的背面有个“晨”字（藏书号）。

244（原藏录号A16）《甘露中流中有身要门》

有关避免妖术的仪轨。

写本，蝴蝶装，不到尾。5个双页，面幅11.5×14厘米。面8行，行12—14字。纸色淡黄灰，小楷，近于行书。有首题，其后是小字的作者署名：“少黑法师传”（13世纪初的）。

从：“敬礼一切诸上师”到：“幻中有者如前入定若出定特见”

245（原藏录号A17）《舍寿要门》

舍弃长寿的仪轨

写本，蝴蝶装。面幅11×14厘米，页1和页3。面7行，行13—14字。小楷字体，经文用尖木笔抄出。纸色淡黄灰，（8世纪初的）保存了以下几部分：

一、页1，作品开头，有首题，第1面的背面有个“烈”

字（藏书号）。第2面的背面有小字：“初作伽行”。

从：“敬礼真宝上师”到：各于九门严字闭塞谛观万法犹如”

二、页3，作品结尾，有尾题，其后有汉文和婆罗迷文的陀罗尼。

从：“缘哑字急称拽纆二十一遍望上牵”到：“成就”

参考书目：弗鲁格《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藏汉文古佛教写本简明目录》，第126号。

246（原藏录号A18）《拙火能照无明》

仪轨，以不押韵的七言诗解释调身养气的戒规。写本，蝴蝶装，全文，8个双页。面8行，行两句七言诗，小楷字体，小字双行夹注，有首题和尾题，首题是：“能照无明”，首题下面有小字双行的小标题：“风息执着共行之法”。文末可能是作者的名字：“罗厮_合吧上师”（13世纪初的）。

从：“敬礼成就诸上师”到：“依文显示故写录”

参考书目：弗鲁格《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藏汉文古佛教写本简明目录》，第76号。

247（原藏录号A19）《金刚亥母禅定》

思维修习活动的指南。文中提到了《百字咒》。

写本，蝴蝶装、全文。4个双页，面8行，行12—14字。小楷，近于行书。纸色浅黄灰，有首题和尾题。首题后面是作者署名：“那悉多 传”，尾题是“金 刚 亥 母 定”（13世纪初的）。

从：“夫修习者面向西坐归依三宝发？”到：“获五验八功二果报证得三身五智”

正文后面的附录为：①《饮食戒规》，10行；②《出定

仪》。

参考书目：弗鲁格《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藏汉文古佛教写本简明目录》，第110号。

248 （原藏录号A20）《大宝楼阁亲念作法》

解释念诵陀罗尼顺序的仪轨。写本，蝴蝶装，文首，1页（两面）。面幅8×9厘米，面6行，行8—9字，共12行。小楷，地脚上有兰查体梵文：𑖀、𑖥、𑖧，有首题（13世纪初的）。

从：“夫持咒者先须正坐”到：“字自身花月座上成释”

249 （原藏录号A22）《圆融忏悔法门》

多半是诗歌的忏悔文集子，有标题已佚的陀罗尼：《发菩提心》、《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忏悔除业障》、《随喜功德》、《请转法轮》、《请佛住世》、《常随佛学》、《恒顺众生》、《普皆回向》、《哀请摄授》、《求生净土》。

写本，蝴蝶装，首缺。现存6个双页及其前的1面和最后一页文末的1面。面幅10.5×15.5厘米。面8行，行13—18字，或两句七言诗。楷书，笔画清楚、熟练，此写本用尖木笔写成，小字双行夹注。纸色白，有尾题，其后是带小字标题《七支加行》的附记。共两行：“所八于一八以诸十二我昔四十方一四十方所^四礼敬 称赞 供养 忏悔 随喜 请转 回向”。这大概是简明目录。其后为另一种笔体写的《文殊（殊）智真言》（13世纪初的）。

从：“补厮并”到：“后转法轮回向等”

第一面背面有写得很大的西夏字“𐵄”。

参考书目：弗鲁格《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藏汉文古佛教写本简明目录》，第155、158号。

250 (原藏录号TK—285)〔仪轨〕

解释光的出现及其涵义的文字，包括最后一篇标题是《九事显发光明义》的经文结尾。

写本，蝴蝶装，1页。面幅11×14厘米，面7行，行14—23字。小楷字体，此写本用尖木笔写成（13世纪初的）。

从：“一刹那中忽尔经过空无益若曾”到：“九身光显内前之三身未必为道因后之六身正是道因也”

改正过来的字写在被改正字的背面。

251 (原藏录号TK—292) 文殊智禅定

记述拜祭文殊的仪轨。

写本的第一面，蝴蝶装，面幅7×10.5厘米，面5行，行11字，或三句四言诗。小楷，笔迹潦草，有首题（13世纪初的）。

从：“夫修习者？身正坐具严六”到：“我及有情 令除愚痴 俱获智惠”

252 (原藏录号TK—74) 《大集(编)五？声(颂)一半》

祈祷文汇编(偈、赞美歌、陀罗尼等)，有以下标题：

《领偈》、《遣魔偈》、《遣魔结界偈》、《……偈》、《赞礼颂》、《供养偈》（九篇不同的经文，第二篇前面有说明：“二十供养。次念四密供养。^{同供}八养”）、《赞叹偈》（十篇不同的经文）、《忏悔偈》（十篇不同的经文，标题后面有

“捺么”二字，第一篇前面有说明：“次赞五方佛^{同念之}”）、

《吉祥偈》（九篇不同的经文）、《回向偈》（两篇不同的经文）、《礼赞偈》（八篇不同的经文，第二篇前面有眉批：

“下卷”）、《回向善根偈》（八篇不同的经文）、《五欲乐》、《方隅八天母供养偈》、《四方空行母供养偈》、《二十种舞供养》、《转法轮偈》、《六十二佛名》、《回向祝赞

文》、《哀纳偈》。

写本，册页装。用粗黄线把纸页缝成小叠，各小叠再缝缀在一起。共5小叠，第一叠存第4—32页（第1—3页佚失），第二至四叠各40页，第五叠8页。页面 10.5×17 厘米，文面 8.5×14 厘米，外页边上的栏线是双线。面7行，行18—20字，或两句七言或九言诗，或一句十一言诗。小楷，间或有小字双行注释（13世纪初的）。

从：“□□〔一〕切正〔觉〕等随于胜〔惠〕□□□”
到：“施主父母并眷属愿见吉祥上乐面”

253 （原藏录号TK—284）〔祈祷文〕

有两篇祈祷文的梵夹页，写本。

四层 28×13 厘米的纸粘成的1页。文面 23.5×9.5 厘米。单栏，经文用尖木笔写出，小楷。纸色淡黄（14世纪中期的），两面都有经文。

1.《礼佛仪轨》。正面，编写成提纲的礼拜诸佛和菩萨的祈祷文，18行，每行一佛或菩萨名。

从：“最上三宝处”到：“释梵四王处”

2.《七佛供养仪》背面，17行，行13字，或两句五言诗，有小字双行注释。

从：“初遣魔次拼授供物次增长官”到：“曷伽请忍奉送回向”
则略于忏悔等文末，后唯你一遍余可付之

254 （原藏录号B2）〔祈祷文汇编〕

净土宗的不同作者的祈祷文汇编。写本，册页装，首缺，用桔红色粗线把5小叠缝在一起。第一叠保存了最后5面，第2、3、5叠各12个双页，第四叠10个双页，共51面。文面 11.5×16.5 厘米，栏线和界格用尖木笔画出。面9行，字体不一。

经文用尖木笔写出。楷书。有许多改写处，正字改写在文中和贴掉错字的小纸块上。纸色淡黄灰（14世纪中期的），有下列著作的正文。

一、第1面，作品末尾，以祈祷偈《往生极乐偈》收尾，楷书，行14字，或两句七言诗，或三句五言诗。

从：“白众等各诵往生极乐偈”到：“皆愿成佛道”

二、第2—5面，未加标题的作品，文前有作者的署名：“唐彦琮 法师 集”。（彦琮可能就是彦棕，7世纪后半期人）。字体同上，每行三句五言诗。

从：“志心归命礼 西方弥陀佛 法藏因弥远”到：“宝殿逐身飞 有缘皆得入 止是往人稀”

三、第6—38页，《无量寿如来念诵修观行仪轨》。小楷，行18字，有首题和尾题，首题后有字体更小的译者署名：

“特进试鸿胪卿大兴〔善寺三藏沙〕门大广智不空奉^诏译”

从：“尔时金刚手菩萨在毗卢遮那佛大集会中从”到：“极乐世界 出北经槐字号”。见《大正藏》第19卷，第67页中栏第26行—第72页中栏第14行。

四、第39—51面，《西方净土礼》。楷书，行15—18字，或两句七言诗，或三句五言诗。有首题和尾题，首题附有小标题：《依流水调》，其后为小字作者署名：“无注沙门慈觉大师普平 集”。尾题后面有此文出版者的署名：“洪济禅院比丘普珂 门板”。正文末和尾题之间有陀罗尼经文《灭罪真言》。

从：“请佛”到：“等所求心愿诸佛摩訶萨”

参考书目：弗鲁格《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藏汉文古佛经写本简明目录》，第159号。

255 (原藏录号B59) 《吉祥大黑正文》

专讲崇拜大黑母程序的仪轨。文中反复出现这种祈祷格式：“敬礼吉祥形噜割”、“敬礼妙微上师”。

写本，册页装，首缺。用草绿色粗线缝成的4叠，共72面。文面11×18厘米，面11行，行17字，或三句五言诗，或两句七言诗。小楷，笔画清楚，有改写处，间或有小字双行注释。纸色淡黄（14世纪中期的）。此写本由下列部分组成：

一、序言，标题阙佚。第1—9面。

从：“〔妙女内有〕□□污得法师者〔厚〕……”到：“唵萨瓦渴渴渴口四□□乌啞悉怛末伽乌啞悉怛末怜莎诃”

二、上名作品。第9—71面，引言（第9—13面）后面指出作者“觉唱师造”，往下（第13—71面）为正文，包括陀罗尼和偈：《根本咒》、《心咒》、《命咒》、《大黑八足赞叹》、《空行母咒》、《拥护母咒》、《柔善母咒》、《勾标母咒》、《勇猛母咒》、《杀害母咒》。有尾题的片断（“大黑……〔竟〕毕”）和首题。

从：“敬礼吉祥形噜割”到：“普及法〔界诸〕有情同证四身大乐理”

三、未加标题的后记，其中提到了《七言真言》。第71—72面。

从：“敬礼吉祥形噜割”
到：“咒则极恶重病尚得解脱况余矣”

参考书目：弗鲁格《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藏汉文古佛教写本简明目录》，第161号。

256 (原藏录号A7) 《慈乌大黑要门》

陀罗尼经文，附有对所崇拜神的特征的描述。

写本，纸页缝成的册子，毗邻两页的字面相反。用白粗线缝成两叠，第一叠10个双页，第二叠4个双页，共28面。文面8×8厘米（14世纪中期的）。

一、第1—18面，作品正文，面7行，行9—10字，小楷，有修改处。包括下列陀罗尼：《净法界咒》、《喫咒食》、《大黑根本咒》、《随意咒》，《亲心咒》、《施寻咒》，《共施食咒》，还提到：《五供养》、《紧咒》。有首题。

从：“^{师传}_{口口}罗麻尚师传罗麻没隆”到：“供养依法不作不能所成”

二、第19—28面，写成大字的各种祈祷文，其中有：《五供养真言》、《四面咒》（两遍），最后两面上有魔圈画，大符号和图画（去掉内脏的鸭子）。

257 （原藏录号A9）《本尊禅定》

叙述思维修习仪式的仪轨，包括下列陀罗尼：《真空咒》、《四面咒》、《变空咒》、《？食咒》、《百字咒》、《本佛六甲胄咒》、《亥母六甲胄〔咒〕》、《本佛观心咒》、《亥母亲心咒》、《亥母合字咒》。

写本，册页装，用浅黄色粗线缝在一起的两叠：第一叠7个双页，第二叠9个双页，最后三面佚失。文面6.5×9.5厘米，面9行，行11—12字，或一句七言诗。正文在第1—22面上。小楷，有首题，其后用更小的字标出作者名字：“天竺上师？？传”（14世纪中期的）。上下封皮用汉文刊本的厚纸做成。上封皮上写了两个“天下”。

从：“若作禅定者早晨起时于软（？）面”到：“怛发 怛莎诃”

正文后面有婆罗迷体大字（第23面），陀罗尼（第24—25

面)，内容不清楚的图画(第27面)，婆罗迷文对照的陀罗尼。

儒家和道家的作品

《论语》《258、259号》

258 (原藏录号TK—268B) 《论语》

被拆开了的一个写本的两小页残片，原来粘在一起，以便在背面写上文字。楷书，笔画清楚，朱点，有一字的左上角标有小红圈(12世纪下半期的)。内容为《子张第十九》(见《四部备要》，第8卷第87页上栏第2行一下栏第2行)和《子路第十三》(见《四部备要》，第8卷第59页上栏第17行一下栏第8行)的片断。写本详细的叙录和正面内容见本书编号340。

259 (原藏录号TK—208) 同上名，《微子第十八》

残片，15.5×19厘米。写本，册子的一页，上端残缺，6行(第2—6行残)，行10字，楷书，朱点，无书题(14世纪中期的)。见《四部备要》，第8卷第83页上栏第17行一下栏第7行，

《吕观文进庄子义》(260号)

260 (原藏录号TK—6) 《吕观文进庄子义》

吕惠卿(约卒于1110年)注释的《庄子》，注者在1094—1097年间获“观文殿学士”称号，此刊本大概是这几年来刻印的，此注释曾于1084年呈送皇帝，约在14世纪佚失。

木刻本，蝴蝶装，109个双页，白口上有书名(《庄子》)、卷号和本卷页数。面10行，行17—20字。小字双行注释，行25字。页面24.5×20厘米，文面22.5×17厘米。纸色灰，厚0.05毫米，行间用竖线分开，宋体字，宋代皇室刻本(11世纪末的)。现存5卷正文。

一、《庄子内篇义，卷第一》，〔《齐物论第二》〕。

4页（第24—28页），卷尾，末尾正文后面有手书大字：

“茂承”。第24页的页边上有个手书的“鬼”字，有尾题。卷数“一”用红墨改写为“台”，文中印错的字被改写过来并标上红墨记号。文字和《四部备要》第151卷第14页上栏第7行—第15页上栏第26行相同。

第28页的背面有手书的描写风景的词，主题同庄子所讲的蝴蝶有关，这首词可能未完。5行，行15—16字，楷书，笔画潦草，不清楚。

从：“粉翼香鬟轻强尽是天付弄情携等闲”到：“随得卖花人去”

二、《吕观文进庄子内篇义卷第二》、《养生主第三》、《人间世第四》、《德充符第五》。27页（第1—25页、第27—28页）。此卷正文缺1页，文内和页边上有许多用红墨和黑墨作的修改和眉批。书尾有手写的很大几个“茂”字和一个“茂承”。有首题、尾题（《庄子内篇义卷第三》）和各篇标题，文字和《四部备要》第151卷第17页上栏第1行—第28页上栏第24行相同。

三、同上名卷第三、《大宗师第六》、《应帝王第七》。23页（第1—2、4—21、23—25页）。此卷正文缺两页，末尾有大写的“茂承”和显然是用尖木笔写的一些不清楚的字：许？、菩。有首题、尾题和各篇标题。文字和《四部备要》第151卷第29页上栏第1行—第38页上栏第19行相同。

四、《外篇义卷第四》、《骈拇第八》、《马蹄第九》、《胠箴第十》、《在宥第十一》。26页（第1—26页）。此卷正文显然缺最后一页，有首题和各篇的标题。文字见《四部备要》第151卷第39页上栏第1行—第49页下栏第20行，到“不明”止。

五、〔同上名卷第五、《天地第十二》〕、《天道第十三》、《天运第十四》。29页（第3—27、29—32页）。此卷正文缺开头、中间1页和结尾，最后两页损坏，有第十三和第十四篇的标题。文字见《四部备要》第151卷第51页上栏第20行—第61页下栏第20行。

全卷有少量的异文，其中许多大概是未被纠正的错字。

“茂承”可能是书主人的名字。

参考书目：关于作者见《宋史》第471卷；《四十七种宋代传记综合引得》第131页。关于注者见伯希和《柯兹洛夫探察队在黑城所得汉文文书》，第6号；《宋史艺文志·补·附编》第96页书名《庄子解十卷》；弗鲁格《10至13世纪中国宋代书籍印刷史》，第54—55页；孟列夫《黑城发现的早期出版物》，载《亚洲民族研究所通报》，第7册，第148—149页；戴密微《黑城发现的早期出版物》，载《通报》第51卷第1—5期，第452页；《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第1152—1153页；T·F·卡特《中国印刷术及其向西方的传播》第222页。版本和研究著作见《宋吕氏庄子义》；陈仁中《校辑吕注庄子义序》，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7卷，1935年第5期，第7—10页。傅增湘《跋宋本吕惠卿庄子义残卷》，载《北平图书馆馆刊》，第5卷第2期，第1—2页；《中国版刻图录》第256号。

《南华真经》（261号）

261 （原藏录号TK—97）《南华真经》

郭象（？—312年）注释的《庄子》，同女真金国的刊本相似，大概是属于12世纪末或13世纪初的刊本。

木刻本，蝴蝶装。25个双页和3个单页。白口上的页码形式为：“上庄子八十一”，“上”字的意思不明白，往下是书

名、卷号和该卷的页数。面13行，行26—29字，注释为小字双行，每行32字。页面26×20.5厘米，文面24×17厘米；边栏为双线，有界格。纸色灰，涩滞，厚0.09—0.12毫米，每厘米8道竖帘纹。此刊本现存以下部分：

一、〔卷八，《徐无鬼第二十四》〕。文字和《四部备要》第151卷第98页下栏第19行—第99页上栏第17行相同。

二、《庄子杂篇》（各篇的所有标题前面都有这四个字），〔《徐无鬼第二十四》〕、《则阳第二十五》、卷九，《外物第二十六》、《寓言第二十七》、《让王第二十八》。有卷八的尾题和卷九的首题（各卷所有书题均为《南华真经》），第二十五至第二十八篇的标题，其下均标明“郭象注”（以下皆相同）。此外，在页边上有手书的各篇名称。文字和《四部备要》第151卷第99页下栏第19行—第114页下栏第15行相同。

三、同上名，卷9，〔《盗跖第二十九》〕、《说剑第三十》、卷10，《渔文第三十一》、《列御寇第三十三》。卷九页11下至页14下，卷十页1上至页6下。

文字见《四部备要》，第151卷第116页上栏第26行—第126页上栏第10行。

参考书目：伯希和《柯兹洛夫探察队在黑城所得汉文文书》，第5号；弗鲁格《10至13世纪中国印刷术简史》，表五；孟列夫《黑城发现的早期出版物》，载《亚洲民族研究所通报》第7册，1961年，第149页；戴密微《黑城发现的早期出版物》，载《通报》，第51卷第4—5期，1964年，第452页；《宋史艺文志·补、附编》，第4卷，第96页。

《太上洞玄灵宝天尊说救苦经》（262号）

262（原藏录号TK—151）《太上洞玄灵宝天尊说救苦经》

木刻本，经折装，全文。4纸，共13折面。保存下来的第1纸的折面前面可能还有两折面版画。折面11×28厘米，文面11×18.5厘米。单栏，面4行，行12字，或两句五言诗，或列出一个天尊的称号，天尊称号的上方有一条高6.5厘米的版画，画着十大天尊，高踞宝座，手握拂尘，各像的大小相等。纸色淡黄，涩滞，厚0.13—0.16毫米，每厘米8道帘纹。字型是毛笔写刻体楷书，有首题和尾题，宋刊本，可能是12世纪20年代的（在《道藏》中书名是《太上洞玄灵宝救苦妙经》）。经文中增补的题记指出，此书最初在1124年（宣和甲辰）刻印于尹州（在今安徽省），此刊本是1124年本，或者是同它年代相近的刊本，伯希和把这两种版本混为一谈是错误的。

文字和《道藏》第182卷，服四，第1页上栏第25行—第2页下栏第7行相同。

参考书目：关于作品见Wieger，第371号（书名《太上洞玄灵宝救苦拔罪妙经》）。关于此版本见伯希和《柯兹洛夫探索队在黑城所得汉文文书》，第18号；弗鲁格《10至13世纪中国印刷术简史》，表三（刊本照片）；弗鲁格《10至13世纪中国宋代书籍印刷史》，第82—83页（认为此版本是属于1191—1192年的）。

《礼记》（263）

263 （原藏录号TK—314）〔《礼记》注释〕

未考定出的《礼记》注释，大概是对《月令第六》的注释。在加有小注的释文中，考定了各种星宿的名称和它们在古代中国的方位。

三件木刻本残片，蝴蝶装，单栏，有界格，小宋体字，双行小注。纸色灰褐，涩滞，厚0.08毫米，帘纹模糊，每厘米8

道。金版本（13世纪上半期的）。

残片一，4.5×16.5厘米。左页面，下端残缺，4残行，白口上有书名残字“记”和页码“八”。

从：“……〔之〕分寿星郑之〔分〕……”到：“曰经星^{恒经}_{皆常}汉书音义云瑞星曰景星亦曰德星……”

残片二，12.5×3.5厘米，一条下边。地脚高1厘米，11残行。注释的分界处有：“……对”，黑底阴文。

从：“……相连□”到：“（小注的左行）……女织〔女〕□”

残片三，12.5×3厘米，页面上端，文字未保留下来。

历史著作和文学作品

历史著作

历史著作（264—266号）

（原藏录号TK—315）〔《汉书》颜师古注，卷六十六陈咸传〕

木刻本残片，14×10厘米，一面的上半截，首尾残缺，单栏，13残行。小号宋体字，有界格，双行夹注，字很小。纸色灰，纸质光滑，厚0.05—0.06毫米，每厘米7道帘纹。无书题，金版本（13世纪上半期的）。文字和《四部备要》第53卷第949页上栏第23行—下栏第14行相同。

265 （原藏录号TK—290）〔《新唐书》，列传〕

被裁成一本不知名书籍封皮硬纸板的4件刊本残片。原先的式样是蝴蝶装，原面15行，行29字。界格纤细，字小，宋体字。根据纸型判断是12世纪90年代绍兴刻印的宋本。

一、卷223下，《奸臣崔昭纬、柳璨传》。一页的左上角

残片，13残行。文字和《四部备要》第78卷第1729页上栏第9—20行相同。

二、《玄晖传》。一页的左上角残片，13残行。文字和《四部备要》第78卷第1279页下栏第13—25行相同。

三、卷224上，《叛臣周智光、梁宗义传》。一页的右上角残片，13残行。文字和《四部备要》第78卷第1733页上栏第23行——下栏第9行相同。

四、《李怀光传》。一页的左上角残片，13残行，文字和《四部备要》第78卷第1734页上栏第21行——下栏第17行相同。

266 (原藏录号TK—316)〔未考定出的晋朝历史著作〕

晋朝的历史著作，带有注释。内容从〔宁康〕二年到太元元年(374—376年)。

两件木刻本残片，折缝朝外的蝴蝶装，每件残片都是一页，版心上有白口的上半截，上栏为双线，外线粗，宋体字，小字双行注释，注释的正文之间有界格，年代上方的页边上有小字的干支年号，白口上的书名和页码阙佚。纸色褐，元刊本(14世纪上半期的)。

残片一、14.5×17厘米，11残行，年代有“甲戌”，“乙亥”。

从：“(注释的右行)：□坚改〔容谢〕……”

到：“(注释的右行)□猛寝……”

残片二、16×16.5厘米，12残行。年代有“丙子”。

从：“〔禁〕老庄图……”到：“(注释的左行)：□□□使〔谓〕……”

文 学 作 品

文学作品 (267—276号)

267 (原藏录号TK—291) [古文]

两件木刻本残片，原先的式样是蝴蝶装。每件均大13.5×10.5厘米，系一页的右上角，被剪下做封皮硬纸板。字小，宋体字。纸色褐灰，根据纸型判断是13世纪30年代绍兴刻印的宋本。

一、以武王伐纣为例，论救天下之患，提到了孟子。13残行。

从：“以救天下之患徘徊四顾未〔知〕……”到：“商山之四老其胸中尤有〔过〕……”

二、两篇著作，第一篇（结尾部分），内容不详。第二篇题为《问司马迁班固言〔六〕〈家〉……》，13残行。有朱点，

从：“之道则同也推是数者观之……”到：“可以去也正上下之分此……”

268 (原藏录号TK—272) [佛教作品]

片断，其中的文体推测是骈体，并有许多佛教术语。大概是中国佛教作品。

写本残片，14×5.5厘米，一页的上端，8残行，楷书（12世纪末的）。

从：“妄想之……”到：“观色……”

269 (原藏录号TK—236) [诗]

描述国家安定和实行仁政的七言押韵诗。写本，1小页，23.5×20.5厘米。9行，行8—12字，纸色灰，字大，行书。有许多黑墨作的改写和涂改（14世纪上半期的）。

从：“怜悯？？我不能”到：“□国之平”

270 (原藏录号A20BⅢ) [诗]

描写牧人生活的八句七言诗。八首，有下列标题：《亡二四牛》、《亡半三牛》、《亡四两牛》、《亡五一牛》、《牛亡人有》、《人牛俱亡》、《全尘六牛》、《亡一五牛》。标题同诗歌内容有何关系，不详。

写本，卷子的一部分，缺下端，54×13.5厘米。3纸，大小不一。40残行，用尖木笔写的楷书。纸色浅黄灰（14世纪中期的）。

从：“亡二四牛”到：“饥餐渴饮平生事 云任高……”

此写本被用来裱糊别的刊本，参看本书编号190。

271 (原藏录号TK—206) [诗集]

关于王子（即佛）出家的叙事诗（五言至九言诗）。

写本，经折装，两纸，19折面。首缺，最后一面只剩左下方的四分之一。面4行，每行一句诗，共72行，第12、44、60、61、68、69行残（缺下面的字），第75—76行缺上半截，第73—74行阙佚。纸色淡黄，大楷，无书题（14世纪中期的）。

从：“回马向南门”到：“……修善”

272 (原藏录号A20BI) [词]

写本，由单个的纸页（可能是被剪成几块的卷子）组成。共保存下来4纸，13.5×21厘米，上下栏单线。小楷。词牌名独占一行，同一词牌的上下阙之间空一字，尖木笔抄写，纸色浅黄灰（14世纪中期的）。

一、1纸。12行，行20—25字，词牌名有：《大圣乐》、《蓦山溪》。

从：“大圣乐”到：“云龕佳趣回出诸绿虑空洞杳宜中自有好清虚活路”

二、1纸。12行，行19—22字。词牌名有：《山亭柳》。

《满庭芳》、《小重山》。

从：“山亭柳”到：“小重山”

三、1纸。10行，行18—21字。词牌名有：《声声慢》、《木槿花》。

从：“声声慢”到：“棘虎狼窝略不平治干热乱漫波波”

四、1纸。12行，行16—22字。词牌名有：《醉蓬莱》、《小镇西》。

从：“醉蓬莱”到：“〔还乘〕劣放无明骋打一团焦热阉家大伯把？当特领拽”

五、一纸的下半截，11残行。〈满〉庭芳词牌。此残片损坏严重。

从：“……庭芳”到：“……〔着〕斜街义路狂走落便宜”

273 （原藏录号TK—221）〔诗文〕

描写酒宴的诗文（韵文？）。

写本残片，12×9.5厘米，一页下端的片断。5残行。纸色淡黄，行书（14世纪中期的）。

从：“……〔子〕前左”到：“……〔有也〕”

274 （无藏录号）〔刘知远诸宫调〕

诸宫调体的作品，现存第一、二、三、十一、十二题。木刻本，蝴蝶装。面幅9×13厘米，文面8×11厘米，上下栏单线，边栏双线，外线粗。面12行，行20—20字，有界格。字小，宋体字。题名和最后的尾名是大字，占两行。尾名和宫调、曲名的上方有符号一（中间的曲名上没有），各曲的上下片之间被用符号①分开。白口上有各题的标记“刘一”、“知二”和该题的页码。纸色白，纸质柔软，厚度和帘纹未查明，金刻本（13世纪初的）。现存以下各题：

一、《知远走慕家庄沙陀村入舍第一》。10个双页。前两页的页码阙佚，大概是第1—2页，剩下的是第5—12页。有首题和尾题。

1.从：“【商调】回戈乐引子”到：“列土床滋味胜高阳一碗了时添一碗淋淋漉漉喱”

2.从：“须冒扫似颏下坎熊皮①七翁望〔见〕先皱眉客人听我说”到：“洪义手持定荒桑棒展臂一手摔定刘知远衣服”

二、《知远别三娘太原投事第二》。10个双页，第2—11页，全文（页码从2开始）。有首题和尾题。

从：“李洪义笋剥知远身上衣服与布衫布裤泊了”到：“知远既许亲事立节级妻李嫂并王嫂二人为媒”

三、《知远充军三娘剪发生少主第三》。前两页，页码从2开始，有首题。

从：“【仙吕调】六么令”到：“地院后庄前俺三娘传示”

四、《知远探三娘与洪义厮打第十一》。首缺，7个双页，第4—10页。

从：“村□□改嫁为不肯把头剪却绮罗□□〔布〕衣交□”到：“当日四口儿性命”

五、《君臣弟兄子母夫妇团圆第十二》。全文，第1—13页。有首题和尾题。

从：“【正宫】应天长”到：“有头尾结末刘知远”

此刊本现存北京图书馆。

参考书目：录文见M·威林格鲁瓦《〈刘知远诸宫调〉版本》，又见孟列夫《黑城发现的早期出版物》（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柯兹洛夫藏卷汉文部分），载《五洲民族研究所通报》，1961年，第7辑，第148页；《论诸宫调体裁和〈刘知远诸宫调〉》；《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

的远东和中亚写本藏卷》，载《考古学年鉴（1970年）》，第282页。戴密微《黑城发现的早期出版物》（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柯兹洛夫藏卷汉文部分），载《通报》，第51卷第4—5期，1964年第451—452页；《中国版刻图录》，第257号。版本见：1937年北平版、1958年北京版。

275 （原藏录号TK—232）〔千字文〕

写本残片，9×18厘米，首尾缺，3行，第1、2行全，每行一句诗（4字）。纸色淡黄，楷书，字很大（14世纪上半期的）。

从：“祸因恶〔积〕”到：“□□〔非宝〕”

276 （原藏录号TK—228）新雕《文酒清话》卷5—9

笑话集。从卷5结尾至卷9开头。保存了以下故事：卷五《笑昧》、《哈诈》；卷六《李成触忌》、《哈勇》、《笑拙》、《笑什》、《消轻浮》、《眉眼争强》、《消假文……》、《安鸿渐报辱》、《陈大卿诗》、《言棋》、《陈大卿》、《哈鄙》；卷七《高敖曹》、《李成》、《消妄知》、《消妄辩》、《恶诗》、《杜人经》、《焦大使》、《杜力文》、《孙山三事》、《消谬诗》；卷八《高敖曹》、《安鸿渐》、《陈大卿》、《消疾》、《冯勤》、《封舜臣》、《白行简》、《愚盗》、《呼延赞》、《张元消拙》、《消蒙〔鄙〕》；卷九《哈谄……》、《哈随顺》、《钱大王》、《钱王〔圆〕……》。

木刻本，小册子，刊本的一部分，无首尾，现存18面和封皮硬纸板的一些小页，面幅12.5×20.5厘米，栏面11.5×17.5厘米，上下栏单线，边栏双线，外线粗。面15行，行27—29字，字小，宋体字，行间有界格。各卷首题和尾题上方标有符号一。此刊本破损厉害，尤其是中间部分最为严重。纸色灰褐，纸质柔软，厚

0.07—0.08毫米，每厘米9道帘纹。金版本（13世纪初的）。

从：“丘源本非儒者乍开书铺既久亦〔有〕官官诒铺下文
字一曰有冯斋”到：“再拜曰……菩事〔吾〕与你千斤□吾每”

此外，还有一面的上半截残片，11×10厘米，大概是卷九
的钱大王故事。

封皮硬纸板上有许多写着西夏文的小纸页和1189年10月29
日的刊本《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的版画残片，参看本书
编号 134。

文 集

文集（277、278号）

277 （原藏录号A21）〔各种文章的汇集〕

包括医方、诗文和仪轨在内的文集。

写本，小册子。两叠，用灰粗线缝在一起，第一叠有18个
双页和3个插进去的单页；第二叠有3个双页，共45个单页。
面幅9.5×14厘米，纸色浅黄灰，用尖木笔抄写，为不同笔体
的楷书，有改写和涂改处（14世纪初的）。此文集中有下列作
品：

一、《神仙方论》

药方，附有服药的顺序说明。第1—15面，面6行，行11—
12字，小字双行注释，有首题。

从：“治脾胃不和姜合丸”到：“鸡”

第10面背面写着6行字，包括下列陀罗尼：《除毒咒》、
《召请咒》、《执火〔咒〕》、《施食咒》。

从：“唵末罗野葛罗吽发 除毒咒”到：“吽吽发 施食
咒”

二、/词/词牌“慢二郎”

第15面(背面)至第17面。面5—6行,行9—10字。每阙后面有个“又”字,指明词牌重复。

从:“古往今来?过卜换了多少”到:“佛上为佛母”

三、《吉祥金(刚)手烧坛仪》。

第18—19面,仪轨,叙述崇拜吉祥金刚手的程序。仪轨中被引用的陀罗尼轨有:《遣毒咒》、《请火神咒》、《多门真言》。面6行,行12字,有尾题。

从:“敬礼吉祥金刚手”到:“罗野发供养取伏不同也”

四、〔也是同金刚手有关的仪轨〕

第30—33面。仪轨中引用了《变空咒》。面6行,行11—12字,无书题。此文大概是上文的继续。

从:“若要求修青衣金刚手法事”到:“〔结等持〕印竟自忌〔头〕……”

五、第34面,包含有佛教概念的提纲,内容不详。

六、〔仪轨〕

第35—45面。描述了金刚天母,记述了崇拜她的道具和仪式。文中有以下祈祷文和陀罗尼:《七宝供养》、《西番赞六波罗蜜》、《西番五供养》、《西番五方〔供养〕》、《三(宝)三尊四菩萨赞叹》。面6行,行12—13字,或两句七言诗,无书题。

从:“□□〔赤马〕……”到:“一义微妙成最上 称赞善成法敬礼”

参考书目:弗鲁格《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藏汉文古佛教写本简明目录》,第157号①—⑥。

278 (原藏录号A32)〔各种作品的汇集〕

包括祈祷文、疑经和占卜文的汇集。

写本,小册子,首尾残缺。用灰粗线缝在一起的三叠,第

一叠原有32面（16个双页），第22—24面被撕去；第二叠原有32面（16个双页），第61—62面被撕去，第37面左边空白处被剪掉；第三叠原有24面（12个双页），第85—88面阙佚。共存79面，面幅9×18.5厘米。此外，还保存了一叠的书背，所有页面全被剪掉。此写本用尖木笔抄写，笔迹拙劣，大小不一。有许多改写和涂改处，纸色淡黄（14世纪中期的）。有以下作品：

一、第1—13面，《演（寅）朝礼一本》。祈祷文，首缺，文中提到《演朝偈》。大楷字体，面4行，行9—11字。有尾题。

从：“住是故我归依 信礼”

到：“和南礼一切贤圣众”

二、第14—31面（第22—24面阙佚），梁武帝信佛的稗史。提到《梁武忏经一卷》和师父“致功和尚”。大楷字体，新段开头的角上有一道黑线，面4行，行10—11字。正文分两部分：

1. 第14—21面。正文开头，从：“昔日梁王皇帝书夜六持”到：“无形血水？非稷成诸罪人”

2. 第25—31面。正文结尾。从：“捧栲身之皮肉绕百育成”到：“者寿命千年礼 痴是〔如（？）〕追”

三、第32—33面，《阴思鬼限》。驱赶恶鬼的咒语，楷书，面5行，行14—16字，有首题。

从：“阴思鬼恨少人知先口年命岁干脂梅”到：“日受患者其轻重”

四、第34—37面，《推定儿女法》。占卜文，讲叙如何推测生儿生女，楷书，面4—5行，行14—15字，有首题，首题前面是历法。

从：“甲巳子午九 乙更丑未八 丙辛寅申〔七〕”到：“便加月分九月上九数枝又去除”

五、第38—63面（第61—62面阙佚），《佛说寿生经》。疑经，有序和后记，楷书，字大，面4行，行9—11字。经文有以下部分：

1. 第38—41面，《佛说寿生经序》。有首题。

从：“右伏以人生在世阴司所注”到：“不少哉”

2. 第42—60面，上名作品。全文和后记的开头，第36面是后记结尾，其中提到《延寿真言》、《天罗咒》、《地罗咒》、《日月黄罗咒》，有首题和尾题。

从：“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耶离”到：“涕浅悲泣作礼而去”

六、第64—84面，仪轨文。不到尾，记述了每年作祭品的阴钞数量和诵读的《金刚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数量。第64—75面有六十干支年号，指明每捆阴钞的数量、读经次数和庇护星宿，第76—84面上是说明。

从：“甲子欠钱五万三千贯看经十七卷纳第三库（曹官姓□）”到：“到清照验判官分上历消”

字 书

字书（279—283号）

279 （原藏录号TK—252）〔《一切经音义》类型的作品〕

八十卷本《大方广佛华严经》〔第七十六卷〕的语音注释。

木刻本，蝴蝶装。共存4面，13.5×17厘米，文面11.5×13厘

米，单栏，面7行，每行字数不等。写刻体，小字双行夹注，纸色浅黄灰，有第七十七和七十八卷的标题，宋版本（11世纪下半期的）。

从：“唱缚^{无可返回}声^{相近}唱哆^{都我反}瑟咤”到：“相^似鑠^{音巢}吞噬^{上吐根反音下音逝}龄^{音令}渗”

《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卷四缩略语汇总表，见《大日本校订大藏经》，第39帙，第1册，第47页下栏第4—11行，注释略有变动。

280 （原藏录号TK—7）〔《广韵》〕

木刻本，蝴蝶装，面幅18.5×27厘米，文面15.5×23厘米，页面中折缝的白口上标有书名简称（《韵》）、声调（例如“上平”）、该篇的页码和各版面刻工的姓：“李”、“秦”、“郎”。面14行，各行字数不等（约18字左右）。纸色灰，厚0.09—0.12毫米；每厘米7—8道帘纹，行间有界格。宋体字，小字双行夹注。一组同韵字条的开头有符号一。一组同韵异义字中第一个字的上方有小圆圈符号，全书均有手批的朱点，无书题。12世纪30年代杭州刻印的宋本。此书现存以下部分：

一、“下平”，〔卷第二〕。白口上有“李”字。

1.韵脚从“〔一。先〕”到“四。宵”，注释从“〔并〕”到“轿”。页1下至页6上。见《四部备要》，第46卷，第33页上栏第6行—38页上栏第2行。

2.同上，韵脚从“〔九。麻〕”到“十。阳”。注释从“〔案〕”（应是豪——译者注）到“商”。页11下至页12上。见《四部备要》，第46卷，第42页上栏第20行—43页上栏第18行。

二、“上声”，〔卷第三〕。白口上有“秦，郎”二字。韵脚从“〔三十。小〕”到“五十。琰”。注释从“膘”到

“殄”。页17下至页26上。见《四部备要》，第46卷，第75页上栏第13行—84页上栏第9行。

三、“去声”，〔卷第四〕。白口上有“李、秦”二字。韵脚从“〔十三。祭〕”到“五十八。陷”。注释从“〔蛎〕”到“颡”。页11下至页30上。见《四部备要》，第46卷，第96页下栏第19行—113页下栏第5行。

参考书目：关于作品见张世禄《中国音韵学史》，第92—104页；弗鲁格《10至13世纪中国宋代书籍印刷史》，第156—161页；伯希和《柯兹洛夫探察队在黑城所得汉文文书》第23号；伯希和《汉文书目注释提要》，载《法兰西远东学院通报》，第2卷，1902年，第327—328页；《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第283—285页。版本式样见：《中国版刻图录》，第35—36号。

281 (原藏录号TK—5) 〔未考定出的韵书〕

韵书，按《广韵》的编法把韵脚相同的一组词编在一个序号之下。从内容看，此书同13世纪中期毛晃著的《增修礼部韵略》和刘渊著的《壬子新刊礼部韵略》（现均佚失）相似。

木刻本，字面向外的蝴蝶装，每个双页对折之后，两边粘在一起，书口朝外，页码在页边上。页码按和韵脚有关的声调（上声）排列。面幅13×18.5厘米。文面11×14厘米。面10行，行14—17字。纸色淡黄，宋体字。每个韵组的标题字被印成黑底阴文，《广韵》中已作为标题字的那个字的上方被标上两个黑三角符号，下方标一线段，每组领头的字围以圆圈符号，读音相同的第一个字前面标有小圆圈。小字双行夹注。间或有朱砂点的标记，无书题。宋刊本（约1252年的）。现存两页：第1—2面、第4—5面。上平，〔四支〕（脂之）。

二、第8—9面。上平，十灰（哈），十一真。

参考书目：关于这种类型的字书见张世禄《中国音韵学史》，下册第123页及其后；关于此版本见伯希和《柯兹洛夫探察队在黑城所得汉文文书》第23号。

282 （原藏录号A 6）《解释歌义壹叠》

解释韵书结构的诗注。诗歌是七言，押韵。诗注被标上“义曰”二字。各篇的标题是：《舌音切字第八门》、《舌上音切字》、《牙音切字第九门》、《齿音切字第十门》、《正齿音切字例颂》、《喉音切字第十一门》、《七言四韵颂》、《七言四韵歌奥》。

写本，小册子，把较薄的几叠用蓝粗线缝在一起，共5叠，每叠8个双页，最后一叠是开头的两页。字面一页向里，一页向外，轮流交错，第二至四叠末尾左上角有该叠的数码。面幅8×11厘米，栏面6.5×8.5厘米，栏线和界格用尖木笔画出，有些地方被画透纸面。面7行，行11—13字，有改写。纸色灰。小楷字体，有首题。首页上加贴了封皮，封皮上有外题字（半行）和重复写了两次的大字“尚面文”，其上有红墨痕迹。（12世纪下半期的）。

从：“帮非互用稍难明 义曰帮”到：“楚侯别玉人 门非〔蔣兰莫〕□”

所有书页的背面均有写下的笔记，字体拙劣，大小不一，其中有下列文字：

一、第2面，“五供养”，第12面上也有。

二、第3面，“七宝供养”。

三、第4—10面，一连串的经文，总标题是《维捺》，小标题是《么河维捺》、《曷西谛葛维捺》、《六难（？）葛维捺》、《葛谛维捺》。

四、第11面，“命皮吟”

五、第13—17面，《大乘起信论》。有首题，指出“马鸣菩萨造”，“真谛三藏译”，往下是正文的开头部分。

六、第19—35面。《究竟一乘圆通心要》，指明是“通理大师集”。第56—57面上也有此文（开头部分）。

七、第45—48面。文据：“五月廿一日众僧印文山上”，列举的人名有：“暘智（惠）、（刘坐）禅、高善惠、李道源、暘善清、手善从、赵惠深、刘善行、贺善谛、不议成、提点师父、小师父、曹法成、訛善得、部（？）法咏、杜宝。

八、第51—55面，五句四言诗和《观自在菩萨颂》。

九、第64面，有人名陈善戒。

下剩各面的背面是习字，第42面上是一行西藏文草书，第44面上是一幅图画。

283 （原藏录号TK—312）〔语音表〕

未考定出的一部字书的语音表，用竖线分隔成条（每条的声调按平、上、去、入排列），再用横线分成三栏，每栏4行字。第一栏的起首字是“帮”，第二栏是“端”，第三栏是“见”。

木刻本，蝴蝶装，一页的上面，面幅13×20厘米，文面11×15.5厘米，双栏，外线粗。白口上有一个残字，认不出来。纸色灰褐，元版本（14世纪中期的）。

283a （原藏录号JX—2822）〔《字杂》〕

分类语汇表。汉文，和西夏文的语汇表相似，写本。

小册子，面幅14×18.5厘米，首尾残缺，双蝴蝶装，共9个蝴蝶页，第一个双蝴蝶页里面一页的下面阙佚。此外，保存了另一个蝴蝶装的一面。36面，面7行，共253行，行10—12字。纸色灰，楷书字体，文中有修改处（12世纪中期的）。有以下各篇的标题：《番姓名第二》、《衣物部第三》、《斛斛部第

四》、《果子部第五》、《农田部第六》、《诸匠部第七》、《身体部第八》、《音乐部第九》、《药物部第十》、《器用部第十一》、《居舍部第十二》、《论语部第十三》、《禽兽部第十四》、《礼乐部第十五》、《颜色部第十六》、《官位部第十七》、《司分部第十八》、《地分部第十九》、《亲戚长幼二十》。

一、第1—3面。

从：“斲乔 巨蓊 重羌 焦杨 折兰”到：“勒瓦 勒罗 路谿 蔡令 光宁”

二、第5—36面。

从：“乐陈 苏辛 美丁 薛谋 曹江”到：“黑水 三角 瓜州 五源 隆州”

三、单独的一面。

从：“卧 罗娘 罗税尖 罗庞领 吃移门”到：“夫妇 姊妹 妻男 士女 伯□”

参考书目：西夏文本见《西夏文写本和刊本》，3·И·戈尔芭切娃和E·И·克恰诺夫编第19、20、23号。

木版画、装饰图案、彩色画、素描、印章

木版画、装饰图案、彩色画、素描、印章（284—296号6）

284 （原藏录号TK—283）〔附有文字和陀罗尼的版画〕

一些版画残片，都是公元947年敦煌刻印的，上面有骑狮子的文殊师利菩萨像，纸色浅褐，光滑，共有8件。

参考书目：卡特《中国印刷术及其向西方的传播》，第42—43页；翟理斯《大英博物院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第

8088—8092号。

285 (原藏录号TK—289)〔附有文字和陀罗尼的版画, 947年刻印〕

印张大 19×29 厘米,画面 16.5×26.5 厘米,双栏,外线粗。被三条线分成两部分。上面的部分 16.5×12 厘米,画一神端坐在狮子上,头戴王冠,手持权杖,顶光和背光环以火舌,周围的光线飞射着火花。右边一牵狮人神态笨拙,穿游牧民族装,蓄有胡须,左边一小孩呈祈祷姿态。左右两边围以双栏,均大 8.5×9 厘米,右栏题为:“大圣文殊师利菩萨”,左栏题为:“普劝志心供养受持”。下面的部分 16.5×14.5 厘米,13行说明文字,行12—14字,尖木笔书写后刻印。此文包含下列陀罗尼:①《文殊师利童真菩萨五字心真言》;②《文殊师利大威德法宝藏心陀罗尼》。

从:“此五台山中文殊师利大圣真仪变”到:“注课持回施有情同归常乐”

286 (原藏录号TK—288)附有文字的版画。

画页 19×28 厘米,画面 17×26 厘米,双栏,外线粗。上半截的顶边几乎完全损失,用一条线分成两部分。上面部分 17×11 厘米,是直径10.5厘米的圆形画像,一佛端坐于莲台,坦胸露臂,手结印契。背光和顶光四周冒着火舌,莲台两侧有标题,双栏, 2×9 厘米,左边的是:“……〔供养受持〕”;右边的榜题阙佚。下面部分 17×15 厘米,13行说明文字,行13—16字,文中有对阿弥陀佛、观世者,大势至的祈祷语。

从:“夫欲念佛修行求生净国者先于净”到:“量寿国更礼三拜即出道场”

此版画为敦煌所印(公元947年的)。

参考书目:翟理斯《大英博物院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

录》，第8086号。

287 (原藏录号TK—114) 《大方广佛华严经变相》

木刻本的一幅版画，右面的部分，残片。画右端有一条画名榜题，四周围以带形装饰图案。现存的部分画一坐佛，面前两侍从和七个跪着的弟子。版画下部是一朵莲花，花瓣上有四个苦行僧。纸色淡黄灰，可能是宋版本（11世纪下半期的）。

288 (原藏录号TK—277) [版画]

一幅版画的右上角，8.5×15.5厘米的残片。现存的画面上是箫的上端、魔王的头像和云彩，角上榜题：“护法神”。纸色黄，1132年(?)的宋刻本。

参考书目：弗鲁格《10至13世纪中国宋代书籍印刷史》，第72—73页。

289 (原藏录号TK—244) [《阿弥陀佛经》版画]

两折页版画，折面20×20厘米，栏面18.5×16厘米，双栏，纸色白(12世纪中期的)。一佛侧坐于高出云端的莲花上，左手靠近左肩，右手指向下方，衣服有黑色宽带，裸露的前胸上有个“卐”字，头部四周有绕了两圈的顶光，佛身周围是光芒，卷曲的光带从优罗那中散出，在版画的左下角终止。右上角榜题“阿弥陀佛”，佛前两女侍，站在高出云端的莲座上，手持大莲花，戴着复杂的头饰，有顶光，头顶有烟团，光线末端有一发愿僧，合掌而立，头部上方榜题：“弟子高玄悟”。左上角有飞舞着的乐器和花朵。

根据内容和佛名判断，这是《阿弥陀经》刊本的插图。

290 (原藏录号TK—247)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版画]

版画，经折装，1纸，3折面，折幅9.5×20.5厘米。全纸28.5×20.5厘米，画面28.5×16厘米，单栏。纸色褐灰(12世

纪中期的)。

一佛侧坐在有莲纹的高座上，胸部裸露，左手置膝上，右手小臂上举。身体和头部的光轮呈发射状，围有圆边，前者里外各三圈，后者各两圈。佛前一小供桌，盖有带花纹的桌布。佛的左右各一僧人，合掌而立。佛首上方有带形的光芒，其间是花朵和云彩。佛首左侧五菩萨，右侧四菩萨。左边一组的上方榜题：“释迦牟尼佛”，佛左边又一榜题：“诸大菩萨”。供桌前的小地毯上跪一弟子，身后还有七弟子坐着，他们全着僧服，合掌，榜题：“声闻弟子”。他们身后的边上有四人合掌而坐，着帝王服，榜题：“国王大臣”。上列各像的头部全有光轮，众弟子头部上方有飞着的花朵和乐器，大臣上方发射着光芒的云彩中有十身小佛，榜题：“十方诸佛”。版画的下部是云彩，每身画像的上方也有云彩。剩下的空白处画有吉祥物。

291 (原藏录号TK—259) [研究肖像的论文]

对密宗神像的描述。一写本的9件残片，原被裁作封皮硬纸板，现一一取下。原为“蝴蝶装”，双页页幅 29×20.5 厘米，面9行，行18字。纸色黄，潦草的楷书，边栏线粗，白口和界行的线细。这些残片的先后顺序没有指明(12世纪末的)。

一、对“四母”(保存下来的名字有，巧饰母，顶上花母)像的描述。

二、对佛(?)像的描述，引用了陀罗尼，提到了释迦顶尊、四方顶尊、十方贤。

三、对“金刚记印”和与之有关的陀罗尼的记述。

四、对“金刚拳”、“金刚铃”及与之有关的陀罗尼的记述。

五、对金刚雕像描述的结尾部分和对菩萨描述的中间部分。

六、对四方顶尊像的描述，附有陀罗尼，其中包括《东方金刚顶尊心咒》。

七、对金刚体的描述。

八、对释迦佛金色塑像的描述，提到了陀罗尼，其中有《变空咒》。

九、对一个不知名神像的描述，引用了陀罗尼。

292 (原藏录号TK—280) [佛像肖形印]

残片，16×20.5厘米，一页的上端。6×7.5厘米的同一个印章的图案，一佛坐于华盖下，左右两菩萨站在莲座上。共有三幅近乎完整的图案和两幅图案残片，排为三行，刻印精致（14世纪初的）。

293 (原藏录号TK—281) [佛像肖形印]

五件坐在莲台上的佛像肖形印残片，光轮上有螺旋形的装饰图案、两侧是花带，印面6.5×7.5厘米，刻印精致（14世纪初的）。

294 (原藏录号TK—260) [添上色彩的版画]

画了粗边的金刚像，像中间的一个圆圈中有个西藏字。

1 纸，10×20.5厘米，版画的虚线、粗边和圆圈被涂成蓝、黄、红、绿等色，元版本（14世纪中期的）。

295 (原藏录号TK—234) [装饰图案]

木版印的装饰图案。1 小纸，19×19厘米。这块小纸上粘了一小块3×8厘米的彩色丝绸残片和4×6厘米的有3 残行西夏文的纸片（14世纪中期的）。

296 (原藏录号TK—282) [佛像肖形印]

残片，19.5×26.5厘米，13印，6 枚残。印中一佛坐于莲台上，两肩上方各一朵莲花，印面4.5×6厘米。（14世纪中期的）。

296a (原藏录号Φ—308) [版画]

一部不知名经的刊本卷首版画，卷子残片，16×20.5厘米，一纸的左上部分，手握宝剑的一武士像的上半截，左肩上方站一僧人，他们左边小栏内榜题：“楞严大师”，栏框宽1厘米，里面是金刚和魔圈，1132(?)年的宋版本。

版画背面糊了一小块纸(当时的裱褙)，纸幅9.5×9厘米，有《妙法莲华经》经文，卷一，经文同《大正藏》第9卷第7页中栏第13—17行，8世纪初的写本。此残片背面有6残行竖写的中亚婆罗迷文。

参考书目：《亚洲民族研究所敦煌特藏汉文写本叙录》，第2辑，第1999、2943、2952号。

296δ (原藏录号Φ—312—I) [佛像肖形印]

单独的1残页，26.5×26.5厘米。坐在莲台上的佛像肖形印，和本书编号293相同。12印，7印残(14世纪初的)。

参考书目：《亚洲民族研究所敦煌特藏汉文写本叙录》，第2辑，第2943号。

医书、历书、占卜书

医 书

医书(297—304号)

297 (原藏录号—TΦ—6867) [医文]

药方及其配制规则的笔记。写本，抄在一个小册子的第2—4面上，该册子的其余部分是手写的西夏文，面幅11.5×16.5厘米，栏面11×13厘米。纸色灰，楷书，小字双行夹注。面6—7行，行11—12字，共16行。无书题(12世纪上半期的)。

从：“敕赐紫苑丸东宫司直贾所”到：“梧桐子大每服五

丸为度”

298 (原藏录号A5) [佛教医文]

三篇医文汇集,记述了除病的仪式和药品。写本,蝴蝶装,不到尾,10个双页和第11页的第1面。面幅8.5×9厘米,面7行,行9—10字。小楷,纸色褐灰,涩滞(13世纪初的)。有以下作品:

一、《念一切如来百字忏悔剂门仪轨》。第1页第1面至第3页第1面,34行。有首题,其后是作者和译者称谓:“西天金刚座大五明传上师李法海译”,和祈祷语:“敬礼一切如来”。

从:“夫修习者欲证佛果菩”到:“舍任情矣”

二、《求佛眼母仪轨》。第3页第2面至第8页第1面,66行。有首题,其后也有译者称谓和祈祷语:“敬礼微妙上师”。文中有陀罗尼《佛眼母咒》,提到了《月轮咒》。

从:“夫修习者欲求佛果若”到:“痊?矣”

三、《利他截病四种内》。附记,不到尾,第8页第1面至第11页第1面,48行,有首题。

从:“第一云于净地上涂曼拏”到:“以牡牛乳洗下一切病患”

参考书目:弗鲁格《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藏汉文古佛教写本简明目录》,第77号。

299 (原藏录号A13) 《佛眼母仪轨》

佛教医文,记述了除病的仪式和药品,内有《佛眼母咒》提到了《月轮咒》。

写本,蝴蝶装。全文,8个双页。版心上有页码。文面7.5×9.5厘米,面5行,行11—13字。纸色灰,潦草的小楷,正文前有祈祷语:“敬礼圣怀相〔金〕”,其后为小字的作者署名:

“西天金剛座 大五明傳 佛眼母儀軌”，有尾題，第1面的背面有很小的書名簡稱：《佛眼母》（13世紀初的）。

300 （原藏錄號TK—286）〔利他截病四種內〕

〔《念一切如來百字懺悔劑門儀軌》〕和〔《求佛眼母儀軌》〕正文的後記。

寫本，蝴蝶裝，首尾殘缺，1個雙頁。頁幅20×14厘米，頁11行，行12字，小楷，用尖木筆抄寫，紙色灰，無書題（13世紀初的）。

301 （原藏錄號TK—287）〔佛教醫文〕

記述了藥劑的成分，服藥時念誦的陀羅尼，以及藥方是由誰傳給誰的。

寫本，蝴蝶裝，首缺。4頁，面幅6.5×9厘米，面5行，行8字，最後一面无字。小楷，尖木筆抄寫，段末有小字祈禱語：“阿帝”。紙色灰褐，無書題（13世紀初的）。

從：“種種毒藥”到：“弟亦竟阿帝”

302 （原藏錄號TK—173）辰龍麝保命丹

藥方，記述了藥劑的效用和服法。

木刻本，單獨一頁，下端殘缺，19.5×22厘米，頂部有10.5×3.5厘米的通欄大標題，黑底陰文，10殘行，金刻本（13世紀上半期的）。

同《中國醫學大辭典》（第4246頁）中的“龍麝聚聖丹”相符。

303 （原藏錄號TK—166《孫真人千金方》卷13，〔心臟方，頭面風第八〕；卷14，〔小腸腑方〕，《小腸腑脈論第一》

7世紀的包括各種藥方的醫學著作，作者孫思邈（公元581—682年），30卷。

木刻本，蝴蝶裝。保存下來的是卷13（第20—24頁），卷

14（第1页）。页面32×20厘米，面14行，行23—25字。有卷13的尾题和卷14的首题，其后是卷14的目录：《小肠腑脉论第一》、《小肠虚实第二》、《舌论第三》、《风玄方第四》、《风癲方第五》、《惊悸方第六》、《好忘方第七》，金版本（13世纪中期的）。

相应的内容见：《道藏》第810册，卷42，页7下第1行——卷43页3上第1行，药方排列次序，药剂含量、药名及其说明均有很大差异。此刊本中有《道藏》中所缺的、用小圆圈“○”与正文分开的注释。

参考书目：关于此著作及其版本见《唐史艺文志》，卷3；《宋史艺文志·补·附编》，卷6第170页；《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第801—804页；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第854页及其后；《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第426—427页；弗鲁格《10至13世纪中国宋代书籍印刷史》，第182页；原文刊本见《道藏》第800册及其后；关于此版本见：孟列夫《黑城发现的早期出版物》（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柯兹洛夫藏卷汉文部分），载《亚州民族研究所简报》，第7册，1961年，第149页；伯希和《柯兹洛夫探察队在黑城所得汉文文书》，第7号。

304（原藏录号TK—187）〔未考定出的医学著作〕

治疗各种疾病的药方，同时指出配制方法和用法。

写本，蝴蝶装。共15页。各页的排列顺序未判明。此写本破散得厉害。

一、1页，46×24厘米，20行，药方有：“治泻痢不〔可〕……”、“神仙透风丹”。

二、1残页，36×24厘米，14行，药名有：“干山药〔根〕”，“治诸风乌金丸”（指明处方作者是杨知观）。

三、1残页，33×24厘米，14行，药方名佚失。

四、半页，26×24厘米，8行，佚名药方。

五、1页的片断，7×13厘米，8行，佚名药方。

六、残片，10×24厘米，5残行，药方有：“治牙疼〔妙圣散〕”，“〔治风凉〕鬲薑荷散方”。

七、残片，10×24厘米，5残行，药名有：“背指散”。

八、1残页，34×24厘米，14行，药方有：“诸疾□〔治〕系洴□宅方”；“千金膏治诸肢恶疮并臃肿〔方〕”。

九、1残页，23×24厘米，8行，药名有：“雄黄丸”。

十、1残页，33×24厘米，15行，药剂功能的理论解释。

十一、残片，22×24厘米，9行，药名佚失。

十二、1残页，30×24厘米，14行，药方有：“〔治〕口中疮不可者”、“治齿置一血不止”、“治咽喉肿痛”。

十三、1残页，31×24厘米，12行，药方有：“烧金法”（药方创作者：贾上人术）。

十四、1残页，31×24厘米，14行，药方有：“治瘰癧疾”。

十五、1页，41×24厘米，15行，药名有：“治鬲气延龄丸”、“生肌药”。

历 书

历书（305—309号）

305（原藏录号TΦ—5285）〔历书〕

历日，日期用竖线分开，竖行再用横线分成5栏（从上到下）：①，表示干支时辰，指出五行及周相的日期；②星座；③告诫应回避什么；④庇护神名称；⑤说明吉凶征兆。

木刻本，粘在西夏文的书背面（当时的裱褙），按西夏文折装书的尺寸从上下两边裁齐。原先大概是卷子装，宋体字，下面3栏的字小。保存下来的是五天的日历。无书题，宋版本

(12世纪前30年的)。

从：“……〔十三〕日乙亥火破 | 女”到：“……十八日庚辰金闭 | 奎”（只录出上面的两栏）。

306 (原藏录号TΦ—5229) 〔历书〕

历书，与本书编号 305 是同一类型。宋体字，现存 5 天的日历，无书题。宋版本（12世纪和前30年的）。

从：“……六日乙卯水危 | 张”到：“……十日己未火开 | 亢”（只录出前两栏）

307 (原藏录号TΦ—5469) 〔历书〕

历书，与本书编号 305 属同一类型。宋体字，现存20天的日历，第12天以后有下月开始的一栏：“〔月〕小”。无书题。宋版本（12世纪前30年的）。

从：“……〔日〕戊戌木除 | 室”到：“……己土危 | 房”（仅录出前两栏）

308 (原藏录号TK—269) 〔历书〕

历书，保存下来的是中间一条的 3 栏：①指出吉凶征兆；②太阳经过黄道的周相；③庇护神。

本刻本，原先大概是卷子装，54×8厘米的长条，两残纸。11天的栏目（第1和第11天的残），宋体字，宋版本。12世纪前30年的）。此长条被剪开作封皮用和被叠成折面为5×3厘米的折子。

从：“……进入 | ？冲 | ……”到：“……〔九鬼〕 | ……”

309 (原藏录号TK—297) 〔历书〕

历书，一竖栏内有下列纵行：①附有干支和五行的日号，并指出它们的周相；②星座；③告诫应回避什么；④指明自然现象；⑤说明吉凶征兆。日期被用竖线分开。

两件木刻本残片，卷子装，按某本书的面幅剪下来的残片，宋体字，宋刻本（12世纪前30年的）。

残片1，43×19.5厘米，卷子的一部分，两残纸，从某月的11日至23日。下面一纵行的文字：从：“葬事出兵野……”到：“营葬礼兴词讼合交关”

残片2，11.5×12厘米，卷子的下半截，第4和第5纵行，第4纵行的末尾有干支：“丙午”。第5纵行的文字：从：“□□导〔共（？）泉鼓钟银束〕”到：“用艮巽 丑后 辰后”

占 卜 书

占卜书（310—314号）

310（原藏录号TK—293）〔占卜文〕

写本残片，6×17.5厘米，文面5.5×15厘米，小册子一面的右里边部分，右端有缝过线的痕迹。4行，行13—14字。楷书，写得很不好，用尖木笔抄写并画出栏线。纸色灰褐，涩滞，厚0.07—0.10毫米，每厘米7道帘纹，无书题（13世纪初的）。

从：“无贞良凡事止息其道乃唱 诃曰”到：“未出门求官并觅职都在是中论□”

311（原藏录号A2）《六十甲子歌》

用干支表示日期或月份，并指出相应的行星名称（尽可能把正文同历法占卜联系起来），七言诗。

写本，12×9厘米，1纸，不到尾。潦草的楷书，7行，行7字，干支前面有朱砂标记一，文中有朱砂圆点（13世纪初的）。

从：“一甲子乙丑海。中金。”到：“一丙子丁丑洞·下水·”

现存绿纸的双封皮，上有此作品的外题字。

312 (原藏录号TK—190)〔占卜文〕

推测事情是否成功的算卦卡。卜名有：《推入宅吉凶》，《推出行求财吉凶》，《推五谷下种子法》。

写本，无首尾，1纸，28×26厘米，17行，行2—3条，楷书（13世纪上半期的）。

从：“天地日一百卅年富贵大凶 天父日大富贵宜子孙富贵”到：“天父日得利吉 天母日无利失财凶 天地日祚意吉”

类似的作品见：《亚洲民族研究所敦煌特藏汉文写本叙录》，第1辑，第1545号。

313 (原藏录号TK—172)〔《六壬课秘课诀》卷上〕

记述六壬课占卜的占卜书。与有关文献中指出的版本卷数（均为一卷）不相符（此版本是二卷或三卷）。原文分为以下标题的各小篇：《论十二贵神旺相法第三》、《论魁罡所临吉凶法第十九》等等，夹有七言韵诗的散文。

木刻本，蝴蝶装。页幅26.5×21.5厘米，面11行，行20字，或两句七言诗。保存下来的是第3—36页，下面的部分磨损严重，最后6页缺下半截。间或有小字双行夹注，同一种纸的封皮。其上有印下的标签片断，是两行说明：“此书……/夫皆悉〔随(?)〕……”，和大字的书名：《〔六壬〕□□〔诀〕》。右端有第2个标签的片断，标签的边上有两方九叠文红印。有第3至第63篇的或全或残的标题（13世纪上半期的）。书名是按白口和标签上的字推测的，金刻本。

从：“前四勾陈戊辰土 前〔八十青〕□□□”到：“假令小运在玄……”

参考书目：《宋史艺文志·补·附编》第141页；孟列夫《黑城发现的早期出版物》（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柯兹

洛夫藏卷汉文部分) 载《亚洲民族研究所通报》,第7册,1961年,第148—149页;戴密微《黑城发现的早期出版物》(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柯兹洛夫藏卷汉文部分),载《通报》第51卷,第4—5期,1964年,第452页。

314 (原藏录号A—1)〔占卜文〕

指导占卜的卦爻辞。列举了阴历的月份, 星宿名称和季节等等。现存各篇的标题:《月将法》、《九宫法》、《八卦法》、《二十四气》、《二月节》。

写本,卷子装,首缺,3纸(第1纸残), 53×9.5 厘米,33行,行8—10字。此卷子被叠成折面,楷书,元写本(14世纪中期的)。

从:“年降。西〔八〕月狂(“狗度迁。”到:“□〔寒〕二月〔节〕。大寒二月中。”

纸 币

纸币(315号)

315 (原藏录号TK—264) 纸币

一、至元(1335年—1340年)年间印刷的纸币,面额貳贯,纸币的栏面 19.5×28 厘米,双栏,外线粗,上端有 19×2.5 厘米的横栏,内印“至元通行宝钞”,两侧各画一颗放出光的珍珠。纸币的下余部分 19×25 厘米,四周为高2.5厘米的带形复杂图案装饰的栏框,栏内分两部分,上面部分的中间有 8.5×8.5 厘米的两个大方字:“貳贯”,其下是两串硬币的图像,右边一栏大 3×6 厘米,左边一栏 2.5×6 厘米,有蒙文方形字,它们的下面右边一栏大 3×2.5 厘米,里面是系列号(□字科),左边一栏大 2.5×2.5 厘米,里面是序列号(□字号)。下面部分

大 14×10.5 厘米，中间有文字：“伪造者处死^{首告者定仍给犯}_{赏银伍人家产}”。右

面5行，左面4行，注明印造纸币的主管部门（“尚书省”、“提举司”），下属单位（“宝钞库”、“印造库”），以及印造年代。在上面部分的顶上有 7.2×7.8 厘米的九叠文红方印；下面部分的顶上有 8×8 厘米的九叠文红方印，左边上有黑色登记印鉴的右半部分，高4厘米，也是九叠文。印文判读不出来。

背面的上部有 6×6 厘米的九叠文红方印，和同一个登记印鉴的右半部分。下部有 9.5×17 厘米的黑印，分成两栏，上面一栏 8×5.5 厘米，有大字“貳贯”；下面一栏 8×8.5 厘米，栏框为方形图案，上下高1厘米，左右长1.5厘米，内有两串硬币图像。纸质粗糙，暗灰色，色调不一，厚0.18—0.25毫米，每厘米4—5道帘纹。

1. 右下角和左下角残缺的一张纸币。面积（这里和以下均指纸幅） 21.5×29.5 厘米。

2. 一张完整的纸币，带有少量的烂孔， 22.5×30 厘米。

3. 一张纸币，下端有 4.5×5 厘米的三角烂孔， 21.5×30 厘米。

4. 一张完整的纸币， 21×28 厘米。

5. 一张纸币，左端和下端残缺，上端损坏严重， 17×25 厘米。

6. 一张纸币，下半截损坏严重， 23.5×30 厘米。

7. 上面和左边损坏严重的一张纸币， 23×30 厘米。

8. 一张完整的纸币，边上有损坏， 22×30 厘米。

9. 一张完整的纸币，印得很糟，有少量的损坏， 21.5×31 厘米。

10. 一张完整的纸币，非常旧， 22×30 厘米。

11. 一张纸币的上半截， 22.5×20 厘米，中间有一个 19×7

厘米的烂孔。

12. 一张印得不好的纸币， 22.5×30.5 厘米，中间有烂孔，左端的烂孔大 10×10.5 厘米。

13. 一张纸币的右半截， 13.5×29.5 厘米。

14. 右端和上端严重损坏的半张纸币， 22.5×31 厘米。

15. 纸币左边的一条，下端残缺， 8.5×27.5 厘米。

16. 一张纸币的下半截， 22×17 厘米。

17. 一张纸币的左上角， 17.5×20 厘米。

18. 上端残缺的一张纸币， 22.5×23.5 厘米。

19. 一张严重磨损的纸币，上面的中部和右下角残缺， 11×29 厘米。

20. 纸币右端的一条，缺上边， 13×27 厘米。

21. 一张纸币的下半截， 21×16.5 厘米。

22. 一张纸币的下半截，四边腐坏得厉害， 21.5×22.5 厘米。

23. 一张纸币的右下角， 13.5×13.5 厘米。

24. 一张纸币的左上角， 13×7 厘米。

25. 一张纸币的右上角， 12×6 厘米。

26. 一张纸币的两片残片， 9.5×8 厘米和 7×6 厘米，上有 1×4 厘米的蒙文方形字印鉴。

二、另种面额的纸币残片。

27. 元统（1333—1334年）年间面额壹贯的纸币。上边的残片， 20×15.5 厘米。在宽6.5厘米的正方形中有大字：“壹贯/文省”，下面大概是一串硬币图像。在左边和右边宽度为3厘米的两栏内有蒙文方形字，往下的两侧和上部是宽2.5厘米的有复杂装饰图案的栏框。它的上方有高2厘米的一长条字，这些字在这张和下张纸币上变成〔元统元宝文钞〕。中部的正方形

之上有6×8厘米的红印，是九叠文。左端为黑色登记印鉴的片断，九叠文字体。背面有登记印鉴的片断和宽10厘米的部分黑印，带有高1.5厘米的有装饰图案的栏框，栏内的上方有字：“〔元统〕/元宝/文钞”，下方是一串硬币的图像。

28. 同样面额的一张纸币的残片，右上角，13×12厘米。印记同上。

2. 同样面额的一张纸币和下半截，腐坏得厉害，21×16.5厘米。同贰贯的纸币的下部分相似，但印文有些不同。有盖了九叠文大红印的痕迹。背面有九叠文红印的片断，宽6厘米。

3. 残片，13×23厘米，上有注明机关名称的黑色戳记的一部分，极力模拟象形字，还有高8.5厘米的九叠文橙黄色印。纸色灰，涩滞，厚0.17—0.20毫米，每厘米6道帘纹。

4. 包装过纸币的一张纸，62.5×39.5厘米。

参考目录：《马可波罗游记》，第57章；伊凤阁、鄂登堡、柯特维奇《柯兹洛夫在黑城的发现品》；伊凤阁《15世纪以前中国纸币的使用》；田中谦二《刘知远作散曲〈上高监司〉续考》，载《东方学报》第31期，1961年，第293—320页。

文 书

文书 (316—375)

316 (原藏录号 TФ—14, 15. [ИHB. №211, 213])
〔12世纪前期的文书〕

第七将冯武衙署有关军队行动和供应等各种问题的文书，有时也遇到一些民政机关的文书。根据提到的地名判断，这位第七将管理着渭河以北的地区和甘肃省东部的边远地区，那里有两个军区：鄜延路和环庆路。文书的起讫年代为1128—1131。

年。文书的背面印着西夏文详解辞典《文海》和《文海杂类》的条文。

纸色灰，纸质光滑，厚0.07—0.12毫米，每厘米5道帘纹。原纸幅37.5×29.5厘米，但大多数被裁去了边，大概是为了裁成辞典的标准面幅。

一、原藏录号TΦ—14，第54页。代表其父赵进忠和同族亲属（赵）京、（赵）居中、《赵》深、（赵）黼、（赵）光疑，保举（赵）德诚任承节郎职务的呈文，赵德诚28岁（1091年生），保安军出身。末尾列举了呈报人的姓名：张动、王靛、薛昂，（赵）居中。首尾和上端均损坏，17残行。日期是：“政和八年二月 日”（1118年2月22日—3月23日），楷书。

从：“……〔史〕部”到：“……〔复〕少保太宰〔兼〕
□□□〔臣〕居中□”

请比较文书31。

二、原藏录号TΦ—14，第92页。一位名叫任千的人就夏贼入侵陕西疆界一事致第七将和第七副将的呈报。

接着报告了功绩，提到的地名有，保安军，通庆城，燕山府；人名有：童宣检。

此文书各方面均严重损坏，中间（第8行）破裂，15残行，小楷，使用了抬头。起首处有日期：“六月十三日”。文中提到的日期还有：“宣和四年十月二十三日”（1122年11月23日）“□〔和〕五年四月十四日”（1123年5月11日）。那末，起首处的日期应是1123年7月7日。末尾有大花笔道（大概是签字时带出的余笔）。

从：“……〔第七将队〕□〔第七副〕……〔任〕千”
到：“……〔施〕行谨具申”

三、原藏录号TΦ—14，第77页，第35页。这两页属同一件文书，说明关于执行军队调动命令的检查结果。近似草书的行书，有修改（这可能是草稿）。

1. 第77页。文书开头。1页。10行。第1行是大写的草字“检”（文书标题）。提到的人名有：宋千，郎差人，于安。此页右端从下面糊了一小条有草字的纸（当时的修补）。右端有盖印痕迹。

从：“据郎差人乡（？）速取到副牒”到：“有保捷第二十一指挥押教由案”

2. 文书末尾，上端佚失，下端损坏。8行，第1—7行残，草书字体。末尾有日期：“宣和七年正月 日”，监察官姓名“张泽”，其后为大写的登文日期：“十一日”（1125年2月5日）。日期前有草书的红字批语：“三件牒副将勾追保廿一曹级供撰文（？）字”。登文日期的上面有红颜料痕迹（可能是印痕）。提到的人名有：差人于安。

从：“……到〔请〕□□根将□”到：“教由案？先前差人于安”

四、原藏录号TΦ—14，第28页。张泽关于调动军队的命令。

此文书无首，下端和左页边残缺。8行，第1—6行残。草书。末尾有日期：“宣和七年正月 日”（1125年2月5日—3月6日）和署名。文书中提到的人名有：苏均，杨昭。日期前面有草书的红字批语：“（？）件牒副将依勾挥教由案……”。左页边沿上还有一行批语和红印的残迹。右页边有文书开头的一行的片断，推测可能是延安府的名称和红印残迹。

从：“各令赍前合用具凭公案……”到：“队卜件依前”

五、原藏录号TΦ—14，张泽关于军队行动的呈报。

文书末尾，缺上端，8残行。向行书转化的楷书，使用了抬头，最后有日期：“二月 日”和署名。左页边长11.5厘米，其上有登文日期：“十九”和签字。日期前面的空白处有签字，文中提到环庆路。此文书和前面的两件大概是同一年的，日期应是1125年3月25日。

从：“……〔契〕勘先团结定策应环庆路人马并〔边〕”到：“……旨”

六、原藏录号TΦ—14，第24页，将司张泽关于军队行动的呈报。

文书末尾，缺上下边，8残行，向行书转化的楷书。使用了抬头，最后有日期“六月 日”和署名。左页边长9.5厘米，上面有大字的登文日期“十七”和签名。日期前面的空白处有签字”（登文符号）。文中提到环庆路。大概是同一年的文书，日期应为1125年7月19日。

从：“〔契〕勘先团结下准备策应环庆路人马内……”到：……〔裁〕旨”

七、原藏录号TΦ—14，第23页，都虞侯孟遇关于打败白直人（女真人？）的呈报。

文书末尾，上端残缺，9行，第1行残，清晰的小楷，使用了抬头，最后有日期：“宣和七年正月 日”和署名，日期合公历1125年2月18日。左页边长9.5厘米，上面有大字的登文日期“十四日”，和收发签字。日期前面有大字草书批语：“军行？破”。文中提到被打败者的名字：王觉。

从：“……手第二十七指挥都虞侯孟遇等”到：“裁旨”

八、原藏录号TΦ—14，第66页。

文书末尾，内容不详，下端残缺，保存下来的是最后一行文字：“请速谨牒”和日期：“宣和七年正月初七日”（1125年

2月11日),草书字体。左页边长26.5厘米,上面有楷书红字批语:“第七将”。左端有黑色登文戳记的右半截,高25厘米多,字体特殊,被认出是:“……〔应环庆路军马番〕”。批语上面有斜印着的红色登文戳记的痕迹,宽3.4厘米,日期上面盖有红印,5.2×5.5厘米,右上角还有一印(左半截),篆字印文,认不出来。

背面印的辞典条文和文书上字的方向相反。

九、原藏录号TΦ—14,第57页。

文书末尾,上端阙佚,内容不详。现存两行,日期:“〔宣〕和七年正月 日”,人名:“进武校尉权第七将部将权副将尚真”和“武翼郎郾延路第七副将孙 千少”。小楷,左页边长32.5厘米,上面的登文戳记有登文日期“拾柒日”和收发签字。右上角有一方红印的左半截,高5.2厘米,篆字印文:“保安军金汤城军之记”。日期合公历1125年2月21日。

十、原藏录号TΦ—14,第86页。

文书末尾,内容不详,上下端残缺。现存3行,最后一行是日期:“宣和七年正月十七日牒”(1125年2月23日)。文中有名字“连示守”。向草书转化的大字行书。左页边长25.5厘米,其左端批有红字:“第七将”。日期上盖有红色方印,5.7×5.5厘米,篆字,右上角是另一印的左半截,上面的两个字是“府印”(全文是“延安府印”)。

从:“……状希”到:“……连示守等?余不请速滞谨〔牒〕”

十一、原藏录号TΦ—15,第10页,关于军队准备行军的报告。

文书末尾,缺上下端,6残行,近似草书的行书。最后有日期:“宣和七年九(?)□十一□”(1125年10(?)月9

日)。其后批着红字“第七将”。日期上盖着红方印， 5.2×5.5 厘米，篆字，认不出来，大概是“酈延路”；右上角还有同一印的左半截。左端有一黑色登文戳记的右半截。字体大而特殊，上面被认出的字有：“……〔延路应环庆路军马番〕”。右端的下角为另一登文戳记的片断，只认出一个“司”字。文中有红色小记号（有3行的右边打了杠）。

从：“…“候？请详此将差定策应……”到：“……请稍有运误牒谨”

十二、原藏录号TΦ—14，第26页。关于在延安府金汤城附近捕获罪犯将间及另2人和王莹及另11人的呈报。

文书末尾，上端和右下角残缺，8行（第2—7行残），草书。最后有日期：“宣和七年九月 日”，报告人名字及其签字。左页边长6厘米，上面有大字草书登文日期“十五日”和收发签字。日期合公历1125年10月13日。登文日期上面盖有酈延路的红色方印， 4.6×5 厘米。

从：“尽权罪”到：“……〔金〕汤城”

十三、原藏录号TΦ—14，第76页。金汤城关于将下列这些人（如果他们逃跑就将他们的亲属）逮捕解送该城并向第七将呈报的命令。这些人是：陈承信、百姓汉忠、庞四郎、赵十三、薛大、专副高仲、康辉、所由高顺、周顺、仓司贴书许僧□大眼，〔高〕六奇，李寄（？）城。提到的急使有：桑青、周□。发文人“从义郎权金汤城兵马监押杜肇”和“武德郎知金汤城李成”。

此文书上端有残缺，下端损坏，14行（第7—12行残），楷书。最后有日期：“宣和七年八月 日”（1125年8月31日—9月28日）和发令人署名。日期上盖有红色篆字方印， 5.2×5.5 厘米，可能是酈延路的印。首尾均有宽6.5厘米的红色登文

戳记残印（印文很大，认不出来，最后一字很像“将”字）。

从：“〔金〕汤城”到：“〔第〕七将谨状”

十四、原藏录号TΦ—14，第16页。文书末尾，残存最后一行文字：“〔第〕七将谨状”，两行日期（合公历1125年8月31日—9月28日），以及和前一文书相同的署名和称号。

文书末尾，缺上端。3行（第1行残）。左页边长29.5厘米。其上斜盖着宽6.5厘米的橙黄色登文戳记的下部分，有个大“将”字的残迹。日期上盖有5×5.2厘米的红方印，是篆字“保安军金汤城军之记”。此文书的字体为小楷。

十五、原藏录号TΦ—14，第75页。关于逮捕苏秉义并将他同李适等人一起解送监狱的信函。

此文书无首，上下端损坏，8行（第1—7行残），行书字体。最后是日期：“宣和七年九月初一日牒”（1125年9月29日）。日号为另一种笔体。日期上盖着5.5×5.7厘米的红方印，篆字印文“延安府印”。左端盖了此印的右半截，右端又盖了两次此印的左半截。

从：“……旁及勒金汤城抄录元被交”到：“……谨牒”

十六、原藏录号TΦ—14，第1、5、9、22、32、34、37、38、56、59、64、72、83页；原藏录号TΦ—15，第2、17、19页。

关于各级官员侵吞国库粮食的讯问笔录。在作进一步叙述时，各页（第1页和最后一页除外）的顺序依据内容重新排列，各页之间不直接相连。所有各页上都是同一种行书笔体。文书的各部分在写录时顶格空白处的距离不等：每问的开头低2厘米，供词低10.5厘米，总括部分低6厘米。文书上有许多5.7×5.5厘米的同一种红方印签，上有篆字印文的“延安府印”。

1.原藏录号TΦ—14,第1页(右半截)。文书的开头,下端残缺,右端和上端损坏。7残行,第7行几乎完全被毁坏。开头有大字:“〈保〉安军”,和“〔牒〕〈第〕〔七将〕……”,往下提到薛〈高〉的呈报。第5—7行上有 5.2×5.5 厘米的红印,大概是“鄜延路司之印”。

从:“经略牙牒枢密院札子鹿……”

到:“……者 将 ……”

2.原藏录号TΦ—14,第5页(右半截)和第1页(左半截)。某人的供词结尾,其中除了供认盗卖粮食外,还提到盗买布匹,并指出布匹价格和人名〈汉〉忠,此后是王期和第七〔将〕下蕃官阿香的供词开头。

这两半截可直接拼合,均缺下端。11行,有红色记号。

从:“……〔状〕鹿〔色〕……”到:“弓箭于指挥雇召过……”

3.原藏录号TΦ—15,第17页。配发军粮和饲料的清单,提到人名有〈王〉期。

1页的右半截(左半截佚失),缺下端,6残行,右端有印痕。文中有日期“今年二月”(1125年3月7日—4月5日)。

从:“〔每〕人口……〔差〕……”到:“文历得有除指过历……”

4.原藏录号TaHГ.—14, ИHB. №211, 第38页。查明杜肇与王期的关系和审问李适的开头,其中提到监押杜肇和庞四郎。

1页,缺下端,11残行,有红色记号。

从:“杜〔肇委实曾〕无外支……”到:“寄〔居庞四郎处〕……”

5.原藏录号TΦ—14,第32页。审问李适的结尾,其中提

到杜肇，庞成忠，审问庞成忠的开头，其中提到的人名有：“第七将队将柳祗、监押李承信、仓司刘〈言〉、马彦、张泽、专副高仲。

1页，缺下端，11残行，右端盖一印的左半截。文中有日期“今年正月二十〔九〕……（1125年3月5日）。

从：“告论〔杜肇〕买了庞成忠交……”到：“□□〔盗〕？□乔麦……”

背面印的辞典条文和文书上字的方向相反。

6.原藏录号TΦ—14，第22页。上一问题的结尾，对李适的审问，李适和庞四郎的供词，审问专典康辉的开头。

1页，缺下端，12残行，最后一问的前面和文中有红色记号。文中有日期“五月”（1125年6月4—7月2日）。

从：“借斛斗白状封记一齐……”到：“铜钱……”

7.原藏录号TΦ—14，第64页。李适的供词，提到庞四郎，他的父亲庞成忠，第七将，陈承信，第七将番大夫，监押杜肇。

1页，下端损坏，12行（第1和第12行残），右端有一印的左边，左端有另一印的右边。文中有日期：“今年六月”（1125年7月3日—31日）。

从：“〔人〕父〔庞成忠赡家驿〕□”到：“□〔肯支〕□〔本色本官〕”

8.原藏录号TΦ—14，第34页。对专典康辉，专典张潜、康永安的审问。提到了曹司王期，监押杜从义（即杜肇）。

1页，下端缺损，12行（第1、11—12行残），有红色记号。

从：“贰拾〔石〕……”到：“……〔交旁于〕……”

9.原藏录号TΦ—15，第19页。高仲供词的结尾和对仓司马彦、知城〔李武郎〕（即李成）的审问。提到〔杜〕〈肇〉

监押和潘大夫。

1 页，下端损坏，12 行（第 1—2、11—12 行残）。文中有红色记号。

从：“挥〔运〕……〔要杜〕□”到：“〔武郎〕□〔将潘大夫〕……”

10. 原藏录号 TΦ—14，第 83 页。对李适、城司韦诜的审问。提到监押杜从义（即杜肇）以及地名：万金寨，□郎山。

1 页，下端损坏，12 行（第 1 行残），第 4 行有修改。左右两端有两印。文中的日期是：“〔宣和七年二月九日〕”（1125 年 3 月 15 日）。

从：“〔一李适〕□〔状宣和七年二月九日于〕□”到：“郎山等处捌铺烽火〔管〕”

11. 原藏录号 ТаНГ—15. ИНВ № 213，第 2 页。某人对讯问关于同蕃落将李进交往的答词。

一页，缺下端。10 残行。文中提到的日期有：“二月”，“今年四月至八月”（即 1125 年 3 月 7 日—4 月 5 日和 5 月 5 日—9 月 28 日）。右端有一残印。

从：“硕逐铺〔尅除〕得经〔历〕□□”到：“陆斗捌升于知城处□”

12. 原藏录号 TΦ—14，第 72 页。〈韦〉诜关于同李进和知城李成交往的供词结尾和对仓司专副康辉，高仲，〔刘〕言同伟诜（原文如此）和知城李武德（即李成）交往情况的审问。

1 页，下端损坏，12 行（第 1—2 行残）。文内和页边上有红色记号。左端盖一印的右半截。

从：“〔有〕李进已俵散逐烽□□”到：“为无 提刑司斛斗逐急”

13. 原藏录号 TΦ—14，第 37 页。金汤知城李成和李适交往

情况的归纳。提到了金汤〔城仓〕司高仲。

1 页，上下端损坏。10 行，最后 1 行残。文内和页边上有红色记号。左端有一印片断。右端有一带日期的黑色登文戳记的片断。文中的日期是：“今年三月四日”（1125 年 4 月 9 日）。

从：“价例照勘伏乞指挥罢”到：“□□〔使〕乐牒催促甚是紧切”

14. 原藏录号 TΦ—14，第 59 页。涉及房轸和他的契约当事人蕃官吃多朴的两个问题。提到了第七将。

1 页，下端损坏，12 行（第 1 和第 7 行残）。右端有一印的左半截。文中的日期是：“七月十二〔日〕”（1125 年 8 月 12 日）。

从：“七月十二〔日〕”到：“当府契勘左狱紧要卖□”

15. 原藏录号 TΦ—14，第 9 页。虞侯大张进关于知城李成同他、专副康永安和仓司贴书张潜交往的供词。

1 页，下端损坏，11 行，第 1 行残。文中的日期是：“今年五〔月〕”（1125 年 6 月 4 日—7 月 2 日）。有红色记号的痕迹。

从：“勘见秣……”到：“下借支到白米贰拾〔硕〕”

16. 原藏录号 TΦ—14，第 56 页。供词的最后部分，其中说到把案犯投入监狱和派差役把文件送到府中。

1 页，下端损坏。8 行（第 1 行残）。文中有红色记号。最后是日期：“宣和七年十月廿二日牒”（1125 年 11 月 7 日）。日期上盖有“延安府印”，右端有同一个印的左半截。

从：“□会到前项逐件事节结勘〔清〕□”：“到〔滞〕谨牒”

十七、原藏录号 TΦ—14，第 73 页。监狱长（？）张辛关

于收到文件和要求进一步指示的呈文。

1 页。右面上下两端损坏严重，11行，第1行残，近似行书的楷书，使用了抬头。最后是日期“宣和七年十一月〇日”。文后和页边上有大字草书批语：“计（？）会？万/同共与差去人勾？”，其后有黑色登文戳记，注明登文日期是“初肆日”（合公历1125年11月30日），和收发签字。文中还提到〈延〉〔安府〕和收到文件的日期“十月三十日”（1125年11月26日），以及“今五日”（1125年12月1日），这个日子离发命令的日期很近。左右两端有两方不全的红色登文戳记，宽6.5厘米，印文认不出来。

从：“□〔安府左狱〕……”到：“裁旨”

十八、原藏录号TΦ—14，第27页、第82页。两页关于仓司马彦盗窃粮食一案供词的呈报，开头和结尾部分，使用了抬头。清晰的小楷字体，此件的内容同下件接近。

1. 第27页。文书的开头，1页，缺下端。中间部分的左右两边损坏严重。18行，第5—6行残。文中提到的地名有：延安府，延川县，制〔戎〕〈城〉；人物有：第七将，拾贰将，专典高仲，将领潘大夫，省仓监押李承信，知城苗武节；日期有：“〈今〉年九月”（1125年9月29日—10月28日），“今年正月”（1125年2月5日—3月6日）。有红色记号和修改处。

从：“〔据〕仓司马彦状先于今年……〔蒙〕”到：“□了当……患……”

2. 第82页。从义郎权金汤城兵马监押杜肇和武德郎知金汤城李成签署的同一个呈文的末尾。1页，上端残缺，下端损坏。6行，第5—6行残。左页边长24.5厘米。最后是签名和日期：“宣和七年十月 日”。文后有批示的大字“申”，大字草书，登文日期“廿一日”和收发签字。日期合公历1125年12月

17日。日期上盖有5×5.2厘米的篆字红方印，印文是“保安军金汤城军之记”。文中提到了仓司马彦，〈第〉柴将，〈延〉安府，和日期“十月二十八日”（1125年11月24日）。

从：“……契勘仓司马彦委实于十月二十八日差出本”

到：“……〔柴〕将谨状”

十九、原藏录号TΦ—14，第88页，第30页。关于仓司马彦盗窃粮食一案供词的呈报，开头和结尾部分，使用了抬头。清晰的小楷。此件内容同上件接近。

1.第88页。文书的开头，1页，上端残缺，下端损坏。17行。文中提到的地名有：制戎城、延安府、延川县；人物有：第七正将潘大夫，知城苗武节、高仲，监押李承信，队将柳祇，专典你几个，拾贰将；日期有：“今年四月”（1125年5月5日—6月3日），“十月二十八日”（1125年11月24日），“今年正月”（1125年2月5日—3月6日），“今年九月”（1125年9月29日—10月28日）。左端盖一印的右半截，全印见此文书的末尾。

从：“□□司马彦状先今年四月内蒙”到：“……〔甚〕□〔覆〕□〔押〕……〔杖拾贰将斛斛〕……”

2.第30页。修武郎权兵马都监杜肇和武德郎知金汤城李成签署的同一件呈文的末尾。1页，缺上端，9残行，左页边长19.5厘米，文中提到延安府，结尾是日期：“□（宣）〔和〕七年十二月 日”。合公历1125年12月27日—1126年1月24日，日期上盖5×5.2厘米的红方印，篆字印文：“保安军金汤城军之记”。

从：“……兑支了当其本将……”

到：“……〔将〕谨状”

二十、原藏录号TΦ—14，第81页。从义郎权兵马监押杜

肇和武德郎知保安军金汤城李成关于官产检查情况呈送第七将报告的结尾。

1 页，上端残缺，下端损坏。11行，第10—11行全。有抬头，左页边长8.5厘米。提到了马彦和延安府。最后是签字和日期：“宣和七年十一月 日”（1125年11月27日—12月26日），页边上有大字批示日期（看不清楚）和收发签字。日期上有5×5.2厘米的红方印，篆字印文：“保安军金汤城军之记”。

从：“……？衙所委官点检常？官物次第本人委实不□”到：“……〔照〕会谨状”

二十一、原藏录号TΦ—14，第8页。房轸关于委托蕃官吃多朴和蕃官刘永忠为金汤城专典高仲出售军粮的报告。

1 页，上下两端损坏，14行，楷书，有抬头。文中的日期有：“今年七月十六日”（1125年 8 月16日），“今年七月二十四日”（1125年 8 月24日）“今年十一月十九日”（1125年12月15日）。提到了延安府，最后是申报人署名和日期：“宣和七年十一月 日”。页边上有大字登文日期：“廿一”

（1125年12月17日）和收发签字。正文后的日期前面有个大的批字“申”。某些字旁有小黑圆圈记号。

从：“□轸近蒙本将差赴”到：“〔裁〕旨”

二十二、原藏录号TΦ—14，第85页。文书结尾，只保留下来最后一段：“第七将谨状”，日期：“宣和七年十一月 日”（1125年11月27日—12月26日）和呈报人署名：“从义郎权金汤城兵马监押杜肇，武德郎知金汤城李成”。

1 页，3行，小楷字体，页边上有宽6.5厘米的红方登文记，上有楷书大字（看不清楚）。日期上盖有5×5.2厘米的红方印，篆字印文：“保安军金汤城军之记”。

二十三、原藏录号TΦ—14，第50页，第18页。关于 蕃落

将李进盗窃粮食一案的结论，小楷，字体清晰。

1.第50页。文书开头，1页，上端残缺，下端损坏，16残行。提到地名：〈金〉〔汤〕城，〈延〉〔安〕府，日期：“今年四月至八月”（1125年5月8日—9月28日）。

从：“□〔汤〕城”到：“掙促状未请斛斛寄仓会子□□”

2.第18页。文书的延续，1页，下端损坏。18行（最后一行残）。提到地名：万全寨，人名：烽火铺头侯八，〔韦〕仇（洗），和日期：“今年四月至八月”（1125年5月5日—9月28日）。

从：“依准”到：“□请……”

此件和下面两件文书的内容相同，笔体一样，看来是1129年初的。

二十四、原藏录号TΦ—14，第53页。关于苗知城（即苗武节）盗窃粮食一案的结论。

1页，下端损坏，此文无首尾，19行（第1和第19行残），小楷，笔画清楚。提到将领潘大夫，专典高仲，李都监（即李成），和日期：“今年正月二十一日”（1125年2月25日）。有红色记号。因为李成是在1125年末至1126年初得到上述称号的，所以本件是1126年初的。

从：“……〔件公〕□〔追〕……”

到：“遣因依公〔案〕……〔赍擎〕前去……”

和上下两件文书的内容相同，笔体一样。

二十五、原藏录号TΦ—15，第8页。关于同一案王期的结论残片。

1页的左半截，缺下端，此文无首尾，8残行，小楷，字体清楚。提到了保安军和杜都监（即杜肇）。既然杜肇是在1125年末至1126年初得到这一称号的，此文书应是1126年初

的。

从：“指挥勘会杜都监元于王期处〔买〕……”到：“本收附已差人前去请领去讫……”

此文书内容同上面的两件相近，笔体一样。

二十六、原藏录号TΦ—14，第14页、第51页、第20页。关于根据故从义郎男李适的报告，就盗窃粮食一案查办金汤城监押杜肇的决定。没有直接连在一起的3页，行书字体，人名边有红色记号。

1.第14页。文书开头，上端残缺，下端损坏，11残行，右上角有楷书大字：〈延〉〔安〕府。左上角有一黑色登文戳记的印边，大概带有登文日期。提到的人名有：第七将冯武，曹司王期，百姓王汉忠。

从：“□〔安〕府 牒 本路第七将冯武”到：“状府〔自借状本城行（？）？〕□□”

2.第51页。文书的延续，下端损坏，12行（第11—12行残）。提到的人名有：部队将窠从义，〈柳〉祇，陈承信，李适，知城李成，城司韦诜。右边有5.7×5.5厘米的红印，篆字印文：“延安府印”，左边也有同一个印文。

从：“依月 日数目去处照〔勘〕”到：“〔米内借〕……”

3.第20页。文书的延续，上端残缺，下端损坏，12行（第10—12行残）。提到了金汤城和李适，左右两边盖有同样的印文。

从：“……〔元初乞（？）〕”到：“……府已专差人赍牒往彼去讫□”

此文书的字体和格式都同下件一样，大概是1126年初的。

二十七、原藏录号TΦ—14，第62页，第44页。两页，是同件文书的一部分，没有直接连在一起。关于根据故从义郎男

李适的报告，就盗窃粮食一案查办金汤城专典（专副）高仲的决定，行书字体，人名旁有红色记号。

1.第62页。文书开头，上端残缺，下端损坏，11行（第1—5行残），右上角有大字楷书“延安府”，文中有一字被贴掉，在另粘的纸上作了改写。提到的人名有：本路第七将冯武，仓司刘言、马彦、张泽，专副康挥（原文如此），队将柳祗。

从：“□安府 牒本路第七将冯〔武〕”到：“物曾覆□官不曾申解”

2.第44页。文书的延续，上下端残缺，11残行，左端盖有高5.5厘米的红印的右部分，印文大概是“延安府印”，提到的人名有：薛大，贴书许僧，本城专副高仲弟六奇，专副高仲家侄子，……兵士吴安妻，〈刘〉言，马彦，张泽，康挥。

从：“□〔合要本〕……〔亲〕……”到：“□言马彦张泽高仲康挥大□”

此文书的笔体和格式同“上件（二十六）”一样。大概是1126年初的。

二十八、原藏录号TΦ—14，第55页。文书的开头，对参与盗窃粮食一案的下列人的问题作了归纳，他们是：百姓李适，城？院子陈用，专典张潜、康永安、马彦，知城李成，族司房轸，将司勾成，专典高仲，也提到了第七将和金汤城。

1页，下端损坏，11行，楷书，右上角有楷书大字“延安府”，下面是较小的字：“牒第柒将”。人名旁有黑色记号，中间盖有5.7×5.5厘米的红印，篆字印文：“延安府印”。

从：“据左狱节状申准勘使府送下百姓李〔适〕”到：“专典张潜康永安马彦逃走陈□”

大概是1126年的。

二十九，原藏录号TΦ—14，第84页，第41页。一件文书的两页，没有直接连在一起。关于对军队供应执行状况进行检查（检）结果的报告，近似草书的行书。

1.第84页。文书开头，叙述了事情的实质。下端损坏，11行，右面盖有高5.5厘米的印章的左边。提到的人名有：曹司王青，将王顺。

从：“契勘七将先牒彼勾追诸军族”到：“将将卜”

2.第41页。文书的延续，包括归纳部分。下端损坏，行，有红色记号，提到了环庆路和人名王青。

从：“右七将契勘今来不任承准”到：“即目不在彼处即请别行于□”

此文书笔体同上两件（二十六、二十七）一样，大概是1126年的。

三十、原藏录号TΦ—15，第7页。关于盗窃粮食一案的判决书。

1页，13行，最后一行残。提到的人名有：仓子杜顺，专副杨彦，兵士卜喜王进宁琪殷旁，李适，索女使，以及日期：

“今月初二日”。右边盖有被断定是“延安府印”的印边，人名旁有红色和黑色记号。

从：“□铜前来押下左〔狱须〕专〔行〕遣”
到：“〔宁琪〕……”

大概是1126年初的。

三十一、原藏录号TΦ—14，第36页。保安军德靖寨赵德诚的履历表。

1页，文书末尾，10行（第1—2行和第8—9行残）。清晰的楷书。提到了先祖（未任过职，名字不祥），祖父（赵）赏乞（未任过职）和父亲赵进忠（武功大夫吉州团练使）。最

后是日期：“靖康元□□月 日”，签名：“承节郎赵德诚”。日期推算成公历是1126年上半期。指明填表人“年叁拾陆”，所以他生于1091年。

从：“……〔德〕诚”到：“……典谨状”

请比较文书“一”

三十二、原藏录号TΦ—14，第79页。关于要第七将追捕逃犯的命令。

1页，7残行。近似行书的楷书，右上角有一个大手写字的余笔（文书名称？），末尾是用另一种笔体写的日期：“〈宣〉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即1126年1月6日），收发签字正文和日期之间有浅褐色批字：“第七将”，日期上盖有5.2×5.5厘米的红方印，篆字印文：“郾延路之印”，右面也有此印的印边和浅褐色记号。

从：“……札付第七将立便勘会有无”到：“……状申来不得稍有住滞准此”

三十三、原藏录号TΦ—15，第5页。统制司关于要第七将调动其属下一百至二百人出发行军的命令。

1页，11行（第2—6行残），楷书，最后是日期：“今日”，签名：“统制司吴湛”，页边上有大字草书登文日期：“〔初〕五日”，和收发签字。日期折合公历大概是1126年1月8日。空白处有大字草书批示：“送第七将”，上面有印痕。

从：“〔统〕制司”到：“裁旨”

背面有3.5×18.5厘米的红色登文戳记，上面被认出的一个字是“案”字。

三十四、原藏录号TΦ—15，第20页。关于调动军队待敌的命令。

文书结尾的一页，7残行，行书字体，最后有日期：“靖康元年二月十九日牒”（1126年2月12日）；页边上有红字批语：“第七将”，文末有红色记号的痕迹，日期上盖有5.2×5.5厘米的方印，篆字印文：“鄜延路司之印”。右端也有此印的一个片断。左端是一黑色登文戳记的片断，字体特殊，最后两个字被认出都是“马”字，右一字大。

从：“……〔法〕成〔解伍石一斗箭〕□□□〔踪〕”

到：“……出误谨牒”

三十五、原藏录号TΦ—14，第12页，第33页。一件文书的两页，没有直接连在一起。关于检查追捕逃亡者结果的报告，大字楷体。

1.第12页。文书开头。1页，下端损坏，9行，第1行上有个大的“检”字（文书名称），有红色记号的痕迹，文中的日期是：“正月十二日”（1126年2月5日）。

从：“准 经略 使牙札子云云”到：“月十二日具状曰”

2.第33页，文书末尾。1页，下端损坏，3残行，最后有日期和呈报人姓名：“靖康元年正月 日吴湛”，行间有红字批语：“二件申经略乐无捉获〔逃〕背人推思倒事”，其后有大字登文日期：“二十七日”，日期合公历1126年2月20日。上面有5.2×5.5厘米的红印，篆字印文：“鄜延路司之印”，日期下面是收发签字。

从：“……今申”到：“……经略 使乐”

三十六、原藏录号TΦ—14，第67页；原藏录号TΦ—15，第12页。一件文书的两页，没有直接连在一起。大字，近似草书的行书。

1.原藏录号TΦ—14，第67页，文书开头，通报防备西贼入侵环庆路所采取的措施。

1 页，缺上端，11行（第10—11行残），有红色记号，第1行是大的模仿登文戳记的签字：“□〔应环庆路军马 牒第七将〕”，中间有一模糊不清的红印， 5.2×5.5 厘米，篆字。

从：“先 准”到：“□于环庆路出没候到清详□”

2. 原藏录号TΦ—15，第12页，文书末尾。

1 页的左半截，上端残缺（右半截佚失），其上有最后一行字的片断：“谨牒”，日期：“〔靖〕康元年二月十五日牒”（1126年3月10日）。日期上盖有 5.2×5.5 厘米的篆字红印，印文为：“鄜延路司之印”，上有红色批字：“第七将”，边上有签字的右半截（模仿登文戳记的手书）：“……〔鄜延路第七将〕□〔司兵军马马〕”（最后一字比其他字大）。

此文书几乎字字句句都同文书“六十八”吻合，大概是它的草稿。

三十七、原藏录号TΦ—15，第16页。文书末尾，内容不详。

1 页的左半截，上端损坏，只保留了最后的一节：“〔滞〕牒”和日期：“靖康元年二月十八日牒”（1126年3月13日）。草书。日期上盖有 5.2×5.5 厘米的橙黄色印，篆字印文：“鄜延路司之印”。上有红色批字：“第七将”页边有一黑色登文戳记的右半截：“……〔司使应环庆路军马马〕”，最后一字比其他字大。

三十八、原藏录号TΦ—14，第43页。关于延缓执行刘承信所记事务原因的呈文，结尾部分。

1 页，右边和下端损坏，6行（第1行字认不出来），草书，提出了环庆路和一个叫刘惟清的人。最后有日期和呈报人签字：“靖康元年闰十一月 日吴湛。”页边和空白处有大字草书黑色批语：“保安军？”和橙黄色批语：“二件申保安军？”

刘将〔信〕□字状事(?)”，登文日期：“十六日”，收发签字。日期合公历1126年12月31日。日期上盖橙黄色印， 5.2×5.5 厘米，篆字，印文大概是“鄜延路司之印”。文中盖有橙黄色登文戳记， 2.7×14.2 厘米，印文认不出来。

从(第2行)：“据承信郎统制策应环庆……”到：“指挥施行今申”

三十九、原藏录号TΦ—14，第21页。关于就捕捉逃犯和拘捕其亲属(如果没找到逃犯)一事给第七将的指示。

1页，10残行，楷书，末尾有日期：“〈靖〉康二年四月初四日”，即1127年5月16日。日期下有收发员的姓：何。文中有用红笔注的大字：勾。正文和日期之间有红批字：“〔第〕七将”。日期上盖 5.2×5.5 厘米的红印，篆字印文：“鄜延路司之印”，正文前面有主管部门登文戳记的左边，模拟式字体，内容是：“〈鄜〉〔延路经略安抚使司〕”。中间有 2.8×5.7 厘米的登文戳记，小楷字体，注明书吏和校对者姓名：“书吏杨谊写职微马袷对”，姓名是手写的。

从：“……案？准 御前会合军马入授所牒今来〔措〕”到：“……施行仍已施行次第文状申来准次”

四十、原藏录号TΦ—14，第68页。差使臣杨仲兴 收集溃散的军队和民团给第七将的命令。

1页，缺上端，8行(第1—4和第8行残)，行书字体，文中提到了鄜延路和刘刺史、何寻光，最后是日期：“〈靖〉康贰年肆月拾捌日”，即1127年5月30日。日期下面有收发员的姓：何，日期上面盖 5.2×5.5 厘米的篆字红印：“鄜延路司之印”。左页边上还有4个印角。正文前面有主管机关的黑色登文戳记，模拟式字体：“〈鄜〉〔延路经略安抚使司〕”。正文和日期之间有红色批字：“第七将”。批字和日期上斜盖着 $2.7 \times$

20.5厘米的红色登文戳记，印文认不出来。下面是 2.5×6.2 厘米的黑色登文戳记，小楷字体：“书吏??写职经??对”。名字是手写的。其下还有一黑色登文戳记， 2.7×4.8 厘米，小楷字体：“?点检讫使臣武澄”。

从：“统制郾延军马刘刺史申已差使臣杨仲兴”到：“目军分出名共申准此”

四十一、原藏录号TΦ—14，第69页。第七副将关于执行收集第七将溃散部队的命令的报告。

1页，8行，第1和第4—6行残，小楷字体，最后是日期和呈报人署名：“〔靖康二年四月〕日忠朝郎推知〔通〕庆城〔权第七副将灌通〕，武功郎郾延路第七副将张顺”。日期上面盖 4.8×5.4 厘米的红印，篆字，印文认不出来。页边上有行书红字批语：“将公文见收集溃散人”，稍左边有一带登文日期“贰拾捌日”(1127年6月9日)的黑色登文戳记，和收发员签字。

从：“□〔延〕路第七副将”到：“〔第〕七将谨状”

四十二、原藏录号TΦ—14，第42页。关于溃散人进入秦凤路一事致第七将的报告。

1页，7行，第1、2、7行残，行书字体。提到了刘保义和河东、河北地区，最后是日期：“〈建〉炎元年伍月拾玖日”，即1127年6月30日。日期上盖有 5.5×5.5 厘米的红印，篆字印文：

“郾延路郾州军司之印”，左端还有个印角，日期下面有收发员的姓：何，右端有机关黑色登文戳记的片断：“……〔路经略〕……。”正文和日期之间有填写了名字的黑色登文戳记， 2.5×6.2 厘米，楷书：“书吏??写职经田中对”。下面边上又有一方 2.7×4.8 厘米的黑色登文戳记，楷书：“?点检讫使臣武澄”，稍左边有红色行书批字：“第七将”。

从：“……已下本将勘会有无招收到秦凤□”到：“准此”

四十三、原藏录号TΦ—14，第71页。关于转达第七将命令的指示。

1页，上下端损坏。6行。近似草书的大字行书。左页边长18厘米，第1行的字比其他各行大，末尾是日期：“〔建〕炎元年六月初七日，”即1127年7月27日。提到的人名有苏玘。文中有红墨记号。正文和日期上有5.5×5.5厘米的同一个印章的三方红印，篆字印文：“鄜延路鄜州军司之印”。页边的高处有个很大的“将”字，批语：“差李怀限一日（“差”、“限”、“日，”为红字），及收发签字。

从：“〔第〕七将”到：“炎元年六月初七日”

四十四、原藏录号TΦ—15，第3页。都指挥使高友，杨过致第七将的呈文，涉及到马军苏玘。

1页，边上损坏，文书的末尾，7行（第1行残），小楷，字体清晰。最后是日期：“建炎元年六月 日”（1127年7月11日—8月9日），和呈报人署名。日期上盖5.3×5厘米的红印，全被磨掉。横着正文和在页边上有宽6厘米的红色登文戳记，认出的一个大字是楷书的“使”字。

从：“……〔弓〕箭手第三十一指挥”到：“〔第〕七将谨状”

四十五、原藏录号TΦ—14，第78页。承节郎鄜延路第拾将队将杨仲兴关于执行收集溃散部队的命令致第七将的呈文。

1页，13行（第1—12行残），小楷。提到了张景、程晖、田俊、侯亮、张贵、党顺、苏玘、陈万、和城名延安。有黑墨记号。末尾是日期：“建炎元年七月 日”，呈报人署名及其签字。页边上有登文日期：“初六”（1127年8月16月），和收发签字，正文前的空白处有黑字批语（草书）：“立便追上

件人林河？”

从：“……郎郾延路第拾将队将杨仲兴”到：“……柒将谨状”

四十六、原藏录号TΦ—14，第6和第2页（左半截）。兵士张德因同祁氏结婚而要求改变粮食供应关系的呈状。

直接连在一起的两个半页。文书末尾，下端损坏。6行。笔体不清晰的楷书，最后是日期：“建炎元年七月 日”，和申请人署名，页边上有黑色登文戳记，带登文日期：“于(?) 贰拾”（1127年8月29日），和收发签字。正文和日期之间有大黑字批语：“改正”。

从：“□□伏为本姓祁为年小随母嫁与□”到：“裁旨”

四十七、原藏录号TΦ—14，第47页，第2页（右半截），第5页（左半截）。第十将队将杨仲兴关于捕获逃犯的呈文。文书的两部分，没有直接连在一起，行书。

1，第47页。文书开头，缺下端。9残行。提到的名字有：程晖、田俊、侯亮、张〔贵〕、党顺、苏玘、陈万、并指出只有最后一人未被捉住。正文前面的右端盖有黑色登文戳记：

“〈郾〉〔延〕路经略安〔抚使司〕”。正文上面有一红色登文戳记，18×13.5厘米，印文认不出来。

从：“……状申准第十将队将杨仲兴公文”到：“指挥降”

2.第2页（右半截），第5页（左半截），文书末尾。直接连在一起的两个半页，缺上端，3行，第2行全。最后是日期：“〈建〉〔炎〕元年柒月贰拾壹日”，即1127年8月30日。正文和日期之间有红批字：“第七将”。日期上盖有5.2×5.5厘米的红印，印文大概是：“郾延路司之印”。日期下面有收发员的姓：何。

从：“…程〔晖〕等〔六〕……”到：“具状申解赴当司

准此”

四十八、原藏录号TΦ—14，第70页。关于征兵支出的报告。

1页，缺上端，10行（第1—4行，第10行残）。提到的人名有：“十七军员曹进，齐德管押”。最后是日期：“〈建〉〔炎〕元年九月初四日（1127年10月11日）。文中还有一个日期：“九月九日”（1127年8月18日）。右端有一字体特殊的黑色登文戳记：“〔鄜〕延〔路使（？）总节司〕”。正文和日期之间有红批字：“第七将”，日期上盖着红印（左边阙佚）高5.5厘米，篆字印文：“鄜延路鄜州军司之印”。页首还有一印的痕迹。日期下面是收发员签字。

从：“□状申先支降到招军铜钱关子肆道”到：“到轻资色头供申 准此”

四十九、原藏录号TΦ—14，第91页。第十〈将〉队将杨仲兴关于交送服装和粮食致第七将的呈报，提到由张景押送。

1页，9残行。最后一行有日期：“〔建〕炎元年九月十五日”（1127年10月22日）。正文和日期之间有红批字：“第七将”，日期上盖有5.5×5.5厘米的紫印。篆字，印文大概是：“鄜延路鄜州军司之印”，页边上有一橙黄色登文戳记的印边，日期下面是收发签字，右端粘一小块纸，上面有个大“申”字。

从：“〔第〕十队将杨仲兴 申契勘所管汉弓箭”到：“〔解〕赴当司出头不得迟滞准〔此〕”

五十、原藏录号TΦ—14，第29页。文书末尾，内容不详。

1页，三残行，楷书，保存了最后两行正文：“……乱有占留仍具已〔发〕遣□/……申准此”，和一行日期：“〈建〉炎元年九月十七日”（1127年10月24日）。正文和日期之间有

红批字：“第七将”，其下有一橙黄色注字：子，日期上面盖5.5×5.5厘米的紫印，篆字，印文大概是：“鄜延路鄜州军司之印”，日期下面是收发员签字。

五十一、原藏录号TΦ—14，第60页。关于部队出发人数不足致第七将的报告，结尾部分。

1页，上端残缺，下端损坏，6行（第1和第6行残），清晰的楷书。最后是日期：“〈建〉炎二年七月二十一日”（1128年8月18日）。正文上斜盖着1.8×13.5厘米的红色登文戳记，楷书：“鄜延路经总？司官？？”，文中有褐色记号，正文和日期之间有褐色批字：“第七将”，日期上盖5.5×5.5厘米的红印，篆字：“鄜延路鄜州军司之印”，页边上还有一个印边。日期下面有收发员签字。

从：“纽计折支价钱不管稍有迟□□”到：“依此指挥施行准此”

五十二、原藏录号TΦ—15，第4页。阿罗（女）和曹进、赵松关于缺少冬衣的报告。

1页，上端残缺，下端损坏，12行（第1—2行，第5—6行残），清晰的小楷字体。文中提到了地名澄城县和保安军，最后是日期：“建炎二年八月 日”（1128年8月28日—9月25日），和女申报人的名字。文中提到的日期是：“今年〔五〕月”（1128年5月31日—6月29日），左页边有个大的批字：申

从：“□人阿罗等”到：“裁旨”

五十三、原藏录号TΦ—14，第87页。军事长官高雅、陈忠（？）、徐永、刘端、史进、张栋、将俊、赵用、？福、小张顺、王卞、赵忠关于缺少冬衣的呈报，末尾部分。

1页，上下两端损坏，19行（第11行残），小楷，字体清

晰。文中还提到郭武经，和地名澄城县，保安军。最后是日期：“建炎二年九月 日”，和12名呈报人姓名，日期后面有大字登文日期：“十日”（1128年10月5日），和收发员签字。日期和正文之间有大的批字：“行”。文中出现的日期还有：“去年十二月”（1128年1月4日—2月2日）“五月”（5月30日—6月29日）和“八月”（8月28日—9月25日）。

从：“〔右〕雅等一十二人先于去年十二月内差随副将郭武经从军使唤□”到：“指挥”

五十四、原藏录号TΦ—14，第46页。李仙关于供应冬服的呈文。

文书末尾，上端残缺。8行，最后一行全。楷书，字体清晰。提到了“华州”，“保安军”。最后是日期：“建炎二年九月 日”，和呈报人姓名。页边上有大字登文日期：“十日”（1128年10月5日），和收发员签字。正文和日期间批有大字“行”。

从：“……为系华州保安军〔二十一指挥〕……”到：“……旨”

五十五、原藏录号TΦ—15，第6页。承信郎权兵马监押刘广，从义〔郎〕权知〔德靖寨吕耿礼〕关于必须供应部队服装的呈文。

1页，缺首，上下端损坏，小楷，字体清晰。8行，第1行残。最后有日期：“建炎二年十月 日”，和呈报人署名。页边上有登文戳记，注明登文日期是：“初捌日”（1128年11月2日），和收发员签字（片断）。日期上面盖有4.8×5.2厘米的红印，篆字印文：“环庆路军之记”。

从：“□使将牒请□速勘会〔令〕来合……”到：“将谨状兼已具一般申 军去讫谨状”

五十六、原藏录号TΦ—14，第17页。承信郎权德靖寨兵马监押刘广从军和从义郎权知德寨吕耿礼关于部伍从华池寨停驻在合水县的呈报。

1页，8行，楷书，末尾是日期：“建炎二年十二月 日”，和呈报人署名。页边上有登文日期：“〔初〕二日”（1128年12月25日），和收发员签字。文书左端粘着一条纸，上面有收发员重签的字。日期上面盖着4.8×5.2厘米的橙黄色印记，篆字印文：“环庆路军之记”。提到了第七将。

从：“德靖寨”到：“第七将谨状”

五十七、原藏录号TΦ—15，第14页。丞谊（？）郎权乱各族又检屈轻，郭武郎权小胡族又检晁宁关于小胡族调拨的军人数量的呈报。

1页，14行（第10行残）。近似行书的楷书，有红色记号，末尾是日期：“建炎二年十二月 日”（1128年12月24日—1129年1月21日）和呈报人签名。

从：“小胡等族”到：“闻谨状”

五十八、原藏录号TΦ—14，第89页。一件呈文的末尾，内容不详。

1页，4行，行书字体。最后是日期：“建炎二年十二月 日”和呈报人签名，页边上有大字登文日期：“〔初〕四日”（1128年12月27日）和收发员签字。登文日期上面有5×5.5厘米的红印，篆字印文：“保安军？？？军之记”。

从：“乞申”到：“照会”

五十九、原藏录号TΦ—15，第15页。潘定关于检查通庆城部队出动情况的报告（检）。

1页，15行，近似草书的行书。有改写。文中提到的人物有：童承节、刘太尉、刘团练、最后是日期：“建炎二年十二

月 日”和呈报人签字，页边上有大字登文日期：“初四日”（1128年12月27日）和收发员签字，文中提到的日期还有：“初三日”（12月26日），右端有主管机关黑色登文戳记的片断和5×5.5厘米的红印的半截，左端也有此印，篆字印文：“保安军？？军之记”，正文和日期之间有红字批语：“四件牒通庆城童承节？”

从：“今月初四日申时后准初三日”到：“右各伏此”

六十、原藏录号TΦ—14，第25页。关于鹤子川地区乌阳嘴要塞蕃官屈轻节制下的军队出动情况的报告（检），缺首。

1页，下端损坏，11行，行书字体，有改写，最后是日期：“建炎二年十二月 日”，和文书名称。页边上有大字登文日期：“〔初九日〕”（1129年1月1日）和收发员签字。开头，正文结尾和登文日期上有5×5.5厘米的三个红印，篆字印文：“保安军？？军之记”。

从：“制置 经略 待制台旨差拨？……”到：“制置 经略 待判行府伏乞照会及增蕃官屈轻准”

六十一、原藏录号TΦ—15，第11页。文书结尾，内容不详。

1页，缺上端，6残行，最后一行带日期：“〔建炎五年正月二十三日〕”（1131年2月22日），日期上盖有5.5×5.5厘米的红印，篆字印文：“廊延路”。左端有一字体特殊的黑色登文戳记：“……〔管廊延路副都总使？番司（？）〕”。

从：“……〔今备准〕”到：“……文回示谨准”

六十二、原藏录号TΦ—14，第90页。关于严禁违抗命令的规定，结尾部分。

1页，4行，最后是日期：“〔阜〕昌二年八月十五日”（1131年9月8日），日期上面盖有5.5×5.5厘米的红印，篆

字，认不出来。日期和正文之间有红批字：“第七将”，页边上有另一枚4.8×5.2厘米的红印，篆字：“鄜延路……”，左端还有另一文书的开头，草书，保存了两行：“兵案 / ……经略 使牙札子云云”。

从：“远即转牒州县递送前去无致依”到：“仍具知禀供申准此”

六十三、原藏录号TΦ—14，第10页。文书开头，查明一个叫郭仙的人犯有勾结叛徒罪。

1页，缺上端，10行（第1、第7—10行残），行书字体。开头指出寄送人（大字行书）：“〔鄜〕延路第拾将”，和地址：“牒本路第柒将”，正文前面的边上有带登文日期“〔初柒日〕”的登文戳记和收发签字。文中提到“庆成军”和“今年二日”，中间的正文和左上角上面有5×5.5厘米的印章的两个红印，篆字印文：“鄜延路金汤城军之记”（12世纪20年代的）。

从：“准来文请速将驻泊庆成军”到：“□指挥去讫候□〔请照〕？施行□”

六十四、原藏录号TΦ—14，第13页。□衙山后铺守烽人杨永关于发现“西贼”和他们向环庆路移动的报告。

1页，11行，第6—7行残，行书字体，提到的要塞有：□远寨、观化城、朱台寨、嘉岭山，和日期：“今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今月十九日卯时”，页首边上有机关登文戳记的片断、页尾右端有高5.5厘米的红印，篆字印文：“鄜延路……”（12世纪20年代的）。

从：“□衙山后铺守烽人杨永分析今月二十三……”到：“〔人〕马及昼夜举〔放到〕烟火事势大……”

六十五、原藏录号TΦ—14，第15页。关于部队服装和粮

食的供应问题致第七将的呈报。

1页，14残行，行书字体，正文前面的页边有大字楷书的文书名称：“〔保安军 牒 第七将〕”。文中提到地名：陕西五路，延〔安〕府和日期：“〔今〕月十九日卯时”、“今月十七日”和“今月贰拾陆日”。有橙黄色记号。此残片中间和末尾有高5.5厘米的印章的两个橙黄色印记，篆字印文：“鄜延路……”（12世纪20年代的）。

从：“□月十九日卯时 准”到：“□□〔种人并〕……”

和文书“七十九”中的日期和地名一样。

六十六、原藏录号TΦ—14，第19页。蕃官蕃兵表示归顺的文书。首尾残缺，提到了皇帝的亲自赏赐。

1页，14残行。提到的地名有：鄜延路，札城寨。右面边上盖有高5厘米的红印，篆字，印文认不出来（12世纪20年代的）。

从：“□慈特降”到：“……〔使内所生〕”

六十七、原藏录号TΦ—14，第31页。此文书首尾残缺，谈到了大赦逃犯的赦书。

1页，10行（12世纪20年代的）。

从：“帅守不曾差官总率见今嚏□”到：“乞札付书写副□总官机”

六十八、原藏录号TΦ—14，第39页。第七将关于对“西贼”采取措施的命令，开头部分。

1页，12残行。正文前面有大字写的文书组成部分的事由：“□〔策〕应环庆路军马 牒 第七将”，正文中画有红线。有5×5.2厘米的红印，篆字，印文大概是“鄜延路”。左端还有一印的片断（1126年3月10日的）。

从：“□准”到：“□□为〔待敌之〕□准备寅夜〔已〕”

文书“三十六”几乎字字句句都同本件吻合，大概是本件的草稿。

六十九、原藏录号TΦ—14，第40页。关于逃兵问题和采取的捕捉措施致第七将的呈报，开头部分。

1页，上下端均损坏，11行，草书字体。提到的人名有：兵士王用、牛描、王立、路询、察刑，城市有：金汤城、延安府，日期有：“七月二十五日”、“九月廿九日”（12世纪20年代）。

从：“□准第七将牒云云”到：“〔延〕安府时？取前付文历等出于八〔月〕”

根据人名判断，此文书是1125年9月29日—10月27日的，请比较文书“七十四”。

七十、原藏录号TΦ—14，第45页。“请人李进”关于供应宴会粮食致第七将的呈文。

1页，下端损坏，开头和中间部分被破坏，11行，第7—8行全，草书字体。提到了王昭，金汤城，“七月二十五日”，“七月二十□□”。在所记的供应事项旁边有拐角形记号，最后一行是日期：“……〔年〕七月 日”和签字，页边上有大字登文日期：“廿三日”。根据人名判断，此日期合公历1125年8月23日。

从：“……〔将牒〕……”到：“〔此〕申”

七十一、原藏录号TΦ—14，第52页。关于必须补充部队的报告，中间部分。

1页，10残行，行书字体，正文中提到环庆路（12世纪20年代的）。

从：“〔应〕团结使来去有呈（？）动及□”到：“〔月〕一日阙侯（？）明本团结数足”

七十二、原藏录号TΦ—14，第58页。关于不可能追捕和捉获逃亡者的报告，中间部分。

1页，下端损坏，11行，草书。文中提到了兵士李全，页首盖有高5.5厘米的红印，篆字，印文认不出来（12世纪20年代的）。

从：“？？千其逐人并在〔本〕”到：“理会亡欠军？归〔？〕”

七十三、原藏录号TΦ—14，第63页，第61页。原藏录号TΦ—15，第18页。1件文书的3页，没有直接连在一起。文书中对部队出发前所发的服装、鞋子和头巾作了记录，大字行书。

根据收发员签字判断，此文书是1126—1127年的。

1.原藏录号TΦ—14，第63页。文书开头，清单的前言和开头部分。

1页，缺上端，13行（第10—12行全）。左页边长3.5厘米。有黑墨标记。第1行中有大字：〈保〉〔安〕军，文书名称：牒和收件人官衔：第七将。正文前面有注明发件日期是“拾捌日”的黑色登文戳记，及收发员签字，文中提到了专副王易。

从：“……来文契勘本将名阙军兵不少同（？）有”到：“……〔本〕库勤专副王易等捡计到事□”

2.原藏录号TΦ—14，第61页。文书的一部分，首尾残缺，1页，17行。发给索畅进、索康义什物的清单。

从：“〔绢壹匹叁尺〕”到：“皂绢系〔腰壹条计〕壹尺五寸”

3.原藏录号TΦ—15，第18页。文书的一部分，首尾残缺。1页，17行（第1、4、17行残）。索邢远得到什物的清单。

从：“〔四？绢皂衫〕……”到：“〔布复壹条计壹〕

……”

七十四、原藏录号TΦ—14，第65页。一个叫杜林的寄给延安府的人名清单。

1页，13行（第1、11—13行残），近似草书的行书。末尾是日期：“〔宣和七年九月〕……”（1125年9月29日—10月27日）和押送人签字。提到的人名有：李适女使探连、专副杨积、杜顺妻何冯、王迎、李林、田进、路询、蔡京、火迷吾（？），薛千，王立，王用，牛措，有一个名字认不出来。根据人名判断，这是盗窃粮食一案中被捕的人。

从：“□安府院？状杜林等”到：“……佐？实”

请比较文书“六十九”中同样的人名。

七十五、原藏录号TΦ—14，第74页。关于一次战役和军队战败情况的呈文，首尾残缺。

1页，下端损坏，15行，小楷字体。文中提到了第七将和地名：延安府、德靖寨、金汤城。文中的日期有：“今月初三日戌时”、“今月初四日”（12世纪20年代的）。

从：“今月初三日戌时□准”到：“右今将”

七十六、原藏录号TΦ—14，第80页。第七副将关于军队作好准备和炮兵出发行军的命令，开头部分。

1页，13行（第1、9—13行残），小楷字体。提到了第七将和鄜延路，文中有红色记号（12世纪20年代的）。

从：“□延路第七副将”到：“……〔挥〕下〔合属库钱收买置造〕施行谨〔具〕□”

七十七、原藏录号TΦ—14，第93页。1页的左半截（右半截佚失），带有红笔签字：第七将。背面盖有不清楚的红色登文戳记，宽3.5厘米，高至少16厘米。楷书，印文认不出来（根据登文戳记判断，此文书是1125年的）。

七十八、原藏录号TΦ—15，第9页。关于捉拿逃亡者和拘捕他们亲属的命令。

1页，15行（第7—8，14—15行残），近似行书的楷书。第1行是大字的文书名称：“〔保安军〕牒 第七将”。名称前面的边上有注明登文日期：“壹拾柒日”的登文戳记，和收发签字片断。文中提到地名陇州，京兆府路，以及女真人（金贼）的侵犯。盖有高5.5厘米的大概是酈延路的红印，篆字，左端有另一个印的片断（12世纪20年代的）。

从：“准 经略 使衙牒准”到：“一若将来捉获未审各合如……”

七十九、原藏录号TΦ—15，第13页。关于执行上件命令的呈报，开头部分。

1页的右半截，页首被撕断，仅保存了文书名称的片断，其开头是：“〈保〉〔安军〕”。8残行，行书字体。文中提到了陕西五路 and 日期：“……〔月〕十九日卯时”、“今月十七日”，左端盖有大概是酈延路的印章的一部分，高5.5厘米（12世纪20年代的）。

从：“……〔月〕十九日卯时准”到：“……〔依〕当司……”

同文书“六十五”中的日期和地名一样。

八十、原藏录号TΦ—15，第21页。文书残片，说的是关于军队已准备好出动的问题。

1页的左半截，5残行，行书字体，有一方模糊不清的红印，5.2×5.5厘米，大概是酈延路的（12世纪20年代的）。

从：“……在前候到请详此及前〔去〕”到：“……急勾抽便要起发……”

八十一、原藏录号TΦ—15，最后1页（无页码）。关于

收集部队的呈文的残片。

1 页的左半截，缺下端，4 残行，楷书。文中提到了第七<将>（12世纪20年代的）。

从：“去后今准回牒称勘会军员……”到：“关子的实下〔落〕归着差拨……”

317 （原藏录号TK—226）〔文书〕

肃州路职员的花名册，注明了他们每个人早期所任的职务。出现的地名有：甘肃省，理阳县，沙州，元州，甘理，甘州。列出的人名有：？南朵立只，郭？，张俊（？）政，大黑奴，孟仲祥，完者秃，息你立充，赛因？，也里帖木儿，伯忽，只（？）任，藏卜行中，不彦，汉（？）恩吉，古儿不？诘，伯家奴，薪（？）肃州奴，也里赤不，哈三，也先不，也立赤帖，？舟，达普花赤。

单独的一页，29.5×20厘米，下端损坏了一大片，两面都有文字，反面直接接正面。正面16行，反面8行，第4—7行，第23—24行残，纸色灰，潦草的行书字体。大部分名字旁边标了黑杠。有改写（14世纪70年代的）。

从：“一名？南朵立只前行詹事院都？？？”到：“一名也立赤帖？舟？肃州……”

318 （原藏录号TK—194）〔文书〕

解释关于因职务问题而引起的争议，包括至正年间（1360年12月18日—1361年1月26日）某人的履历表。表中提到了下列人物：赵刚，官衔提摧案牍，来自宁夏路，在甘肃中书省任职；达鲁花赤，官衔都官佳员，他的儿子不花；官吏薄逸实埋武略，官衔判官贰员；〔淹〕伯，官衔判官。

写本，1 纸，27.5×21.5厘米，首尾残缺，30行，行8—10字，行书字体。页边上盖有高8厘米的同一个印章的两个红印，

九叠文字体。印文未识读出来。许多字的旁边有朱砂标记。

背面有一行淡墨写的字：“宣光二年五月……”（合公历1371年6月13日—7月12日），一枚 4×3 厘米的方形戳记，里面有个模拟体的“中”字。

文书中提到的第二个人，可能是达鲁花迟，参看《元诗选癸集》戊下，第26页上。

319 （原藏录号TK—212）〔文书〕

关于七十三岁的乞答你退伍的公函，结尾部分。

残片， 21×19 厘米，首尾及下端均缺，写本，11行，行书字体（14世纪60年代的）。

从：“右乞答你年七十三岁除〔见〕……”到：“……侯〔粮〕养〔活〕住……”

背面有用很淡的墨写的字，认不出来，5行，可能是批语。

320 （原藏录号TK—217）〔文书〕

大概是某人调动报告的草稿。

残片， 10×20.5 厘米，1纸的左下角，3残行近似草书的行书，有红色标记（14世纪70年代的）。

321 （原藏录号TK—211）〔文书〕

派县官伯忽达普花去京城的记事，注明因误期而被罚了稻米。

1小页， 10×16 厘米。写本，6行，行11—14字，行书字体，最后是日期：“宣光二年三月初一日”（1371年3月18日），和戳记。

322 （原藏录号TK—263）〔文书〕

一叠政府文书的一个标签， 7.5×50 厘米的纸条，上面有一行很大的楷书字（字大 4×3 厘米）：“敕授将仕郎亦集乃

路总”，下面补写了三个较小的字：“管府事”，左边有同一个收发员签字。元写本（14世纪中期的）。

323 （原藏录号TK—214）〔文书〕

钦差官们关于军队粮食状况检查结果上报皇帝的呈文。这些官员们检查了甘肃中书省和其他地方。他们的名字认不出来。

单独的一页，31.5×32.5厘米。10行，行17—20字。近似草书的行书字体，使用了抬头，有改写和涂改处（14世纪30年代的）。背面4行批示，第1和第4行下面有两个戳记，签字的左边也有两个戳记，认不出来。同本书编号324的戳记有一部分相似，批语几乎一样。

324 （原藏录号TK—249）〔文书〕

写在一个卷子上的两件文书，有关大麻地和谷子地收成的预估情况的检查。

卷幅150.5×23.5厘米，3纸，缺首。共32行，各行字数不等。

1.第1纸上的文书，17行，第2—4，8、10行残，行书字体。关于检查天历二年（1329年）收成和至顺元年（1330年）预估收成（按40%的增长率）的纪录。文书注明“至顺元年月”，末尾是检查官署名：“河渠司官 答乞，河渠司官 怙灭赤”。名字后面有两个黑色戳记，最后一行是字很大的登文日期：“初十日”，此日期后的下面还有一个戳记。文书使用了抬头，抬头上端空2—10.5厘米。此纸背面有两个黑色戳记。

2.第2—3纸上的文书，14行，第1—3行残，大字草书。关于预估收成的检查记录，末尾有日期：“至顺元年九月”（1330年10月13日—11月10日）和文书制作者的名字。此后是草书的批语，批语后面有戳记，最后一行是字很大的登

文日期：“初十日”。这些戳记和第一件文书上的相似。此文
书也使用了抬头，文中提到亦集乃路。

背面有两行草书文字，每行4字（呈文记事）：“至顺元
年 / 张立式呈”。

根据此写本中各处的日期来看，此文书的呈报日期是：至
顺元年九月初十日（1330年10月22日）。

戳记同本书编号323的戳记有一部分相似，批语几乎一样。

325 （原藏录号TK—227）〔文书〕

某人关于供应军粮的呈文，文书的末尾。

残片，20×24厘米，9残行，草字，文中有日期：“至顺四
年”（1333年1月17日—11月8日）。

326 （原藏录号TΦ—5176）〔文书〕

洮州马军，步军以及弓箭手和志愿兵的数目清册。

写本卷子，147×11.5厘米，首尾残缺。此文用被裁成
的窄条粘在一起，共4纸，小楷字体（14世纪初的）。

1.第2纸。原纸的上半截，33×11.5厘米，24残行。出现的
军事长官名有：万户杜海，副万户曹朴京；地名有：临洮府，巩
州；部族名有：汪家族，兀家族。

2.第3纸从上面同第一纸第15行以后的部分连在一起，34
行，第1—14行残。提到的军事长官有：万户蒲臬，……
〔厮〕鸡，安百福，万户阿奇赵，敦武校尉前临洮府，酒同监
完颜辨，万户丁仲礼；地名有：也龙河，通祐堡。

3.第4纸。原纸的下半截，44×11.5厘米，缺结尾部分。
34残行。提到的军事长官有：赵锐，阿速藁，万户嚧三十。

327 （原藏录号TΦ—4484）〔文书〕

军队的花名册，注有每人的年龄和所在部门（毛克）。

写本卷子，68.5×17厘米，由3纸粘成，首尾残缺。每纸

自成一独立部分，小楷字体（14世纪30年代的）。

1.第1纸。两残行，正文方向和其他两纸相反。

从：“王忠五十……”到：“邵弼三……”

2.第2纸，9残行。

从：“……〔系〕第一毛克下正军”到：“……〔岁〕系第五毛克下正军”

3.第3纸，6残行。

从：“……系第二毛克下正军”到：“……〔岁系〕……”

328 （原藏录号TK—193）〔文书〕

马？等人关于信号火把和军粮状况给朝廷官员的呈报日志，提到了人名李山□。

写本，1纸，33×23.5厘米，8行，草书，有许多改写和涂改（14世纪中期的）。

从：“奉？官”到：“大□□”

329 （原藏录号TK—198）〔文书〕

一位署名司吏赵的人签署的报告边防站食品情况的信函。

残片，24.5×11.5厘米，信函的最后一页，6残行，行书字体。页首盖有高6.5厘米的红印的左半截，九叠文字体，最后两字是“之印”（14世纪中期的）。

从：“……照？军人？政□”到：“……日司吏赵 欠□”

330 （原藏录号TK—204）〔文书〕

写本的一部分，首尾残缺，43.5×33厘米，一残纸，两面有字。

1.军队每天出动的作战部署，注明日期、人数和食品数量（面粉、肉类、酒、大米和杂支，最后一项用货币表示）。提到下列军事长官的名字：赤令只失我（？）大王，赤令只巴柳（？）城王，怛乱肃王，必立杰怛木儿大王，哈刺章，李罗怛

木儿大王，朵只巴太子，以及甘肃省。

写本正面，32行，第1—3、9、11、32行残，小楷，有些地方转为行书，有黑色记号（在天头上）。

从：“一〔起〕……”到：“正一人”

有些名字和本书编号331中的相同。

2. 甘肃省某人的履历表，多次提到完者帖木儿的名字。

写本背面，13残行，行书字体，近似草书，有红色记号。

文中的日期是宣光二年（1371年）的各种月份和日号，最后一个月日是“六月廿五日”（8月6日）。

从：“□□里甘肃等处？中书省？？乃分省照必近？”
到：“□外有……尺……”

331（原藏录号TK—248）〔文书〕

军队每天出动的作战部署，注明可能耽搁的时间和应当供应的食品（面粉、肉类、酒、大米），开列成货币价格（铔）。提到的人有：赤令只失加普宁肃王，哈孙，必立杰帖木儿，大王，答孙沙都，朵列帖木儿，巴立忽火者，奥都刺赤，奥都刺，唐兀歹，朵卜歹，索罗帖木儿，八答失巴撒儿，帖儿肃王，也赤帖木里，令赤巴柳城王，忻都哈刺，阿章王，答立蛮，杨行义，也可斡立脱，帖木立，朵立只巴安定王，王忍明，与伦大王，马麻火者，薛不干，答答木薛非，德胜虎，杨又或；以及地点：玄肃沙，宁夏路，欠少府，甘肃行省，永昌。

写本，卷子的开头，92.5×33.5厘米，3纸（第3纸残）。

107行（第99—107行残），行38—40字，小楷字体，近似行书（14世纪70年代的）。

从：“初五日一起”到：“……〔杂支钞〕五钱”

各纸粘接处正面有7.5×7.5厘米的红印，九叠文字体，印

文未释读出来。粘接处背面各有 2 至 3 个草字。第 2 纸的粘接缝下面有页码：“二”。

有些人名同本书编号 330 的相同。

232 (原藏录号 TK—203) [文书]

一件内容不详的文书，某人记录下来的可能是军队发的钱物。提到了“军人张”。

残片，27.5×20.5厘米，首尾残缺。1纸的上半截，12残行，最后一行看不清楚。近似草书的行书字体，文中有红色小记号和画出的线。日期有：“廿六年十一月”（至正二十六年，即1366年12月3日—31日）；“至正廿七年〔正〕……”

（1367年1月31日—2月28日）；“月廿二日”，最后一个日期大概记的是写好文书的日子。使用了抬头。

从：“……〔以〕下……”到：“月廿二日□□写……”

背面有两句话：① 1行，有日期：“……年正月廿日状……”（何年，不详）；② 3行，其中有日期：“……卅一年〔四〕月”（1371年7月13日—8月10日），其余的字认不出来。

333 (原藏录号 DX—2828) [文书]

许多文书残片，登记了所收到的建筑材料（主要是木材），这些材料大概是乾佑二年四至六月（1172年4月25日—7月22日）在怀远县采购的。

18件互相不能直接连在一起的残片。根据保存下来的残片来看，这是两种文书的一部分。

残片 1 至 13 是记下的收到（交付）显然是修仓库的木材的部分单据。交付（接受）材料要登记运夫（采购人？）的姓和他所交付（或领去）的材料数量。核算单位用“驮”。在某种情况下，如果运送的是散装品，例如是木材，核算单位就用长

度、厚度和宽度。

单据上有许多重复的戳记，均盖在数目字的前后。领用人 and 统计员填盖这些戳记，大概是要以此证明每张单据的真实性。有时除了戳记外在单据的末尾还有私章。保存下来的有以下七种：①𠂔，②𠂔，③𠂔，④𠂔，⑤𠂔，⑥𠂔，⑦𠂔，我们在下面把它们标为①，②，③等等。第一个名章是李大道的（参看本书编号 209）。

某些残片的背面保存了几个字，有“领”或领讫等字样。像是总计文书正面开列的“驮”数。这可能是某人领到库存材料的凭据。

残片14至18像是付给某些具体人的收据，以证明他们按合同完成了某项工作（可能就是差役）。此外，所有这些单据或是同服某种差役有关，或是直接同征税有关。最后一件残片说的是“材租交纳”。

残片1，23.5×10厘米，一纸的上端，10残行，纸色淡黄，行书字体。

提到的人名有：王勤乐，傅丑奴，崔那正（此名也见本书编号 335 残片2）。第2行第一个名字上方标有红墨圆圈。第4行整项记事被圈以黑粗线。文中的私章有两个①，七个②和四个③。

从：“③貳驮①貳……”到：“①肆驮⑦……”

残片2，10×8厘米，一纸的上端，4残行，第1行和最后一行的边上有纵线。

从：“〔壹驮〕……”到：“壹驮材……”

背面盖有印戳⑤，其下有一行字的开头：“依数领讫……”。

残片3，12×9.5厘米，一纸的下端，4残行，纸色、纸质、笔

体同上，日期大概也一样。

提到了人名傅六行（此名也见本书编号 335 残片二）。文中的私章有三个①，两个②和一个④。

从：“②伍驮①……”到：“②参驮①……”

残片 4，13×9。一纸的上端，4 残行，纸色、纸质、笔体同上，日期大概也一样。

提到的人有：崔的成，孙猪狗（此人名（？）也见本书编号 335 残片 1），文中的私章有两个②。

从：“崔的成湜土……”到：“孙猪狗于窟……”

残片 5，16×8.5 厘米，5 残行，行书字体。

从：“……〔犯〕弘”到：“柒伍……”

背面一行有印戳的末尾：“……⑦”

残片 6，12.5×10 厘米，4 残行。最后一行是“〔已〕次使口”，行书字体，最后一行的日期合公历 1172 年 7 月 2 日—11 日。

从：“……壹驮肆片？七五……”到：“乾佑二年六月〔十〕……”

残片右端的背面保存了五个字的右半部分：“（？）（？）（？）〔领〕讫……”。中间有一行字的开头：“三人……”

残片 7，10×19 厘米，4 残行，第 1 行只保存了字的左部分，最后一行（字大）是：“……〔使〕口”，其下有印戳①，最后一行中的日期合公历 1172 年 7 月 3 日。

从：“……〔壹驮〕……”到：“〔乾〕祐二年六月十一日”

残片 8，21×10 厘米，6 残行。日期合公历大概是 1172 年 7 月 6 日，提到了怀远县。

从：“……于怀远县割……”到：“……〔月〕十四日”

此残片中间的背面有一残行：“……收领手承(?)人大杨阿喜……”

残片9, 24×10厘米, 6残行, 日期合公历1172年7月7日。文后左下角有印戳①。

从: “……〔陆〕尺阔〔壹〕……”到: “……〔月〕十五日”

残片10, 10.5×10厘米, 保存了单据最后两项的片断: “……〔伍寸〕 / ……十六日”, 和左下角的印戳①。日期合公历1172年7月8日。

残片11, 12.5×10厘米, 和上件一样。保存了最后两句的片断: “……埋参驮 / ……〔月〕廿一日”, 和左下角的印戳⑥。日期合公历1172年7月13日。

残片12, 24×10厘米, 3残行(第1和最后一行损坏)。

从: “……〔壹片〕长壹拾肆尺……”到: “……材贰片各长壹”

背面提到人名白伴狗, 中间有一残行: “……十〔五〕日领材手人白伴狗……”。日期合公历大概是1172年7月7日。

残片13, 25×7.5厘米, 8残行(第2行6字, 其余各行1—2字)。纸色、纸质、笔体同上, 日期大概也一样。提到的姓有李、〔贺〕、〔梁〕、〔杨〕、田。

从: “……〔长〕壹〔尺〕……”到: “……田? ……”

残片14, 10×22厘米, 4行(第1—2行残, 最后一行被部分剪掉), 日期合公历1172年7月11日。

从: “般驮割材壹拾贰片计脚参只其所……”到: “乾祐二年五月十九日”

残片15, 用李纱口的名义写的单据, 23×10厘米, 9残行。纸色、纸质、笔体同上, 日期大概也一样。背面提到了人名孟

匡永。

从：“今右脚户李纱……”到：“壹长……”

背面有用红墨写的两行字的开头：“其所与孟阿永……/只柒……”

残片16，以李猪儿(?)的名义写的单据。24×10厘米，10残行，有红色记号。

从：“……〔右〕脚户李猪儿(?)……”到：“……〔肆片〕……”

背面靠近左边有印戳⑤，其下是：“六月十二日〔领〕……”，日期合公历1172年7月4日。

残片17，以李遇的名义写的单据。12×10厘米，4残行。

从：“……〔右〕脚家李遇的于……”到：“……壹驮〔六〕□材……”

残片18，10×22厘米，3行(第1、2行残，沿第3行画了纵线)。纸色、纸质和字体同上。日期是：“乾祐二年六月十七日”(1172年7月9日)。

从：“有清库列信项〔两驮〕……”到：“〔六月十七日〕”

334 (原藏录号JX—10279)〔文书〕

同类档案中的4件不同的单据残片，和本书编号333、335相同。格式一样，都同上面那些人参与的活动有关。只是内容有点不同。如果上面的(见本书编号333)主要是驮运木材的单据，那么此件大概主要是驮运胶塑土的单据。

残片1，16×10厘米，5残行，纸色浅黄，涩滞，行书字体。印戳和本书编号333中的一样。

第2、3行之间和第4、5行之间都有用红墨写的另一种笔体的字：“……〔正〕参丸”，记的是另外的事。文中的私章

三个①和两个②。

从：“……〔驮〕①？〔驮〕②……”到：“……〔般驮〕胶塑土……”

残片2，4.5×7、纸色、纸质，字体同上，日期大概也一样。1残行：“①伍驮②……”。

残片3，4.5×9厘米，2残行，纸色、纸质，笔体同上，日期大概也一样。

提到了孙猪狗（此名也见本书编号333、335）。

从：“孙猪〔狗〕大〔板〕……”到：“②伍驮②……”

残片4，10×14厘米，保存了3行字的下面部分，第1和第3行仅存一字，其下有用另种笔体写的同类单据上的红字：“上参丸”，纸色、纸质、笔体同上，日期大概也一样。

从：“……〔驮〕上参丸”到：“……〔驮〕上参丸”

335 （原藏录号B—61）〔文书〕

1172年的同一档案室中的8件不同的单据残片，和本书编号333、334相同。在格式和内容上，前三件和本书编号333的残片1至5相同，接着的两件同残片5至6相同，最后两件同残片18相同。

残片1，23.5×9厘米，4残行，纸色淡黄，涩滞，行书。提到了孙猪苟（此名也见本书编号333、334）。第2行在孙猪苟名后有红墨写的两个“正”字。这显然是某种代表符号（参看本书编号333）。文中的私章有两个③和②，日期大概合公历1172年3月18日。

从：“三月廿五日领〔到〕……”到：“②柒驮③……”

残片2，21.5×8.5厘米，5残行，第1行和第4行相同，都用红墨写了：“上正〔参〕……”，这几个字的边上画了一道黑杠。纸的右端还有一行字的痕迹。

文中的私章有一个①和一个③。提到了傅六行和崔那征（参看本书编号333）。

从：“上正〔参〕……”到：“崖那征胶……”

残片3，4×8厘米，一纸的右上角，边沿有粘接痕迹和几个字的残迹，显然是以前就有的。纸色、纸质、字体均同上，日期大概也一样。1残行：“②参驮②”。

残片4，23.5×10厘米，4残行（最后一行是大字：“已次使□”）。行书字体，1172年的。

从：“枯处殷 驮？材……”到：“乾祐二年……”

残片5，10×4厘米，3残行（第1行只存三个字的左旁，最后一行字大），行书字体（1172年的？）。

从：“……数领〔记〕……”到：“已〔次〕……”

残片6，9×21厘米，此残片右上角被撕掉，现存两行字的痕迹，参照残片4和残片5对它们进行了复原（1172年6月23日—7月22日的）。

从：“……〔六月 日〕”到：“（大字）〔已次〕□〔口〕（和印戳⑤）”

残片7，17×10厘米，3残行。纸色、纸质、笔体同上，日期大概也一样。提到了怀远县和人名孙艳奴。距正文4厘米处，靠近左端有个“日”字，沿裁开的边上有两道横线痕迹，显然是印戳的痕迹。

从：“……〔孙〕艳奴于怀远县”到：“……依来者？寸尺丈”

残片8，12×10厘米，3残行，有红色记号，提到了麦城。

从：“……久等于〔麦〕城解”到：“……〔寸〕尺丈并已合同”

336 （原藏录号TK—295）〔文书〕

大概是用石、斗、升计量的交付谷物的单据。

粘在封皮硬纸板上的九件残片，行书，用木尖笔写出，纸色浅褐，涩滞，厚0.05—0.07毫米，每厘米8道帘纹（12世纪末的），所有残片都破碎得厉害。

残片1，13×8厘米，6残行。

从：“刘？的……”到：“比……”

残片2，7×13厘米，3残行。

从：“……〔良一石〕与番家诏下〔九〔月〕……”到：“……六〔斗〕……”

残片3，8.5×12厘米，4残行。

从：“……十二日……十……”，到：“……州……”

残片4，4×4.5厘米，刊本碎片，《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中的一残行：“〔须菩提于〕……”。

残片5，8×14厘米，两残行，最后一行的末尾有签字记号。

从：“……〔后〕除下……〔一月十〕……”到：“……〔伯〕伍……〔此〕从？……”

残片6，8×14厘米，3残行。每行开头标有一道黑杠。

从：“〔福〕……”到：“福奇〔一石三〕^{斗更赤？}三后一石

残片7，3×12.5厘米，1残行：“……下找利乙恒倍”

残片8，6.5×7厘米，2残行。

从：“……〔仗遇〕恭^{更欠}伍^升……”到：“……汉一斗^人……”

残片9，3.5×10.5厘米，两残行草书西夏文。

337（原藏录号TK—299）〔文书〕

发给各种人员什物和服装的日记帐。

残片，27×13厘米，帐单开头部分，上端被剪掉，12残行，大楷字体，人名右边画了红线。从初九日到十二日的帐单。帐下

注有小字，如：“十月初三日付本人”，左页边长3厘米，页边上有几个黑印痕迹。纸色黄（12世纪末的）。提到的人名有：□闹奴，□字崑，□名呱呱，□贺遇由，□善智，□阿黑，（税）那征嚷，□花。

从：“……闹奴—旧连袋一口”到：“……花〔黄十段〕”

338 （原藏录号TK—202，〔文书〕）

关于牲畜（牛、羊、马）情况的通知。提到的人名有：脱忽怙木吃（？）。

残片，19.5×23.5厘米，首尾残缺，破烂严重。8行，第3—5行全（每行16—17字）。近似行书的楷书字体，文中有日期“皇庆二年〔一〕月”，即1313年1月27日—2月25日。

从：“……你赤”到：“……居羯羊二口□□”

339 （原藏录号TK—235）〔文书〕

大麦、小麦、麻子（数量精确到沙〈勺〉）等谷物的收入（现存量）清单。

残片，14×23.5厘米，首尾和上端均缺，损坏严重，6残行，行书字体。（14世纪初的）。

从：“……小〔麦〕”到：“……千九百七石〔？〕斗糜子”

340 （原藏录号TK—268A）〔文书〕

记录谷物数量的原始凭证。

残片，24×14厘米，是两纸相粘的地方。10残行，小楷字体。末尾的底部有个收发员签的大字（14世纪初的）。

从：“……下项须至申”到：“……申”

此文书写在粘成卷子的较早的写本的纸背上，参看本书编号258。

341 （原藏录号TK—237）〔文书〕

记录发放谷物的收支簿记的残片。一纸下端的碎片，5×7.5厘米，3残行，行书字体，有许多改写和被删去的地方，有几栏的上面和右面被画上黑色记号（14世纪初的）。

从：“……〔伍〕斗”到：“……〔？〕的？米□”

342 （原藏录号TK——201）〔文书〕

单独的一页，28×28厘米，两面均有字，多处被撕破，有大量的小洞。

1.单据，记录了发给老年人（共43人）的冬夏服装和毛毡（末系毡台儿），注有数额和价格（钞）。提到了一个叫哈廷丁甘？的人。

写本的正面，不到尾，15行，行25—29字，小楷，第1行可能是标题。文中有日期：“天历二年十月”（1329年10月23日至11月20日）。页边左上角有4行草体字，可能是批语。

从：“〔分〕集□□抢□”到：“〔毡台儿〕每各支壹块长壹丈〔阔肆尺〕计肆□〔参块〕□〔价〕”

2.未认出来的草体文书，可能是信函。写本的反面，11行草体字。

343 （原藏录号TK—230）〔文书〕

发放黍、小麦和其他谷物的日支簿记。领收人的名字都认不出来。

1纸，38.5×19厘米，此写本损坏严重，特别是下端。25行，第9—17和第20—25行残。近似草书的行书字体，有改写处，大多数字墨色很淡（14世纪中期的）。

从：“□八日中收”到：“……大麦一……”

344 （原藏录号TK—219）〔文书〕

贵重服装、珍珠、金银物品的清单。

1件残片，17.5×26厘米，首尾和下端均缺。7残行，

淡墨写的大楷字。使用了可能是表示另一栏目的抬头（14世纪中期的）。

从：“……大红……”到：“大？邪文袖干？”

345 （原藏录号TK—209）〔付款凭证〕

记录了大概是作为军需品而付给一个名叫陈友文的钱款（钞，用“定”和“两”计算）以及军粮（粮、黄米、小麦）的凭证。

1件残片，16×26厘米，首尾均缺，两窄页，10残行，记有各种数字。

从：“〔钱〕中？钞四定四十五两”到：“〔杂〕？小麦一斗 □□□〔斗〕

346 （原藏录号Дх—1339）文〔书〕

一位不知名官员呈报的秋夏两季（显然是从某些固定的人或地段）收入（？）谷物的分顶帐目。每项上都注登记为“地字”号的单据。保存下来了两个单据的号：第27号和第39号。提到了〔韩〕栾妃子。

残片，21×17厘米，10残行，楷书。文中有日期：“至正二年七月至九月”（1343年8月2日—10月29日）和“至正二年四月至九月”（1342年5月5日—10月29日）。

从：“……〔麦〕伍石陆斗〔壹〕”

到：“有〔具〕 如〔前〕”

背面是某个（带日期的）呈文结尾部分的3行字，保存下来的有：“右谨具…… / 呈…… / 宣光二年六月……”（1371年7月13日—8月10日）。

347 （原藏录号TK—210）〔文书〕

各种官员掌握马匹的凭据。提到的人名有：“……司吏张国用，……省典吏耿国瑞，罗良宗”。

残片,14×12厘米,写本。8残行,行书字体,有红色小记号,左上角有盖过红印的痕迹,文中有日期:“二十三岁二月三日”(大概是至正23年,即1363年3月15日)和“四月二十九日”(即同年6月10日)。

从:“……司吏张国用驪?前”到:“……岁四月二十九日……”

348 (原藏录号JX—2158)〔文书〕

〔官(?)〕堂食司吏刘融关于为购买宴会(?)食品(肉、面粉和葱)要求拨付一斗小麦的呈报。

写本,41×22厘米。文书正文22.5×20厘米。12行,行16—24字。行书,字小,末尾有日期:“至正廿四年十二月”。

第10—12行间有与纸同高的笔体肥大的批语:“申收小麦壹斗”。批语上面盖有8×8厘米的三个橙黄色印章,九叠文字体。上半纸靠近左端,也盖有同一个印章。此印上方有大字登文日期:“初十日”(1365年1月2日),下方偏右处盖有两枚黑方印(均大4.5×5厘米),带有收发员的戳记。第9—10行间的上方有认不出来的草体字(三至四个)。日期下方的签字由于背面的文字渗透过来而没完全认出来。

从:“〔官(?)〕堂食司吏刘融”到:“至正二十四年十二月 司吏???”

背面有五行大草体字,其中被认出来的有日期:“宣光二年二月”(1371年2月16日—3月17日),姓:“张”“李”和一个很大的“春”字。

参考书目:《亚洲民族研究所敦煌特藏汉文写本叙录》,第2辑,第2914号。

349 (原藏录号TK—213)〔文书〕

被用完做了几件全套服装的布匹数量的凭据。

残片，32×22.5厘米，首尾残缺，被撕成上下两半截，写本。1残纸，14行，行8—10字，使用了抬头，行书字体（14世纪70年代的）。

从：“木器伍拾……”到：“……并系紫……”

350 （原藏录号JX—1403）〔文书〕

皇庆一年（1312年）的刑房特赦令。

写本的开头，23.5×27厘米，8行，行17字。正文前有“形房”2字，可能是写本的小标题。文中有两个日期，都是皇庆一年，一个是赦令的发布日期：“十二月初一日”（1312年12月29日），第二个是赦令开始生效的日期：“十月二十九日”（1312年11月27日），写本中有抬头。

从：“见四（返（？））贼人令只僧吉杀死错卜公予”到：“之敢？赦前予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

此文书被收入《亚洲民族研究所敦煌特藏汉文写本叙录》第1辑第1652号。

351 （原藏录号TK—224）〔法律文书〕

肃州路一位名叫余迁筵的人关于阿新死后遗产审查情况初报八个月以后的复报。

残片，12.5×27.5厘米，1纸的右端，4行（第3行残），楷书（14世纪上半期的）。

从：“据肃州路申奉省？为阿新身死公事已经”到：“…督勒本路取当该首领官吏”

背面有批语，是几个很大的楷书字，其中被认出的有：〔札〕付，路总？府，还有一印的右边，黑色九叠文字体，高7厘米。

352 （原藏录号TK—233）〔文书〕

关于某件事的决定，内容不详。

残片，32×16.5厘米，12残行，流利的楷书，使用了抬头（14世纪上半期的）。

从：“□□〔呈 准此 ”到：“有文〔司〕……”

背面是木版印的带浅色花纹的装饰图案。

353 （原藏录号TK—192）〔向法官递交的正式呈文〕

一个姓陈的人写的呈文草稿。写本，残片，14×24厘米，两面都有文字。

写本的正面。5行，第1—3行残，末尾有日期：“至正六年六月”（1346年6月20日—7月18日）。

从：“……德请□□覆过牒”到：“至正六年六月取承管人〔陈〕……状”

背面是注明谷物数量的清单，4行，草书字体（可能是借据）。

从：“小麦四斗某 大麦子……壹”到：“□卅斗五？
？第七？”

354 （原藏录号TK—215）〔字据〕

一位名叫善保的人关于押解罪犯沅争的字据。残片，24.5×29厘米，缺首，损坏严重，写本，9行，第5—6行全，行15字，行书字体（14世纪中期的）。

从：“……〔系〕”到：“善保 不宣”

355 （原藏录号TK—239）〔文书〕

一个叫赵柏寿的人对被囊家歹错误处罚的控诉书。大概是单独的1纸，22×26厘米，不到尾。6行，近似草书的行书，有修改处。

从：“刊神”到：“到”

背面有对这一事件的说明，缺首。提到的人名有：囊家（加）歹、火立忽孙、陈子忠、赵思聪。

5行近似草书的行书，有许多被删掉的地方和改写处。改写处的中间有日期：“至廿四年”（大概是至正24年，即1364年）。

356（原藏录号B53）〔文书〕

1纸，33×21.5厘米，两面是两个不同的文书。

1.正面，文书的结尾，大概同审理案件有关。6行，近似草书的行书，字体大。文中有日期“宣光二年正月”，与此案有关的人名及签字，文后有三个非上述人的戳记，登文日期“廿一日”（1391年2月6日）和收发员戳记。日期后有两行另一种笔体的草书字：“将毁？舍/曹管”，大概是批语。

从：“五十十”到：“经？李”

2.背面，文书的末尾，结算收到亦集乃路的粮食数。9行，小楷字体。

从：“前申收粮壹拾伍〔石〕陆斗”到：“〔经（？）〕
验谨具申”

357（原藏录号TK—229）〔文书〕

与县法庭有关的人名单。提到的有：达鲁花赤相公、周付天、赵大尚、曾大佳、朱孝卿、张君锡、本书（？）甫，元顺礼、任通事、侯恩问、赵智清、谢付天。

单独的1小页，19×21厘米，四边损坏并有许多小烂孔，7行（14世纪70年代的）。

358（原藏录号TK—197）〔文书〕

一件内容不详的文书的末尾，带有日期“……元四年”和登文号“……〔寒〕字四号”。

残片，14×13.5厘米，写本，两残行，年代大概是至元4年（1338年）。

从：“……元四年”到：“……〔寒〕字四号”

359 (原藏录号TK—223) 申唎契本

准备捆契据(地契?)用的标签。

两个高9厘米的纸条,折成高4.5厘米的长条,每个纸条上都有一行很大的楷书字(14世纪上半期的)。

一、1张纸条,9×26.5厘米,两个一样的题词:“申唎契本”。

二、一张纸条的上端,9×10厘米,两个一样的题词:“官〔台〕……”

360 (原藏录号TK—222)〔文书〕

两件内容不详的文书的片断文字。残片,13.5×9.5厘米,两面都有文字,笔体不同,大概不是同一个文书(14世纪中期的)。

361 (原藏录号TK—205)〔文书〕

各种文书的5件残片(1172年的)。

残片1,内容不详的一件文书,提到了宁夏路,有戳记。

11×17厘米,5残行,楷书。

从:“……有人至〔公(?)〕审……”到:“……已月照〔给〕……”

残片2,文书片断,和本书编号的333的残片1至13是同一种类型的文书。上面盖了李大道的两个戳记(参看本书编号209)。

6.5×10厘米,两残行(第2行是红字,未认出来),行书。

从:“驮? 伍驮伍〔驮〕……”到:“……〔驮〕???”

残片3,一件内容不详的文书,有两个很大的残字,认不出来,和一枚红印的左边,高6.5厘米,九叠文字体。下部有个认不出来的戳记的片断。

残片4,一件内容不详的文书,两行片断,墨汁的污点和

印章式样都和残片 3 相同。

残片 5，一件文书的末尾，写了个很大的日期：“七月初五日”（1172年7月27日），还有两枚和残片 3、残片 4 同样类型的印章，5.5×6厘米，九叠文字体。

362（原藏录号TK—313）〔文书〕

14件小残片，最大的6×7.5厘米，认出了它们上面的一些零星的字：王位、贼人、耳聋（14世纪中期的）。

363（原藏录号TK—216）〔文书〕

一件内容不详的文书，可能是蒙古文的音译。有几处的末尾大概是草书的蒙古字。

残片，16×23.5厘米，缺首，上端损坏严重，6行（第1行残），使用了抬头（14世纪70年代的）。

364（原藏录号TK—305）〔文书〕

一件内容不详的正式文件的结尾，只保留了日期和签字。写本，40.5×30厘米，一纸，破烂得厉害，右半截的上端被撕掉。5残行，行书字体。第1行有日期“……年八月”，呈报人签名“侯未（？）忍”和戳记，最后是收发员签字“常〔带肃〕”及其戳记。左页边长21厘米，上面有个很大的批示日期“廿七日”，和2×2厘米的黑色印戳，印文不清，第2行大概是批语，上面也有一个印章的痕迹（14世纪70年代的）。

从：“……年八月 吏侯未（？）忍”到：“……历”

365（原藏录号TK—302）〔文书〕

甘肃等处行中书省寄送的一件呈文的末尾，内容不详。

残片，15×43厘米，1纸，无首，下端残缺，右页边破碎得厉害。4行，最后一残行有日期“大德八年三□日”（1304年4月6日—5月4日）和告状人名字的开头：“亦……”。小楷，字写得好。空白处有4残行草书批语和第5行的片断。批

语中有省名，收发员名字“赵小舟（？）”，告状人名字“？？亦都”。批语的行间有小字补写的名字“（？）亦花公田”。元代的写本。

从：“甘肃等处行中书省伏乞”到：“大德八年三□ 日告状人亦……”

366 （原藏录号B63）〔备忘录〕

关于宋朝一位俗姓董的僧人智坚前往印度（西天）的记事（记）。提到了他的师父法达大师（俗姓张）和法诠大师（俗姓阳），出发日期是“端供二年岁次己丑八月十八日”（989年9月20日）。

写本，1小纸，10×26.5厘米，5行，行25字，楷书，写得不好，大小不一，用尖木笔写出。纸色灰，纸质粗糙，厚0.25—0.26厘米，每厘米5道帘纹。提到的最后日期是989年9月22日。宋写本。

从：“端供二年岁次己丑八月十八日其汉大师智坚往西天去马都料”到：“也 端供二年岁次己丑八月十九日往西天取菩萨戒僧智坚记”

参考书目：弗鲁格《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藏汉文古佛教写本简明目录》第160号。

367 （原藏录号TK—298）〔文书〕

一位不知名的人关于到达西凉府的报告或信函。

一个写本的4件残片。清晰的楷书字体，有红色标记（横线），宋写本（12世纪20—30年代的）。提到了人名：□海使人。

一、残片，12×18厘米，1纸的下半截，首尾均残，4残行。

从：“……不敢暂离更有〔大石〕悉”到：“……〔后〕恁道我至西凉府与承”

二、上端的3件残片， 5×12 厘米； 2.5×12 厘米； 1.5×12 厘米。文书最后4行的上半截。

从：“〔前〕□〔屡〕……”到：“奉草启不军……”

368（原藏录号DX—2957，DX—10280）〔文书〕

千户刘塞关于被打死和被俘人数的呈文。

写本， 41×20 厘米，包括两个直接连起的纸块，18行（第1行残）行3—13字。楷书，文中有日期：“光定十三〈年〉十月初四日”（1223年10月29日），提到的人名有：刘胜、杨青士、邓（？）师子、邓（？）宽、邓（？）伴、女丁、王？喜，第3、第5—6、第7—12行中，对着死者姓名注有（1至3个）西夏字。

从：“……死人姓名开”到：“千户刘？状”

369（原藏录号TK—225）〔文书〕

关于遭受土匪袭击的报告，附有损失清单，提到了人名耿麦麦。

残片， 29.5×11.5 厘米，1纸，16残行，小楷字体，有红色和黑色记号（13世纪末的？）。

从：“……所管九十三指挥弓箭手……”到：“……〔绢袄〕子壹领系白绢裹 妇……”

370（原藏录号TK—231）〔文书〕

关于捕获土匪也速答儿，阿立浑，帖木儿（？），杨耳梅的呈报。提到的官府方面的人有：被本（？）公、刺麻巴、盘花、忻都帖蜀。

文书的开头。1残纸， 41×24.5 厘米，尾部损坏严重。18行（第16—18行残），行14—16字。行书字体。文中的日期是“至元二年五月十二日”（1336年6月21日）和“十七日”（6月26日）。

从：“？至十八日到高的绍被本所公使人马刺麻”到：
“……是官”

背面是6行大的草书字，有许多被删掉和作了修改。可能是批语，最后3行是签名。

371（原藏录号TK—199）〔文书〕

郭斌给他的朋友崔克成、李德明、元文的信，告诉收到了他们信的消息。

1纸，49.5×27厘米，缺右上角和左边，写本，17行（第1—5、16—17行残），行21字，使用了抬头，行书字体，日期仅注明“仲夏”。

从：……不肖郭斌顿首再三拜之”到：“……〔长夜〕□
〔若郭斌付〕

372（原藏录号TK—200）出典地土文

关于魏得又为交纳小麦和杂物税而出典土地四年（从羊年到狗年）的契据，开头部分。残片，20×19厘米，写本，9行，最后一行残，行书字体（14世纪中期的）。

从：“出典地土文？人魏得又今为要钱使用”到：“……
〔罚〕典地……”

373（原藏录号A 20 B II）〔信件〕

信件，号召志趣相同者接受佛教僧侣的誓言。

写本，首尾残缺，13.5×21厘米，7行，行12—13字，大楷字体。抬头旁的空白处注有：“行斌全？”（14世纪中期的）。

从：“坐欢喜之殿真如登解脱之楼自”到：“佛禅印师心
王战六贼出轮回表”

此残断被用来裱糊本书编号190刊本。

374（原藏录号TK—195）〔文书〕

从垃圾堆中和被打碎的“小泥像”中找到的3件文书。3:

件文书的纸都一样：浅黄色，涩滞，厚0.10—0.12毫米，每厘米7道帘纹（14世纪70年代的）。

一、仰东（？）园的一个名叫“造速鲁麻”的人的赠与证书。

写本，单独一小页，9×16厘米，4行，行11—14字，草书，第1行稍有损坏。结尾有日期：“七月初二日拾”。文上盖着6.5×6.5厘米的红方印，九叠文字体，认不出来。

从：“仰乐园人户七□□□者造速鲁”到：“七月初二日拾”

背面是关于收到军粮的信件草稿残片，无头尾，4行，行8—10字，草书。

从：“……屯兴如虚甘”到：“秋季口粮未曾支付”

二、仿照上件写的文字，有少量的异文，出生地点写成：仰东芸。

写本，单独一小页，8×14厘米，4行，行12—14字。行书，字小。印章、日期都和上面的一样。

从：“仰东芸人户月□□考如承者造速”到：“七月初二日拾”

三、西夏文陀罗尼。

写本。单独一小页，6.5×21.5厘米，两行，草书。

用一小张纸包起的小纸页，包装纸上有П·К·柯兹洛夫的亲笔题词。正面写着：“在小泥像和垃圾（黑色断层）中找到的一些写本”。里面写着：“我的这小纸包中有：小包A和小包B。A）在黑城废墟里的垃圾中找到的；B）在打碎从黑城塔的倒塌物中掏出的小泥像时得到的”。

小页1和2被单个包着，包皮上写着：“B）在小泥像中（里面）找到的；小泥像本身是从座落在黑城废墟的主要要塞——塔的内部得到的”。

375 (无藏录号)〔文书〕

岭北陈才乡给流沙陈德照的私人信件，地名不详。

1纸， 36.3×22.2 厘米。14行，行16—19字，楷书。开头和结尾有写信人的姓名和地址，结尾还有日期：“至正十一年七月初四日”（1371年7月27日）。提到的人名有：王山驴、周社儿、王复礼。

从“陈才乡记事”到：“流沙陈德照开？岭北陈才乡？”

公布的影印件见：伊凤阁《黑城出土文书。（一）（14世纪的中国私人书信）》，载《皇家科学院通报》，第6集第7卷，1913年，第14号，第811—816页。

附 录

参 考 书 目

(Л. И. 丘古耶夫斯基编制)

Ф. К. 沃尔科夫《黑城塔墓中的人类遗骸》，载《俄国民族志资料》，第2卷，1914年，第179—182页。

З. И. 戈尔芭切娃《西夏文写本和刊本》，载《东方学研究所学术论丛》，第9卷，1954年，第67—89页。

М. И. 沃罗比耶娃——捷霞托夫斯卡娅，И. Т. 佐格拉夫，А. С. 马尔提诺夫，孟列夫、Б. Л. 斯米尔诺夫《亚洲民族研究所敦煌特藏汉文写本叙录》，第1辑，莫斯科，1963年；第2辑，莫斯科，1967年。

А. И. 伊凤阁《15世纪以前中国纸币的使用》，载《俄国民族志资料》，第2卷，1914年，第159—174页。

А. И. 伊凤阁《黑城出土文书（一）（14世纪的中国私人书

信)》，载《皇家科学院通报》，第6集，第7卷，1913年，第14期，第811—816页。

A.И.伊凤阁《西夏史上的一页》，载《皇家科学院通报》，第6集，第5卷，1911年，第831—836页。

A.И.伊凤阁《观弥勒上生兜率天经》。伊凤阁公布了西夏文并增补了汉译，彼得格勒，1916年。

A.И.伊凤阁、С.Ф.鄂登堡、B.Л.科特维奇《柯兹洛夫在黑城的发现品》，圣彼得堡，1909年。

K.Б.柯萍《西夏文译本所存已失传的汉文类书》，载《东方各民族的古文献和文化史研究问题》，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第七次年会会刊。1971年，第16—19页。

K.Б.柯萍《唐宋〈类林〉》，载《东方各民族的古文献和文化史研究问题》，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第八次年会会刊，1972年，第191—195页。

П.К.柯兹洛夫《蒙古、安多和死城哈拉浩特》，1907—1909年俄罗斯地理学会名誉会员П.К.柯兹洛夫在亚洲高原的考察，莫斯科——彼得格勒，1923年。

B.Л.科特维奇《中国元朝纸币的样式》，载《俄国皇家地理学会通报》，第14卷，第8辑，1909年，第474—477页。
又见伊凤阁、鄂登堡和科特维奇著《柯兹洛夫在黑城的发现品》一书。

Е.И.克恰诺夫《西夏国史纲》莫斯科，1968年。

《俄国民族志资料》，第2卷，圣彼得堡，1914年。

孟列夫《论诸宫调体裁和〈刘知远诸宫调〉》，载《苏联和东方各国的历史和语言学问题》，莫斯科，1961年。

孟列夫《黑城发现的早期出版物》（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

究所柯兹洛夫藏卷汉文部分》，载《亚洲民族研究所简报》，第7册，IO·勒里希纪念集，1961年，第143—199页。

孟列夫《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的远东和中亚写本藏卷》，载《考古学年鉴（1970年）》，莫斯科，1971年，第277—290年。

О.П.彼特洛夫《朝鲜文化的古书面文献叙录》，莫斯科——列宁格勒，第1辑，1956年；第2辑，1963年。

И.П.米纳耶夫据古法文翻译，К.И.库尼柯作序、注释和校译《马可·波罗游记》，列宁格勒，1940年。

М.П.鲁多娃《黑城出土的两件版画》，载《爱尔米达什博物馆通报》，第28号，列宁格勒，1967年，第45—48页。

З.И.戈尔芭切娃和Е.И.克恰诺夫编，《西夏文写本和刊本·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藏已考定的写本和刊本目录》，莫斯科，1963年。

А.П.捷连提耶夫——卡坦斯基《黑城发现的纸》，载《考古学年鉴（1966年）》，莫斯科，1968年，第12—13页。

А.П.捷连提耶夫——卡坦斯基《黑城发现的11—13世纪的西夏古文献书籍》，副博士学位论文提要，列宁格勒，1973年。

А.П.捷连提耶夫——卡坦斯基《西夏古文献中一种“不认识的”的符号》，载《东方题铭学》，第19期，1969年，第154—158页。

К.К.弗鲁格《10至13世纪中国印刷术简史》，载《苏联东方学》，第1期，1940年，第78—94页。

К.К.弗鲁格《10至13世纪中国宋代书籍印刷史》，莫斯科——列宁格勒，1959年。

- K.K.弗鲁格《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藏汉文写本非佛教部分概述》，载《东方书目》第7辑，1934年，第87—92页。
- K.K.弗鲁格《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藏汉文古佛教写本简明目录》，载《东方书目》第8—9辑，1936年，第158—163页。
- K.K.弗鲁格《关于西夏刻印的汉文经文》，载《东方书目》第2—4辑，1933年，第158—163页。
- 《刘知远诸宫调》，M.Doleželova-Velingorova和J.I.Crump 翻译并作序，牛津出版社，1969年，第1—128页。
- T.F.卡特《中国印刷术及其向西方的传播》，纽约，1925年版，1955年第2版。
- E.沙晚译、A.I.伊凤阁著《西夏史上的一页》，俄文载《皇家科学院通报》，1911年，第831—836页；法文载《通报》第12期，1911年，第441—446页。
- P.戴密微译《黑城发现的早期出版物》（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柯兹洛夫藏卷汉文部分），载《通报》第51卷，第4—5期，1964年，第450—452页。
- L.翟理斯《大英博物院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伦敦，1957年。
- E.D.格林斯蒂德《西夏研究》，第1—10卷，（写本缩微胶卷）
- Hazai.G.和Zieme.P《回鹘文〈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刊本残篇》，载《Acta Orientalia》，第21卷，1968年，复制件I，第1—14页。
- Hazai.G.和Zieme.P.《〈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回鹘文译本残卷》（另有T.Inokuchi写的补遗），载《柏林吐鲁番文书》I，《古东方历史和文化文献》，第3号，1970

年，第1—75页，插图1—11。

P.伯希和：《柯兹洛夫探察队在黑城所得汉文文书》，载《亚细亚杂志》，1914年5—6月号，第1—20页（单印本）。

D.伯希和：《汉文书目注释提要》，载《法兰西远东学院通报》，第2卷，1902年，第315—340页。

M.威林格鲁瓦《〈刘知远诸宫调〉版本》，载《东方档案》，1960年第28期，第282—329页。

L. Wieger: Taoisme. Tome I, Bibliographie générale. L. 1911.

E. T. S. 沃纳《中国神话词典》，上海，1932年。

C. A. S. 威廉《中国艺术的手法和象征主义的百科全书》，纽约，1960年。

明河《补续高僧传》，载《大日本续藏经》，CXXXI, 1—2。

王伯敏《中国版画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1年。

《大正新修大藏经》，东京，1924—1928年，第1—85卷。

《道藏》，第1—112卷，上海，涵芳楼影印，1923—1926年。

井口泰淳《敦煌本〈佛名经〉的结构》，载《东方学报》，第35号，1964年，第397—437页。

念常《佛祖历代通载》，载《大日本续藏经》，CXXXII, 2—4。

《刘知远（金本诸宫调）》，〔北平〕，1937年。

《刘知远诸宫调》，北京，文物出版社，1958年。

《辽金元艺文志》，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

《辽金元传记三十种综合引得》，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牧田谛亮《中国佛教疑经研究序说——敦煌出土疑经类》，载《东方学报》第35期，1964年，第337—396页。

《中国医学大辞典》，谢观编纂，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

《中国版刻图录》第1至第8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61年。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

吴广成《西夏书事》，道光乙酉年镌（1825），小岷山房藏版；中华民国廿有四年（1935），三月，北平隆福寺文奎堂影印。

《新唐书》，载《四部备要》第76—79卷。

《四十七种宋代传记综合引得》，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丁传靖《宋人轶事汇录》，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

《宋吕氏庄子义》，第1—2卷，长州，1934年。

《宋史》，脱脱等修。载《四部备要》第81—88卷。

《宋史艺文志·补·附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

《四部备要》，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胡玉缙撰，王欣夫辑，上海，中华书局，1964年。

《大日本续藏经》，第1—150卷，京都。1906—1912年。

田中谦二《刘知远作散曲〈上高监司〉续考》载《东方学报》第31期，1961年，第293—320页。

傅增湘《跋宋本吕惠卿庄子义残卷》，载《北平图书馆馆刊》，第5卷第2期，第1—2页。

觉岸《释氏稽古略》，载《大正藏》，第49卷，第20375号，《大日本续藏经》，CXXXⅢ，1—2。

《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张世禄《中国音韵学史》，上下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年。

《五家正宗谈》，载《大日本续藏经》，CXXXV。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年。

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上下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

陈仁中《校辑吕注庄子义序》，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7卷，1934年第5期，第7—10页。

《二十五史补编》，第6卷，上海，中华书局，1955年。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

译者后记

本书根据原苏联科学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的俄文版《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节译。

1908—1909年间，以柯兹洛夫（П. К. Козлов）为队长的沙俄蒙古四川探险队来到中国进行“地理考察”。1909年5月，他们在我国的黑城（蒙语哈拉浩特，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南）遗址挖掘并运走了大量西夏文物。这批珍贵的西夏文物包括大量古代书面文献和器物。书面文献除了举世闻名的8千余件西夏文刊本和写本外，还有不少汉文、藏文、回鹘文、突厥文、叙利亚文、女真文、蒙古文等书籍和文卷，以及元代纸币。

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柯兹洛夫当年发掘的黑城汉文文献一直存放在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手稿部。直到80年代以前，公布于世的只有约50件。

苏联的学者从1957年开始，在前人编目的基础上，对这批黑城汉文遗书进行系统的整理分类和编写全面的叙录。他们从众多的文献中整理出488件。然后拼合成375个序号，著录为《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柯兹洛夫藏卷）》一书，由莫斯科科学出版社东方文献编辑部于1984年出版。这本书是对柯兹洛夫从黑城所发掘的11—14世纪的汉文写本和木刻本的首次完整叙录。这批黑城出土的汉文遗书包括各种不同的佛、道、儒

学典籍、文学、历史著作、字书、历书、医书、占卜书，以及社会经济文书和元代纸币等，特别是一些罕见的宋、金、西夏版印书籍和主要是西夏书籍卷首的木版画，均可称稀世之珍。它们不仅是研究西夏、宋、金、元朝政治、经济、科技、文化、艺术、法律、军事、宗教、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的宝贵文献，也是研究党项族与汉、藏、蒙等兄弟民族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的宝贵资料，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本书开首由作者写了“科学性的导言”，占全书的四分之一篇幅，反映了苏联学者的研究成果。作者在导言中对藏卷内容从十一个方面进行了分类研究，提出了许多精辟见解，例如对书籍和印刷史资料的分析就很有见地。作者还推测出土黑城文献的“著名的塔”，是西夏罗太后（仁宗的皇后，桓宗之母）的坟墓，塔中发现的许多书籍，都是罗太后的私人藏品，这类饶有兴趣的问题，亦可进一步加以探讨。作者对藏卷的叙录采用了科学的分类研究方法，这从目录中已反映出来，这里不必多说。作者对藏卷年代、性质、用途的考释既注意纸质、书法、术语、人名、地名、印章诸方面，也与历史文献进行了对比。因此能得出许多中肯的结论。遗憾的是书中未能将文献全文（特别是世俗文献）完整地予以公布。这对他人进一步研究造成了困难。但本书仍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在某些方面仍填补了不少空白。

本书作者孟列夫（Л. Н. Меньшиков，汉译名是他自取的中文名字）是前苏联科学院东方写本部1953级研究生，1955年正式参加工作。1956年东方写本部改称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建立远东研究组，孟列夫为该组成员，负责整理黑城出土的汉文遗书。1966年他任远东文献研究室负责人后，还从事敦煌文献的编目。由他主编的两辑《亚洲民族研

究所敦煌特藏汉文写本叙录》，分别于1963和1967年出版。孟氏的主要论著还有：《维摩诘变文、〈十吉祥〉变文》、《报恩经变文》、《论诸宫调体裁和〈刘知远诸宫调〉》、《黑城发现的早期出版物》（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柯兹洛夫藏卷汉文部分）等。1989年11月至1990年初，孟氏曾以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中国文学博士、高级研究员、敦煌学专家的身份来我国北京、兰州、敦煌、银川等地进行学术访问。

1984年中华书局总编李侃先生从苏联带回了这本书，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立即予以复印并分发有关单位。1986年底，甘肃省敦煌研究院委托我翻译此书。之后，我得到敦煌研究院、甘肃省教委、张掖师专、宁夏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他们在资料、科研经费和时间安排上给我提供了很多方便。敦煌研究院的段文杰、施萍亭、贺世哲、梁尉英、李正宇等先生，甘肃省教委的黄鸿昌、程耀荣先生，中华书局柴剑虹先生，张掖师专的向叙典先生，对本书的翻译和出版至为关心，想了不少办法。特别是宁夏人民出版社的徐庄、汤晓芳先生，深感中国在促进西夏学研究方面应负之特殊使命，宁夏出版西夏学研究著作应有之特殊地位，和出版社同仁一道，在经费困难的情况下，多方奔走呼号，组织出版包括本书在内的一系列西夏学研究专著，精神至为感人。她们还为译稿提出了很宝贵的修改意见。我谨向上述单位和各位先生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为节省篇幅，对佛教内容的叙录进行了略译，原书中出现的汉字是抄印的，其中有少数草字由于书写不清，或者本来就无法辨认，本书排印时一律用“？”代替。原书附录中的“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手稿部藏录号和本书叙录号索引”、“梵文标题、人名和术语索引”、

“写本和刊本年代索引”、“作品和章节汉文名称索引”、“汉文人名、地名索引”、“俄文译名索引”、“英文提要”等也一并从略。原书中的繁体字也一律改为简化字。

王克孝

1992年10月于银川

乃造論名為廣觀若以空生名為尊者理似不當以
不佳空生聞故疏迴此切德施群生者始從初聞空
廣釋所有之福觀與群生群者衆也生即四生此
衆生之異名也言略示等者結略指廣初之兩句結
疏略後之兩句指彼青龍大雲廣發自上凡聖皆有
迴向無者天親已知前釋青龍疏主迴向廣云妙理非
惠測意論略敷揚福善濟含生達證無所證大雲疏主
迴向頌云我承三寶加持力以讚甚深寶相義迴斯切
德施群生速到涅槃真法界公極鈔主迴向頌云我發
法中喜得讚般若心生大歡喜踊躍充滿身現存及
未來諸佛所依靈法界內衆生常願持般若清鈔主迴
向頌云欲讚甚深微妙理先熏眾聖身加持開演真宗
福田法界生靈普皆益

金剛般若經鈔第五

眼印功德廣大如虛空究竟如法界

皇龍安肅率土重登勾當者實相通神助緣

者孤靈猶瑞飛行大陸帶角披毛俱沐良因春

登樂岸 時大中祥符九年四月八日眼畢

其美行書萬部外郎知州涇州兼管內勅夏弟輕軍都尉信梁鳳施卷

觀文進莊子內篇義卷第二
養生主第三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隨无涯殆不
而爲知者殆而已矣爲善无近也爲惡无近
刑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身
可以盡年生之爲物隨形而有盡見有涯也知之爲物隨形而有盡見有涯也
殆而後已非所以安且久也知其反已於有涯而上其真所謂利知則殆身不殆有也已而後之知則殆其身矣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惡已
皆有所不知也
而止其所不知之
也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
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手之所至然鄉然奏
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有
文惠君曰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
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臣之
解牛之時所見无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
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
而心卻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
藝進乎道術入乎天機平旦以起操刀割此族
小月莫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牛
未聞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若新

新髮是戒耶 著髮是戒耶
是戒耶乞食是戒耶 止
命是戒耶如是觀已於
身無所取於修無所著

伏願慈航電激作沉淪
曠劫之津梁 寶錄
縣印社稷萬年之席福
莊宋太原王簡施

原藏录号 TK—185(本书编号 98),《大方广佛华严经》第十六品中间

一段经文和题记,1091 年宋版本。

自警文

在家修行錄

事親佛事

豪門佛事

軍門佛事

鄧中佛事

公門佛事

人生未悟歌

鎮陽洪濟禪院慈覺和尚勸化文并偈頌

門人

普惠

編

蓮池勝會錄文

夫以念為念以生為生者常見之所失
也以無念為無念以無生為無生者邪
見之所惑也念而無念生而無生者第
一義諦也是以實際理地不受一塵則
上無諸佛之可念下無淨土之可生佛
事門中不捨一法則揅攝諸根蓋有念
佛三昧還源要術示開往生一門所以
終日念佛而不乖於無念熾然往生而
不乖於無生故能凡聖各住自位而感

王壇子要

體用同時
 試將心比佛
 終同真妄
 注心要法門
 始與佛
 其性無異
 其法無異
 其理無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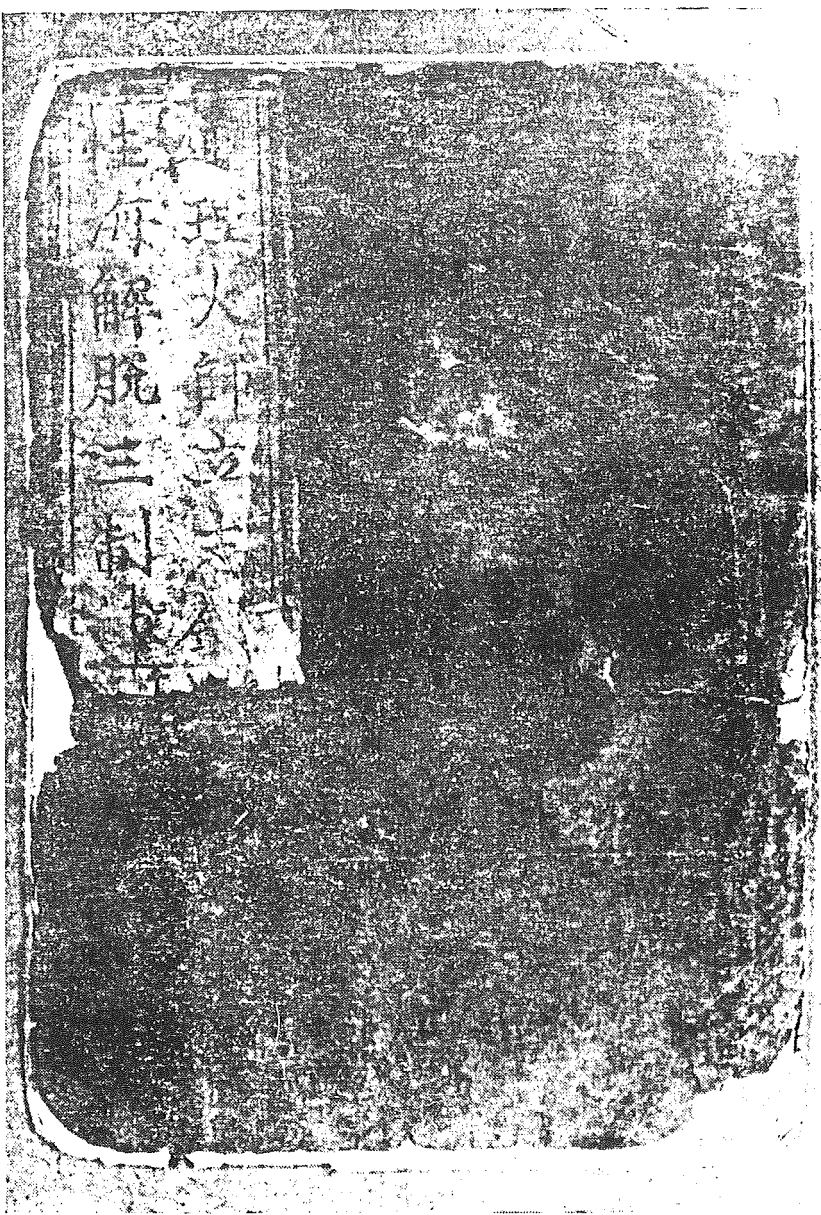


原藏录号 TK-186(本书编号 227),《注心要法門》部分版画,鈐有书主印记的正文尾和封皮包皮,十二世纪前二十五年的宋版本。

	次九五公	公	非難
享奉本定心			吉日庚午天 月空香香天 民日鳴吠時陰 有招集時良幼 會親姻時行
享奉本尾			音歲任天 聖聖聖聖 舍字印
言中水破集			大結天 代日五 師衣與
言中水危斗落			音歲對 守日律 星羅埋

			吉日歲對
言中水危斗落	應		三會齊明星司 四相星運高會 藥尊神傳會
言中水危斗落	聖	辟泰	天魁重日劫教 勾陳黑道 嫁娶開倉長 詞訟遷居集
言中水危斗落			天獄 不宜論訟
言中水危斗落	歸	甲	吉日歲對 執儲明星 祀神祇 時命

原藏录号 TK-297(本书编号 309), 历书残片, 十二世纪的宋版本。



原藏录号 TK-134(本书编号 279), 通理的作品封皮, 1127 年前的宋本。

真州長蘆了和尚勅外錄

侍者 德祐 義祐 編

上堂僧問三世諸佛向火爐裏轉大法輪還
端的也無師呵呵大笑云我却疑着僧云和
尚爲甚麼却疑着師云野花香滿路幽鳥不
知春僧禮拜師云今日遭人毒手
師乃云柳眼爭芳風煙混秀未露處密殺春
色不萌時暗滌溪光寒晶擲子哥謠野渡漁

東

二

人鼓腹所以道正則龍嶺異寶偏乃鶴宿銀
龍且道不落正偏作麼生相委良久云萬機
休罷處一曲韻無私

上堂僧問如經蠱毒之鄉水也不得露他一
滴未審此意如何師云及盡始通身僧云通
身後如何師云方知撲不破

師乃云不假舌頭說熾然無間歇深密密處
光彩頓生明歷歷時混融皎潔若也和身放

咄咄咄咄咄咄咄咄咄咄

余時興盡意甚懽。即從座起。

偏袒右肩。合掌向佛。所作畢。

信止尊觀世音菩薩以何因

錄名觀世音常告樂業蓮華

1949年10月1日

10

揭諦本宗剛 扶掖建法幢

恒來原尊勝 必作真尊最

無邊無中際 無短亦無長

般若波羅密 乃代古今常

夾頌心經一卷

血聞般若及心經者實謂難得

之尚好齊出濟之正航投物道迷途

其為東家親茲誠要遂欲誠心意願

無過之言用贊父母同姓之德今則

特捨事蹟懇求良工開刻投成弗施

舍識教使 佛種不斷善業長流

廣廣善哉離苦得樂常生諸剎常

恬果因願隨 殊勅以當來願值

此華王血相見然後福露沙三不利反

自識七佛皆蒙比益

廣廣善哉發安身事願 陳善施

原藏录号 TK-158(本书编号 175),《夹頌心經》经文尾和题记, 1073

年的西夏版本。

功一切諸大菩薩無垢普賢菩薩而為
上首一生補處住薩頂位諸大菩薩及
餘十方種種世界普來集會一切刹海
極微塵數諸菩薩摩訶薩眾大智舍利
弗摩訶目犍連等而為上首諸大聲聞
并諸人天一切世主天龍夜叉乾闥婆
阿脩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
人等一切大眾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
受奉行

大方廣佛花嚴經卷第四十

大德寺講主演妙大德少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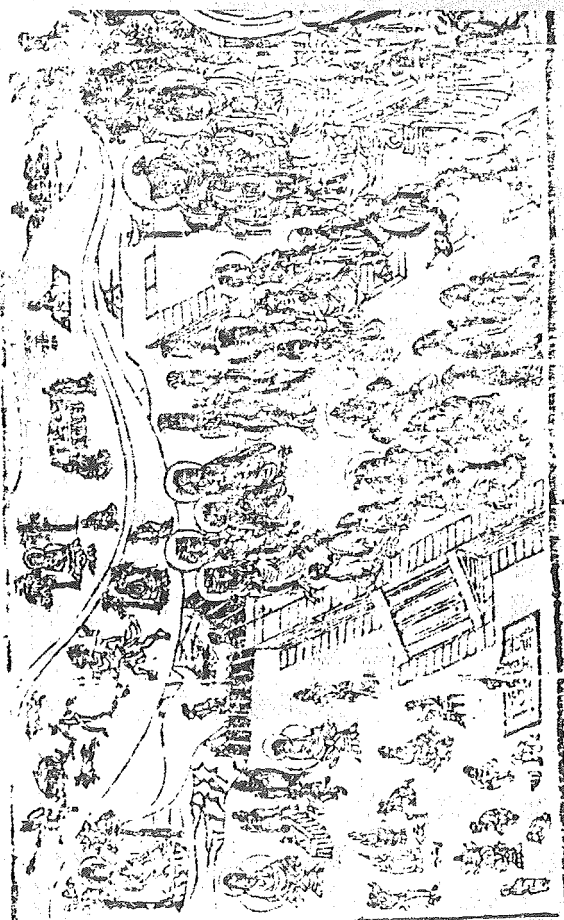
寶號

收訖此經功德

大正十年八月 日奉通

上敷四重恩 下濟三途苦 普救諸塗炭 廣發善根識

永絕煩惱行 興大慈有量 滅除諸業罪 速證菩提因



奉天賜道經式宣文神錄
智制義去邪降曉然恭皇帝

妙法蓮華經和傳序 一一一

終南山釋道宣述

妙法蓮華經者統諸佛降靈之本致也蓋
結大夏出彼千歲東傳震旦三百餘載西
晉惠帝永康年中長安青門敬坐菩薩竺
法護者初翻此經名正法華東晉安帝隆
安年中後秦弘始五慈沙門鳩摩羅什次
翻此經名妙法蓮華隋氏仁壽大興善寺
三藏法師玄奘所翻其多彼所證者同名外

原藏录号 TK-1 (本书编号 67-1),《妙法莲华经》卷第一,有皇族肖像的版面部分和经文开头,1146 年的西夏版本。

座上普賢若於後世受持讀誦是經典者
 是人不得貪著衣服卧具飲食資生之物
 所願不虛亦於現世得其福報若有人輕
 毀之言汝在人耳空作是行終無所獲如
 是罪報當世世無眼若有供養讚歎之者
 當於今世得現果報若復見受持是經者
 出其過惡若貧若不實此人現世得白癩
 病若輕笑之者當世世牙齒疎缺醜瘠平
 鼻手腳瘰癧眼目角昧身體臭穢惡瘡膿
 血氣短氣諸惡重病是故普賢若見受
 持是經典者當起遠迎當如敬佛說是普
 賢勸發古非恒河沙等無量無邊菩薩得
 百千億施陀羅尼三千大千世界微塵
 等諸菩薩具普賢道佛說是經時普賢等
 諸菩薩舍利弗等諸聲聞及諸天龍人非
 人等一切大會皆大歡喜受持佛語作禮
 而去

妙法蓮華經卷第七

妙法蓮華經者入不思量之妙法也故云妙法蓮華經
 性之無知失此遺法官者心之闇障以義
 旨隱顯示悟入之門經後卷經之中亦有
 之內二十八品皆經之寶藏之寶七之寶藏
 言微之理洞究而須華七喻力彰而存早三周誦之
 則去獲紅蓮於憶年秋之則以收華光於滿三誠愿
 問之南輪真苦海之津源今有清淨弟子離字入王
 誓愿三寶聞贊華海事約理義同義以友特盡微誠
 以上敬宗室神史臺正身奉為緣之旨命上鎮頂
 其日費飲之類皆宋室誦之贈印斯經一部普
 一切同形支持以茲功懋快服 皇基永固同福
 之生 片時壽壽德康天之事是經在之無經
 周極之狀情願大夏人聚三年於此因實上

原藏录号 TK-11 (本书编号 67-7) 《妙法莲华经》卷第七，经文尾和

题记。



諸淨土中若入流本
 其水族眾生上浴
 罪惡住生佛國又入相續善
 六至聖天子誦持章句
 生之厄若壽終者見獲延壽
 白塵亦復不墮三惡苦報中
 記為佛嫡子若此之類功勳
 觀效應因倍激誠無違命之
 印道漢一萬五千卷普施國內
 志心者歸虔誠頂禮亦無
 服每當錫意而誦持致遂其
 修業善開闢自具求之大放
 之理候讀經不絕於調聲掛
 大藤應千國內之聖像中
 金粧過施設供之法對不
 實會致
 之心志竭誠
 一旦可叶悉

後序
 雲卿博瞻懿恭 皇帝

一七 永通無量門

皆有照無盡

一念與通無量界

生死涅槃同一塊

山河石壁不相妨

即此智通無量間

法界

法華嚴法界觀門卷下

恭惟

盧現稱性發百千偈之大經彰生佛也無二如一時

時雨甘苦自分

曼殊化身隨機設三十重之妙門明階降也非一似三

渡河淺深各異是故 定慧祖師歎云奇哉顯設文約義曾

理深事簡以利注釋其義引學者擊其門至于悟入大經

法界則方通相虛萬象性實一真也 相國裴公製序指

惑者謂斯法門都可謂入聖玄術出凡要路意偏詞存

易尤析舉綱提綱此原經云張大教綱於生此之觀文若唯注

而不科如無綱之綱若但科而不注如無綱之綱科注

軸轅勞披覽故有先賢移其科格以就觀文既觀下有

注文上有科三者備矣一經顯焉使諸修觀之徒講宣之信

無煩目移科之意其在茲乎今者獲其幸居

帝望喜遇良規始欲修習終難得本以至口授則音律

去傳寫者句文脫誤致難學心必成大失是以恭拈蒙

募玉鑲板印施流通備諸學者若持若誦情盡見除或

見或聞功或獲智即止上樂通觀法界延

龍筆於皇家羅

福星亦宜無道如堯舜上風與等華嚴之遠趣則為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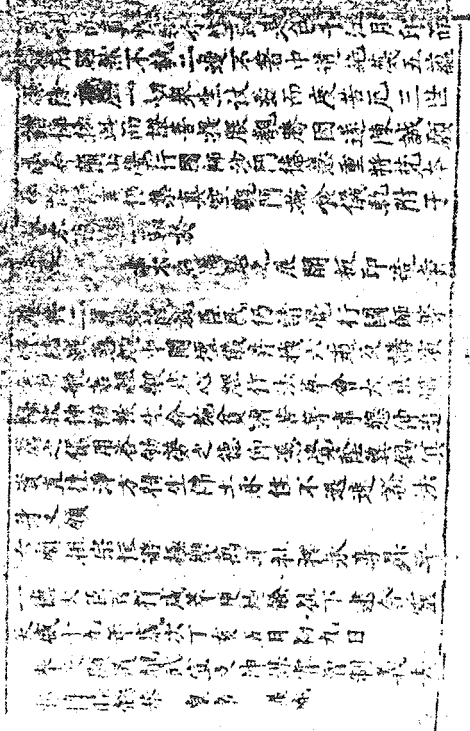
性反一真不問寬觀將來無對簿具余情悉如我願

大國說中欲垂慈照者也

皇朝天監四年庚子年八月望日巧直沙門釋法惠敬

鄉州縣元寺僧西安州歸義司主簿張中文謹就

聖節敬誌



原藏录号 TK-128(本书编号 182),《佛说圣佛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版画和题记末尾,1167 年西夏版本。

受奉行

佛說金輪佛頂大威德熾盛光如來

羅尸經

羅睺星真言

每月會降下

唵囉嚩囊 柯獲羅囉嚩野

身壽升疆

金枝 鬱茂重見千秋靈動令靈

法界存立齊成

佛道

眼經善友舉



尚座系宗鑒

伏授人主言此

雲平陳用 李授事 杜信忠 張德

杜慶忠 杜用 牛智惠 張用 杜德勝

杜宗慶 許忠義 張師道 等

明倫出辰壬子八月初一日重刊板印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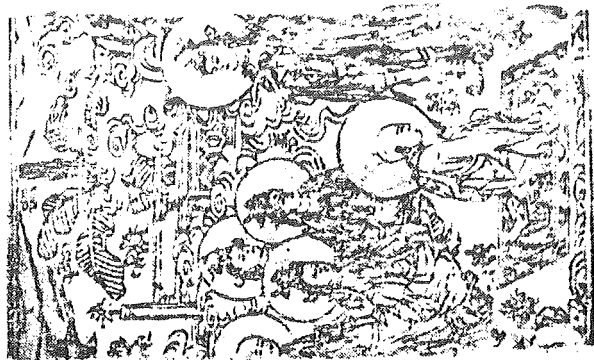
原藏录号 TK-129(本书编号 184).《陀罗尼经》题记,1184 年西夏

(兰山)版本。



中常轉不疑嘉法論解有解
諸州敬受于有僧歸奉洲觀友諸股店僧与一僧同席見此情
問主人索酒肉歌之其歡樂寺僧怒而呵之續見其僧還續
音通華嚴經口角兩邊俱致光明狀若金色誦
至五供已上真光漸收却入僧口 三禪師修德卓然
篇此經聞由之時金工建生於舌表 佛元元年
光遠照徹百餘里
常滿華嚴忽然坐化三年墳上生如星
草石發墳破棺見從舌上而生光

西夏三
三十三



原藏录号 TK-124(本书编号 11)《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版画和题记

末尾,1167 年西夏版本,

乃度生之根本予論道之暇恒持此經
每出誠心萬生實信今者災速伏累疾
病纏綿日月雖多藥石無効故陳誓願
鏤板以施仗此勝因冀資真祐儻或
年未世速愈沉痾必若運數難逃早生
淨土又願
邦家鞏固曆服延長歲稔時豐民安俗
阜常川滋穡悉除有禍之因沙界含靈
並羅無為之果時天咸十九年五月 日
太師上公總領軍國重事秦魯國王 謹願

於福履然後滿朝
慈光四海存亡俱
白高大夏國乾祐
甲辰九月十五日
奉天顯道耀武宣文
制義去邪惇睦懿

梵云 呵吟拽
磨帶薩咄 捺
捺 須得囉
此云聖大乘勝意

蘭山智昭國師沙門

奉天顯道耀武宣文神謀睿智制義去

敬礼一切諸佛
如是我聞一時

佛說聖大乘三歸依經

蘭山智昭國師妙門德慧奉譯

奉天顯道燿武宣文神謀睿智恭皇帝謹定

敬禮最上三寶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

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

百五十人俱集

每日誦持供養所獲福善伏願

皇基寶運彌昌

藝祖神宗莫齊登於覺道

崇考皇妣祈早往於淨方

中宮永保於壽齡聖嗣長增

於福履然後滿朝臣庶共沐

慈光海存亡俱蒙善利時

白高大夏國乾祐十五年歲次

甲辰九月十五日

奉天顯道燿武宣文神謀睿智

制義去邪惇睦懿恭皇帝施

原藏录号 TK-121(本书编号 179),《佛说圣大乘三归依经》题记,

1184 年西夏(兰山)版本。

念此陀羅尼一連所求
 者如一俱胝佛在於一霎
 天一劫而亦不能數盡功德
 若有人書寫此六字大明王
 陀羅尼者則同書八萬四千
 法藏若有人以天金寶造作
 如微塵數佛像已一日中慶
 讚供養所獲果報不如寫此
 六字大明王陀羅尼中一字
 所獲功德然此陀羅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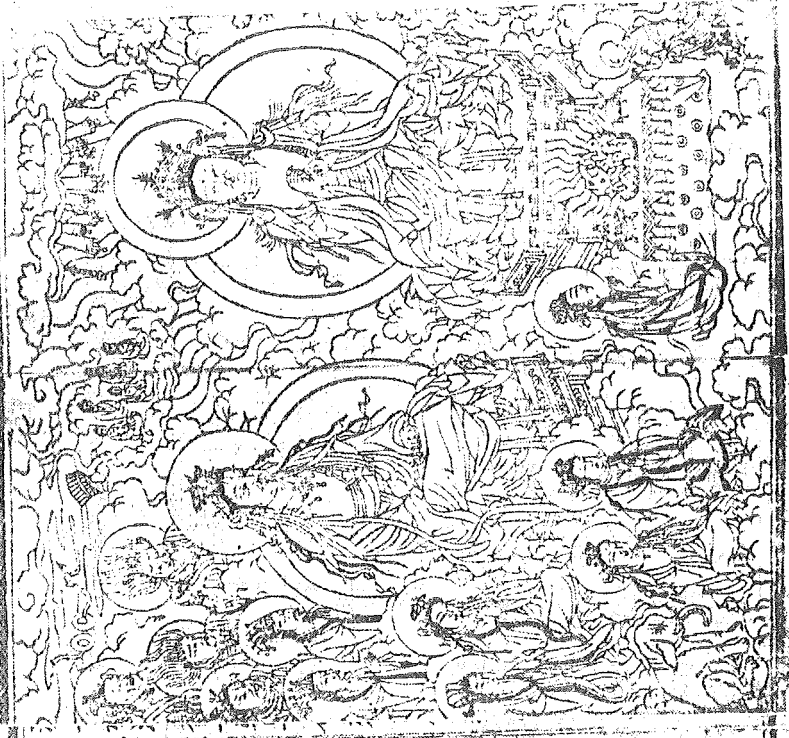
一切諸佛菩薩之所苟未老
 念一遍即同供養一切諸佛
 如是功德不可具述即說陀
 羅尼曰

唵麻祢鉢捺鉢
 三 卍 卍 卍 卍

六字大明王功德略
 尊勝心呪 唵沒隆二莎訶

乾祐乙巳十六年季秋八
 月十五日地丘 智通 施

原藏錄号 TK—136(本书编号 187),《六字大明王功德略》经文末尾
 和题记,1185 年西夏版本。



大非小塵塵諦了 此華嚴經是不思議之典非情
 佛於一微塵中帝轉如 皇所拘說入說小經云十方諸
 是無盡法輪無有間斷 **金光孕於口中** 上元年中洛
 僧歸洛州觀友將投店宿為一僧同宿見此僧問主人榮
 酒肉戰之其服安事僧烈帝列之續其僧誠發其音
 華嚴經口角而遠俱被光明狀若金色通至五快已上真
 光顯似卸入僧口之時 **無連生於舌表** 如意元年漳
 感喜焉此經讀之時 又神師修德專慕華
 金光遠照襟袖餘里 **無連生於舌表** 州有尼戒行
 持苦常誦華嚴忽然坐化三年墳上生紅蓮
 五葉圓鼓破聲見提舌上而生光彩鮮明

大正七年十二月歲次己酉五月五日

正宮 集賢羅氏謹施

翠頭頂印聞法音令發無上不退堅固之心得
超九十億劫生死之罪聞名號則不墮黑暗邊
地之眾若歸依則必預成道授記之中佛言未
來修此眾主亦得弥勒攝受感佛奧理鍾振斯
經謹於乾祐己酉二十年九月十五日恭請宗
律國師淨戒國師大乘玄密國師禪法師僧眾
等就大度民寺作求生兜率內宮弥勒廣大法
會燒結壇作廣大供養奉廣大施食并念佛誦
咒讀西番番漢藏經及大乘經典說法作大乘
懺悔散施番漢觀弥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一
十萬卷漢金剛經普賢行願經觀音經等各五
萬卷身銀僧放生濟貧設因諸般法事凡七晝

夜所成功德伏願 一祖 四宗證內宮之寶位
宗考 皇妣宣聖率之蓮臺曆數無疆宮闈
有慶不穀享黃髮之壽四海視昇平之年福同
三輪之體空理契一真初言絕謹願

奉天顯道耀武宣文神謀睿智制義去

邪傳陸懿恭 皇帝 謹施

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須菩提所言法

相者如來所則非法相是名法才

應化非真分第三十二

須菩提若有人以滿無量阿僧祇世界七寶持

用布施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發菩提心者持於

此經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為人演說其福

勝彼云何為人演說不取於相如如不動何以

有如是說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

如是觀佛說是經已長老須菩提及諸比丘比

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一切世間天人阿脩羅聞

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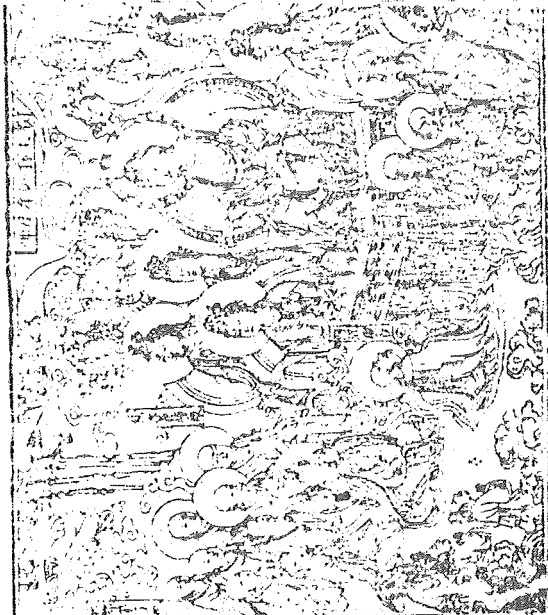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大夏乾祐二十年歲次己酉三月十五日

正宮 皇后羅氏謹施

原藏录号 TK-14 (本书编号 18),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经文末尾和

题记, 1189 年西夏版本。



修行此法永無諸難疾諸苦損

恭聞竺乾大覺特開甘露之玄門沙

界含靈普獲真常之寶藏今斯

轉女身經者上乘秘典了義真詮談

無相無名之妙心顯非男非女之真

性大權應跡石脇化生權天帝不受

珠衣控聲聞真談妙理慈觀獻蓋華

此世之洪恩諸婦轉形酬多生之育

德聞經歡喜定轉女身信樂受持速

登聖果今皇太后羅氏自惟生居

末世去聖時遙宿植良因幸逢真教

每思

三宗之厚德仰憑法力以薦噴遂於

原藏錄号 TK-8 (本書编号 146), 《佛說轉女身經》有皇族肖像的版
画部分和部分題記。

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

普賢行願品

蜀賓國三藏般若奉 詔譯

余時普賢菩薩摩訶薩稱歎如來勝功
德已告諸菩薩及善財言善男子如來
功德假使十方一切諸佛經不可說不

度僧西蕃番蓮二千貢

散齋僧二萬三千九百貢

放神幡一百七十一口

散施

入塔成道像淨除罪障功德共二

萬七千二百七十六楨

香漢轉女身經仁王經行願經三

九萬三千部

數珠一萬六千八百串

消演香漢大衆經六十一部

大衆懺悔一千一百四十九遍

是大衆言下應有之益也

作宮入

散四萬五十二夾

設齋六十五夾

放生羊七萬七千七百七十九口

大散一夾

原藏录号 TK—98(本书编号 123),《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四十, 经文
开头和部分题记,1196 年西夏版本。

六字增壽大明陀羅尼經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

卿傳法大師臣施護奉詔譯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

祇樹給孤獨園余時尊者阿

難有大疾病佛自知己即詣

彼所敷座而坐告阿難曰

就最上增益之法阿難聞已

信受奉行

聖六字增壽大明陀羅尼經

右願印施此經云百余卷寶薦

正靈父母及法界有情同往

第方

昔大夏天慶七年七月十日

袁子仇等謹施

原藏录号 TK—135(本书编号 155),《六字增寿大明陀罗尼经》经文

开头和题记,1200 年西夏版本。



三
 達
 藏
 經
 高
 坡
 無
 二
 門
 直
 鑄
 奉
 僧
 智
 寶
 宿
 方
 良
 銀
 奉
 隆
 命
 工
 鑄
 於
 辰
 三
 年
 月
 日
 庚
 子
 年
 歲
 次
 癸
 卯
 中
 之
 官
 不
 能
 定
 庚
 子
 年
 歲
 次
 癸
 卯
 中
 之
 官
 不
 能
 定
 庚
 子
 年
 歲
 次
 癸
 卯
 中
 之
 官
 不
 能
 定

美書卷

時至建元元年十一月十五日

聖德太子達摩法師

門子智寶謹誌

21

聖天智國

東晉書

原藏录号 TK-21(本书编号 149), 经集、版画和带有印记的题记结尾, 1210 年西夏版本。



大方廣佛華嚴經梵行品

唐于闐國三藏實叉難陀譯

余時正念天子白法慧菩薩

言佛子一切世界諸菩薩

衆依如來教染衣出家

無有休息行無上業不求

果報了知境界如幻如夢

如影如響亦如變化若諸

菩薩能與如是觀行相應

於諸法中不生二解心切

儻法疾得現前初發心時

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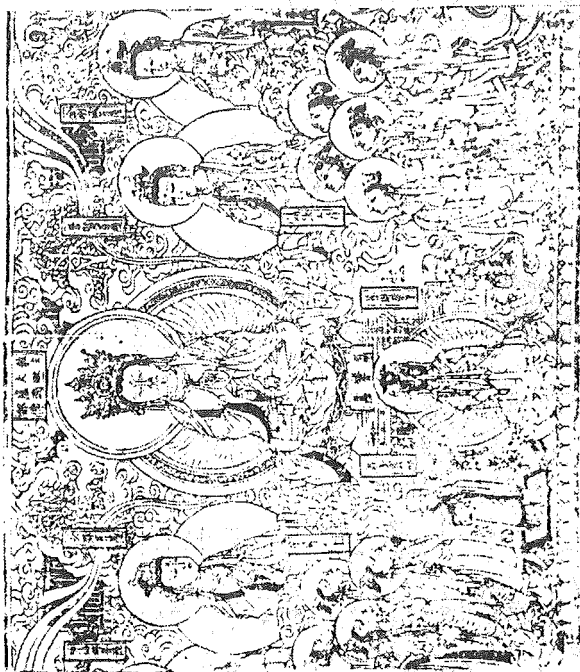
提知一切法即心自性成

就慧身不由他悟

大方廣佛華嚴經梵行品

原藏錄号 TK-246(本書编号 99),《大方廣佛華嚴經》第十六品经文

开头和结尾,十二世纪中期金版本。



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疏序

大原府崇禎寺沙門 澄觀奉 詔 述

大哉真界萬法資始包空有而絕相入
言象而無迹妙有得之而不有真空得
之而不空生滅得之而具常緣起得之
而交映我佛得之妙踐真覺廓淨塵習

歷四十九年讀聲不絕大般若數十部至終七之辰

詮義法師設樂師瑠璃光七佛供養惠照禪師奉

西方無量壽廣大中國西大禪師提點等九結城

愿趣聖朝六道法事廣此功德伏願

帝統延昌遍山呼之景肇

宮大福身功德之崇光

傳為贊

原藏录号 TK-142(本书编号 106),《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四十, 版
画、经文开头和题记结尾,十二世纪中期金版本。

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佛告須菩提。若有人
 何況其少。須菩提。我今當以言告汝。若有
 言男子善女人。以七寶滿於所恒河沙數
 三千大千世界。以用布施。得福多不須
 菩提言甚多世尊。佛告須菩提。若善
 男子善女人。於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
 等。為他人說。而此福德。勝前福德。

尊重正教分第十二

金

十

復次須菩提。隨說是經。乃至四句偈等。當
 知此處。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皆應供養
 奉佛塔廟。何況有人。盡能受持讀誦。須
 菩提。當知是人。成就最上第一希有之
 法。若此經典所在之處。則為有佛。若

尊重第十

如法受持分第十三

須菩提。當知此經。當何處受持。

小腸腑論第一

風眩方第四

野忘方第七

小腸虛實第二

風眩方第五

古論第三

驚悸方第六

小腸腑論第一

腸腑者主心也古其甚微也心所以合氣於小腸小腸者
 府之腑也膀胱者主重二斤十四兩長二丈四尺大腸二十四
 分左迴腸積環及十四曲定脈和利精神者求於之氣腸
 胃之中常留水穀二斗四升其外則脈所以應之二十四
 脈心應度其厚則脈厚脈厚則小腸厚皮薄則脈薄脈薄則
 小腸薄皮厚則脈緩脈緩則小腸大而長皮薄則脈急脈急則小
 腸結也心前之脈接於小腸心夢不已小腸急之止小腸急者
 俱出也及至食七日死者水穀氣津液皆亡矣篇篇云小
 腸經不流六日死何以知之長直如繩不得屈伸汗出不止
 陰與太陽相表裏所以表里氣通須臾不通故食下腸實而
 見其火府實而不滿實則傷熱熱則口張口為之生瘡虛則傷
 寒則利便泄瀉或發其水其根在小腸起方在治水方中
 腸有寒其人大重便溏有熱氣必痔小腸有積食留滯於
 胃復止小腸病者小腸痛腰脊痠痛而痛時發之後月則甚
 其甚者獨有小積甚者全小拍次拍間熱若脈沉此其候也小
 腸經引臍上衝心邪在小腸者連臍係屬於脊背肝肺絡心系
 臍盛則臍連上衝動肝散於胃結於舌厥取之舌下以散之按
 所過之經以調之小腸脈者小腸脈張而痛脈急者各按小
 腸則其脈急而痛主太陽之脈動則其脈急而痛不可回頭目似按
 臍似按黃帝曰主少陰之脈獨亡者何也岐伯曰少陰者主
 五臟六腑之大主也心為神之主神之所舍其藏固邪不能
 入心之包絡包絡者心主之脈也故少陰無病也黃帝曰

天有大慈悲者

汝為利益有情故

具足智身妙吉祥

諸真實名是大益

能作清淨除罪業

於我精數應諦聽

善哉善哉持金剛

手持金剛汝善哉

聚主我為此事故

為汝巧妙令宣說

汝今一心應諦聽

唯然末阿變善哉

復次釋迦出有壞

一切眾咒大種性

眾咒明持種性

於其三種全觀察

世間及出世間性

顯作世間大種性

殊勝廣大手印種

大種大善應觀察

言詞之主演偈頌

眾咒王名具六種

將令顯出於無二

無生法者自宣說

密門依倚引鳥龍身談讚阿嚩歌

密門依倚引鳥龍身談讚阿嚩歌

密門依二名咒聖名依

密門依二名咒聖名依

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

〔俄〕孟列夫 著 王克孝 译

*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银川市解放西街105号)

宁夏社会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

开本：大32 印张10.3125 字数248千字

印数：1—500册

1994年11月第1版

1994年11月第1次印刷

*

ISBN7—227—01424—X/K · 134

定价：10.80元